

直面中国人口危局，发出时代最强呼声！
不能不读的人口学经典！

易富贤◎著

大国空巢



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Big Country
With an Empty Nest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易富贤◎著

大国空巢



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Big try
With an Empty Nest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 易富贤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80234-856-1

I. 大… II. 易… III. 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研究—
中国 IV. C9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2460号

书 名：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著作责任者：易富贤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7-80234-856-1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960mm 1/16

印 张：23.75

字 数：440千字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联系电话：(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我社于2011年出版了国内著名时评人童大焕老师的心血力作——《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在编辑书稿过程中，我们见到童老师几次提到一本名叫《大国空巢》的书。好奇起见，我们去卓越网搜索该书，但奇怪的是，搜索结果中并没有该书的相关信息。于是，就去新浪微博直接联系该书作者——易富贤老师。经过与易老师的沟通，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本《大国空巢》只是在香港出版了，并未在内地出版。考虑到人口问题如今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感觉有必要出版一本全面分析我国人口现状及人口政策的图书。同时，在卓越网搜索该书时，只要输入“大国”两字，便会出现“大国空巢”的搜索提示，可见很多读者对该书有所期待。综合上述两点，我们认为应该给《大国空巢》出个内地版。

一番简单说明后，易老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出版邀请，并答应愿意根据我们的出版建议对《大国空巢》进行修订。比较而言，内地版《大国空巢》持论更温和，内容更精简，数据更扎实，观点更明确，如易老师在本书自序中所言：“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本书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銃’……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可以说，易老师在内地版《大国空巢》中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我们相信，这样一本心血力作，应该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好评。易老师曾于2012年5月3日至6月19日在国内受邀做了24场讲座，已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易老师根据本书内容所制成的幻灯片，目前已有14421598次点击、53344个回复（见<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

ardid=1&star=1&replyid=6618931&id=6618931&skin=0&page=1)。正如易老师本人所言：“新版本更加完善（有大量内容没有上网），完全做到有理有据，应该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在本书中，易老师结合世界人口的相关背景，介绍了文明兴衰的人口因素，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背景及中国人口现状作了细致分析，并对中国的人口作了合理展望。我们认为，易老师的研究态度是认真的，其忧国忧民的恳切之心跃然纸上。当然，由于研究方法、视角及环境等因素，易老师的观点、结论未必能获得普遍（包括我们编辑）的认可，甚至会被有些读者视为极端，并给予激烈的批评，但我们认为，争论本身具有极大的意义，而真理往往是在多次的争论中凸现出来，学术上的错误完全可以通过学术的争鸣得以澄清。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唤起大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合理反思，从而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裨益。

BIG COUNTRY WITH AN EMPTY NEST

自序

我家居湘西农村，高山的阻隔，使得一些传统生育文化得以保留。因此，我童年接受的人口观教育是分裂的：一方面是“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计划生育宣传。

1999年，我来到美国，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误区；2000~2002年，在海外论坛零星地发表过一些文章；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对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系统的反思；2003年，正式“登陆”中国大陆的论坛，同网友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一文，其被很多网站转载，并被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修改后发表，这标志着民间批判性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兴起。应《嘹望东方》记者的要求，我将过去几年的观点浓缩为9万字的文章，后将其发表在《光明观察》。截至2004年底，我关于人口研究的文章在大陆网站的浏览量至少达到上百万。

2004~2006年，我在论坛上发布的帖子很多点击量过百万，累计有数千万网络读者，在内参也发表过一些文章。2006年，我将过去几年的观点浓缩成40多万字的《大国空巢》，于2007年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并将内容制作成幻灯片，在网上传播，仅在凯迪社区就有一千多万点击量。同时，不少大学开始在课堂上讲授《大国空巢》的部分内容。

2003年刚“登陆”大陆论坛时，我的观点遭到网民一面倒的反对；但到2006年，网络民意基本逆转，网络地摊变成了连锁店。此后，在所有网络投票中，都是一面倒地支持调整人口政策。比如，我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上提交的《停止计划生

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了4万多人的支持和796人的联署，只有数百人反对，成为“第一提案”。

这些年，我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送资料。2010年“两会”前，给200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邮寄了1万多字的资料。2011年“两会”前，给几乎所有（近5000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几乎所有（上千位）省部级官员邮寄了彩色印刷的《大国空巢》幻灯片和文字资料，希望通过法制途径对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调整。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出来后，我应国家发改委主管的《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的邀请，花半年多时间完成了一个10万多字的报告（后分别浓缩为5万多字和1万字两个报告，并予以发表）。该报告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我回国做了13场讲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改革内参》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燕山大讲堂、天则经济研究所、“乌有之乡”网站、传知行所、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2012年，我回国做了23场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观察报》报社、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大学、郑州思想沙龙、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株洲图书馆、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广州中医药大学、《时代周报》编辑部、第一财经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这些讲座内容也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框架来看，本书与香港版《大国空巢》一样，都是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揭示大国空巢的人口危机，这是一本“旧书”。但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本书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因此这又是一本“新书”。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銃”（不过“杀伤力”还是蛮大的，过去几年人口变化都被我“不幸言中”，而与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集体结论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在战略上“瞄准”了，而计生委的“大炮”却故意“打歪”了），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

几十年来，“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就业压力”等理论，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很多人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

不得已的选择”。针对于此，本书以事实判断摧毁了这一枷锁，盼能有助于重建大众的价值判断以及生命人伦底线。

意识形态是“如何活”（多样性），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统一性），本书强调了人口的重要性，但我要申明的是：人口是文明发展、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今后，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将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人口太多”，也不能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总体来说，我是用“局外人”的视野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地理上，我来自“化外之地”湘西怀化，宋朝时由“蛮峒”改名为“怀化”（取“怀柔归化”之意，又有“怀抱天下，化育万物”之意）。以雪峰山为界，湘西又分为沅江流域和资水流域。沅江流域山高水急，民风剽悍，豪强并起，有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傲骨和豪气（比如执拗的沈从文）。而资水流域则更有忧愤深广的济世情怀，涌现出魏源、蔡锷、陈天华等一大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之士。此外，被流放、贬置、囚禁湘西的历史名人不下百人（如屈原、王昌龄、刘禹锡、魏了翁等），因此又增添了“长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流放文化。

湖南三湘四水，我算是喝三水长大的，家乡在资水上游（沅、资分水岭）。高中在沅江边（黔阳古城）读的，大学在湘江边（长沙）读的。就像三水对我身体的影响一样，资、沅、湘文化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我骨子里既有沅江文化敢于挑战主流的“造反精神”，又有资、湘文化的家国情怀。这些年，我一直处于忧愤之中，有时甚至会泪水长流。由于我在学术生涯最黄金的十多年“不务正业”，对专业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些湘雅老教授曾多次责我辜负了老师们的期望），国内外控制人口的组织也不乐见我的研究，因此我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若没有我太太全方面的支持，我很难坚持下来。考虑到人命关天，我在煎熬中欲罢不能，感觉必须对人口危机发出呼声，并广而告之。

我是湘西山里人，家乡在海拔700~1200米的雪峰山腰（几十里外的山谷海拔只有100多米），习惯于登高远眺。我的童年农村生活与两千年前的先祖没什么差别，后面到长沙读大学，到美国工作，人生经历算是数百年工业革命的缩影，既“历史”又“国际”，同时也见证了人类生育模式的转变。目前，发达国家大多还在“低生育

率”的悬崖下挣扎，而美国已经攀上了悬崖，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站在美国国土上研究人口问题，可能会比在其他国家拥有更宏阔的视野。

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无关，算是“化外之学科”，但是却让我能根据“生生不息”的生物学原则，从“生老病死”多维度看待人口问题，并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如寻找多种“诊断”生育率的社会发展指标，根据“外科无菌操作”原则，将“无菌”数据（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与“污染”数据隔离，用“手术刀”逐层解析人口数据（读者从冰冷的数据里可能会读出凄凉的故事，读懂我的愤怒）。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我能在业余时间研究人口问题。“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在人口研究方面没有申请科研基金、发表论文的压力，不怕得罪学术圈子，不用看政府官员的眼色，因此也不会像一些人口学者那样因“心为形役”而受制于各种条条框框。我的动力其实只来自忧愤和兴趣，这种局外人的视角让我比一些人口学者更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但就计划生育政策而言，我始终又是在局内。在我刚记事时，家乡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实行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我曾目睹了很多极端案例。这些年，很多网友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由于有这些“显微镜”，我比那些用“望远镜”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海外学者更具微观视野。

最后，我诚盼此书能引发更多人对人口问题关注，“生生不息”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的建立，需要全民共同参与。

易富贤

2013年1月15日

BIG COUNTRY WITH AN EMPTY NEST

目录

第 1 章 世界人口历史和展望 / 1

一场瘟疫、战乱足以毁灭繁衍了上千年的家族，比如1618年至1648年的欧洲30年战争加上黑死病，欧洲人口减少一半。1492年的时候，美洲有五六千万印第安人，但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由于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天花等传染病，人口减少了90%。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支柱 / 2

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 / 3

近代人口爆炸 / 5

美洲作物对中国清朝人口的影响 / 7

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 / 9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 11

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 / 13

“人口灾难”的狼真来了，但不是大灰狼 / 16

世界人口展望 / 19

第 2 章 文明兴衰的人口因素 / 23

两次出生高峰奠定了美国强国的地位。但是由于经济衰退等原因，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的生育率已经由2007年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1988年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的1.89，2011年的育龄妇女出生率为1920年有记录以来最低。

先哲谈人口与文明的关系 / 24

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 25
罗马帝国灭亡的人口因素	/ 28
人口优势避免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 33
吐蕃、蒙古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 34
印第安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 37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 38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人口因素	/ 44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的人口因素	/ 46
“日”薄西山的人口因素	/ 48
俄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 50
苏联解体的人口因素	/ 52
俄罗斯人口政策的教训和经验	/ 56
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 59

第 3 章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背景 / 63

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停止增长。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

二战前：从种族主义、优生学到人口学	/ 64
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的兴起	/ 68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角色	/ 71
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	/ 74
计划生育思潮西风东渐	/ 79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思想的交锋	/ 82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	/ 85
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 87
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 94
计划生育后果始料不及	/ 98
中国人口学的建立	/ 100
美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 106

第 4 章 中国的人口现状 / 111

2000年11月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只有12.6583亿（其实还有水分），根本没有13亿，说明以前的预测是严重脱离实际的。2000年人口普查也证实生育率确实只有1.22，那么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就不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及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计生委的预测靠谱吗 / 112

201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 / 130

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 / 143

计划生育到底少生、“超生”了多少人 / 153

第 5 章 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 / 167

中国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6亿顶峰后，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几乎同时出现民工荒。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暂时掩盖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

1998年：小学在校人数开始减少 / 168

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开始减少 / 171

2008年：17~20岁男性兵源开始负增长 / 173

2012年：育龄妇女开始减少 / 174

2012年：总抚养比止跌攀升 / 176

2014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负增长 / 181

2015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 184

2016年：购房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 / 188

2018年：总人口开始负增长 / 188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今后的经济走势 / 193

老有所养，谁来养 / 197

中国是既不优生，又不优育 / 200

失独家庭数量在快速增加 / 208

第 6 章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 211

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减少新生人口，这意味着社会持续老化，等人口以这种方式减少后，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比例已经很低了（很容易惯性地降到几千万乃至灭亡），人口结构已经是不可持续发展了（抚养比将达到历史最高，缺乏创新能力，也缺乏生育小孩的愿望）。

- “适度人口”理论摧毁古希腊文明 / 212
- 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 213
- 要是中国人口只有7亿、5亿会怎样 / 216
- 耕地和粮食 / 219
- 淡水资源 / 228
- 矿产资源 / 230
- 能源 / 232
- 环境 / 237
- 结论 / 240

第 7 章 用国际视野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 241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和印度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中国大陆是超短跑，人口负债比日本要严重得多。

-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伊朗为曾提倡二胎后悔莫及 / 242
- 国际、国内都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 / 247
- 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出生高峰有多高 / 250
- 补偿性出生高峰越高越好 / 259
- “低生育率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 / 265
- 从人口结构看世界经济格局 / 267
- 世界和中国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 271
- 世界人口变局对中国国防的影响 / 278
- 中国应积极布局西部的人口和城市 / 280

第 8 章 中国人口展望 / 283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20多年了，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需要的“动能”非常大。生育率要达到高方案，需要改革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其难度比1979年的改革开放要大得多。

- 中国人口展望 / 284
- 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式战略调整 / 292
- 做好“接生”准备 / 294
- 投资“造物”，不如投资“造人” / 297
- 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 300
- 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 306
- 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和光棍危机 / 309
- 婴童经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起搏器 / 312

第 9 章 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 315

中国今后将有4亿老人、4000万光棍、数百万失独家庭，这是客观事实。必须正视现实，适应这种人口结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 316
- 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的比较 / 318
- 婚姻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设计 / 321
- 婚姻将“性”关进笼子 / 325
- 古代鼓励生育的政策 / 328
- 古代结婚、离婚制度 / 332
- 尊重男女天然的分工 / 336
- 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落 / 339
- 美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回归 / 345
- 欧美鼓励生育的困局 / 348
- 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 / 351
- 落实政府责任，保障生育权利 / 353

后记 / 360



第 1 章

世界人口历史和展望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 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支柱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政治、经济、国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赖于人口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理论上—对夫妇只需要生2个孩子就可以了。但是由于部分小孩会在生育之前夭折，并且正常的出生男女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106，因此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为2.1，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TFR）是人口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可以近似理解成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

总和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通常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期）。

世代更替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育龄期死亡率、出生性别比等。古代由于夭折率高、寿命短，要保证人口的世代更替，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6个左右孩子。由于死亡率的降低，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就可以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①。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②，2005~2010年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平均为6.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0.2‰，中国则为22‰。中国5岁以下女童死亡率高达31‰，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7‰。中国的青少年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也高于

^① Espenshade TJ, Guzman JC, and Westoff CF, "The surprising global variation in replacement fertilit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 22:575-583.

^②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发达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远比发达国家（在正常的102~106范围）要高。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

考虑到中国的畸形性别比以及育龄前和育龄期死亡率，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左右，而不是2.1。

由于有不孕不育（中国目前超过1/8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单身、丁克（双收入，无孩子）等人群的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2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部分家庭只生1个孩子。要是主流家庭不计生、不愿生、养不起3个孩子，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人口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①。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防、民族心理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

中国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时间；同样，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口比上一代差不多减半），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

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

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同样也不会让人口无限地增长。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注意到古代风水学家观察到的这样一种现象：财丁不能两旺。换句话说，越穷越生，越生越富，越富越不生，越不生人口越少，被其他人群取代。在中国，总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生育率高于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世界范围，也是富裕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这导致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和穆斯林地区等，都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力不足，不得不引进大量外部移民，这些来自生活水平较低地区的移民，慢慢地取

^①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4页。

代、占据了本土人原有的优势地位^①。

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通过这一升一降的方式，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文明的兴衰更替。古代通过“左手”调控人口：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现代通过“右手”调控人口：避孕、高养育成本、低生育意愿、高不孕率等。

在远古时代，生产力落后，粮食来源有限，生存条件恶劣，寿命短，人类繁衍非常缓慢。无数部落相继灭绝（全世界很多地方发现了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有些还曾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些部落在艰难繁衍数百万年后都先后灭绝），整个人类也曾几度到了灭绝的边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有所积累，开始出现人类文明。婚姻制度的建立规范了性和生育秩序，确立了男人对孩子的“产权”，更是激发了男性养育后代的动力。“孝”文化的确立，使得养育子女能有所回报，给人口发展之火浇上了利润之油。

但是即便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也只有20岁左右，“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疾病（如痢疾、普通感染）在当时都可以致命，现在只需要简单手术的骨折在当时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彻底丧失。康熙皇帝共有21个王妃，共生育55个子女，只有31个子女活到成年。乾隆皇帝共有17位王妃，生有17子10女，但是有5个皇子、5个皇女早殇。顺治共有8个儿子，将康熙选为继承人是因为康熙出过天花，已经有抵抗力。沙皇俄国彼得大帝的两位妻子共生育10个子女，但是只有一子二女活到成年，唯一的孙子彼得二世14岁死于天花。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孩子的存活率更低，有时候生育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长大成人。

一场瘟疫、战乱足以毁灭繁衍了上千年的家族，比如1618年至1648年的欧洲30年战争加上黑死病，欧洲人口减少一半。1492年的时候，美洲有五六千万印第安人，但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由于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天花等传染病，人口减少了90%。

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因为战争和瘟疫导致人口损失高达60%以上，人口多次从四五千万下降到1000多万。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约为2000万，公元2年增加到5900多万，东汉和三国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年间）恢复到1600多万。后面又出现五胡乱华，人口锐减。经过隋唐盛世，到公元755年人口恢复到5200多万。但是经过安史之乱，公元760年（唐肃宗年间）人口再次减少到1600多万。宋朝人口有所恢复，但宋元战争又导致人口锐减，公元1403年（明成祖时期）人口达到

^① 海克：《人口的假话》，《新闻周刊》，2002年第28期。

6600多万^①。明朝末年的瘟疫和明末清初战乱又导致人口锐减。

由于人口繁衍的艰难，古代很多非常辉煌的文明都因为人口不能延续而中断。中国以前至少有数万个姓氏，但绝大多数的姓氏和无数民族都已经陆续灭绝，现在幸存的家族在历史上也都几度到了“子姓几尽，不绝若线”的险境。

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公元1年全球人口只有2.258亿，其中中国人口5960万（占全球26.4%）；公元1000年全球人口增加到2.672亿，到1500年也只增加到4.34亿。稀少的人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科技进步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以1990年的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为基准，公元1年、1000年、1500年全球人均GDP分别只有467美元、453美元、566美元^②。

近代人口爆炸

1500年之后世界人口才开始快速增长，从1500年的4.4亿增加到1600年的5.6亿、1700年的6.0亿、1820年的10.4亿、1900年的15.6亿，然后在1927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突破70亿。

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人口爆炸？一是粮食增长，二是寿命延长。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红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③。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水稻、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这些作物“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冈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玉米、马铃薯现在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的出现弥补了谷

① 《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

②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③ 王思明：《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17世纪时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当时的欧洲，一亩马铃薯田和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①。爱尔兰1500年、1600年人口分别只有80万、100万，但是自从马铃薯引入后，爱尔兰人口迅速增加到1700年的193万，1820年的710万，1850年的850万。1845~1847年，一场突发的植物枯萎病横扫爱尔兰，马铃薯大减产，短短两年内，就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及其引发的疾病，导致上百万爱尔兰人移居英格兰、北美或澳大利亚。据估计，在1845~1925年间，约有5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1990年美国爱尔兰裔人口有3874万，爱尔兰—苏格兰混血人口有562万^②；美国多位总统（如杰克逊、麦金莱、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克林顿）是爱尔兰裔。根据加拿大人口统计资料^③，2006年加拿大爱尔兰裔人口有435万。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数百万爱尔兰裔人口。2010年爱尔兰本土还有448万人口。就是说，1600年100万爱尔兰人现在有四五千万后裔！

除了美洲作物外，化肥的合成和推广也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氮、磷、钾是“肥料三要素”。1838年，英国乡绅劳斯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制成磷肥，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化学肥料。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及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创立了植物矿物质营养学说和归还学说，为化肥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李比希还在1850年发明了钾肥^④。

与来自土壤、可循环使用的磷、钾不同，氮主要靠雷电从空气中合成，随雨水补充给土壤（并最终回归空气），部分靠豆科作物根瘤菌固氮。在20世纪之前，农作物所需要的氮肥来源十分有限。当时农业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来自有机物的副产品，比如人畜粪便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数量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而空气中的氮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年德国人口增长很快，所瓜分的殖民地很少，粮食必须自给自足，德国的化学家提出向空气要氮肥的设想。1911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厂，开创

① 刘作奎：《改变世界的四种植物 曾导致人类大迁徙》，人民网（来源：《环球时报》），2006年8月31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763041.html>。

② U.S. Census Bureau, "Ancestry: 2000, Census 2000 Brief", Issued June 2004, pp.3-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2kbr-35.pdf>。

③ "Ethnic origins, 2006 counts, for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 20% sample data", Statistics Canada, Date Modified: 2010-10-06,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dp-dp/hlt/97-562/pages/page.cfm?Lang=E&Geo=PR&Code=01&Data=Count&Table=2&StartRec=1&Sort=3&Display=All&CSDFilter=5000#Notes>。

④ 《化肥（Chemical fertilizer）》，新华网（来源：中国科技馆），2008年3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8-03/30/content_7884346.htm。

了人类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①。

20世纪农业科技（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更是突飞猛进。谷物世界平均亩产从1961年的95公斤（此前更低）提高到2009年的234公斤（同年，我国约363公斤，荷兰、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超过600公斤）^②。

近代人口爆炸很大程度还应该归功于人类成功地扼住了控制人口的“左手”。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黑死病、天花、伤寒、痢疾、斑症伤寒等被有效控制，粮食增加后体质也增强，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灭和青霉素的发明。

天花因其流行迅猛和极高的致死率（一般可达25%，有时甚至可高达40%~50%）而被称为“死神帮凶”。患者即使不死，脸上和身上亦会留下永久性麻点疤痕，甚至失明。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到1801年，接种牛痘的技术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开来，并在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天花接种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20岁左右飞跃性地提高到40岁。

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1942年起，美国制药企业开始大批量生产青霉素。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问世挽救了无数被细菌感染的病患，人类平均寿命从40岁延长到60岁。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进步，2010年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69岁（发达国家为78岁）。

外来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经降低，现在寿命的延长更大程度取决于人的本身，如果癌症和心脑血管等决定寿命的关键疾病能被攻克，那么人类的平均寿命还能有所延长。但考虑到细胞分裂规律，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慢慢逼近人类的长寿极限。联合国预测2100年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将延长到81岁。如果医疗服务过度偏重于延年益寿，那么必将与用于迅速恢复劳动能力的医疗服务发生矛盾，也将降低养幼的能力（导致生育率下降），加重老年化危机。

美洲作物对中国清朝人口的影响

根据官方资料，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曾经超过6600万。但是明末大旱，粮食减产。饥荒、瘟疫（如鼠疫）、农民起义（如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不断，加上明清战争，人口锐减^③。

① 李力钢、刘博：《20世纪的科学技术》，新时代出版社2011年版。

②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③ 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2005年第1期。

清朝初年，人口恢复性增长。清朝统治者非常注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康熙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还亲自培育出早熟新稻种，在南方推广连作双季稻，并把水稻的种植推进到了长城以北^①。

根据《清圣祖实录》卷43记载，康熙帝还曾下令严禁抛弃婴儿：“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其弃而不养者，严禁。”

康熙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30年，收到巨大成效，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轻捐薄赋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清康熙51年（公元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了数，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逐步实行“摊丁入地”，丁银和地赋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取消了全部人头税，添丁不加银，大大促进了人口发展。

可能由于气候等原因，欧洲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马铃薯，而中国却是产量更高的玉米、红薯（目前中国红薯产量还占世界总产量的80%）。

玉米早在明朝嘉靖年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几十年时间）就传入广西等地，到清朝康熙中期传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所以取名“蜀黍”，后来在全国推广。

红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明朝末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主要种植地还只限于福建等少数地方。

清朝政局稳定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广这些高产作物。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红薯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②。

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出版了大量农业书籍。耕地面积也持续增加，依照汪士铎1851年的说法：“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③

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主政长达134年，社会安定，政策连续，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

① 闻性真：《康熙和他的御稻种》，《历史学家茶座（第六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黄启臣：《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m-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51090>。

③ 汪士铎撰，邓之诚辑录：《汪梅翁乙丙日记》，文芸阁1936年版。

从当时欧洲情况来看，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法国人口增长就很缓慢，而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增长较快）。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中国人传统以植物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极大限度地养活人口（粮食转变为肉类、奶制品会消耗谷物）。这点从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由于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粮食能够自给。

康熙、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非常快速，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由于康熙和乾隆时期人口统计标准不同，乾隆的估算并非十分严谨。笔者考证，1792年的人口（超过3亿）应是康熙元年（1662年）的人口（4475万）的6.9倍^①。

人口增长，伴随的是综合国力的提高。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82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3.8亿）占世界（10.4亿）的36.6%，GDP占世界的32.9%（西方国家占25.0%）^②。

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

在近代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英国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③。

人类生活水平尤其在最近100年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

① 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

② Angus Maddis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000-2030", *World Economics*, vol. 9, no.4(October-December 2008), pp.75-100.

③ 梁紫星：《被夸大的环境危机》，《科普杂志》，2004年第3期。

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①。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从467美元（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标准）到666美元，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而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10倍，从666美元上升到7614美元（同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②。

其实在马尔萨斯之前，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就已经认识到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他认为“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制于这种力量的规模，或者换句话说，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经验统计学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益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库兹涅茨强调，人口增长可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这一结果必然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根据大量史实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依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等于技术进步率，总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加人口增长率，国家的总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认为，“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① 吴万伟：《从“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国网，2006年5月15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enkou/1209403.htm>（译自“Doom and Demography” by Nicholas Eberstad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62417）。

^②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近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是科技爆炸。在谈论历史时，人们往往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①。哈特说：“虽然政治变迁是重要的，但公正地说，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500年之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同他们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500年时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两样。……但科学发现不仅带来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命，它还完全改变了政治和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因而，在他的排行榜上，科学家和发明家最多（36人）。

在哈特的名单中，纸的发明人蔡伦（？~121年）高居第7，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发明人约翰·谷登堡（1400~1468年）高居第8，哈特解释说：在公元2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希腊、罗马文明）先进，缺乏适当的书写材料（只有笨重的竹简）是中国文化进步的一种极大的障碍，而西方有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虽然有其缺陷，但是却比竹简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蔡伦对纸的发明，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公元后的1000年间，中国的成就超过了西方。西方国家开始使用纸以后，就堪与中国平起平坐。在15世纪，约翰·谷登堡发明了一种可以大规模印刷书的技术之后（虽然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未推广），西方文明再次超过了中国。

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的时候，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早期。谷腾堡的印刷术印刷速度快，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就已经印刷了3万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各种书籍，大大加速和深化了文艺复兴，还对后面的新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

但是光是印刷术还不足以完成文艺复兴和引发工业革命。美洲高产作物的推广，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有足够的人口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科学、哲学和艺术研究。比如牛顿（1642~1727年）在21到27岁期间为现代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牛顿时代，美洲高产作物已经在英国普及，牛顿不务农已经不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才有机会继续学习、研究。否则，像他这样父亲早逝的农民的孩子，十几岁必须承担其家庭重担，一代科学巨星就将埋没于农田。

以1492年为界，此前5000年的累计人口总数不到此后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

^① Michael H. Hart, *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 Chicago: Citadel Press, 2000.

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人口累计创造的文明。古代寿命短，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生产力低下，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科技成果也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在哈特的名人排行榜中，哥伦布之前的4000多年里只有34位名人，而哥伦布之后却有66人。现代绝大多数学科的创始人都诞生于哥伦布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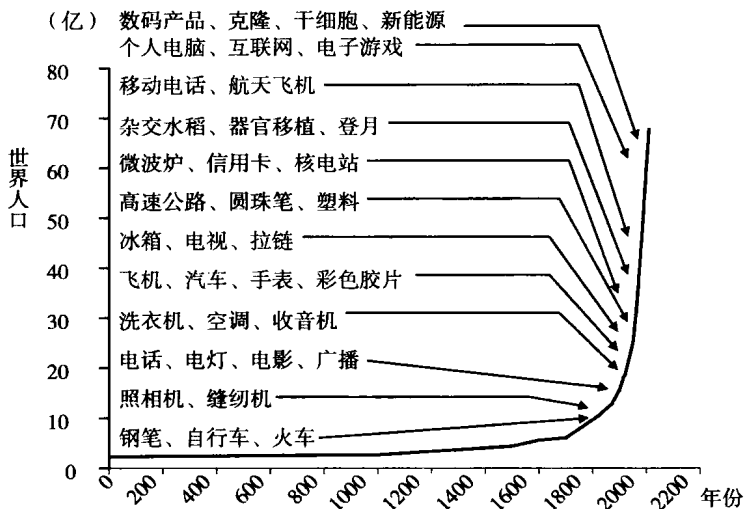


图1.1 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只是“减法”的消耗；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的增加的。比如瓦特的蒸汽机使得“非资源”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启动了工业革命；奥托的内燃机使得“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哈伯的理论使得“非资源”空气变为氮肥（用空气制造面包）；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光明。能源的突破，“人工小气候”的应用，大大扩展了人类生存空间（古代人迹稀少的地方现在也建成了大城市）。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变为“资源”的过程。只要科学技术在进步，自然资源永远也不会枯竭，人口减少意味着开源的智力减少。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也是悲剧。

“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需求的推动，计算机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

就翻一番，而价格却减半，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网络也呈现了这种指数增长趋势。以太网的发明者鲍勃·梅特卡夫揭开了网络价值的秘密：“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①。这里“网络”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计算机网络。比如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观点碰撞就越频繁，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迸发，政府的决策也就可以更科学合理。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将远超过造纸和印刷术，将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以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

人是高等动物，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很多社会学特性。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揭示了生物的社会属性。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生物科学，无疑将对社会学基础理论的重建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生物学的深层的哲学观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

细胞生长分为潜伏期、指数增生期、停滞期。细胞潜伏期与细胞密度密切相关，细胞太少的时候生长速度会很慢，甚至全部死亡，这是因为细胞生长需要一些细胞自身产生的辅因子，若细胞太少，会导致这类因子不足。细胞增加到一定数量，细胞间形成缝隙连接，允许细胞之间的电耦合（比如通过电耦合，心脏的所有心肌细胞可同步动作）和化学通信，细胞功能很活跃，进入指数增生期，每个细胞的“占地面积”也有所缩小。指数增生期持续3~5天后，空间渐趋减少，能抑制细胞的运动，这种现象称接触抑制。当细胞密度进一步增大，培养液中营养成分减少，代谢产物增多，则发生密度抑制，进入停滞期。继而培养液中营养渐趋耗尽，代谢产物积累，pH降低，细胞会中毒，重则死亡。将细胞消化下来，稀释后种植在新培养瓶，细胞又快速增长。但是如果传代过晚，因细胞已受损，传代后细胞也生长不好。也就是说，要让细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较高的细胞密度，但又需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既有“社会性”，又有“独立性”。

人口和文明发展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当人口很少的时候，很难产生文明。有些边远地区的民族往往因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后，甚至人口灭绝。只有当有足够人口数量的时候，有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才能产生文明。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人均耕地减少、土地兼并、吏治腐败等，出现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假如不改善

^① 向峰、朱贝校：《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大地》，2000年第18期，<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792/289652.html>。

吏治、提高农业技术的话，会出现社会动荡、饥荒、瘟疫，甚至战争，人口很难再增加。战后人口又快速增长。新的技术（如农业技术、建筑技术）使得承载人口的空间增加，人口相对变稀了。

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人口越多，大家可以共用很多公共的东西，土地、基础设施（水、电、道路、通讯）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公共服务越便利，人均公共投资反而越小，同时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处理^①。

人口越多，微小的需求也能形成市场，刺激产业化，分工更细，智力资源越丰富，技术优势也就越容易发挥并被所有人分享，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比如说在甲地8个人应聘1个职位，乙地80个人应聘10个职位，比例都一样。但对于求职者来说，在乙地多了10倍的应聘可能性；对于公司来说，甲地8个人可能没有1个合格的，公司只好空着职位，乙地因为有80个应聘者，公司就算不能招到10个合格的，也可以招到六七个合格员工，相对来说乙地就业率更高（对公司和个人都有利），并且在乙地还可以增加1个服务行业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人都愿意往美国跑、小城市的人和企业都愿意往大城市跑的原因。

企业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使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双赢”。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②。

人口密度效应在交通运输上体现得最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单位时间内，这个国家的人均单位货物长距离迁移的距离越短。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均铁路只是澳大利亚的1/10（人均建设成本也低），但日本铁路运输更便利，服务质量更好，并且发展起高速铁路。小城市由于人口少，公共汽车的班次少，乘一次车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城市人口多，几分钟一趟车。

娱乐产业也不例外。相同成本拍摄的电视、电影，因为观众增加，赚的钱也多。赚的钱多，竞争也就激烈，结果是导演和演员的素质提高，可以花费更多的钱进行娱乐投资。老百姓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看高档次的表演。美国在电影业方面的垄断地位

^① 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人民网（来源：《经济日报》），2000年5月19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435.html>。

^② 王东京：《看准城市规模效应》，中国城市化网站，2004-03-07，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001267。

就与其人口数量有很大关系。

旅游业也一样。一个旅游景点要是大量的游客，就有资金进行景点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游客人均担负的费用就越低。要是游客太少，很多有潜力的旅游景点就无法开辟。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现在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在崛起，也是因为有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

城市化就是尽量利用人口优势。每个国家的都市圈大都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而我国2000多个县级城市只有不到20%达到了应有的规模。人口流动就是实力的流动，茅于軾注意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①。随着人口大量迁往沿海和大城市，内地将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今后内地的地级市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不用说县城了。现已出现民工荒，今后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发展内地经济？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其实，目前这些“城市病”并非不可救药，也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这些副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人类近2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城市病”的过程，城市也越来越大。比如从人力车、马车到汽车，再到轻轨、地铁，交通大为改观。从柴到煤炭，再到液化气和电，城市的环境承载力也提高了。

其实，现代最严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城市容积率高，人均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房价高，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只有0.9~1.2。

而美国的生育率能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与城市规划、合理的房价有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日本的两三倍，中位房价只是人均GDP的5倍，户外空间也大，每个社区都有公园。即便芝加哥（生育率为1.9左右）这样高密度的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而美国德州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3左右，与其住房宽敞而价廉也有关。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但由于严格限制城市土地供应，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这种高密度进行城市规划的，北京、上海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其实正在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种民不聊“生”的城市化老路，光“利用人口”，不“生产

^① 茅于軾：《〈大国空巢〉序》，《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

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提高了，比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方米；30平方米房子的家庭在1978年能够养2个孩子，现在却不行了。美国1950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6.6平方米，现在超过70平方米了。中国现在城市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但是今后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住房面积和设计会与现在大不一样。中国城市今后将面临根本性的改建，但是今后老年化严重，劳动力成本将非常高，城市改建的成本将非常高（如日本和欧洲国家那样），那么今后中国大陆也会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样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因此，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应该重点建设中心城市，形成人口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增强辐射能力。而东部发达省市，应该借助发达的交通，引导人口向郊区分流（伦敦人口在1939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降低城市的容积率，防止低生育率这一“城市病”，让城市既能生产物质财富，也能生产人口财富。

“人口灾难”的狼真来了，但不是大灰狼

世界人口自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出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人口悲观论甚嚣尘上，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的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

人口灾难“狼来了”喊了200年，狼真的来了，不过来的不是“大灰狼”（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减少）。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生育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的资料^①，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在7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2005~2010年只有1.66。如果稳定在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上，那么日本、欧洲人口将分别从2010年的1.27亿、7.4亿减少到2100年的0.57亿、4.8亿。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从60年代后期的6.0左右下降到2005~2010年的2.6。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①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错位。从个人到政府都强调物质再生产，而忽略人口再生产。

② 养老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与个人收益脱钩。“造物”有报酬，“造人”无回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报（还影响“造物”，降低家庭收入）。“造人”的巨额投入主要是由家庭出，产出却主要在社会。从经济上，家庭养儿是亏本的。孩子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是个人的高消费。

③ 养孩子成本增高。美国农业部2010年的研究表明，养小孩到18岁，平均需要花费226920美元，刚好相当于美国的中位房价（221800美元）。孩子越多，边际成本越低，养第2个孩子的成本是第1个孩子的60%，养第3个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个孩子的27%，但3个孩子对社会的回报却是一个孩子的3倍^①。中国只允许生1个孩子，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多生孩子而降低边际成本，养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报率却是全世界最低的。由于只有1个孩子，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只养到高中毕业（美国读大学大多靠孩子自己打工或贷款），还得承担大学教育、买房、结婚、生育等费用。可以说，中国是以3个孩子的成本只为将来培养了1个劳动力。现在大家觉得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养不起2个孩子，是根据独生子女的养育标准；如果主流家庭生3个孩子，那么养育成本将大幅下降。

④ 避孕率增加。在避孕套、避孕帽和子宫颈帽等发明之后，19世纪西方国家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口服避孕药和宫内避孕环研制成功后，更是推动了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⑤ 结婚率降低，单身、丁克人群增加。比如2003年日本有54%的25岁以上女性、43%的30岁出头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多了一倍。预测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将是单身家庭，而首都东京地区的单身家庭比例将超过40%^②。香港的单身比例目前已经超过日本，北京、上海、广州正在追赶香港。

⑥ 离婚率升高。传统的婚姻模式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经济合作社”被打破，离婚率增高，也导致“生育共同体”的崩溃。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率高既浪费生育时间（家庭内战耗费时间，重新恋爱结婚也需要时间），又使得女性没有安全感，不敢生孩子，还使得抚养成本（物质、感情、精力成本）增高。欧美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韩国等东亚国家后来居上^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婚率持续增加，1978年仅有28.5万对夫妻离婚，而2011年共有211

① Laura Vanderkam, "Hey parents, the third kid's a bargain", USA Today, Updated 1/10/2012, <http://www.usatoday.com/news/opinion/forum/story/2012-01-10/family-parents-kids-spending/52484040/1>.

② 折冬：《经济独立观念改变 日本女“单身贵族”跟婚姻说拜拜》，新华网（来源：《北京青年报》），2004年9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9/02/content_1936687.htm。

③ 《各国离婚率调查 中国离婚人数迅速上升》，《环球时报》，2006年5月15日第16版，<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4/4378175.html>。

万对夫妻离婚^①。

⑦ 就业和生活压力大。在农业社会，生活节奏慢，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能够预测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物质上虽然贫穷，但心理上比较安全，自杀率低。现在打交道的是人和社会，“就业替代”频繁，就像紧抓扶手站在快速行驶的敞篷车上，对车开往何处茫然无知，提心吊胆防止掉下去，心理安全感下降，自杀率高，更何况生儿育女了。1950年以来，全球自杀率在不断提高。日本、韩国、俄罗斯、东欧的自杀率非常高^②，生育率也是非常低。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自杀率较低，生育率也较高。古代游牧民族由于身体四处飘荡，人口很难增加；现在城市人口心理在游荡，不敢生孩子。

⑧ 妇女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提高。教育时间的延长不但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意愿，也使得女性育婴期大为缩短。就业压力大，使得夫妻双方都得工作才能保证家庭的经济安全。妇女就业率上升，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也担心生孩子会造成物质、工作机会（包括升职）、技能上的损失。

⑨ 婚龄、育龄延迟，性生活减少。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岁时有18%没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岁时候有51%没有生育^③。而20岁出头是妇女黄金生育年龄，生育质量和生育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下降。很多妇女陷入了“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有生育条件时没有了生育能力”的矛盾之中。古代50岁妇女还“必与五日之御”；现在由于电影、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有很多30多岁的夫妇就已经疏于敦伦之道了。

⑩ 不孕不育比例剧增。根据医学统计，近30年来，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快速上升到12.5%（1/8育龄夫妇不孕不育），接近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④。而用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⑤。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① 王敏：《中国高离婚率背后的婚姻困境》，《社会观察》，2011年第3期。王南：《北京登记离婚数 增幅创7年新低》，新华网（来源：《法制晚报》），2012年2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2/02/c_122648419.htm。

② WHO, "Suicide rates per 100,000 by country, year and sex (Tabl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prevention/suicide_rates/en/. Retrieved 2012-01-26.

③ "Most women born from '71 to '74 childless at 30", The Japan Times, March 4, 2006, <http://www.japantimes.co.jp/text/nn20060304a2.html>.

④ 鲁海燕：《我国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 成为第三大顽疾》，人民网，2005年6月14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893/3468643.html>。陈焯非：《中国不孕不育患者20年增长三倍 数量超过4000万》，人民网，2010年11月9日，<http://health.people.com.cn/GB/13169958.html>。

⑤ 高峻、高尔生：《中国育龄妇女不孕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统计》，2005年第1期，第27~29页。

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混乱导致生殖器感染、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增大、不健康的食物等，均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性病导致男女生殖器的炎症、堵塞造成不孕。性伙伴多，混杂的精液常易致敏，在女性体内产生抗精子抗体，增加不孕的风险。

与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并且精子的活力也在降低。美国的一位化学教授甚至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①。钟南山院士担心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就丧失了^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精子减少呢？阴囊温度低于体温2℃~3℃左右是确保精子发生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阴囊脂肪过多、久坐导致静脉曲张使血流速度减慢而不能散热、泡热水澡、穿紧身裤、用笔记本电脑等都可以使得阴囊温度提高，从而抑制精子产生，减少睾酮分泌。肥胖男人精液中的DNA发生断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古代皇帝生育能力不高，比如晚清三代皇帝都没有孩子，可能与生活水平高有关。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症可导致女性卵巢功能异常（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发育不良、性机能异常及阴道炎等妇科疾病。

①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年青一代生理上早熟，而心理上却晚熟。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下降。

② 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代表的控制人口组织，耗费巨资制造“人口危机”的舆论，形成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资助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计划生育政策，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的下降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这些可以称之为控制人口发展的不为人知的“右手”——由于社会进步而带来的对人口发展的抑制。

可见现代控制人口的“右手”虽然比古代的“左手”要温柔，但更加有效。现代经济制度、教育模式等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得人口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世界人口展望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分四种方案预测了今后的世界和各国人

① 杨孝文：《科学家惊讶发现精子也有团队精神》，人民网，2004年7月8日，<http://www.people.com.cn/GB/kejy/1057/2625621.html>。

② 贾也：《食品安全关乎国运兴衰》，《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5日第11版。

口变化^①，其中高方案认为世界平均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2.52上升到2020~2025年的2.84，然后缓慢下降到2100年的2.5，世界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158亿人。中方方案则认为生育率将缓慢下降到2100年的2.03，总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101亿人。低方案认为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到2050年的1.71、2100年的1.55，2047年人口会增加到8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100年的61.8亿人。如果各国都“稳定现有生育率”的话，那么世界总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268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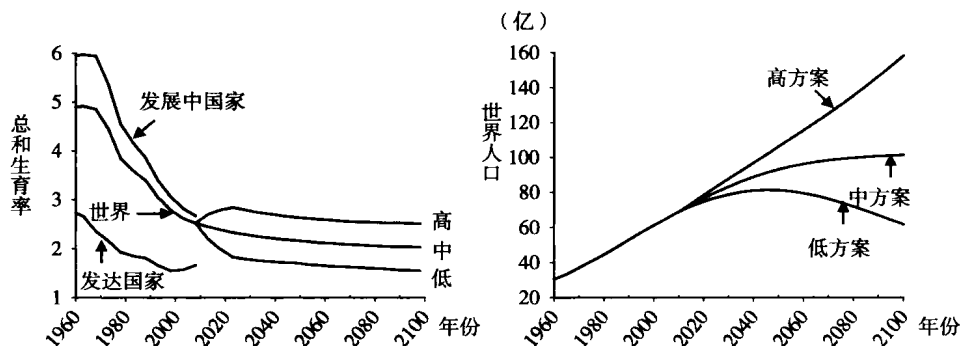


图1.2 世界历年总和生育率和人口

联合国高方案是假定中国的生育率从2005~2010年的1.64不断上升到2095~2100年的2.51，总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1亿（占全球19.45%）增加到2050年的14.79亿（占全球13.94%）、2100年的15.87亿（占全球10.04%）。

中方方案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的1.64逐渐回升到2095~2100年的2.01，总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3.98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96亿（占全球13.92%）、2100年的9.41亿（占全球9.29%）。

低方案则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的1.64下降到2020~2025年的1.03，之后逐步回升到本世纪末的1.51，总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3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1.30亿（占全球13.93%）、2100年的5.06亿（占全球8.19%）。

如果“稳定现有生育率”（联合国认为中国为1.64）的话，总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4.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3.03亿（占全球11.91%）、2100年的8.28亿（占全球3.09%）。

在高、中、低、“稳定现有生育率”的方案下，印度人口（2010年为12.2亿）将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增加到2050年的19.52亿、16.92亿、14.57亿、20.20亿，然后在2100年分别为25.69亿、15.50亿、8.80亿、33.20亿。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是错误的。

① 对现有人口和生育率的判断是错误的。联合国高估了（故意？）发展中国家现有生育率和人口，比如认为2010年世界、中国、印度的生育率分别为2.48、1.64、2.64。但是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只有1.18，印度的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2.5（城市为1.9，农村为2.8）^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2》也认为2010年世界生育率为2.45，其中中国为1.598，印度为2.625。如果将中国、印度的生育率更正为1.18、2.5的话，那么2010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其实只有2.3（生育率为2.48或2.3，用于远期预测的话，结果将是相差甚远）。考虑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高估了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那么2010年世界实际平均生育率还没有2.3，而是已经逼近世代更替水平了。

②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从人均GDP看，2010年世界人均GDP（以2000年的美元可比价为基准）相当于欧盟1960年的水平。从教育角度看，2009年世界平均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为66.8%（发展中国家只有54.9%）^②，只相当于欧洲国家20世纪60年代水平^③。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还将步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老路继续下降几十年，只是速度更快（因为避孕手段更便利，电脑、电视、网络更普及），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未富先老，缺乏鼓励生育的“动能”，生育率下降后更难回升。发达国家则可能会沿着中方案或“稳定现有生育率”走。总体来说，今后几十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将沿着低方案，甚至更低的路线走，

但联合国却通过媒体大力宣传中、高方案，说全球人口会达到100亿、150亿，对全球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抑制人口增长^④。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从来没有准确过。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对中国人口峰值预测从2008年版的2032年达到14.66亿（吓坏了中国领导人）下调到了2010年版的2027年达到13.98亿，对2050年中国总人口的预测也从2008年版的14.17亿下调到

①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estimates of fertility indicators”, 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 statistical report 2010,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pp.48, http://www.censusindia.gov.in/vital_statistics/srs/Chap_3_-_2010.pdf.

②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③ Briseid Ole and Françoise Caillods, “Trend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They Relevant for African Countries?” Paris, IIEP-UNESCO, 2004.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90/139018e.pdf>.

④ Tim Worstall, “UN Population Predictions: Up To 15 Billion by 2100”, Forbes, 10/23/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timworstall/2011/10/23/un-population-predictions-up-to-15-billion-by-2100>.

2010年版的12.96亿（相差1.2亿）。这是因为联合国2008年高估了中国的生育率，认为中国2005~2010年、2010~201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77、1.79；而2010年版将之分别下调到1.64、1.56，其实仍然是高估，因为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1996~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

可以说，20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而21世纪面临的将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联合国人口基金需要承担历史责任。



第 2 章

文明兴衰的人口因素

先哲谈人口与文明的关系

新陈代谢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没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没有文明的“生生不息”。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写道，“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特别是过去300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时，他们变得高度警觉，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我们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了文明人，而造成这一增长的正是文明：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书本知识不能使某个地方的1万人在原子弹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猎采摘的生活”。

英国《新科学家》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①。

中国古代先贤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文明延续和国家强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②。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

^① 沈志真：《科学家预言：人类消失20万年后将遗迹全无》，人民网，2006年10月13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8/4914489.html>。

^② 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学》，1996年第3期，<http://www.psychen.com/psyhistory/200402/255047606.shtml>。

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他将大量地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并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

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

《尉繚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

《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国防负担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徠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徠民”（吸引移民）。加入“徠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战国群雄纷争，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战国初期的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较落后，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愤然喊出：“国家

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经过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① 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原来井田制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舍地而税人”，将军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开荒）。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于是，老百姓便“喜农而乐战”。

② 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需要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人口比例，手段之一是提高粮价，“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使商无得余，农无得粟”。现在生育率低，从事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比例低是重要原因。

③ 降低农业税赋。对农业是“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得“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农业就能得到发展。

④ 防止超前消费。商鞅提出“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抬高耗粮的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那么粮食就可以最大程度用来养活人口。现在，主流家庭养育3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如果以2012年的消费能力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⑤ 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励生育：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成年后必须结婚分家。缩小贫富差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树立清纯的民风，反对淫乱。禁止私斗，加强社会治安。

⑥ 理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商鞅认为：“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如果积聚黄金，那么会贬值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人口分母可以转变为GDP分子），如果积聚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人财两旺。现在中国的很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认为减少人口分子可以提高人均GDP分母，牺牲可增值的人力资本

换取不可增值的物资资本。

⑦ 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

⑧ 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认为，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而中国现在的人口危机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统计出了问题，经历了两次人口普查，竟然连生育率都拿不准，人口总数竟然靠推测。

⑨ 积极解决“人地矛盾”。商鞅认为如果“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那么“民胜地务开”。就是说，人多地少就应当开荒、辟土，比如秦国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而中国现在一些学者却主张采取“减少人口”的消极的方法来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⑩ 积极的移民政策。商鞅认为如果“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那么“地胜其民者事徠”。换言之，地多人少就应当吸引移民。商鞅总结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也打过胜仗，但是对方并不屈服，就是因为秦国仅能获得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商鞅建议秦孝公发布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秦国让原居民征战，让新移民务农，农战两不误。商鞅建议用军队春天围敌国农田，夏天去吃其贮粮，秋天收其秋粮，冬天挖其仓粮，敌国的人口就无法繁衍起来；秦国同时用宽厚的文德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秦国人口却不断增加。除了吸引外来移民外，还必须防止本国人口外移。商鞅认为，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美国是很好地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既鼓励生育，又吸引移民。而中国目前一方面不让生育，一方面却又缺乏凝聚力，大量富人携带巨资外移。

秦国在其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更获得人口（包括张仪、范雎、李斯等人才）。李斯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士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李斯认为，即使像秦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自足，需要通过贸易等途径从其他国家获得。而现在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却以资源不足为理由而要求减少人口。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秦国土地和人口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商鞅的战时经济学在135年之内将弱秦变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中国，但其过分崇尚行政权力、军事征服，“严而少恩”，“仁义不施”，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

由于秦国钳制思想，虽然人口众多，但智力来源却非常有限，治理国家主要依赖于客卿，即便秦二世没有灭亡，但是统一之后没有了客卿来源，也很难继续治理好国家的。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法家独强，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妨碍了文明的发展。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一段稳定发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用阴阳家、道家奠基，法家立柱，儒家盖顶，墨家砌墙，名家装修，那么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必将更加辉煌。

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

罗马帝国灭亡的人口因素

2004年，美国作者菲利普·朗曼在他的《空摇篮》一书中写道：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首次出现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胁着现代社会^①。

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

^① Phillip Longman, *The Empty Cradle—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①。季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家庭和婚姻的衰败。

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的生育率下降。

① 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② 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②。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③ 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④ 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⑤ 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⑥ 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不孕。

历史学家杜兰特（Will Durant, 1885~1981年）说，娼妓在古罗马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某些时候政客的选举必须透过“妓院老板行会”来收集选票。他说：“奸淫普遍猖狂到一个程度，导致性行为若非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根本就引起不了大众的关注。而实际上每个小康家庭的女人都至少都有过一次离婚的记录”，“娼妓猖獗，同性恋因着与希腊人及亚洲人接触而受到更大的鼓舞。许多有钱人为求得一名男性的欢心而不惜付出一台仑的价钱，加图（Cato）抱怨说一名漂亮的男孩远比一座农场的价值还高”，“罗马人就像希腊人一样，始终十分纵容男人去嫖妓，认为这些职业是合法并且是有限止的……老塞尼加认为罗马女人中充斥着奸淫的行为”^③。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不断减少。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④。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一路攻击沿途的日耳曼人蛮族（包括西哥特

① 刘达临：《世界性史图鉴：性的社会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4.

④ 《铅与古罗马宫廷灾难之谜》，《现代社会中的化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人），日耳曼人蜂拥逃向西方，以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人的生育率很高，人口众多，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控制了罗马的粮食来源。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三天三夜的洗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正如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这段长达一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中世纪”。

假如古希腊、罗马帝国没有因为人口问题而灭亡，那么工业革命可能会更早发生，人类也可能更早地步入现代文明。

基督教于公元1至2世纪传入罗马，在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容易被许多人接受。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 longer，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基督徒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①。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现在西方一些人士担心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又在欧洲重演。欧美国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世纪以来生育率就不断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生育率普遍跌到更替水平附近。二战后出现了一个婴儿潮，60年代初欧盟的生育率达到2.6，美国则达到3.6。

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大批量生产，口服避孕药在市场推出，加上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性解放”风潮，离婚率增加，结婚率下降，性病泛滥。社保制的建立、生育的付出与养老收益脱钩，生育对个人变得没有多大益处了。60年代，欧美的生育率再次下降，美国在1976年降到1.74后止跌回升，到1989年回升到2.0，其后一直稳定在2.1附近。欧洲的生育率一路狂跌，2001年欧盟只有1.45，其后略有回升，但2009年还不到1.6。欧洲人口将从2015年开始负增长。

劳动力的短缺，使得欧洲在1960年代就开始吸引穆斯林移民。所有的西欧国家都

^① Spengler, "Faith, fertility and American dominance——The Empty Cradle by Phillip Longman", Asia Times Online, Sep 8,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108Aa01.html.

面临着穆斯林人口剧增的问题。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2%上升到1990年的4.1%、2000年的5.1%、2010年的6.0%，到2030年将达到8.0%。

表2.1 欧洲各国穆斯林人口(万)、占总人口比例(%)及生育率^①

国家	2010年		2030年		2005~2010年生育率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穆斯林	非穆斯林
法国	470.4	7.5	686	10.3	2.8	1.9
德国	411.9	5	554.5	7.1	1.8	1.3
英国	286.9	4.6	556.7	8.2	3.0	1.8
意大利	158.3	2.6	319.9	5.4	1.9	1.4
西班牙	102.1	2.3	185.9	3.7	1.6	1.4
奥地利	47.5	5.7	79.9	9.3	2.4	1.3
比利时	63.8	6	114.9	10.2	2.5	1.7
丹麦	22.6	4.1	31.7	5.6	2.7	1.8
希腊	52.7	4.7	77.2	6.9	1.8	1.6
荷兰	91.4	5.5	136.5	7.8	2.7	1.6
挪威	14.4	3	35.9	6.5	3.1	1.8
瑞典	45.1	4.9	99.3	9.9	2.5	1.8
瑞士	43.3	5.7	66.3	8.1	2.4	1.4

穆斯林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201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占48.7%，而非穆斯林中30岁以下人口只占33.8%。一方面由于穆斯林的生育率高，一方面由于年轻人口（现在和今后的育龄人口）比例高，这就意味着今后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二战后，强大的实力赋予了欧洲人“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唐朝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对移民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4架民航客机，撞塌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以“9·11”事件为转折，欧洲的种族关系转趋紧张，发生了多起穆斯林恐怖袭击事件。

2004年3月11日上午，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的系列爆炸案导致190人丧生，受伤人数

^①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10-2030”, Pew Research Center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January 27, 2011, http://www.pewforum.org/uploadedFiles/Topics/Religious_Affiliation/Muslim/FutureGlobalMuslimPopulation-WebPDF-Feb10.pdf.

超过1500人。

2004年，荷兰电影制片人兼报章专栏作家特奥·梵高因在纪录片中对妇女在伊斯兰世界的现状做出抨击，遭到枪杀。

2005年7月7日早上交通尖峰时间，伦敦连环发生了至少7起爆炸案，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共52人，伤者逾百。

2005年9月30日，在丹麦《日德兰邮报》上刊出负面描绘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导致穆斯林民众的抗议，也带来部分极端分子的恐怖威胁。

2005年10月，法国数十个城镇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焚车近万辆。

从此，欧洲人对穆斯林移民的“反感度”达到了峰值，很多人认为欧洲本土的文化特征正受到威胁，担心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多元文化失败论在欧洲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公开承认“多元文化努力彻底失败”^①。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捍卫西方价值观^②。接着，法国、荷兰等国也承认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开始强调“主导文化”^③。

2011年7月22日，挪威于特岛发生枪击案，造成92人死亡，97人受伤。凶手安德斯·布雷维克是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承认，政府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其犯罪的动机之一。挪威惨案向欧洲敲响了警钟：欧洲地区反对移民、反对伊斯兰和反对多元文化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大增。

今后欧洲将陷入两难的境界：一方面，以2010年为转折点，总劳动力开始减少，经济很大程度将依赖移民；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减少后，经济将出现长期的衰退，大众心理将由开放转向保守，很容易将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治安恶化归罪于移民。欧洲近年的排外思潮兴起其实是经济衰退的一个标志。移民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对移民是“排斥”还是“利用”将考验欧洲政要的政治智慧。

从人类文明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其实是好事。穆斯林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在继续上升，从1950年的17.06%上升到1970年的19.02%、1990年的22.07%、2010年的24.86%，预计将增加到2020年的26.01%^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穆斯林人口在世界经

① 王方、纪双城、董铭：《多元文化失败论在欧洲蔓延》，《环球视野》，第329期（摘自2010年11月15日《环球时报》），<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3082>。

② 《英首相卡梅伦称国家文化多元主义已死亡》，BBC中文网，2011年2月5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uk/2011/02/110205_cameron_multiculturalism.shtml。

③ 李文堂：《西方也讲“主导文化”？》，人民网，2011年11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290255.html>。

④ Houssain Kettani, “World Muslim Population: 1950-20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2 (June 2010), pp.154-164, <http://www.ijesd.org/papers/29-D438.pdf>.

济、政治、文化的发言权将不断上升，他们也必将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人口优势避免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东西方历史有些相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同期，两地的科学与文明迅速发展，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几乎同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中国涌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哲，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中国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被秦始皇焚毁，汉朝只继承了残存的文明。古希腊人的文明遗产也只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其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

与罗马帝国同期的是中国东汉、魏晋时期。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药（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尽情享受声色，崇尚空谈和阴柔美，玄学兴起，好男色，“狎昵变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美男子“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儒家东晋史家干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保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搜神记》卷七）干宝评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干宝将这些现象与其他现象一起视为西晋败亡之兆，“胡狄侵中国之萌”。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晋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塞外，并以汉人戍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文中提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认为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江统的建议也未被采纳。

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各派皇室宗亲和军阀们为了争夺权利，竞相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军队，大批蛮族部族潮涌般冲入华夏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带。一方面是淫乱、礼崩乐坏的西晋王朝，一方面是剽悍的胡风。在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对汉人社会大肆杀戮和抢劫。《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史称“五胡乱华”。

干宝在《晋纪总论》谴责西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礼法刑政，於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应詹给元帝上疏，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晋书·应詹传》）

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汉族人口急剧减少。部分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东晋偏安江南，保存了文明。《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而北方五胡互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甚至从此消亡），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訾中，人口减少。留在北方的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于是，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隋唐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有人说，蒙古族和满族凭借很少的人口仍然征服中国，因此人口多少意义不大。其实，正如商鞅所说：“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蒙古和满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国，主要原因是汉朝之后（尤其是宋朝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刻意弱化民间力量，虽然中国总人口多于蒙古和满族等民族，但是可以动用的力量反而不够。而蒙古和满族却充分利用他们的人口资源。蒙古和满族虽然能够通过武力征服中国的政权，但是不能征服中国的文化（必须靠人口）。最终，这些民族反而被同化。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政权虽然被征服过，但是中华文化从没有被征服过。

吐蕃、蒙古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7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

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①，西藏人口有800万^②。西藏军队曾于公元763年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将大量财富用来修建众多的寺庙，进一步降低老百姓养育孩子的能力。吐蕃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藏族只有277.5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藏族人口541万，占中国人口的1/233。

毛泽东认识到西藏的制度不利于人口发展，他在1959年说：“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③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蒙古帝国拥有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战马，13世纪蒙古铁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无数的古代文明遭到彻底毁灭，无数个城池被夷为平地，数千万人被屠杀，征服的疆域面积超过4000万平方公里。但很快就因为本民族人口的局限不能承受扩张所带来的压力而崩溃，其强大不过是昙花一现。

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蒙古总共被分为了200多个盟和旗，始终被束缚在各自的地域，不能统一在一起形成人口规模优势，这样就不会威胁满清的统治。康熙《大清会典》规定：“外藩蒙古不得越旗改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

满清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控制蒙古族的人口。“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的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更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

① 《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

② 《从数字看西藏》，新华网（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4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14/content_7972647.htm。

③ 毛泽东：《毛泽东对西藏平叛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引自：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07035803672986>。

“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①。1792年，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喇嘛说》碑文，立此碑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阐明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②。

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长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在中国总人口由数千万增加到4亿多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

冯玉祥将军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待的吗？’”^③

1908年，《民报》发表了署名蒙裔多分子，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④

解放后由于摆脱黄教的束缚，中国的蒙古族人口快速增加，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8.8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676），2000年增加到399.53万（是1953年的4.5倍，占中国总人口的1/317）。而蒙古国的人口也从1950年的78万增

^① 《兴安盟科右前旗葛根庙历史初探》，内蒙古新闻网，2004年9月4日，http://xam.nmgnews.com.cn/article/20040904/22889_1.html。

^② 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论》，《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冯玉祥：《我的生活》，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④ 蒙裔多分子：《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民报》，1908年第20号《来稿》，第113页。

加到2000年的241万（是1950年的3.1倍）。可见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卓有成效”的。公正地说，解放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蒙古族的人口发展的。

印第安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数千年来，印第安人在美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对天文、数学、历法、雕刻技术有卓越的创造，尤其是农业非常发达，最早培植了玉米、马铃薯、红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等农作物，并掌握了饲养火鸡、狗和蜜蜂的技术。

但印第安人却没有欧亚大陆所有的水稻、小麦、燕麦等谷类作物，也没有牛、马、羊、猪等大牲口。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基本没有大规模饲养业，餐桌上虽然有玉米，但是肉类却非常有限（主要肉食是豚鼠肉）。不会使用轮子，又没有大牲口，也就没有马车等运输工具。印第安人一直不会使用铁制工具，耕种技术比较原始。

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玛雅文明辉煌两千年后却在公元9世纪突然走向败落，数十座古老的城邦同时被废弃，逐渐为森林所淹没。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印第安人仍然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

由于人口仍然众多，印第安文明的火炬并没有熄灭。对1492年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总数，不同的学者估算结果不一，从840万到1.12亿不等，比较准确的估计是5000万到6000万，其中秘鲁人口为400万到1500万，中墨西哥人口为500万到2500万，中美洲人口为225万到545万^①。要知道1403年明成祖时期，中国人口也才6660万人^②；目前，30个西欧国家在1500年的时候总人口也只有5700多万人（2008年人口为4.01亿人）^③。假以时日，印第安人文明仍有机会复兴。

然而随着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流行病，使得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下降到1568年的265万、1595年的137.5万、1625年的73万。秘鲁的人口下降到1570年的130万、1620年的70万^④。美国的印第安人人口也从1492年的150万快速减少，后面逐渐增加，但到1920年的时候仍然只有35万^⑤。很多印第安人部

^① Peter Bakewell, Jacqueline Holler,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to 1825(3rd Edition),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p.195-196.

^② 《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

^③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3-2009.xls.

^④ Peter Bakewell, Jacqueline Holler,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to 1825(3rd Edition),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p.195-196.

^⑤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changing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in transition", U.S.Society&Values, Vol 4, No 2(JUNE 1999), pp.7. <http://usa.usembassy.de/etexts/his/ijse0699.pdf>.

落彻底灭绝。

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并非欧洲人的枪炮（1500年西班牙总人口才680万，靠枪炮是难以征服五六千人口的美洲的），而是他们带来的疾病。天花、霍乱、腮腺炎、麻疹、淋病和黄热病，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力。比如欧洲人当时的天花病死率只有10%，而印第安人则高达90%，天花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同盟军^①。

一方面是印第安人人口的崩溃，一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铲除一个文化，如同路人随手折下路边一朵向日葵”，印第安人的文献被殖民者当作“魔鬼的作品”付之一炬，曾经辉煌的印第安人文明彻底崩溃。作为美洲新主人的欧洲人然后得意地宣扬“印第安人无文明”^②。

同样，在英国人入侵澳大利亚的时候，天花等传染病也成了最得力的同盟军。1789年，在与新近到达悉尼港口的英国定居者为邻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中间爆发了天花，并向内陆扩散。据英国人估计，当时这场天花杀死了50%的土著人。此次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遇到过的最大的一次“人口地震”^③。人口的崩溃必然导致文明的崩溃。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工业革命起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60年代，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国其他地区 and 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是什么原因导致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偏僻的岛国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杨晓凯综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Simon Johnson）等人的观点^④，强森等人比较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当时的条件，他们发现，西班牙、葡萄牙发生工业革命的客观条件远远比英国要好：

① 谢来：《传染病打败印第安人？》，《新京报》，2006年5月21日，<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0582/2006/05-21/018@181761.htm>。

② 《丛林中的神话：玛雅文明》，新华网（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3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5-03/24/content_2738143.htm。

③ 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http://gb.cri.cn/3601/2005/07/21/1266@631375.htm>。

④ 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在西班牙发生》，《南方周末》，2003年4月24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424/jj/qs/200304240677.asp>。

① 西班牙、葡萄牙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

② 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③ 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但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纯粹以剥削殖民地满足本土为目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对殖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工业革命本应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假说。

① 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

② 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

③ 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研究发现，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英国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并且私有财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所得到的好处却由皇室所垄断。换句话说，英国是由民间自发地参与大西洋贸易，是“私营”，而不是王室出资靠“国营”。因此，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杨晓凯极为推崇强森等人的这种观点，并说现在的太平洋贸易就像当年的大西洋贸易，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强森、杨晓凯的这些观点解释了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但是却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法国。法国也是当年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直接从这些贸易中得益；法国大革命前虽然政治专制，但是经济却比较自由，并且“薄赋轻徭”，普通百姓也能分享经济利益，在大革命后，法国对专制的限制更甚于英国。依照强森、杨晓凯的观点，工业革命能够发生在英国，那么更能发生在法国。

但杨晓凯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一文比较英国和法国时，却又赞扬英国政府的高税率。杨晓凯认为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依照杨晓凯的这种观点，那么西班牙政府比英国政府更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工业革命又应该发生在西班牙才是。

因此，强森、杨晓凯对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解释虽然有很多合理成分，但是并不充分。因为他们忽略了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

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欧洲国家，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却是英国，而不是文艺复兴起源地意

大利，不是航海强国西班牙，也不是近代世界宪法文化的发源地法国。其实，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的主要原因是人口。

表2.2 1500~2008年欧美各国人口(百万)^①

国家\年份	1500	1600	1700	1820	1850	1900	1950	2000	2008
英国	3.9	6.2	8.6	21.2	27.2	41.2	50.1	59.5	60.9
爱尔兰	0.8	1.0	1.9	7.1	6.9	4.5	3.0	3.8	4.2
法国	15.0	18.5	21.5	31.3	36.4	40.6	42.5	61.1	64.1
德国	12.0	16.0	15.0	24.9	33.7	54.4	68.4	82.2	82.4
意大利	10.5	13.1	13.3	20.2	24.5	33.7	47.1	57.7	58.1
荷兰	1.0	1.5	1.9	2.3	3.1	5.1	10.1	15.9	16.6
葡萄牙	1.0	1.1	2.0	3.3	3.8	5.4	8.4	10.3	10.7
西班牙	6.8	8.2	8.8	12.2	14.9	18.6	28.1	40.0	40.5
苏联	17.0	20.7	26.6	54.8	73.8	124.5	179.6	288.7	283.7
美国			1.0	10.0	23.6	76.4	152.3	282.2	304.2

当英国人口因为引进美洲高产作物而使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后，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法国大文豪雨果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②。

1500年，法国人口1500万，大不列颠（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70万左右，法国人口是大不列颠人口的3.2倍。从1500年到1820年，大不列颠人口增加了5.0倍，而法国、德国、意大利人口分别只增加了1.1、1.1、0.9倍。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了英国人马尔萨斯的担忧。但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仍然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1837~1901年在位），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然而，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

工业革命需要两种人：大量脱离土地的技术创新人员和大量自由劳动者。只有英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看看英国当时的情况。

^①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3-2009.xls。如无特殊说明，本节和下面几节的人口和GDP数据均采纳安格斯·麦迪森的资料。

^② 《历史烽烟难掩哥伦布传奇，是冒险家还是征服者》，新华网（来源：《新京报》），2006年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6-05/21/content_4578167_2.htm。

① 劳动力脱离土地。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毛织业的发展。为了增加羊毛的数量，18世纪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使农业完全纳入资本主义轨道。

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并且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革命。18世纪30年代，三叶草和芜菁被引入大田，增加了土壤肥力，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农业家贝克韦尔培养出“新莱斯特羊”，开改良牲畜之风。

一方面是人口急剧增加，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人口需求减少，这就导致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样，中国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为其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农业基础。

② 工业发明。

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

1764~1767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

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

1779年，纺织工人克隆普敦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自动棉纺纱机。

1785年，牧师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

1769年，仪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单向蒸汽机，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③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英国由于人口增加快，每年增加大量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上面可见，英国的这些工业发明大多是一线年轻工人，要是这些人仍然在土地上谋生，是不可能有机会作出发明的。有大量的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而这又是人口压力逼出来的。

法国耕地面积是英国的3.04倍，草原面积则只相当于英国的85.2%^①。1500年，英国人口394万，只相当于法国人口（1500万）的26.3%，人均耕地是法国的1.25倍，人均草原面积则是英国的4.47倍，当时两国的人均GDP基本一致，英国是714美元，法国是727美元。

1700年，英国人口增加到857万，相当于法国人口（2150万）的39.8%，人均耕地只是法国的83%倍。1705年，英格兰只有35%的劳动从事农业，而法国还有70%

^① “Land and Agriculture”，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last update: October 2010,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agriculturalland.htm>.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英国人均GDP增加到1700年的1250美元，高于法国的910美元。

到1850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增加到2718万，已经相当于法国人口（3640万）的74.7%，人均耕地只是法国的44%，人均草原是法国的1.57倍。

那么可以看出，当时法国耕地丰富，一方面没有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民在土地上就可以谋生，没有必要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到城市讨生活。到1845年，法国还有5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英国只有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了^①。

以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0%计算，1850年的时候英国有1359万劳动力，其中1087万从事非农行业；法国有1820万劳动力，但从事非农行业的只有746万。就是说，虽然当时英国总人口仍然比法国少，但是脱离土地的自由人员反而远比法国多。

1851年，英国耕地单产只比法国多20%^②，光是靠本国耕地根本养活不了不断增加的人口，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为了生存，破产的农民纷纷转移到城市，通过贸易获得就业机会和粮食。1850年，英国的人均GDP增加到2330美元，远高于法国的1597美元。

如果1500~1850年英国人口也与法国同步增长的话，那么1850年人口只有957万，人均耕地反而是法国的1.25倍，人均草原是法国的4.47倍。耕地和草原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就业机会和粮食需求，根本不必进城打工。

如果1700~1850年英国人口与法国同步增长的话，那么1850年英国人口只有1450万，自由劳动力还不到法国的一半。

有人认为刺激工业革命产生的两大最重要条件是：国际市场与资本市场。其实这两个条件在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之前，已经在荷兰完成了。但是荷兰的人口太少，到1820年人口才230万，如此少的人口一方面难以涌现瓦特那样的发明家，一方面自由劳动力难以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所激发的生产能量。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因素只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诸多必要条件在英国得到完美的统一。而当时英格兰中部人口最为稠密，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也就不足为奇了。

浙江温州和湖南邵东的情况也类似。两地人多地少，在计划经济时代非常贫穷。

^① Stephen Broadberry, Kevin H. O' Rourk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ume 1- 170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9-151. http://www.cepr.org/meets/wkcn/1/1679/papers/Brunt-Dennison-Simpson_Chapter.pdf.

^② Clark, Gregor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gland, 1500-1912",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une, 2002, <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gclark/papers/prod2002.pdf>.

温州人均耕地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5；邵东人均耕地面积在湖南倒数第一，并且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改革开放后，迫于生计，大量温州人、邵东人到全国各地经商、创业，两地商人现在成了财富的符号。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1990年英裔人口（包括English、Scottish、Irish、Scots-Irish、Welsh以及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人后裔American）共9683万（考虑到还有10%以上的人没有公布祖籍，因此英裔总人口应该超过1亿），占美国人口的38.9%（占公布祖籍人口的43.5%）；法裔人口1032万^①。

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统计资料^②，英裔1649万，法裔491万（主要是魁北克省），还有1007万认为是Canadian人（早期移民，以英裔为主），其中部分是混血人种。

英国和法国还向其他国家移民，也还有外来移民，假设二者抵消。1990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100万，法国5817万，澳大利亚1696万，新西兰341万。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的英裔，那么1990年大不列颠裔人口接近2亿，而法裔人口不到7500万。

就是说从1500年到1990年，当初474万大不列颠人口增加到近2亿，增加41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11.9倍），当初1500万法国人增加不到4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2.9倍）。从文艺复兴开始到1492年这一段时间，有10位名人（哈特排行榜）都是欧洲大陆的，无一是大不列颠的。在1500年之后，影响世界的名人中大不列颠却有17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有8人，而传统的欧洲人口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分别只有8人、9人、3人。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数百万人口使用的英语，现已成为世界语言。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1662年（康熙元年），法国人口2000万，中国人口四千多万^③，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倍多；2010年，中国人口却是法国的20倍。1700年，法国人口占西欧（2008年30国人口共4亿）的26.4%，GDP占24.1%；2006年，法国人口只占西欧的15.8%，GDP只占16.4%。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决定命运！

^① U.S. Census Bureau, "Ancestry: 2000", Census 2000 Brief, Issued June 2004, pp.3-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2kbr-35.pdf>.

^② "Ethnic origins, 2006 counts, for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 20% sample data", Statistics Canada, Date Modified: 2010-10-06,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dp-pd/hlt/97-562/pages/page.cfm?Lang=E&Geo=PR&Code=01&Data=Count&Table=2&StartRec=1&Sort=3&Display=All&CSDFilter=5000#Notes>.

^③ 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人口因素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16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导致人口减少，1700年恢复到15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1820年德国人口为2491万，1830年恢复到2804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3946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8万和3773万。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法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另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其被称为“近代大学之母”。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科学家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化肥。1913年德国人口增加到6506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65万和4146万。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

德国的直接竞争对手是邻国法国。1820年德国人口只相当于法国的80%，而到1913年却是法国的1.6倍。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1820年德国GDP只相当于法国的76%，1871年只相当于英国的68%，但在1873年超过法国，1908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3年的德国的GDP是法国的1.64倍，是英国的1.06倍。绝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让德国在1914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除了德国外，还有奥匈帝国（5280万人口）、奥斯曼帝国（2400万人口）、保加利亚（470万人口），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但是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人口大国加入协约国，彻底改变了战局。俄国当时虽然还是农奴制国家，还比较落后，但是1913年有1.56亿人口（是德国的2.4倍），GDP也接近德国；1913年美国人口（9761万）是德国1.5倍，GDP是德国的2.2倍。这种人口形势对比必然导致同盟国的惨败。战争使得德国的GDP减少了1/3，也使得人口减少到1919年的6055万。

1919~1939年间德国人口和经济增长都快于英国和法国，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6929万，而法国和英国人口分别只有4190万、4799万；1939年德国的GDP是法国的

1.87倍，是英国的1.25倍。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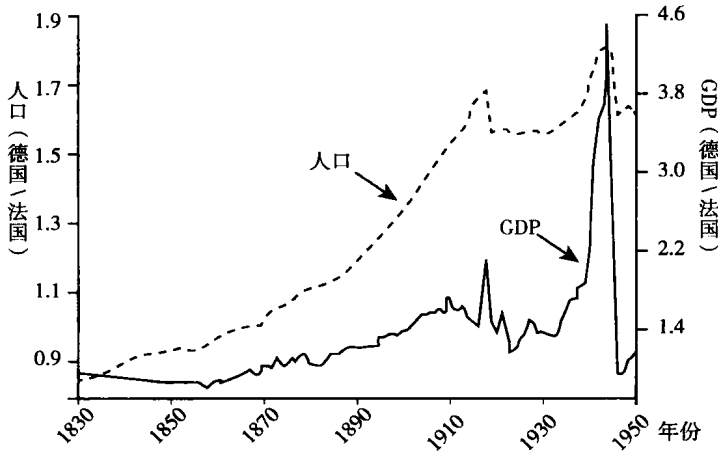


图2.1 德国和法国的人口、GDP的比较

从局部来看，以德国和意大利（1939年人口4387万，GDP是法国的77%）为主的轴心国是可以打败以英法为主的同盟国的，但同样由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加入，改变了战局的结局。1939年，美国人口是德国的1.9倍，GDP是德国的2.3倍；苏联人口是德国的2.78倍，GDP是德国的1.15倍。战争不但让德国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国家也被一分为二。

1820年的法国人口是德国的1.25倍，GDP是德国的1.32倍；但是到1939年的时候，法国人口只是德国的60%，GDP只是德国的54%。短短的120年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德国除了本土人口增加较快外，还大量移民国外，美国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美国有5795万德裔^①，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统计资料，加拿大有318万德裔^②。1700年的1500万德国人目前至少有1.5亿后裔。

但是风水轮流转，二战后德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法国，1975~2009年平均只有1.37，而法国平均还有1.86。法国人口相当于德国的比例由1943年的55.4%上升到2010年的76.3%。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如果保持现有生育率不变，那么2100年法国人口将是德国的1.68倍，中位年龄是46.5岁（德国是56.5岁）^③。

① U.S. Census Bureau, "Ancestry: 2000", Census 2000 Brief, Issued June 2004, pp.3-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2kbr-35.pdf>.

② "Ethnic origins, 2006 counts, for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 20% sample data", Statistics Canada, Date Modified: 2010-10-06,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dp-pd/hlt/97-562/pages/page.cfm?Lang=E&Geo=PR&Code=01&Data=Count&Table=2&StartRec=1&Sort=3&Display=All&CSDFilter=5000#Notes>.

③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的人口因素

日本人口从1500年的1540万增加到1820年的3100万之后，与中国一样，人口停滞增长。1850年日本的人口、GDP分别相当于中国的7.8%、8.8%，人均GDP也与中国基本一致。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强国之路。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发展近代工业；建立近代化军队，进行武士道教育。

其实，人口政策改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明治初年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对贫困家庭，发给育儿补贴，实行孕妇登记、死产检查制度，重视妇幼保健。1941年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励一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一方面不断增加人口资源；一方面兴办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通过教育将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从1850年到1894年（甲午年），日本人口从3200万增加到4135万，增加了29.2%；中国人口从4.12亿下降到3.88亿，下降了5.8%；日本人均GDP从679美元增加到1079美元，中国人均GDP从600美元下降到542美元。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是在走下坡路，日本是在走上坡路。考虑到中国晚清政治也腐败，日本战胜并非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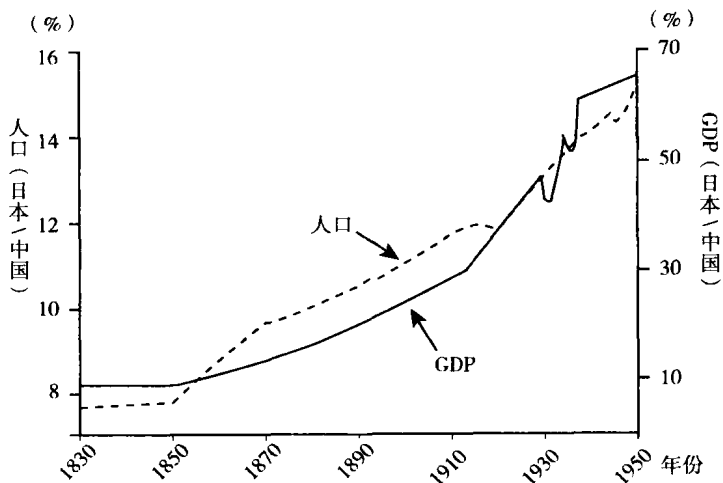


图2.2 中国、日本的人口和GDP的比较

清朝战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获得赔款库平银2亿两，其中80%用来发展军力。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有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并获得港口特权。日本于1937年悍然发动了对华战争。

从人口角度更能看出当时中日实力的对比。1937年日本人口增加到7128万（是1850年的2.23倍），人均GDP增加到2315美元；中国人口只增加到5.11亿（是1850年的1.24倍），人均GDP仍然只有580美元。日本GDP总量相当于中国比例从1850年的8.8%提升到1938年的61%。并且日本的人口结构也比中国好，从事科技和工业的人口比例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又实行军国主义教育，能够聚集起全国的人力物力对抗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国、英国等国总人口和出生人口都下降；而日本每年出生人口仍然稳定在220万左右^①，总人口还增加到1944年的7718万。并且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朝鲜、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东部大片地区，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人口资源。如果单靠中国本国力量，是很难在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但1944年，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8倍，GDP是日本的8.4倍，军事和科技也远超过日本。苏联人口是日本的2.3倍，GDP是日本的1.6倍。

可见，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的重要秘诀之一都是将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这也符合商鞅“民众而用”的人口思想。而中国当时却是“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胡适、张竞生、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都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人满为患，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刚好与德国、日本当年相反，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降低科教投入。中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从1979年之前的平均1.3%（最高为2.3%）下降到0.6%。中国高中在校人数由1978年的1553万下降到1981年的715万（直到2002年才再次超过1978年）；初中招生人数也从1977年的2368万下降到1981年的1363万^②。一些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得靠“希望工程”。

德国和日本当时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

^① 《男女别人口·人口增减及人口密度（明治5年~平成21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www.stat.go.jp/data/chouki/zuhyou/02-01.xls，2011年9月10日。

^②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通过侵略来扩展地盘；2008年人口1.27亿，人均GDP是1937年的9.9倍，然而整个国家却陷入了另外一种恐慌，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日”薄西山的人口因素

明治维新之后，直到1949年，日本一直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资料^①，日本年出生人口由1872年的59.3万稳步增加到1920年的210万，此后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1946年则下降到157.6万（生育率下降到3.02）。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稳定，1947年、1948年、1949年出现了三年出生高峰，每年分别出生262.3万（生育率回升到4.54）、270.3万（是1946年的1.7倍）、269.4万人，这个人群被称为“团块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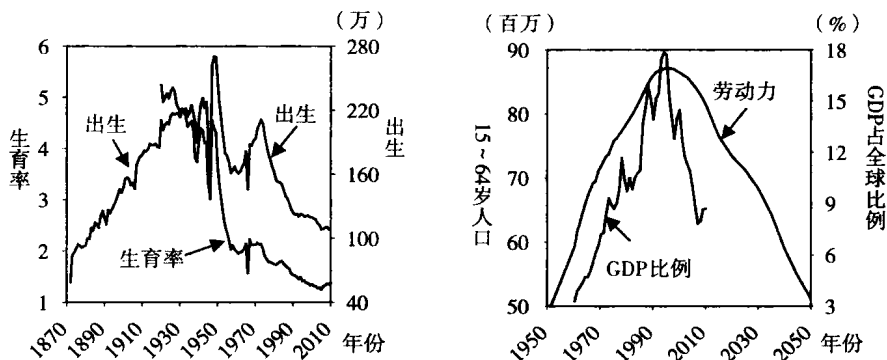


图2.3 日本历年生育率、出生人数、15~64岁人数、GDP占全球比例

“团块世代”及以前出生的人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些年轻劳动力不但数量多，并且素质高（工作的热情高、有责任心，且有熟练的技术）。

但是当时日本政界和学界对出生高峰极为惊恐，1949年内阁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同年，众议院通过“关于口问题决议案”，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计划，人口政策由鼓励生育转变为限制生育。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在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计划政策的双重推动下，生育率从1949年的4.3急剧下降到1952年的3.0、1956年的2.2。

^① 《男女别人口·人口增减及人口密度（明治5年～平成21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www.stat.go.jp/data/chouki/zuhyou/02-01.xls，2011年9月10日。

美国的控制人口的组织在日本人口政策的这种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战失败后，日本被美国占领。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派出专家（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弗兰克·诺特斯坦）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调研了3个月。1948年，日本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可见日本的人口政策确实是受优生学的影响），放宽对堕胎的限制。日本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主体框架在美国占领时期（1945~1952年）已经基本确立^①。可见，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意义不仅仅在战争本身。日本的计划生育组织和人口学家对中国后面的计划生育也起了推动作用^②。

20世纪40年代的出生高峰在60年代到了生育年龄，日本又出现了一个继发性出生高峰（尽管生育率并没有上升，仍然只有2.1、2.2），每年出生人口由1961年的161万增加到1973年的211万（还达不到战前水平），总人口在1967年突破1亿大关。这又引起了日本政界和学界的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1974年4月，经“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正式发表了以“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为题的《人口白皮书》，强调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尖锐的，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并把优生优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视人口宣传教育，从1970年代起，开始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强人口教育。日本的控制人口计划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高度评价。

日本生育率从1974年的2.1降低到1975年1.9、1990年的1.5，1997年之后生育率稳定在1.3左右。2011年日本只出生105.7万人，不到战前的50%。由于育龄妇女在继续快速减少，今后每年出生人口还将继续下降。

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了人口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日本15~64岁的劳动力从1950年的4905万增加到1995年的8726万。年轻劳动力推动日本经济腾飞，1950年到197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10%以上。以现值美元为标准^③，日本GDP占全球比例从1960年的3.3%上升到1994年的17.9%（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DP从479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1968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只相当于美国的16.6%，而到1987却超过了美国，1995年的时候是美国的1.5倍。日本出口占全球比例由1948年的0.44%快速增加到1953年的1.52%、1963年的3.48%、1973年的6.4%、1983年的8.0%、1993年的9.9%，成为世界工厂^④。日本在1990年总抚养比（非劳动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

① Yu-ling Huang, "The Population Council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Postwar East Asia", Ph.D. Candidate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2009, <http://www.rockarch.org/publications/resrep/huang.pdf>.

② 周冬霖：《日本计划生育在中国》，《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我所了解的日本JICA人》，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99959/99970/index.html>。

③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④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developments in 2009",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us_e/its2010_e/its10_world_trade_dev_e.pd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2010, PROSPECTS FOR 2011", 7 April 2011,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1_e/pr628_e.pdf.

比例)只有43%，中位年龄只有37岁，低抚养比和经济的繁荣也导致民众的民主政治热情高涨，于1993年完成了政治转型。

但是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1995年之后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年龄结构也不断老化），导致日本经济开始一蹶不振。

一方面年轻人口数量在减少，一方面缺乏创新活力、创业欲望和“团块世代”那样的吃苦耐劳精神。梁建章研究发现，日本10大高科技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在过去30年中创立的，而美国10大高科技企业中却有8家是过去30年中创立的^①。日本占全球500强企业的份额从1995年的149家减少到2012年的68家。

日本GDP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9%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8.7%。人均GDP仅仅从1995年的41968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3137美元。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95年的152%下降到2010年的91%（购买力只相当于美国的72%）。国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首相频繁更换，老年犯罪率开始攀升，今后政治生态将大为改变，将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转向生存经济学、政治学。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②。

2011年，日本总人口也开始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如果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日本人口将下降到2050年的9657万（中位年龄将是56岁）、2100年的5521万（中位年龄将是60.4岁），日本今后将逐渐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极端老化的国家。

日本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3.25%降低到2010年的1.83%。在联合国中方案下，2050年、2100年日本人口占全球比例分别只有1.17%、0.90%；在低方案下，分别只有1.19%、0.89%。

俄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于1243年建立了钦察汗国，统治着包括莫斯科公国在内的辽阔区域。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钦察汗国分裂后的大帐汗国，使得莫斯科公国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1546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沙俄诞生。当时的俄罗斯只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

^① 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0~73页。

^② Farrell D, Greenberg 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n aging Japan," McKinsey Quarterly, May 2005. <http://www.mickeybutts.com/agingjapan.pdf>.

小国。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1695万（其中俄罗斯只有数百万人口），1700年也只有2655万。1682年彼得大帝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当时，俄国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被欧洲大国看不起，类似于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国；彼得大帝类似于秦始皇。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动俄国展开了广泛的“西化”运动，学习英、法等国，以变革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局面，俄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

但是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当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家庭在享受现代生活而减少生育的时候，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保持东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20年人口达到5476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125万、2491万、2124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1860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1870年人口已达8867万，其后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在1913年达到1.56亿。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使得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到1931年之后苏联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战前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50%。

从1820年到1938年，俄国（苏联）人口、总GDP、人均GDP分别增加了2.44倍、9.75倍、2.12倍；中国人口、总GDP分别只增加了35%、26%，人均GDP还略有减少。1820年中国的GDP是俄国的6.1倍，但是到1938年的时候只是苏联的71%了。在这段时间内，俄国侵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爆发。虽然当时苏联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德国的40%，但由于有人口规模优势，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作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苏联人口损失较大，总人口由1940年的1.96亿下降到1946年的1.74亿，减少的两千多万人口中很大比例是青壮年劳动力，不但让苏联经济直接损失20%，而且也降低了苏联的经济的后续发展能力。而美国人口却从1940年的1.33亿增加到1947年的1.42亿，经济增长40%。

二战后，苏联人口和经济恢复增长，1947年到1989年美苏人口基本同步增长，

苏联人口相当于美国的比例稳定在116%~119%；苏联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回升到1950年的35.0%、1960年的41.2%、1974年的44.3%（还是远不到战前的水平）。

可见，俄罗斯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从1700年到1940年，俄国人口增加了6.38倍，而法国人口只增长了91%），人口使得俄国的崛起延续了近300年才衰退。如果俄国人口增速与法国一样，那么即便崛起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就不错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厉害的要算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也“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自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

苏联解体的人口因素

关于苏联1991年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既然人是社会的主体，从人口本身分析应该最为准确。与那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找原因的事后诸葛亮不同，美国未来学家彼得·舒瓦茨（Peter Schwartz）在苏联解体几年前就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即将崩溃^①。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1989年出版的《The New Realities》中也从人口结构角度预测了苏联即将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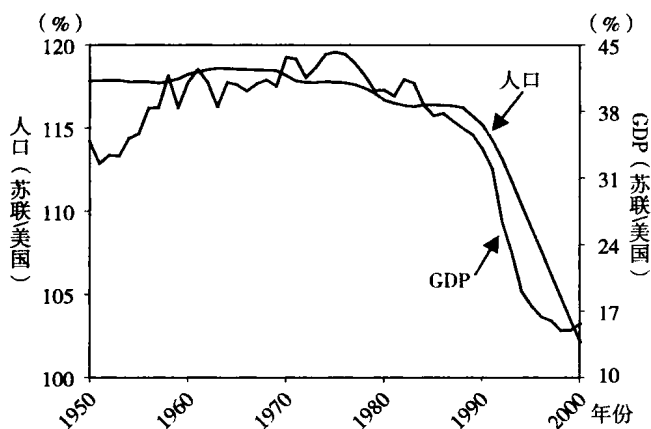


图2.4 苏联、美国的人口和GDP比较

笔者比较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结构，发现1950年到1970年，美苏人口比例、经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1970年之后，苏美两国人口比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苏联和

^① Peter Schwartz, Doug Randall, "Ahead of the Curve: Anticipating Strategic Surprise", in Francis Fukuyama, ed., *Blindside: How to Anticipate Forcing Events and Wild Cards in Glob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 93-108.

美国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为118.3%，这一比例缓慢降低到1980年的116.8%、1990年的115.3%；然后以1990年为转折，这一比例快速降低到1993年的111.9%、1995年的109.1%、2000年的102.3%、2005年的96.5%。苏联和美国的15~64岁劳动力之比在196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却稳定在115%；也是以1990年为转折点，这个比例下降到1993年的109.9%、2000年的102.9%、2005年的98.6%^①。人口均势被打破，也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均势被打破。究其原因，在于：

① 1940年之前俄罗斯（无法获得前苏联全部人口资料）的出生人口一直远远超过美国^②。但是二战期间，俄罗斯每年出生人口急剧下降，从1939年的433万（是美国的1.76倍）下降到1946年的255万。二战后，尽管实行了“英雄母亲”政策，但是出生人数只略微回升到1951年的294万（只是1946年的1.15倍）。1955年之后，俄罗斯出生人口又开始下降，到1968年只有182万（比1955年减少38%）。而美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却从1933年的231万不断增加到1957年的431万（是1933年的1.87倍）。1961年之后，美国的出生人口也开始下降，跌到1973年314万的低谷，但仍然是俄罗斯的1.6倍^③。1946年到1971年，美国生育率平均为3.14，俄罗斯为2.53。虽然苏联是在1991年解体的，其实二战期间就埋下了导致解体的人口学定时炸弹（人口有几十年的滞后性）。苏联在二战中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人口。美国才是二战的真正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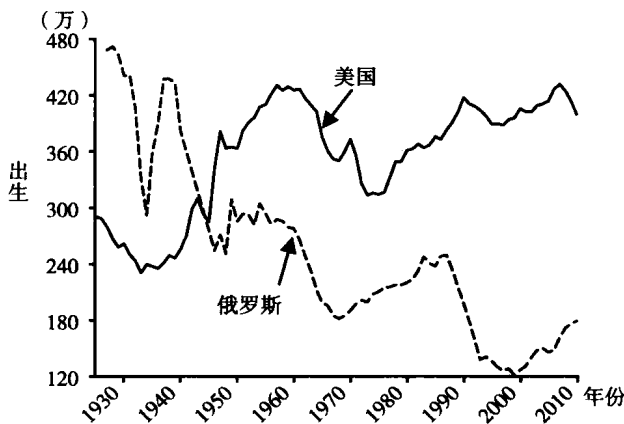


图2.5 美国、俄罗斯每年出生人数

①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3-2009.xls.

② E.Andreev, L.Darski, T. Kharkova "Histoire démographique de la Russie. 1927-1959", НАСЕЛЕНИЕ И ОБЩЕСТВО, № 31, Октябрь 1998, <http://demoscope.ru/acrobat/ps31.pdf>.

③ Sharon Jayson, "Is this the next baby boom?" USA TODAY, 7/17/2008, http://www.usatoday.com/news/nation/2008-07-16-baby-boomlet_N.htm; "Table 1-1. Live Births, Birth Rates, and Fertility Rates, by Race: United States, 1909-94",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www.cdc.gov/nchs/data/statab/t941x01.pdf>.

② 苏联的寿命比美国短，尤其是男性寿命短，很多人在劳动年龄就过早死亡。

③ 苏联在二战损失了两千多万人口，育龄人口损耗比例高，影响了今后的人口发展。从1950年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二战中俄罗斯育龄人口损耗程度远远超过日本。

④ 俄罗斯堕胎比例很高。

表2.3 美国、俄罗斯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岁）、堕胎率（%）比较

年份	生育率		美国预期寿命		俄罗斯预期寿命		堕胎率	
	俄罗斯	美国	男	女	男	女	美国	俄罗斯
1950~1955	2.85	3.45	65.8	71.7	60.5	67.3	0.01	
1955~1960	2.82	3.71	66.6	73.0	62.5	69.9	0.01	134.9
1960~1965	2.55	3.31	66.8	73.6	64.1	72.8	0.01	198.4
1965~1970	2.02	2.55	66.8	74.1	63.8	73.4	0.2	268.6
1970~1975	2.03	2.02	67.5	75.2	63.1	73.6	17.3	239.4
1975~1980	1.94	1.79	69.4	77.0	61.9	73.1	39.1	216.5
1980~1985	2.04	1.80	70.7	77.9	61.5	72.9	43.1	189.2
1985~1990	2.12	1.89	71.3	78.4	63.9	73.8	40.9	190.0
1990~1995	1.55	1.99	72.2	79.0	60.6	72.7	37.5	226.2
1995~2000	1.25	1.96	73.4	79.4	59.6	72.2	34.2	193.6

堕胎率是指堕胎例数与同期出生孩子的比例。比如1970~1974年俄罗斯出生997万人，堕胎2386万例，堕胎率为239.4%；换句话说，怀孕100个孩子，其中有70.5%以堕胎而告终。美国是在1973年才将堕胎合法化，其后的堕胎率也不到俄罗斯的1/5。

⑤ 美国有移民。

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的出生率就已降至临界点以下。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①。

其实，美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就开始快速下降，到1976年只有1.74，而俄罗斯的生育率却稳定在2.0。1972年到1989年，俄罗斯的生育率一直高于美国，俄罗斯平均为2.0，美国为1.84。俄罗斯的出生人口从1968年的182万稳步增加到1987年的250万。但是孩子成为劳动力有20年的成长周期，远水救不了近火。俄罗斯20~59岁的劳动力从1950年的5366万增加到1960年的6544万、1970年的6785万，然后在1985年达到8173

① 《俄人口减少趋势难以逆转》，人民网，2004年11月7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ji/1031/2970741.html>。

万的顶峰后开始减少，到1990年跌到低谷（8007万），国力也跌到低谷，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如果当时能够熬几年，说不定还能熬过去，因为10年后俄罗斯劳动力开始大幅增加（从1999年的8066万增加到2010年的8774万）。

虽然1990年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是苏联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劳动人口不够，不足以支撑2.88亿人口的大国。可见无论人口多少，要是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人口因素只是其一。

苏联解体后，一方面由于政治动荡，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稳定在低水平，俄罗斯经济负增长（1990～1998年人均GDP年均减少6.1%）；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1985～1990年的69.11岁下降到1990～1995年的66.58岁、2000～2005年的64.88岁；生育率从1989年的2.01跳跃性下降到1995年的1.34、1999年的1.17；每年出生人口由1990年的199万下降到1999年的121万（只是1987年的49%）。

表2.4 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历年的生育率^①

国家	1988	1989	1990	1991	1993	1995	1999	2005	2009
俄罗斯	2.12	2.01	1.89	1.73	1.39	1.34	1.17	1.29	1.54
白俄罗斯	2.04	2.03	1.91	1.80	1.61	1.39	1.31	1.21	1.44
乌克兰	2.02	1.92	1.85	1.81	1.60	1.40	1.20	1.20	1.46
拉脱维亚	2.11	2.05	2.02	1.86	1.51	1.25	1.16	1.31	1.31
格鲁吉亚	2.24	2.22	2.18	2.13	2.01	1.88	1.66	1.57	1.56
立陶宛	2.09	1.98	2.03	1.97	1.67	1.55	1.46	1.27	1.55
保加利亚	1.97	1.90	1.81	1.65	1.45	1.23	1.23	1.32	1.57
捷克	1.94	1.87	1.89	1.86	1.67	1.28	1.13	1.28	1.49
斯洛伐克	2.13	2.07	2.09	2.05	1.87	1.52	1.33	1.25	1.41
匈牙利	1.79	1.78	1.84	1.86	1.69	1.57	1.28	1.31	1.32
罗马尼亚	2.31	2.20	1.84	1.57	1.44	1.34	1.30	1.32	1.38
波兰	2.13	2.08	2.04	2.05	1.85	1.61	1.37	1.24	1.40
塞尔维亚				1.80		1.70		1.45	1.44
波斯尼亚	1.84	1.78	1.71	1.65	1.56	1.52	1.45	1.21	1.16
马其顿	2.17	2.15	2.13	2.10	2.03	1.94	1.72	1.50	1.44
斯洛文尼亚	1.63	1.52	1.46	1.42	1.33	1.29	1.21	1.26	1.53
克罗地亚	1.79	1.63	1.63	1.53	1.52	1.58	1.38	1.41	1.50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在苏联自身难保的同时，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劳动力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1990年左右就开始负增长；而当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仍然在快速增加。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85~1990年的2.11下降到1990~1995年的1.62、1995~2000年的1.29，2005~2010年也只回升到1.40。而美国、法国、英国的生育率在1985~1990年分别为1.89、1.80、1.84，在2005~2010年则分别为2.07、1.97、1.83^①。

中国2013年后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但从国际环境看应该不会出现苏联那种政治危机，因为中国经济有完善的体系，并且早已与世界融为一体。根据世贸组织的资料，2010年中国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19.5%，占日本的22.1%，占欧盟的7.0%。并且中国的市场也正在崛起，200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只占美国总出口的2.1%，但2010年已经增加到7.2%，中国市场正给美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②。苏联、东欧当年是孤立的经济体系，还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现在中国不但不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今后老龄化的中国更加无力威胁他国），而且是其重要贸易伙伴。如果中国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那么受害者不仅是中国，还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可能引起整个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和政治动荡（日本和欧洲将首当其冲，因为劳动力已经负增长）。

俄罗斯人口政策的教训和经验

1999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人均GDP在1999年到2010年平均年增长5.75%。一是因为普京赶上了好运气，20~59岁的劳动力在1999年后开始回升，从1999年的8066万增加到2010年的8774万；二是因为普京采取了有效措施，稳定了政治和经济局面；三是因为石油价格稳定在较高水平（俄罗斯是石油输出国）。凭着优良的政绩，普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2012年以64%的得票率第三次当选总统。但2010年之后，俄罗斯20~59岁劳动力（由于俄罗斯人口寿命较短，因此劳动力不以15~64岁计算）开始不可逆地减少（1991年后生育率跳跃性下降后，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25年将跌至7301万，普京2012年再任总统后可能会面临一些棘手问题，普京离任时的声望将大不如2012年。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②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1",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us_e/status_e.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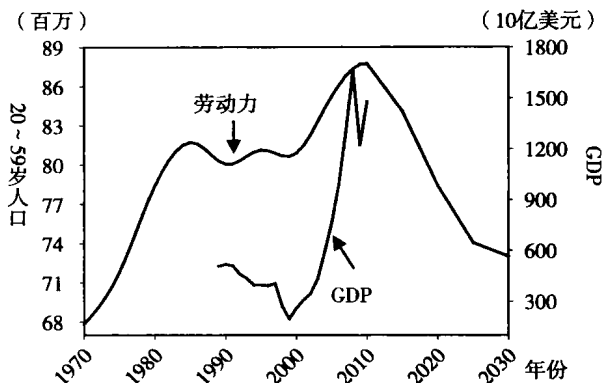


图2.6 俄罗斯历年劳动力和GDP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14年，俄罗斯有0.899亿人口，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49亿；然而从1992年至今，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高50%以上，总人口下降到2010年的1.43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果保持近年的生育率，俄罗斯的人口将下降到2100年的0.67亿。普京总统称之为“国家危机”，人口危机已成为威胁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头号敌人，将来俄罗斯的国家基础都会受到动摇。俄罗斯15~24岁人口将从2005年的2458万下降到2020年的1371万，这至少意味着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到那时将不复存在。就政治意义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将使俄罗斯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发生变化。

从人口角度评价，普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他上台后俄罗斯生育率从1999年的1.17稳步回升到2006年的1.3、2009年的1.54、2010年的1.59，出生人口由1999年的121万增加到2011年的180万（增加48%）。而1999~2010年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生育率却仍然徘徊在1.3左右，中国台湾生育率从1.56下降到0.895。俄罗斯生育率回升有下面几个原因。

① 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增长，预期寿命提高到2011年的68岁。

② 政府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俄罗斯正在走向死亡。普京在多次国情咨文中称人口减少问题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尖锐的问题”，是“国家危机”^①。2005年，俄罗斯推行“国家优先发展计划”，普京亲任主席^②。2006年，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

① 《低生育率已成全球性趋势》，《参考消息》，2004年10月1日。

② 韩显阳：《普京“三管齐下”解决人口问题》，新华网，2006年5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5/13/content_4540638.htm。

中重点谈论了两个“主要问题”，即人口问题和军队发展问题。普京把人口问题放在军事问题之前，可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①。

③ 普京的人口政策的核心是改变现有价值观，回归传统，重视家庭，树立养育子女光荣的观念（普京将“祖国服务”勋章授给“英雄母亲”），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子女，进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为了不偏废传统的家庭观念，俄将2008年定为“家庭年”。梅德韦杰夫总统上台后，又在其夫人的倡议下设立“家庭、爱情和忠诚日”^②。

④ 在政府和宗教力量的推动下，堕胎比例在稳步下降（从1993年的70%下降到2008年的45%）。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严格对堕胎广告的要求，广告内容必须警告堕胎可能成为不孕的原因^③。2011年11月21日，俄罗斯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怀孕12周以后堕胎，并且还规定，申请堕胎的妇女在堕胎前必须有2~7天的重新思考时间^④。

⑤ 财政补贴。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要求政府详细制定一个为期10年的庞大的鼓励生育的财政补贴计划，包括提高对新生儿家庭的补贴，发放儿童学前教育补贴，对孕妇、产妇进行补贴，鼓励并资助收养孤儿，设立“母亲资本”等^⑤。2011年，普京发表2010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俄政府将增加投入，继续大力推行改善医疗、鼓励生育等刺激政策^⑥。2012年2月12日，普京提出一系列详细计划，认为扩建公立幼儿园是俄罗斯领导层的首要工作；把人口负增长地区第三个和第三个以上子女出生的家庭的社会补助延长至孩子3岁，补助额度为每个月7000卢布（约合1470元人民币）；增加学生的奖学金（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将房地产价格降低20%~30%（降低民生成本）。普京表示，如果他的这些计划都能付诸实施，俄罗斯人口将在2050年

① 《人口问题，俄罗斯的“心头之痛”》，人民网（来源：《广州日报》），2007年10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6412156.html>。

② 陆乐、青木、萨苏、古放、陶短房、高懿洁、钟玉华：《男主内，女主外？全球家庭形态遭遇“非传统”挑战》，人民网（来源：《环球时报》），2010年5月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1538909.html>。

③ 《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严格对堕胎广告的要求》，中国新闻网，2011年7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7-15/3186005.shtml>。

④ Russia parliament adopts law restricting abortions, CBS News, October 21, 2011, http://www.cbsnews.com/8301-501714_162-20123745.html。

⑤ 《人口问题，俄罗斯的“心头之痛”》，人民网（来源：《广州日报》），2007年10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6412156.html>。

⑥ 刘恺：《普京说俄罗斯将大力推进鼓励生育等刺激政策》，新华网，2011年4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4/21/c_121331602.htm。

上升至1.54亿，否则将下降至1.07亿^①。俄罗斯副总理罗格津则表示，俄罗斯应该通过鼓励生育将人口在现有1.42亿的基础上增加3倍，即要达到5亿人^②。

⑥ 吸引移民。尤其是欢迎前苏联地区的移民。俄罗斯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移民目标国家（移民人数仅次于美国）。移民的涌入补偿了自然损失的人口数量。普京表示，移民的不断涌入可以使俄罗斯人口在2025年达到1.46亿^③。

201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总结说：“人口计划开始实施后，居民人数趋于稳定，从2010年起人口实现了增长。这是我们的主要成绩。”他认为，一家3个孩子应当成为俄罗斯的标准。为此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首先让妇女不再担心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会影响其职业生涯和找到好工作，甚至迫使其成为家庭妇女。还需要解决排队入幼儿园的问题，落实育有子女妇女的职业再培训计划，支持灵活的就业形式。尤其应关注学前教育机构，包括鼓励建立私营学前教育机构。

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700年，美国人口只有100万，只占全球的0.17%。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人口还只有250万。由于外来移民和高生育率，美国人口快速增加到1820年的998万（占全球0.96%）、1900年的7639万（占全球4.89%）、1950年的1.52亿、2009年的3.07亿。

以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④，1820年美国经济总量还只占全球的1.8%，只相当于英国的34.6%、法国的35.4%；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在1861年超过法国，在1872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1951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达到6.02%的顶峰，GDP占全球比例也达到27.7%的顶峰。其后，美国人口和GDP占全球比例都缓慢下降，2008年分别下降到4.5%、18.6%。

① 朱艳：《普京列出详细计划欲将俄罗斯人口增至1.54亿》，新华网（来源：国际在线），2012年2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13/c_122695571.htm?prolongation=1。

② 《俄副总理表示俄罗斯人口目标为5亿》，中国日报网（来源：《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13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2-02-13/content_5145672.html。

③ 《俄罗斯人口数量因移民涌入而增加 达到1.43亿》，新华网（来源：中国新闻网），2012年8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20/c_123607019.htm。

④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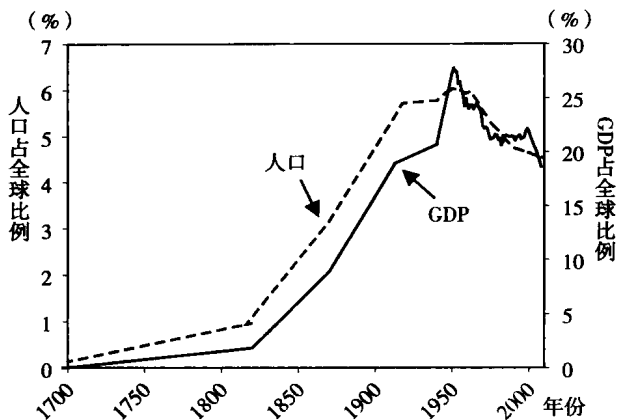


图2.7 美国人口、GDP占全球比例

以现值美元计算，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在1962年达到39.2%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10年的23.1%。美国占全球500强企业的份额从2002年的197家减少到2012年的132家。

可见，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的变化与人口占全球比例是同步的。目前，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仍然高于其人口占全球比例，原因是美国的工业化起步比中国、印度早一百多年，有先发优势。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中、低方案^①，到2050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仍将分别为4.4%、4.3%；到2100年，则将分别为5.0%、4.7%。也就是说，今后上百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美国的先发优势逐渐丧失，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优势而崛起，这个时候决定国家实力的主要就靠人口了，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却将继续下降。

到2050年，美国人口仍将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中国由于老年化，经济总量难以超过美国。印度虽然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毕竟与美国差距太大，在2050年之前难以超过美国。

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强盛，与其生育率的变化密切相关。相对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来说，美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起步晚，生育率下降也晚。美国的生育率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下降，到1900年的时候还在3.9左右（法国只有2.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德国、英国等都出现生育率的跳跃性下降，而美国的生育率的变化却较为平稳，即便最低谷的1936年也还有2.1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等国生育率再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次跳跃性下降，而美国生育率反而在1940年开始回升（提前出现婴儿潮）。1960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3.65的，而欧盟（以2010年的27国为准）只有2.59。

20世纪60年代，美国、欧盟的生育率再次下降，美国下降更快，1975年只有1.77，而欧盟还有2.07。1981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81，欧盟为1.82，基本一致。此后，美国的社会全面趋向保守，生育率止跌回升，1989年达到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加上婴儿潮的出生高峰到了生育年龄，美国在1974年之后出现了又一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由1975年的314万增加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此后美国每年出生人口一直稳定在400万左右^①。

而欧盟却变得更加“自由”，生育率也继续下降到1989年的1.65、1999年的1.44，其后虽有所回升，但2009年仍然不到1.6。由于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婴儿潮的那个出生高峰并没有继发出另一个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在“平稳”地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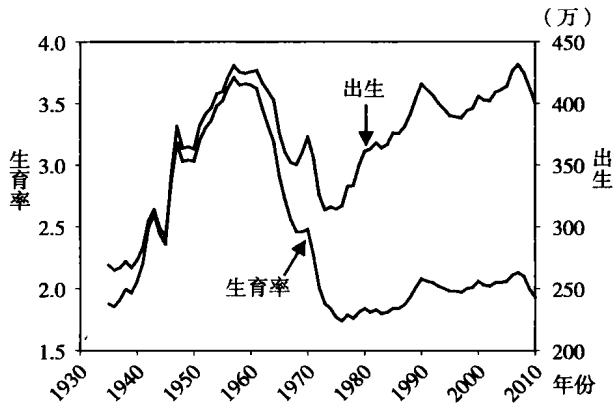


图2.8 美国历年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

1950年，美国人口为1.58亿，欧盟（27国）为3.73亿，是美国的2.4倍。2010年，美国人口为3.1亿，欧盟为5.0亿，是美国的1.6倍；美国中位年龄为37岁，欧盟为41岁。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假如继续保持目前的生育率的话，207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4.38亿，超过欧盟的4.35亿；美国中位年龄只是41岁，欧盟却是50岁。210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4.78亿，是欧盟3.69亿人口的1.3倍。1960年，美国、欧盟老年抚养比均为15.3%；2010年，美国为19.5%，而欧盟却为25.9%；2050年，美国为35%，而欧盟为51%；2100年，美国为46%，而欧盟为65%。

^① “Live birth, deaths, infant deaths, and maternal deaths: 1990 to 2001”,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3, p21-22. <http://www.census.gov/statab/hist/HS-13.pdf>; “Births, deaths, marriages, and divorces”,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2, pp.65.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2012/tables/12s0078.pdf>.

由于移民以及拉美裔和非洲裔的生育率高于白人，美国白人占全国比例从1940年的89.8%下降到1980年的83.1%、2010年的72.4%（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预测该比例在2043年将低于50%）。种族结构的变化也改变了政治版图。2008年、2012年，非洲裔的奥巴马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很大程度得益于少数民族一面倒的支持。2008年，他在白人男性选民中只获得41%的支持（这也反映出美国的进步，因为在40年前是不可能的），而他的对手麦凯恩却获得57%的支持^①。2012年总统选举，白人中39%支持民主党的奥巴马，59%支持共和党的罗姆尼；非洲裔（占选民的13%）中93%支持奥巴马，6%支持罗姆尼；拉美裔（占选民的10%）中71%支持奥巴马，27%支持罗姆尼；亚裔（占选民的3%）中73%支持奥巴马，26%支持罗姆尼^②。随着民族融合，选票的民族特色将不断淡化。美国是移民国家，其民族融合是今后全球化的缩影。美国的一些民族政策值得各国借鉴。

两次出生高峰奠定了美国强国的地位。但是由于经济衰退等原因，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的生育率已经由2007年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1988年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的1.89，2011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1920年有记录以来最低^③。美国很多学者感到很震惊，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2010年可能是美国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从人口结构看，美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可能性很大：①美国的总抚养比在2005年开始上升，从49%上升到2030年64%（是因为老年抚养比从18%上升到34%），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很难完全恢复，老年福利将压制儿童福利。②少数民族人数的增加，使得自由派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拉美裔、黑人的生育率也在下降，下降速度比白人更快，比如2007~2010年美国出生率整体下降8%，而墨西哥移民则下降24%）^④，保守派共和党复兴传统文化的企图将很难实现（2008年、2012年，共和党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往中间路线靠），美国可能将一步步往欧洲的道路上滑。美国需要调整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努力防止生育率下降。

① Gary Langer, "Romney Takes Lead on Economy; White Men are the Movers", ABC news, Oct 24, 2012, <http://abcnews.com/blogs/politics/2012/10/romney-takes-lead-on-economy-white-men-are-the-mover>.

②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it Polls", CNN, Nov 15, 2012, <http://www.cnn.com/election/2012/results/race/president>.

③ Brady E. Hamilton, Joyce A. Martin and Stephanie J. Ventura, "Births: Preliminary Data for 2011",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61, No. 5 (Oct. 3, 2012), http://www.cdc.gov/nchs/data/nvsr/nvsr61/nvsr61_05.pdf.

④ "US birth rate falls to record low", BBC news, 29 November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us-canada-20550661>.



第 3 章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背景

二战前：从种族主义、优生学到人口学

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世纪以来生育率就不断下降，比如美国的生育率从1850年的5.7几乎直线下降到1900年的3.8。而法国生育率在1901年的时候更是只有2.9了。尽管当时美国等国还是禁止避孕和堕胎的，避孕器具也很昂贵（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相继研制成功口服避孕药和高效的宫内避孕环），但中上层私下避孕已经很普遍。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国、挪威、丹麦的生育率只有2.2左右，而英国、德国、瑞典、瑞士等国的生育率更是低于2.0了。当时发达国家由于婴幼儿死亡率仍较高，世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普遍在2.3以上^①。也就是说，当时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并不存在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

但是发达国家的“低素质”的穷人（尤其是黑人等有色人种）由于识字率低，没有避孕知识，也买不起避孕器具，生育率远远比“高素质”的富人要高，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黑人生育率还在3.0左右（说明当时黑人避孕也非常普遍了）^②。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1879~1966年）是计划生育的首倡者。桑格是家中十一个孩子的第六个，她的母亲共怀孕过十八次，去世的时候不到50岁（其实在当时还算正常的）。桑格一直相信她母亲的死和痛苦，与过多怀孕和生育有关。桑格曾在纽约市的移民社区当过护士，看到许多贫穷移民妇女因不断的生育而无法摆脱贫穷，于是她于1912年倡导计划生育，1914年印发杂志宣传避孕，1916年开设计划生育门诊部。桑格的活动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她也几次被捕入狱。几年后，她的境况大为改善（她应该得到了富人的资助，才能周游各国）。1921年，她创立了美国限制生育联盟。1922年，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限制生育大会。

桑格是女权主义者，她提倡节育应该是为了贫穷妇女权益，但她又反对给穷人

^① Jan Van Bavel,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the West before the Baby Boom (1900-1940): Current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terface Demography*, September 1, 2008. <http://iussp2009.princeton.edu/download.aspx?submissionId=90388>.

^② Michele Boldrin, Mariacristina De Nardi, Larry E. Jones,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NBER Working Papers 1114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05, <http://www.nber.org/papers/w11146.pdf>.

提供福利，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其实，她控制人口更主要是出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考虑，她在1919年就提出“节育（birth control）的‘首要目的’就是让社会有更少的‘劣等人’（unfit），有更多的‘优等人’（fit）”。1921年，她提出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纯化种族”。她认为，黑人应该被消除，黑人、穷人、穷移民等“不合格”的人，是“人类的杂草”、“不应该出生的人”^①。1922年，桑格提议强制性地对下层百姓进行智商测试和节育。一方面她认为人类的生育不应由男人（她说“不管男人的态度如何”）和政府、国家决定，而应由女性决定。另一方面，她又建议政府干预生育，实行准生证制度，只有合格的人群才能获得政府颁发的准生证^②。桑格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西方国家很多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支持。

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内部，白人的经济地位也比有色人种要高，白人产生了一种种族优越感。穷人和有色人种以及贫穷国家整体的高生育率引起优生学家和种族主义者的担忧，担心会出现“逆淘汰”。

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他的表弟高尔顿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并倡导了优生学。1912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召开，达尔文的儿子主持了这次会议。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国家开始广泛流行。

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亨利·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 1857~1935年，铁路大亨威廉·奥斯本的儿子）是大会主席。在他和其他人的推动下，美国于1926年成立了美国优生学会。桑格（1922年离婚后，43岁的桑格嫁给了61岁的石油大王詹姆斯·斯利）和美国很多富人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早期成员。该组织在亨利·奥斯本的领导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改良种族，手段之一就是控制人口。

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对优生学的热情非常高涨。1932年，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名誉副主席亨利·奥斯本在会上致辞说：“优生学不是人类的发明，是众所周知的普适价值，即优等人生存下来，劣等人被消灭（elimination）。”他认为，人口过多，超出了土地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大量劣等人永久性失业。光是美国就有数百万劣等人在拖美国的后腿。他认为，节育（birth

^① Angela Franks, *Margaret Sanger's Eugenic Legacy: The Control of Female Fertilit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 2005;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 *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② David Kennedy, *Birth Control in America: the Career of Margaret Sang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16.

control) 运动是双面剑, 虽然初衷是控制劣等人的生育, 但事实上对优等人的影响更大, 比如法国上层人生育率更低。因此, 他提出用生育选择 (birth selection) 取代 birth control, 鼓励优等多生, 抑制劣等人生育。这篇致辞发表在该年8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上^①。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建议, 对有劣等基因的人群进行隔离、结扎、节育、堕胎、杀婴, 以防止他们繁衍下去, 从而稀释美国的基因库^②。1932年, 桑格女士建议对精神和道德有缺陷的人进行隔离和绝育; 也可将第二组人群 (文盲、贫民等) 隔离到农场和开放地带。德国优生组织对美国优生学会推崇有加, 希特勒本人还给美国优生学会主席麦迪逊·格兰特写过感谢信, 认为美国优生学会关于种族的书是他的《圣经》^③。

对美国优生学及其后的人口学支持力度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和奥斯本家族。洛克菲勒一世 (石油大亨老约翰·洛克菲勒, 地球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二世、洛克菲勒三世 (John D. Rockefeller 3rd, 1906 ~ 1978年) 都是美国优生学会的会员。他们认为, 只有他们和与他们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 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④。洛克菲勒一世还给德国的几个优生学组织提供了巨额资助, 而这些组织成为希特勒的纳粹优生项目的重要基地。亨利·奥斯本的儿子亨利·奥斯本二世 (Henry Fairfield Osborn Jr, 1887 ~ 1969年)、侄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 (Frederick Henry Osborn, 1889 ~ 1981年) 也是美国优生学会的创始会员或早期成员。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与洛克菲勒三世一起成为优生学的新旗手和人口学的重要奠基人, 他在1937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秘书的时候, 将纳粹的优生学费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试验”^⑤。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给优生学以巨大的打击。很多中上层人士以前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哪些人是劣等人群, 现在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失业和贫困, 那么是否也被认为是劣等人群^⑥? 洛克菲勒三世和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在帮助优生学渡过财政难关的

① Henry Fairfield Osborn, “Birth selection versus birth control”, *Science* vol. 76 no. 1965 (26 August 1932), pp. 173-179.

② David C Reardon, “Chapter Five: 1932-1982: Eugenics in Transition”, *The Eugenics Connection: Shapers of Humanity*, <http://www.elliottinstitute.org/images/EugenicsInTransition.pdf>.

③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 *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④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 (威廉·恩道尔), 赵刚等译: 《粮食危机》,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⑤ Frederick Osborn, “Summar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Eugenics in Relation to Nursing”, *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 Papers*, BK 6, Feb. 24, 1937.

⑥ Daniel Taylor, “Eugenics 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quality control to quantity control”, *Old-Thinker News*, April 30, 2008, <http://www.oldthinkernews.com/2008/04/eugenics-and-environmentalism-from-quality-control-to-quantity-control>.

同时，也意识到单独设立人口学的必要（用马尔萨斯主义取代优生学，并且控制人口也确实到了需要“科学”量化的阶段）。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和校董，也是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的董事。在他的游说之下，1936年米尔班克纪念基金资助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世界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①。弗雷德里克·奥斯本邀请他的朋友弗兰克·W. 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 1902~1983年）担任所长，成为现代人口学的主要创立者。

诺特斯坦在192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成员。1929年，他加入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研究不同生育率的遗传学影响。他认为，生育率的不同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种群构成。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官方网站仍然不讳言他的这些优生和种族主义的背景^②。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属于国际事务学院，可见其重点是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二战后，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一一曝光，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之后，变成了人口学、环境学。1966年，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对记者说：“以人口理事会的名义开发宫内节育器（IUDs）比以优生学的名义更好。我认为IUDs是迄今最重要的优生手段。”^③1968年，他在书中说：“用其他的名目达到优生的目的。”^④

桑格和洛克菲勒家族、奥斯本家族在穷人、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宣传计划生育，但桑格本人有三个孩子，她最钟爱的小儿子生了6个孩子。洛克菲勒一世有5个孩子（到2006年为止，他有150多个后代了），洛克菲勒二世有6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四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的大弟有7个孩子，二弟有4个孩子，小弟有6个孩子。亨利·奥斯本有5个孩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有6个孩子。老布什（也是优生学的信徒）有5个孩子。可见他们确实是信奉birth selection。而他们培训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学家们却很少有多生孩子的（真将birth control这一泥菩萨当成神来供），便于回国后“言传身教”。

^① The 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office_population_research.html.

^② “Frank W. Notestein Papers, 1930-1977: Finding Aid”,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ublished in Published on November 28, 2005. <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getEad?id=ark:/88435/m326m1736>.

^③ Frederick Osborn to P. R. U. Stratton, 12 Jan. 1966, AES Archives, folder on “Osborn, Frederick, Letters on Eugenics”.

^④ Frederick Osborn, *The Future of Human Heredity*,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1968, p.104.

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的兴起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着手设计战后的世界格局了。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美国外交委员会完成了“美国战时与和平时利益研究”的系列秘密报告。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在秘密报告中指出，贫穷国家人口增长很快，将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不利于美国拓展市场。诺特斯坦提出应该帮助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降低其生育率^①。诺特斯坦的报告对决策者和其他人口学家影响非常大。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也在秘密报告中指出，降低穷国的生育率符合美国利益^②。这些建议很符合参与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那些商人们的口味。他们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国控制人口的计划必须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比如减少贫困、饥荒，提高妇女地位），以掩盖其真实目的：优生（降低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生育率），获取穷国的自然资源。“少生快富”可以避免穷国倒向苏共阵营^③。

“在冷战环境中的敌对状况下，经济动荡和落后国家的贫困都被视为潜在威胁。此外，国家之间的收入高度不平等也被视作国际动荡的根源。再者，从长远角度看，低生育率区和高生育率区之间人口规模失衡不断加剧将有让人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④

可见，发达国家要控制穷国人口，既有长期考虑，又有短期打算。从短期看，为了防止穷国因为贫困和动荡而倒向苏联，就必须帮助其发展经济，比如美国在降低其盟友日本、巴西、中国台湾、韩国等生育率的同时，也让其经济快速发展；从长远看，又可以防止这些穷国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出现“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在策略上与满清控制蒙古的人口差不多：既提高了喇嘛的地位，又控制了人口。

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1980年获得美国田纳西大学博士学位）告诉笔者，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雅尔塔会议还有一个绝密协议，就是减少中国的人

^① Frank W. Notestein, "Problems of Policy Toward Areas of Heavy Population Pressure", No. T - B 72, 21 April 1944, 6 & 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4).

^② Jacob Vin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nial Problem'", No. E - B 71, 24 June 1944, 10-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4).

^③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 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④ Graziella Caselli, Jacques Vallin, Guillaume Wunsch, Demograph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Four Volume Set: A Treatise in Population 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5, p34.

口，避免“黄祸”。涂肇庆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老教授私下里告诉过他。这种说法可信度较高，因为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西德总理阿登纳秘密会谈中也说，对欧洲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中国人口太多，发展起来不得了，那样就会发生“黄祸”。他要阿登纳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付中国^①。

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和《我们被掠夺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推动了战后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也鼓舞了保罗·埃利希（1968年出版《人口爆炸》）等人。前者的作者是威廉·福格特，后者的作者是亨利·奥斯本二世。环境、资源（奥斯本二世重点强调了石油）成为控制人口的重要借口。奥斯本二世在该书以及其后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在194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认为人口过多比原子弹的危害还要大，呼吁制定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政策以限制全球人口增长。1953年，他出版了《地球的极限》，书中的观点成为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的中心思想。奥斯本二世其实认识到“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他的这一观点被其后的环境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②。

1952年优生学家们成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人口控制，一个是由桑格女士和卡洛斯·布莱克（英国优生学会会长）等人在印度成立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一个是由洛克菲勒三世与弗雷德里克·奥斯本（1946~1952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会长）创立的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人口理事会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是各国人口学的摇篮。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被洛克菲勒三世任命为人口理事会的会长。他有超强的鼓动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他1941年担任美国陆军部土气署的主席，战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副代表，后在联合国常规军备委员会任职一年。在奥斯本的领导下，人口理事会重点是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控制人口。为了避免指责美国为帝国主义，奥斯本要求人口理事会保持非常低调。比如在1952年创建人口理事会的会议上，奥斯本曾经问道：“假如开发一种完美的避孕措施，那么应该由芝加哥大学或者Bellevue医院等（学术机构）来宣布，并且在日本或印度（发展中国家）开发完成，这样不是效果更好吗？”人口理事会资金雄厚，通过提供巨额研究基金和丰厚的奖学金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人口专家网络。奥斯本说通过这种静悄悄的

^① 官力、周敬青、张曙：《中苏论战毛泽东赞邓小平：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人民网读书频道（来源：《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2012年4月27日，<http://book.people.com.cn/GB/108221/17766945.html>。

^② Donald Gibson, *Environmentalism: Ideology and Power*,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 Inc, 2003, pp.48-49.

“学术”方式，可以避免穷国的公众意识到是美国在控制其人口^①。人口理事会的人口专家遍布亚（包括中国）、非、拉^②。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Paul Demeny）公开承认：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其管理人员（如计划生育官员）和专业人员（比如人口学家）会自发地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会一直主动地继续控制人口计划。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生育的所谓“持续发展”的理由会渐趋式微。这部分是源于大众对计划生育的内在科学性的批判，更主要的是人们对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的自然反应^③。

可见，保罗·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计划生育官僚机构一旦设立，将会自我巩固和强化，不断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为了自己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不择手段（比如数据篡改）。保罗·德曼也知道所谓的“计划生育有利于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幌子，迟早会被揭穿。

1959年，诺特斯坦接替奥斯本成为人口理事会的主席（1968年卸任）。人口理事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岛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根据这个岛国的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这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们做绝育手术，结扎输卵管。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④。

人口理事会也将芝加哥的穷人贫民区作为他们的控制人口的“实验室”，然后将所积累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1961年，一个实验主管向诺特斯坦汇报说：“所有的黑人、低收入群体都在服用我们的口服避孕药，现在都快疯了。”通过舆论灌输让民众“自愿”控制人口也是其重要手段。他们也实验如何在实行控制人口的计划时，

① Beryl Suitters, "Be Brave and Angry: Chronic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London: IPPF, 197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cript of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Problems", Williamsburg, Va., 21 June 1952, afternoon session, 16, RAC; and Frederick Osborn, Voyage to a New World, 1889-1979 (Garrison, N.Y.: privately printed, 1979), 133.

② Population Council, <http://www.popcouncil.org>.

③ Paul George Demeny, "Population Policy: A Concise Summary", Population Council, Volume 173 of Working papers, 2003, www.popcouncil.org/pdfs/wp/173.pdf.

④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 (威廉·恩道尔)，赵刚等译：《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避免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①。

1968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匹兹堡分部曾指供：为低收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避孕药及其他避孕方法的计划生育诊所一直在尽量降低美国黑人的出生率，避孕药被当成灭绝种族的凶器。“黑人种族灭绝”一词流行起来^②。

在穷国推行计划生育的路线图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先由学术界进行研究，然后形成大众舆论，最后通过国际和国家层面研究经济发展的机构形成控制人口的官方政策。”^③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他在书中认为：人口爆炸导致环境污染，死亡率将增高，寿命将大幅缩短。预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④。埃利希呼吁道，人口增长必须停止，“如果靠自觉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就采取强迫手段”^⑤。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成立了罗马俱乐部。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无限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各卖出了数百万本，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出控制人口的政策。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角色

1945年，洛克菲勒家族拿出巨资在纽约买下了一块土地，捐给了新成立的联合

① Edmund Ramsden, "Between Quality and Quantity: Eugen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Demograph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1927-1972", PhD dis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2. <http://www.rockarch.org/publications/resrep/ramsdn.pdf>; Jurriaan Maessen, "Rockefeller Council Demographers Subjected American Slums To Eugenic Mind-Control Ops," Infowars.com, July 2, 2012, <http://www.infowars.com/rockefeller-council-demographers-subjected-american-slums-to-eugenic-mind-control-ops>.

② Simone M Caron, "Birth Control and the Black Community in the 1960s: Genocide or Power Politic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1, No. 3 (Spring, 1998), pp. 545-569.

③ Graziella Caselli, Jacques Vallin, Guillaume Wunsch, *Demograph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Four Volume Set: A Treatise in Population 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5, p34.

④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2.

⑤ Leo Hickman,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The Guardian*, 13 January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an/14/population-explosion-seven-billion>.

国。联合国从此在洛克菲勒家族控制全球人口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46年10月，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设立了人口委员会。同年，诺特斯坦在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了一个职能部门——联合国人口处，并成为首任处长（1946~1948年）。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洛克菲勒说：“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①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同年，联合国人口处也升级为人口司。

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荐下，菲律宾人拉斐尔·萨拉斯（Rafael Salas，哈佛大学毕业）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首任执行主任，并一直干到他1987年去世。萨拉斯被洛克菲勒三世选中下面几个重要原因^②：

① 萨拉斯与洛克菲勒三世有极深的渊源，曾被洛克菲勒三世推荐担任负责菲律宾人口控制计划的联合国人口项目高级官员。

② 1968年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权会议上，萨拉斯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有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的基本人权。”由萨拉斯出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主任，既可以在人权方面掩人耳目（萨拉斯被选为人权会议的副主席本身就是预埋伏笔），还可以“人权”为名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比如“提高”妇女地位）。根据人权宣言，父母可以决定是否要生下孩子或堕胎，等于是将胎儿的生命权从属于母亲或父母的自由选择权。依照这种定义，中国老百姓“自主地”通过B超选择性堕胎女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实上，萨拉斯根本就无视人权问题，比如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的时候，萨拉斯对记者说“人权问题应由各国自行决定”^③。

③ 萨拉斯的肤色（亚洲人）和信仰（天主教）。因为当时亚洲人口增长很快，而洛克菲勒三世控制全球人口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天主教。

④ look at us and learn（言传身教）和conviction（信念）。因为萨拉斯曾在菲律宾政府担任负责粮食的官员，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信念，符合洛克菲勒用“粮食危机”控制人口的理念。

①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赵刚等译：《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引自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② Jean Guilfoyle, “NSSM 2000: blueprint for de-population”, The Interim, July 1998, <http://www.theinterim.com/july98/20nssm.html>; “Former UNFPA Executive Director, UN Under-Secretary General Rafael Montinola Salas”, UNFPA, <http://www.unfpa.org/public/site/global/lang/en/pid/4755>.

③ Fred Pearce, 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 and our Planet's Surprising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2010, P81.

后面三任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也都符合“言传身教”和“信念”的原则。第二任（1987~2000年）执行主任是巴基斯坦的纳菲丝·萨迪克（Nafis Sadik）女士（是桑格奖的获得者，1971年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之前曾是巴基斯坦负责人口控制的官员）。萨迪克在印度出生、读大学，在巴基斯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对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妇女（劳动参与率很低、识字率很低、人口增长很快）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她又是名门之后（她父亲是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世界银行副总裁），有号召能力。萨迪克也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旗下的穆斯林妇女基金的顾问^①。洛克菲勒家族公开承认是想通过支持女权主义“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动摇家庭结构，进而减少生育，控制人口，以实现“全球精英”化^②。

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三任（2000~2010年）执行主任苏拉亚·欧拜德（Thoraya Ahmed Obaid）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联合国部门高官的沙特女性，只有2个女儿。通过她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将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降下来。欧拜德女士也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纽约大学研究西方与穆斯林关系的中心的顾问委员^③。

联合国人口基金现任（2010~ ）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欣（Babatunde Osotimehin）曾是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人口学。根据他的简历，1981年以来他因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资助^④。现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其中尼日利亚为世界第七人口大国（2012年人口有1.6亿），生育率仍较高，经济发展也较快（2003~2011年，GDP年均增长7.4%；以2005年可比购买力平价为标准，2011年的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预计到2035年将成为仅次于印度、中国、美国的第四人口大国，成为非洲强国；今后人口还将超过美国。由奥索蒂梅欣出任UNFPA执行主任将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以“可持续发展”为由，敦促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比如2012年8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警告称，如果菲律宾不能通过控制生育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向国民提供免费避孕工具），它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可能倒退^⑤。联合国还特意

① Muslim Women's Fund. <http://www.rockpa.org/page.aspx?pid=309>.

② Paul Joseph Watson, "Rockefeller Admitted Elite Goal Of Microchipped Population", Prison Planet, January 29, 2007, <http://www.prisonplanet.com/articles/january2007/290107rockefellergoal.htm>.

③ Center for Dialogues: Islamic World - U.S. - The West. http://www.centerfordialogues.org/about_Dialogues_Islam_US_West.

④ Babatunde Osotimehin CURRICULUM VITAE, http://www.africalsexuality.org/abuja2008/download/bio_osotimehin.pdf.

⑤ "UN warns on Philippines birth law", Radio Australia, Updated 5 August 2012, <http://www.radioaustralia.net.au/international/2012-08-05/un-warns-on-philippines-birth-law/993334>.

将全球第70亿人“诞生”在菲律宾。

但是经济学家的结论却截然相反，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诺伊曼（Frederic Neumann）表示，未来几年，亚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菲律宾则将会因为拥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而保持竞争优势。汇丰银行预测，菲律宾的经济在世界排名将从2012年的第44位跃升到2050年的第16位^①。

联合国的那些堂皇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人均资源丰富的津巴布韦在人口政策上是“听话”的国家，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资助其普及避孕和提高妇女教育水平；而尼日利亚是“不听话”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0》，津巴布韦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从1979年的6.8%快速攀升到1987年的40%；而尼日利亚却从1979年的7.3%只缓慢地上升到1987年的23%、2005年的31%。1990~2008年津巴布韦的育龄妇女避孕率高达60.2%，而尼日利亚只有14.7%。津巴布韦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3.3，而同期尼日利亚的生育率只从6.8下降到5.5。但津巴布韦并没有“少生快富”，人均GDP从1980年的916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594美元；而尼日利亚反而是“越生越富”，人均GDP从850美元增加到1222美元。

津巴布韦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尼日利亚的42%，但今后人口将不到尼日利亚的1/20，无法像尼日利亚那样形成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经济前景将远不如尼日利亚。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坚决支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育儿，都对妇女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再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避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自发地提高教育水平和避孕率（就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可能比拔苗助长地（甚至通过诱骗、强迫手段推行节育）提高更符合经济规律。

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廉价的资源进口。欧盟对进口石油依赖度超过90%，美国的石油消费也很大程度依赖进口，但当时预测世界石油储

^① Floyd Whaley, "A Youthful Populace Helps Make the Philippines an Economic Bright Spot in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8/28/business/global/philippine-economy-set-to-become-asias-newest-bright-spot.html?pagewanted=all>.

量很快就要枯竭。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一方面是认为全球资源即将耗尽。人口悲观论甚嚣尘上。

1969年7月，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1972年，约翰三世把他的减少人口的实验和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低调处理这份报告。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由1973年的每桶3.29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1.6美元，最终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失业率剧增，经济负增长。美国GDP增长率由1973年的4.9%下降到1974年的-1.4%、1975年的-1.2%，欧盟的GDP增长率也从1973年的5.6%下降到1975年的-1.1%^①。石油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对全球资源和人口的担忧。

1974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上，美国提出了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的建议。这一计划受到了天主教教会、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坚决抵制。它们的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②。

在这个背景下，亨利·基辛格（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简称《NSSM-200》）。1974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SM-200》^③。基辛格认为：“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应该成为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

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杰拉德·福特接替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为副总统。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仍担任国务卿。至此，美国进入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④。

《NSSM-200》的中心思想是：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应确保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地获取自然资源。

为了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NSSM-200》中列举了多种可能阻碍美国从发展中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赵刚等译：《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NSSM 200) - April 1974. <http://www.population-security.org/28-APP2.html>.

^④ Brian Clowes, Kissinger Report 2004: A Retrospective on NSSM-200,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2004, <http://www.hli.org/files/Kissinger%20Report%202004.pdf>.

国家通畅地获取资源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①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加，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②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将难以购买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这样会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③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会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从而有数量众多的反帝国主义的年轻人口。

因此，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地缘政治也是美国政要们的重要考虑。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出现了婴儿潮，1956~1961年美国生育率更是维持在3.7的高水平。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生育率开始再次下降，美国在1974年只有1.84（其中白人为1.75，黑人为2.34），英国也只有1.92。而当时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仍然在5.0以上，死亡率却开始快速下降。世界人口由1913年的17.9亿增加到1950年的25亿、1974年40亿。但西方国家（西欧30国以及美国、加拿大、大洋洲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13年就开始减少，从20.8%下降到1950年的19.1%、1974年的15.4%。1960~1974年，全球增加人口中西方国家只占7.9%^①。

美国的一些政要担心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为强国，从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基辛格在《NSSM-200》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的特殊地位：“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预测其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NSSM-200》警告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比如：

① 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② 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③ 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不惜用强制手段。

④ 降低生育意愿。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

⑤ 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

^① Angus Maddison's website: [http://www.gdgc.net/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horizontal-file 03-2009.xls](http://www.gdgc.net/maddison/Historical%20Statistics/horizontal-file%2003-2009.xls).

位（“关爱女孩”）；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

按照1948年联合国宪章的严格定义，这种政策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基辛格自然明白，如果这一计划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就会被扣上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甚至更难听的帽子。他要了一系列宣传花招以掩盖真实意图，在《NSSM-200》里说：

“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① 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② 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进一步，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美国的计划被包装成“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与1968年《德黑兰人权宣言》非常吻合了，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现在成了“自由选择”、“可持续发展”、“保护妇女权益”了。

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NSSM-200》还特别指出，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也应该包括红十字会，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曾在红十字会工作，熟悉其运作模式；中国计生委主任、副主任退休后也到红十字会任职）来实施这项计划，并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福特基金会等很多美国基金会和个人都热衷于资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现在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了。2009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有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在纽约的绝密聚会，其中包括大卫·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个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延缓全球人口增长^①。

据估算，1965~2004年，美国共投入了173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主要投入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其次是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②。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了15年，直到与天主教教会有关联的一些组织采取私人法律行动，最终才迫使这份文件在1989年解密。20世纪90年代，才供一些学者进行研究。

^① Robert Frank: 《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华尔街日报》，2009年5月28日，<http://chinese.wsj.com/gb/20090528/wrt101244.asp>。

^② Brian Clowes, Kissinger Report 2004: A Retrospective on NSSM-200,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2004, <http://www.hli.org/files/Kissinger%20Report%202004.pdf>。

1964~1985年统治巴西20年之久的军事独裁政权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这段时间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生育率急剧下降。1991年，《巴西杂志》等媒体披露了《NSSM-200》后，巴西卫生部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是由来自巴西立法机构各个政党的165位议员发起。巴西政府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计划刚启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巴西政府发现绝育手术由形形色色的机构实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巴西政府提出了抗议^①。

秘鲁面积128万平方公里，人口才2000多万，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藤森于1990年当选秘鲁总统后，也实行控制人口计划，25万妇女被“自愿”绝育。一些贫穷妇女为了获得免费粮食而被绝育，一些享受政府救济的妇女被威胁将取消救济而去接受绝育手术，一些妇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绝育。2002年，秘鲁国会调查发现，藤森总统的计划生育是受美国国际发展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的，尤其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导^②。

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也参与了泰国和伊朗的控制人口计划。2008年，伊朗《德黑兰时报》披露了美国《NSSM-200》^③。

印度作为人口大国，自然受到格外的“礼遇”。桑格女士多次访问印度，1952年选择在印度成立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比在发达国家成立象征意义更大）。1955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向印度卫生部提出人口政策的建议，印度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人口研究中心，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成为培养发展中国家人口学家的基地（蒋正华、李建民等人就是在那里学习的）^④。联合国人口基金给印度提供了巨额援助，光是1974~1979年的第一周期的项目就高达4000万美元^⑤。1976年，英迪

①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赵刚等译：《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② Brian Clowes, Kissinger Report 2004: A Retrospective on NSSM-200,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2004, http://www.hli.org/files/Kissinger%20Report%202004.pdf.

③ 古力：《美曾制定秘密计划欲通过粮食控制欠发达国家人口》，中国新闻网，2008年3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j/gjzj/news/2008/03-22/1199451.shtml。

④ “Frank W. Notestein Papers, 1930-1977: Finding Aid”,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ublished in Published on November 28, 2005. 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getEad?id=ark:/88435/m326m1736.

⑤ “Assistan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DP/FPA/PROJECTS/REC/24, 10 April 1985. http://web.undp.org/execbrd/archives/sessions/gc/32nd-1985/DP-FPA-PROJECTS-REC-24.pdf.

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一些员工如果不接受结扎将失去工作，印度绝育人数从1974~1975年的135万升至1976~1977年的820万。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绝育人数也下降到1977~1978年的90万^①。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②。虽然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在设法控制印度的人口，迄今在印度共进行了七个周期的援助项目，但由于没有获得印度中央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印度生育率只是缓慢下降，目前仍稍高于更替水平。由于有年轻的人口结构，印度经济充满活力。换句话说，印度被灌了一口毒药，但吐了出来。

美国现在仍然在致力于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比如，2010年1月8日，国务卿希拉里在联大纪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15周年会议上发言，宣布美国2010年再次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基金，国会批准了6.48亿美元的对外援助，用于计划生育方案。希拉里还表示，美国启动了一个为期6年的新的项目，花费630亿美元巨资（相当于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年的预算）用来改善全球健康（包括普及避孕），预计可以防止数百万的意外怀孕^③。当然，普及避孕后，必将减少更多（数量级的差别）的原本是“非意外”的怀孕。

计划生育思潮西风东渐

从战国的韩非子到清朝的汪士铎，中国本土支持控制人口者不乏其人。但第一个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的应该算是严复，而率先引入现代“计划生育”理念并引起知识界广泛讨论的人应该是胡适和张竞生。

1877~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他曾提出“奢民说”和“教育妨生说”，也就是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平越高，人口增长越慢。他主张用“奢民”和提高教育来减缓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④。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胡适受桑格夫人思想的影响，自称“无后主

① “The fate of Rukmini Prasad,” *New Internationalist*, 1980 Jun; 88:20-1. <http://www.ncwint.org/features/1980/06/01/sterilisation>.

② 江亚平：《印度控制人口任重道远》，新华网，2004年5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5/02/content_1451130.htm。

③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8,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01.htm>.

④ 陈文联：《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历史考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3卷第2期。

义”，疑问“为什么要孩子”？反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论”。1916年11月，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的：“生育当裁制，家庭要自由。”^①1920年，他的好朋友任叔永与陈衡哲结婚时，胡适送去了一副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2年，桑格夫人因出席伦敦“国际限制生育大会”，途经日本和中国。桑格夫人在日本并不受欢迎，讲演了15次，其中14次是在私人集会上讲的，唯一一次在公众集会上讲演，还受到了官方的阻挠。桑格4月中旬抵达北京。她持有当时正在美国考察的蒋梦麟（北大总务长、后任北大校长）写的介绍信，找到了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4月15日，胡适到北京饭店拜会了她，安排桑格夫人于4月19日在北大大礼堂演讲，由蔡元培校长亲自主持，张竞生作陪。全场“听者约二千人”，胡适亲自担任翻译。桑格夫人除了宣传节育外，还介绍了她的优生学观点，“自然界中本来生存竞争的一种现象，则强者侵者自能生存，而弱者劣者便应淘汰。现在养成了一种假仁假义的慈悲心理，便不配生存也生存，不当繁殖者也居然繁殖”，她认为应该“使配生育的人才能生育，而且应有一种严格的裁制”。她在总结发言时对北大学子说：“我希望诸君坦白地老实地研究这个问题，帮助人类造成国际间永久可靠的和平。”她的宣传册第二天就被译成中文，并且印刷了5000份公开发行。在胡适的倡议下，“中华生育制裁协会”在北京成立，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计划生育组织^②。

其实，在桑格夫人来华之前，中国已经有人开始提倡生育节制了。比如1921年，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又在《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然而，他们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1922年12月，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演时无伤感地指出：“我于三年前看见我国人猪狗似的繁育”，因此，大力“提倡生育限制法，大受社会的咒骂”，没想到桑格夫人来华宣传，“前时骂我的报纸竟一变而为欢迎桑格夫人的主张了”。为此，张竞生不禁感叹：“实则我的学理比桑格夫人的高深得多。但我被侮辱，伊享盛名，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③

^① 张家俊：《胡适首倡“计划生育”》，光明网（来源：《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第200期），2005年4月3日，http://www.gmw.cn/01wzb/2005-04/03/content_208837.htm。

^② 乔晓轩：《节制生育西风东渐》，文新传媒网（来源：《新民晚报》），2008年6月8日，http://www.news365.com.cn/wxpdbhygb/shzd/200806/t20080610_1904623.htm。丁莉芳、杨东铭：《试述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主义及对中国的影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③ 侯杰、王正：《计划生育要从他们说起》，人民网（来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7月2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0/12234690.html>。

张竞生其实并非自夸。他1912年至1915年就读巴黎大学，1916年至1919年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留法的期间，法国生育率从1912年的2.49跳跃性下降到1916年的1.23；而当时美国的生育率还在3.0左右。法国节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比美国要先进。张竞生在法国猎艳甚多，亲身体会了法国各种性生活方式和节育方法。

张竞生1919年博士毕业，1920年初回国，没来得及体验法国的新人口政策：给生育8个或以上孩子的女性颁发“法国家庭荣誉勋章”；立法规定，不仅堕胎是非法的，而且传播避孕方法也是非法的。法国生育率从1919年的1.59上升到1920年的2.69^①。

张竞生回国后就不遗余力地宣传节育，呼吁少生优生。他认为，中国人4亿是极限，最好减少到3亿。他提议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否则罚款。

其实，1820年以来，中国人口几乎停滞增长，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6.6%下降到1913年的24.4%，而同期西方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从13.8%上升到20.8%^②。192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是54岁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30岁左右，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即便如“猪狗似的繁育”，也只勉强维持人口不减少。如果中国人也节育，那么人口必将锐减。孙中山就认识到中国新青年中马尔萨斯主义的盛行有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在《三民主义》中说道：

“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孙中山认为：人口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列强人口的日增，中国人口不增甚至减少，有亡国灭种的危害；中国只有增加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解决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才能避免这一危险^③。

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也非常反感张竞生的观点，斥其为“神经病”。

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孙中山等人那样的战略眼光，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口过剩，所以只要有方法让人

①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ACCORDING TO THE MARITAL STAT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 France, http://www.insee.fr/en/ppp/bases-de-donnees/irweb/sd2005/dd/excel/sd2005_t5_11.xls, 2011/9/10.

② Angus Maddison's website: [http://www.gdpc.net/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horizontal-file 03-2009.xls](http://www.gdpc.net/maddison/Historical%20Statistics/horizontal-file%2003-2009.xls).

③ 王永恒：《论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人民网（来源：《人民论坛》），2009年8月2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9921520.html>。

口数量减少，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桑格夫人的观点让大家发现了一种“得救”的方法，叫做“节育”。大家对于桑格夫人，也像招待活人济世的名医一般，非常恳切^①。

离开北京后，桑格夫人又到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桑格夫人的推动下，节制生育思潮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一时间，相关论文和著作呈井喷式涌现。许多人士如胡适、梁启超、马寅初等都写文章介绍了她的生育观。此后三四年中，桑格夫人的书以《生育节制法》、《节育主义》、《女子应有的知识》等书名被译成中文出版^②。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思想的交锋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针对艾奇逊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49年8月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反驳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③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年）的观点类似。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吃鸡越少，人多吃则鸡越多。”因为人不但能吃鸡，也能养鸡。

解放初，中国是限制堕胎的。1950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④。

但当时城市婴幼儿死亡率已经下降，部分干部和城市居民由于工作和住房等现实

^① 侯杰、王正：《计划生育要从他们说起》，人民网（来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7月2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0/12234690.html>。

^② 乔晓轩：《节制生育西风东渐》，文新传媒网（来源：《新民晚报》），2008年6月8日，http://www.news365.com.cn/wxpd/bhygb/shzd/200806/t20080610_1904623.htm。

^③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④ 汤兆云：《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来源：《百年潮》），2009年4月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074176.html>。

压力，有强烈的避孕要求。而1952年在印度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已经开始掀起。当时，节育不但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而且在政治领袖中有相当大的共识。

1953年春，张竞生写下1.3万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中央机关收到后批示“退回、酌办”，把信退回广东省委，省委又把它退回张竞生所在单位^①。

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曾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但邓小平副总理于1953年8月要求卫生部改正，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②。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说：“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大负担。”

1954年11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③。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委员长在一次关于节制生育的会议上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④

中央领导的表态给了邵力子（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知识分子勇气。邵力子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以及1954年9月17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两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⑤。1954年12月19日，邵力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邵力子再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建议，得到了马寅初、竺可桢等人的支持。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两处讲到节制生育。

① 陈冰：《张竞生：现代中国学术疆域的拓荒者》，《晶报》，2008年9月25日第A16版，http://jb.sznews.com/html/2008-09/25/content_350412.htm。

②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1955年3月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9/content_2391355.htm。

③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54]卫药字第579号（1954年11月10日）。

④ 刘少奇：《提倡节育》（1954年12月27日），新华网（来源：《刘少奇选集》下卷），200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4/content_2376954.htm。

⑤ 吴跃农：《邵力子：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中国政协新闻网（来源：《文汇报》），2005年6月9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46624/46626/3456140.html>。

按照毛泽东时代党内关系的准则，梁中堂推测，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有了转变，然后才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表现^①。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②梁中堂考证认为这是现在看到的毛泽东讲计划生育的最早资料。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顺便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并表扬了邵力子。马寅初按照大会安排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马寅初当时也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也对马寅初的观点非常认同和重视。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倒是谈不上“新”，并未达到严复的高度，而与张竞生1920年的观点非常类似，比如避孕、晚育，“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心中还是很犹豫的，反复修改自己2月27日的讲话，最后将计划生育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是强调：“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然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③。

毛泽东心中一直认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他并不反对节育。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认为“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但他仍然强调，“我是赞成节育

^① 梁中堂：《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12月30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12/30/content_1030085.htm。

^②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236641/16619082.html>。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189967/11568204.html>。

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①

应该说，马寅初是响应毛泽东而提出“新人口论”的，但马寅初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②

1959~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而马寅初的前任蒋梦麟（代理及在任北大校长长达17年）可没有马寅初那么好的运气。他因为在台湾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1959年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③。

1959年海峡两岸对人口问题的争论与1932年美国的一场争论非常相似：统计学家路易斯·都柏林（Louis I. Dublin，美国大都会生命保险公司第三任总裁）说：“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将人口成比例地减少一半，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会改善”，他以此来反对亨利·奥斯本的控制人口的理论^④。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

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停止增长。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⑤

① 李琦：《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人口控制思想探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http://www.wxyjs.org.cn/GB/186517/11365019.html>。

②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128.htm。

③ 游宇明：《蒋梦麟的“硬”与“软”》，《文史春秋》2010年第3期。

④ Henry Fairfield Osborn, "Birth selection versus birth control," *Science* vol. 76 no. 1965 (26 august 1932), pp173-179.

⑤ 《历史的记录：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60年回望（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来源：《中国人口报》），2009年8月29日，http://www.chinapop.gov.cn/ztgh/zgrklsl/rkdsj/200908/t20090829_177315.html。

但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1960年9月公开出版。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①。

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比例小，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策缺乏刚性，1962年到1970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仍高达6.1，1970年也还有5.81。

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快速增加到1960年的6.7亿、1970年的8.2亿，而人均GDP却增长非常缓慢。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基准，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1936年为596美元）仅仅增加到1970年的778美元；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超过1万美元，台湾地区为2537美元，非洲平均为1335美元。要知道，公元元年中国人均GDP也有450美元^②。也就是说，1970年中国大陆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水平与两千年前的先祖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多是贫穷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各地在计划生育上做了很多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避孕措施也进一步改善和普及；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中学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导致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晚婚晚育）、稀（两胎间需要有间隔）、少（少生）”的生育政策，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③。

当时的计划生育还基本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反对强制（“软制”成分是有的）。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发[62]698号（1962年12月18日）。

② Angus Maddison, 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3-2009.xls.

③ 刘长发：《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是毛泽东的错误吗？》，人民网（来源：《真理的追求》，2000年10月11日），2002年6月13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434/8437/20020613/751973.html>。曹前发：《建国后毛泽东人口思想述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网（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http://www.wxyjs.org.cn/GB/186517/11365038.html>。

因为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提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认识到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①

1973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代表时就明确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1974年9月19日，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代表及女用长效口服避孕药科研总结会部分代表时，华国锋说：“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要有正确方针、政策，不能强迫命令。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1975年5月22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领导小组时谈话说：“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口。……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②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也说明1975年虽然中央反对强制，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使用强制手段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生育率也下降到3.2。

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1978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中国大陆1978年农业大丰收，但人均GDP仍然只有979美元，与台湾（4717美元）等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随着全社会对文革指导思想和理论开始进行反思，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很自然地将“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列为中国贫穷的主因之一，归罪于毛泽东不控制人口。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9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各

^① 曹前发：《建国后毛泽东人口思想述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网（出处：《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版），<http://www.wxjys.org.cn/GB/186517/11365038.html>。

^② 梁中堂：《华国锋曾反对制定法规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梁中堂网易博客，2011年3月16日，<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121610036655>。

种会议上不遗余力地鼓动。一些地方纷纷制定了“一胎制”的地方政策^①。

陈云很早就提出了通过计划生育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节制生育，现在粮食、布匹、学校都很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这些主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原因，没有被采纳。文革结束以后，又一次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重提这个问题。在1979年6月给老部下陈慕华副总理的信中，他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建议采取五条计划生育的措施：大造舆论；制定法令，只准生一个；加强避孕药物工作；优待独生子女；实行社会保险^②。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新华社紧急调研后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报告。6月21日，陈云副总理将该报告批转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③。胡耀邦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商量解决。1979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领导到马家宣布为马老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选举马寅初先生为名誉会长^④。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毛泽东效仿苏联“英雄母亲”的政策鼓励生育。

其实，所有国家在战后都出现人口增长（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但这只是一过性增长。中国人口并不会真的会如马寅初所预测那样50年后会超过26亿，并且当时根本谈不上鼓励生育。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在革命胜利后，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很苦，无产阶级生活更苦，小孩生多了没有办法。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才搞‘母亲英雄’，

① 梁中堂：《“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112期，第64～73页。

② 王建：《陈云经济发展观探析》，人民网（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5期），2005年5月3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8339/48342/3427930.html>。

③ 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人民网（来源：《中国档案报》1998.10.15），2002年6月13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434/8437/20020613/751972.html>。

④ 穆光宗：《马寅初的人口论：毛泽东为什么会先赞同后反对？》，凤凰网（来源：文汇报书周报），2010年12月29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ishi/detail_2010_12/29/3754232_0.shtml。

提倡生育；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口减少，又有大量荒地可以利用，增加人口有利，就提倡生育了。为什么苏联先节制生育后提倡生育，因为情况变了。我们中国要不要搞‘母亲英雄’和提倡生育呢？我们不要搞，我看将来也不搞，可能永远不搞。我们在陕北时提过‘人畜两旺’的口号。据我所知，当时陕北婴儿死亡率很高，生下来的小孩有百分之五十都死了。人民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才提出‘人畜两旺’。我们并未提倡多生，主要是设法降低婴儿死亡率。又因为有人不赞成新法接生，所以要宣传。但就在那时，‘人畜两旺’在干部中也没有提倡。”^①

可见，所谓效仿苏联搞“英雄母亲”政策，其实是指共产党在陕北的时期（死亡率极高）。将1950年后的人口增加归罪于毛泽东的“英雄母亲”政策，是张冠李戴。在1950年到1953年这4年时间，即便不赞成堕胎和节育，四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6.0，与其前几年一致，也与其后的几年（允许节育）一致；台湾地区在1951年到1960年平均生育率为6.3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中国、印度、泰国、巴西、越南、伊朗无不例外。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也仍然在6.0。6.0左右的生育率接近现实生育极限（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即便鼓励生育也没有用，1950~1953年限制节育也只影响少数城市居民。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②，1950~1980年中国人口基本与世界同步增长，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1亿（是1950年的1.47倍）、1980年的9.8亿（是1950年的1.78倍），但占全球比例一直稳定在22%。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由1950年的11.6亿增加到1970年的18.56亿（是1950年的1.6倍）、1980年的23.7亿（是1950年的2.04倍），人口增长比中国还要快。台湾地区人口由1950年的756万增加到1970年的1475万（是1950年的1.95倍）、1980年的1787万（是1950年的2.36倍）^③，人口增速也比中国大陆快。

中国人口增长主要是预期寿命的延长。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50~1955年中国男、女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9.3岁、42.3岁，印度分别为39.4岁、38.0岁，世界

^① 刘少奇：《提倡节育》（1954年12月27日），新华网（来源：《刘少奇选集》下卷），200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4/content_2376954.htm。

^②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③ 姜道章：《人口成长与国土资源》，《台北市教育周报》第十卷第二期。http://www2.pccu.edu.tw/CRUCTE/Hs-geography/html/humangeog_4_2.htm。台湾“内政部社会司”网站，<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l-11.xls>。

平均分别为45.2岁、47.9岁^①。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1960年之后中国的寿命延长明显快于其他国家。

表3.1 各国历年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岁)^②

年份	国家	中国	印度	韩国	世界	高收入	中收入	低收入	拉美
1960		43.5	42.4	53	52.6	68.6	48.1	42.3	56.1
1965		51.3	45.8	56.8	55.8	69.7	52.3	44.6	58.2
1970		62.9	49.1	61.2	59.3	70.6	57.4	44.6	60.2
1975		65.7	52.6	64	61.4	72.2	59.8	46.5	62.3
1980		67.0	55.3	65.8	62.9	73.3	61.5	50.2	64.5
1985		68.3	57.0	68.5	64.2	74.5	63.1	51.7	66.5
1990		69.5	58.4	71.3	65.4	75.5	64.5	52.7	68.2
1995		70.4	59.8	73.4	66.2	76.3	65.4	53.4	70.0
2000		71.2	61.6	75.9	67.2	77.6	66.6	54.7	71.6
2005		72.2	63.4	78.4	68.3	78.7	67.7	56.7	72.9
2009		73.1	64.8	80.3	69.4	79.6	68.8	58.4	73.9

中国官方媒体也认为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81年的68岁，并认为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6‰，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1981年的35‰^③。

可见，1949年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得少”，而不是“生得太多”，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当时物质上是贫穷，但是在医疗、基础教育、农田水利建设、科技创新（如杂交水稻、航天技术）等方面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是社会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一些经济制度确实是非常僵化的，比如笔者家乡（湘西雪峰山）由于海拔高（500~1200米），不适合种双季稻，但当时的领导要求我们公社与其他海拔低（100多米）的公社一样种双季稻，结果早稻减产，晚稻颗粒无收，并且又不允许开垦荒地。笔者的童年是饥寒交迫，但赤脚医生制度却让笔者活下来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疗制度，现在

① “WORLD POPULATION TO 2300”，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Printed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4,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longrange2/WorldPop2300final.pdf>.

②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③ 唐钧：《人人享有：中国医疗保障的新蓝图》，新华网（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9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05/content_9801111.htm。

在世的人很多在婴幼儿期就已经夭亡。换句话说，当时虽然“活得不好”，但是却让大家“活下来”了。当时的政策是经得起“生命核算”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有几十年的滞后期（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人均GDP直到二战后才快速增长），当时“活下来”的人口奠定了1980年后几十年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

但是有生也有死，等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老年，开始大规模死亡的时候，中国将出现一个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伴随的将是国力的衰退。

马寅初提出的“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在当时是错误的（婴幼儿死亡率高，当时的“二胎”政策效果和后面的一胎化政策其实是一样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不孕率高，单身、丁克比例高，生育意愿低）。

表3.2中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用年中人口数和出生率计算出生人数）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①。其实，这个数据也不是很准确，因为相应年龄人口与1982年人口普查有出入。

表3.2 1957~1979年中国生育率、出生人数（万人）

年份	生育率	出生人数		年份	生育率	出生人数	
		实际	马寅初			实际	马寅初
1957	6.41	2169	677	1969	5.72	2715	949
1958	5.68	1909	672	1970	5.81	2736	942
1959	4.3	1650	768	1971	5.44	2578	948
1960	4.02	1392	692	1972	4.98	2566	1031
1961	3.29	1190	723	1973	4.54	2463	1085
1962	6.02	2464	819	1974	4.17	2235	1072
1963	7.5	2959	789	1975	3.57	2109	1181
1964	6.18	2733	885	1976	3.24	1853	1144
1965	6.08	2709	891	1977	2.84	1786	1258
1966	6.26	2578	824	1978	2.72	1745	1283
1967	5.31	2562	965	1979	2.75	1727	1256
1968	6.45	2756	855	合计		51584	21707

假如1957年就采纳马寅初理论，每个妇女只生两个（生育率为2.0）的话（事实上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中国统计年鉴1999》，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是不可能的)，那么1957~1979年共出生2.1707亿人，比实际的5.1584亿人少生2.9877亿（ $5.1584-2.1707=2.9877$ 万），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宣传一致。换句话说，依照马寅初理论，1957~1979年出生人口中有大约58%是不应该出生的。这少生的3亿人到2010年有两亿多孩子。将马寅初理论抬上神龛，意味着否定5亿多生命的生存合法性！

将1982年的人口普查的各年龄组人口以年龄别存活率回推1979年各年龄组人数。然后依照上表中的比例计算马寅初理论下1979年各年龄组人数。比如1957年依照马寅初的话只出生677万，是实际出生2169万的31.2%；1979年的22岁人口（1957年出生）实际为1895万，那么依照马寅初理论的话只有591万（ $1895 \times 31.2\%=591$ ）。

在1957~197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少生3亿后，分两种方案预测1979年后的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停止计划生育。年龄别存活率和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可参见本书第4章中“201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一节。

1979年的时候，计划生育已经实行了20多年，政策惯性很强；中国人口总量还是美国的3倍，很容易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人口太多、计划生育力度不够”；而当时国际控制人口的思潮高涨，因此，中国很可能不但不停止计划生育，反而同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1989年的生育率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实际生育率应该会更低，因为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①，1990~2000年的生育率采纳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2005年的生育率采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2010年的生育率采纳“六普”的结果，中间缺失年份用线性穿插。1980~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采纳2010年人口普查的0~30岁的性别比。

假如1979年后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1980~2010年的生育率应该略高于泰国。但是考虑到中国已经实行20多年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已经改变，避孕率很难下降，凡是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率都没有回升到1.8以上的，因此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应该远比泰国要低。但是又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对1979年后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的实际生育率还是会有所反弹的，生育率应该会略低于泰国。这里乐观地假设1980~2010年的生育率与泰国一样^②，出生性别比为106。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中国统计年鉴1999》，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②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World Bank, September 28, 2012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表3.3 1980~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

年份	停计生	一胎化	年份	停计生	一胎化
1980	3.39	2.24	1996	1.82	1.36
1981	3.20	2.63	1997	1.79	1.31
1982	3.02	2.87	1998	1.76	1.31
1983	2.86	2.42	1999	1.73	1.23
1984	2.71	2.35	2000	1.71	1.22
1985	2.57	2.20	2001	1.70	1.24
1986	2.45	2.42	2002	1.68	1.27
1987	2.35	2.59	2003	1.67	1.29
1988	2.26	2.31	2004	1.66	1.31
1989	2.18	2.25	2005	1.65	1.33
1990	2.11	2.37	2006	1.64	1.30
1991	2.05	1.80	2007	1.63	1.27
1992	2.00	1.68	2008	1.61	1.24
1993	1.95	1.57	2009	1.60	1.21
1994	1.91	1.47	2010	1.60	1.18
1995	1.86	1.48			

表3.4 2010年人口结构

	独生子女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	人口普查
总人口(亿)	7.4	8.0	13.4
占世界比例(%)	11.7	12.6	19.4
15~59岁人口(亿)	4.6	4.9	9.4
60+岁比例(%)	22.5	20.7	13.3
65+岁比例(%)	15.2	13.9	8.9
中位年龄(岁)	38.2	35.1	34.9
老年抚养比(%)	21.6	20.7	12.0
总抚养比(%)	42.6	48.9	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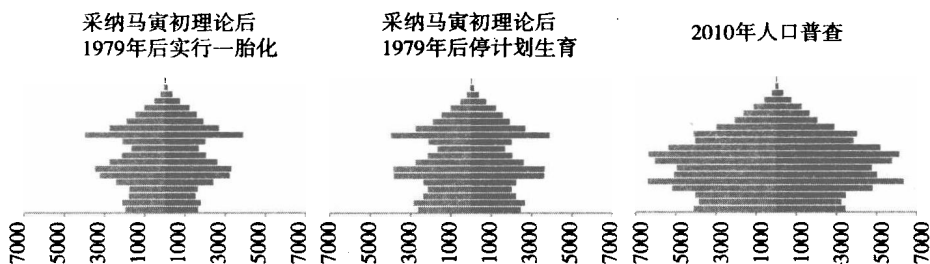


图3.1 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图

注：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数（万人），从下往上依次是：0~5岁、5~9岁、10~14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人口有9.4亿，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3.3%，正是凭借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如此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目前才能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当初采纳马寅初理论，即便1979年后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10年总人口也只有8.0亿，15~59岁人口只有4.9亿，而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却高达20.7%（美国只有18.4%，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只有7.5%），那么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步履维艰。

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在社会发展和“晚、稀、少”政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1978年的2.72、1980年的2.24。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方面是“穷怕了”，一方面对未来人口增长没有底（当时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对科技进步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提高会自发降低生育率。因此，决策者和理论家、学者们仍坚持将控制人口当成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9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费里克斯·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①。

1979年，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来源：《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http://www.hprc.org.cn/gsw/detail_ldrzjnp.jsp?channelid=75041&record=201。

但是毕竟还缺乏相关的学术论证。而中国长期以来并无专门研究人口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邬沧萍等人也是临时转行从事人口研究。

国际上，《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已经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强大舆论，对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冲击很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此后与中国历届领导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提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很难相信他没有游说中国领导人实行计划生育。而从中美开始接触，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内舆论对西方文化理论也由过去的绝对排斥，转为吸收、学习为主。这也成为中国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态度转化的重要背景。

1973年6月，戴维·洛克菲勒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谈了两小时。但是洛克菲勒拒绝透露谈话的具体内容。他说，“谈话是极其融洽的”，涉及“大量的问题”^①。是否涉及计划生育，不得而知。

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的报道^②。从1972年到198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曾8次访华，“我国领导人多次亲切地同他会面，进行友好谈话。每次，他都非常关切中国人口政策和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说明他早在1972年就访问了中国，那么甚至可能对中国1973年的计划生育都有推动作用。美国有电视节目称，老布什在1972年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1974~1975年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曾参与游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需要查找相关档案证据）。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属于后者，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1979年，中国开始获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多边援助。要知道中国1950~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③。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草签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

1978年6月12~16日，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七届世界大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芬兰总统出席了开幕式。中国自动化学会派出以杨嘉墀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导弹专家宋健随杨嘉墀去芬兰参加此会，并

① 《戴维·洛克菲勒在香港谈中国之行》，《参考消息》，1973年7月6日。

② 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③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1950~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5&ID=11040000000000000000,1。

顺访荷兰。荷兰的屯特大学的微分博弈理论专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向宋健等客人介绍了人口控制理论，并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宋健回国后与李广元、于景元等人开始了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了，宋健的学生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会议路标，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了人口控制论。1979年12月7~13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梁中堂目睹了李广元“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计生委的前身）在内的全体与会代表。与此同时，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些教师（王浣尘、王月娟、蒋正华、邵福庆等），也在用控制论的方法预测中国人口^①。依照宋健自己后来的话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②

1979年，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老先生平反，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落到1979年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北大校友）的头上，田雪原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了《百年人口预测报告》。《报告》认为，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新华社将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一度曾有人主张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山东冠县1991年真实行过“百日无孩”运动）^③。

当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对科学和人才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因为这是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根据宋健的优化方案，约在2070年左右，中国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④。

① 梁中堂：《“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112期，第64~73页。

② 曾涛思：《坚守底线是一个人应有的情怀》，新浪网（来源：《中国青年》），2005年4月28日，<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8/14266519984.shtml>。

③ 士心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由来》，中华读书报（摘自《新世纪》1998年第3期），1998年3月18日，<http://www.gmw.cn/01ds/1998-03/18/GB/190%5EDS411.HTM>。

④ 《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9月2日，<http://nmpc.people.com.cn/GB/127024/9972958.html>。

王震副总理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

据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在这次会议上，宋健再次成为焦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参加《公开信》起草工作的，一共有8个人（栗秀真、梅行、宋健、刘铮、苏沛、刘庆山、王连城、张敏才）。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陈慕华等人又做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①。

198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徽标就是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1981年，被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桑格女士所创立）接纳为准会员。1983年，被批准为正式会员。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政策非常关注。根据《人民日报》1987年的报道，1980年9月，以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为首的人口基金代表团访问中国，“同我国正式签订了人口基金第一期援华方案协议，规定在1980至1984年间，人口基金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援款，用于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产期保健、人口学研究与人员培训等22个项目”^②。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萨拉斯一行时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③这说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一胎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

198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④。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优生优育”也成了国家的政策。

^①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始末》，新华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9期），2011年1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1/14/c_12980178.htm。

^② 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③ 《邓小平思想年谱·1980年》，人民网，<http://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80/2632725.html>。

^④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年9月2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7034.htm。

1985年11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有少数外国人骂我们的人口政策。他们真正用心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十五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当时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学者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然后领导又迷信学者的“论证”。捏了个泥菩萨，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

计划生育后果始料不及

在《公开信》发出几天后，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篇幅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①

宋健开创的人口控制论学科的建立被称为“结束了从马尔萨斯以来长达200多年的激烈争论，把人口学变成一门精确的定量科学”。西方人口统计学的奠基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考尔教授（Ansley J. Coale，在诺特斯坦于1959年担任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会长之后，考尔继任为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所长）评价说：“宋的研究和我们西方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那里要有很高的技巧”^②。1987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奖^③。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的误差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④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被人口普查数据证

① 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0月3日。

② 《宋健》，何梁何利基金网站，<http://www.hi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250>。

③ 《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9月2日，<http://nmpc.people.com.cn/GB/127024/9972958.html>。

④ 宋健：《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明远远脱离实际。

《公开信》中曾经引述了社会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①事实证明，当时许多对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偏于乐观了。

比如，《公开信》认为不会出现“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很快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今后将有4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

《公开信》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但事实上，中国在上世纪末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现在离公开信发表仅30多年，如何实现全社会的“老有所养”已成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城市已普遍实现了社保，但仅有4000万老人得以享受。农村老人还远谈不上社保全覆盖，即使有一些，标准也不高。现在国家已经在考虑推迟退休年龄，今后高达4亿老人的养老将是未来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2012年，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现在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给老年人一种误导，就是养老的很多责任推给政府”，“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②。

《公开信》认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但事实上，中国在2003年就开始出现民工荒。

《公开信》认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迫使中国走外向型经济模式。

宋健认为，生育率为2.3高于更替水平，人口会一直增加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也在107（略高于发达国家的105），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2左右（高于发达国家的2.1），2.3的生育

^①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年9月2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7034.htm。

^② 郭少峰：《全国老龄委副主任称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新华网（来源：《新京报》），2012年8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8/25/c_112842826.htm。

率对中国来说只略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将不断下降（严复、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这种规律）。人口在低惯性增长几十年后，就会停止增长，不可能在2050年达到宋健所说的40亿人。当时应该做的是废止“晚、稀、少”那样的宽松计划生育政策，然后在1990年之后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如果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最多只能达到14.6亿，总人口在2032年达到顶峰后会负增长，到2100年降低到11.6亿人。

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

中国人口学的建立

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成立了全国人口学会筹备组，许涤新、陈道、刘铮、刘庆山任正、副组长。根据1980年《人口研究》的资料：“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应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邀请，派出刘铮、张乐群、田雪原、袁方、蒋琦等五同志，于5月19~23日去美国夏威夷出席了该所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议’。”^①

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选择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应该是段纪宪起的桥梁作用。

段纪宪是贵州人，抗战胜利后，就读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本应在1950年毕业，但因为抗拒让出宿舍给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部人员，1949年10月1日台大布告说：“学生段纪宪在校屡次滋事，应即开除学籍。”段纪宪被开除后，被推荐到农复会人口研究单位，后又再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深造，应该算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口学家。

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派出专家（包括诺特斯坦）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调研了3个月^②，除了给日本制订控制人口的政策外，还建议中国、韩国等地控制人口。

农复会是美国援华法案的一部分，有两位美籍委员、三位中国籍委员，均由两

^① 《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中国人口分析会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Yu-ling Huang, “The Population Council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Postwar East Asia”, Ph.D. Candidate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2009, <http://www.rockarch.org/publications/resrep/huang.pdf>.

国“总统”任命。美籍委员贝克（John Earl Baker）认为台湾必须控制人口，蒋梦麟主任（与桑格夫人保持长期的友谊）也一直支持控制人口。段纪宪在农复会很受重视，1951年出版了《台湾之人口》。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社会学部副主任埃文斯（Rogers F Evans）推荐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者巴克利（George W Barclay）博士到台湾进行人口研究。段纪宪是巴克利在台湾的合作伙伴。巴克利对段纪宪评价很高，1953年的时候说段纪宪还要回普林斯顿^①。

1957年，段纪宪前往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年便回到新中国，先被分配在农业科学院工作，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英语教员，“文革”期间被扣上“台湾特务”、“美国特务”、“英国特务”等罪名，下放到团河农场劳动。段纪宪1973年离开了中国内地前往香港，后又在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推荐下到了夏威夷，成为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是由保罗·德曼创办于1969年，保罗·德曼在1973年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后，韩国人赵利济（Lee-Jay Cho）继任为所长（也是中西方中心的副主任）。赵利济对段纪宪非常倚重和信任。

1981年2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宣告成立，马寅初为名誉会长，许涤新为会长，陈道、刘庆山、刘铮、宋健为副会长。3月25日，段纪宪访问中国，并表示将协助中国社科院创办英语培训中心^②。段纪宪先后把众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安排到东西方中心进行交流或留学（如田雪原、马赢通、阎志强、杨宜勇等）。他与宋健、于景元合写的一部有关中国人口控制的英文专著《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 Theory and Applications》，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赵利济评价道：“这本书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里程碑。书中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而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人口增长已成为紧迫问题的第三世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③于景元在1986年还获得东西方中心的一项大奖。可见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创办中国人口学、培养中国人口学家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除了东西方中心外，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等机构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者（如顾宝昌、曾毅等人）。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归来的那批人口学家基本都是联合国基金资助留学的。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研究机构也是联合

^① 赵育农：《一个女性经验的家庭计划：台湾家庭计划早期的发展（1954—196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19～2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0年大事记（1978～2008）》，人民网教育频道，2008年9月25日，<http://edu.people.com.cn/GB/8216/134692/8103197.html>。

^③ 《宋健》，何梁何利基金网站，<http://www.hi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250>。

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

笔者个人相信，这些人口学家（甚至段纪宪）是无辜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东西方中心的那些培训计划的真实目的。

198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一期5000万美元援华项目结束后，又通过了第二周期5000万美元的援华方案。美国政府1986年拒绝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提供已答应的部分捐款。萨拉斯积极奔走于日本、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又筹集到2000万美元捐款，基本弥补了美国拒付的款项。“上述两个人口基金援华方案对中国人口数据搜集和分析、计划生育、妇幼保健、避孕药具生产、人口教育和宣传、人口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等都起了推动作用。”^①

1979年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共资助中国2.395亿美元。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的项目^②：

第一周期（1980～1984年），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二周期（1985～1989年），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三周期（1990～1994年），援助金额为5700万美元。

第四周期（1998～2002年），援助金额为2000万美元。

第五周期（2003～2005年），援助金额为1350万美元。

第六周期（2006～2010年），援助金额为2700万美元。

第七周期（2011～2015年），援助金额为2200万美元。

可以说，整个中国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学体系、人口数据体系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类似的原始依据。

目前活跃在中国人口学舞台的学者，基本上都具有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资助的背景。说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所赞成观点的很大影响，应该是不为过的。

《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

^① 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② 《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人口与发展合作的30年历程》，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网站，<http://www.un.org.cn/public/resource/4d777c9afa665ccf289b9af71eadf414.pdf>。《中国政府—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国别方案2011—2015》，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网站，<http://www.un.org.cn/public/resource/68d3f1d844fd90a66808a4dddb5ce587.pdf>。

成“可持续发展”。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一人”牛文元被选中为专家。1989年，以牛文元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1989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博士胡鞍钢出版《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强调了一胎化政策的必要性。1989年，胡鞍钢和牛文元等人发表了第二份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①。他们的观点得到宋健的大力支持^②。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作为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从1990年开始主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而支撑牛文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不正确地放大中国人口增长和未来人口趋势为基础，然后以粮食、环境、气候等外部条件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近年，牛文元、胡鞍钢又提出要制定“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③。牛文元提出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这也是养活将到来的15亿人口的基本保障线”^④。《学习时报》第220期发表采访他的文章^⑤：“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1000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000亿~8000亿，新增人口每年要消耗掉新增GDP的1/5左右，也就是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讲话很可能是受牛文元的影响）。由于他的“研究”很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全球人口的理念，牛文元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数据非常重视，1982年联合国派统计司主管人口和社会统计工作的副司长游允中（1935~2011年，台湾人，笔者与他有过多次邮件联系，就中国的生育率进行过辩论）指导中国进行人口普查（他也是中国后面几次人口普

① 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1989年8月，载中国科学报编：《国情与决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温志宏，刘梦羽：《采访牛文元：大道至简》，中国网（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4期），2009年4月17日，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9-04/17/content_17625738.htm。

③ 付毅飞：《牛文元委员：“低碳发展”需要国家行动方案》，搜狐网（来源：《科技日报》），2011年3月9日，<http://roll.sohu.com/20110309/n304089442.shtml>。《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核心理念 能源产业承压最大》，人民网（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14日，<http://energy.people.com.cn/GB/12724005.html>。

④ 牛文元：《中国发展需设三保障线》，中金在线（来源：《中国窗》），2008年3月12日，<http://news.cnfol.com/080312/101,1277,3896061,00.shtml>。

⑤ 陶春：《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学习时报》第200期，<http://discovery.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44594.htm>。

查的指导者)。1982年7月1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和助理执行主任萨迪克(1987年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二届执行主任)访华亲自了解人口普查。7月1日下午,赵紫阳总理在会见萨拉斯一行时说:“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人口普查,不仅对中国是一件大事,对世界人口和发展也是一件大事。”赵紫阳在和萨拉斯讨论了未来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后说,中国一定要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以免对世界人口问题增加压力^①。

联合国人口基金还在国际社会上掩盖中国计划生育的真相。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萨拉斯博士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所开展的有关活动。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②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很多机构有合作项目,其办事处通常就在当地的计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却说:“虽然有人指责中国采用强迫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使用强迫的方法。”^③它声称:“中国妇女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怀孕的时机和间隔;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指标;堕胎不是促进中国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计划生育不存在强迫。”1986年,萨拉斯说:“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④

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萨迪克在CBS Nightwatch电视节目中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堕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迫。”她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完全自愿的”^⑤。1991年4月11日,萨迪克对新华社说:“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过去10年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高兴。现在中国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派技术专家帮助其他国家。”^⑥联合国还授予中国“联合国

①·《赵紫阳会见萨拉斯时说:中国一定要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科学网(来源:新华社,1982年7月2日),<http://www.cssn.cn/news/209181.htm>。

② 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③ United Nations, *Abortion Policies: A Global Review*,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2. Volume 1, page 85.

④ Brian Clowes, *Kissinger Report 2004: A Retrospective on NSSM-200*,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2004, <http://www.hli.org/files/Kissinger%20Report%202004.pdf>.

⑤ “Forced Abortion, Infanticide Reported in Tibet”, *The Wanderer*, April 6, 1989, page 2.

⑥ Brian Clowes, Chapter 4: *China's Forced Abortion Program*, *The Facts of Life*, <http://www.hli.org/index.php/the-facts-of-life>.

最佳人口控制奖”^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在参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外，也为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辩护，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在其1997年发布的《世界儿童状况》中认为中国是“世界最佳儿童友好国家”。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遭到强烈的抵制。1984年人口政策松小口后，生育率停止下降（但也没有回升），引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人的不满和国际控制人口的组织的高度关注，“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国家科委组织了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人口控制与对策》课题组（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子”学派），得出结论：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政策^②。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承认：随着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人们会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自然反应”^③。

中国在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只有1.33。如果公众和决策层知道这些信息，也会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自然反应”。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生育率篡改为了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却将联合国的数据当成圣旨，比如2006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④联合国、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用“修正”后的生育率数据，夸张地预测未来人口，淡化民众的这种“自然反应”。即便是开明派人口学者，也是尽量将民众的“自然反应”淡化为各种二胎过渡方案。并且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不争论”，使得大家不敢有“自然反应”；即便有，也无从表达。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媒体还不敢大胆提“停止计划生育”，而只敢说放开二胎。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14.5亿，与联合国2003年前的预测完全一致^⑤。

中国人口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将有非常好的前景。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人口学家和“持续发展”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① Steven W. Mosher, “Thinking Clear: Forced Abortions and Infanticide in Communist China”, *Human Life Review*, Summer 1985, pages 7 to 34. Page 33, footnote 9.

^② 《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09月2日，<http://nmpc.people.com.cn/GB/127024/9972958.html>。

^③ Paul George Demy, “Population Policy: A Concise Summary”, *Population Council*, Volume 173 of Working papers, 2003, www.popcouncil.org/pdfs/wp/173.pdf。

^④ 《人口计生委张维庆谈“稳定低生育水平，以人为本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国政府网，2006年3月21日，<http://www.gov.cn/zwhd/ft/rkwt/wz.htm>。

^⑤ 张维庆：《关注人口安全 促进协调发展》，《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12期。

人口变成了问题，并且是大问题。他们是联合“谋杀”了鲜活的中华文明！

基辛格显然比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更清楚中国的人口危机。2011年1月20日，他接受了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今后经济不可能赶上美国^①。

中国人口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在“术”的方面毕竟还是积累了一些方法学知识（代价也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点需要高度肯定。但是人口学缺乏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比如梁中堂教授某些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站得更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一些人口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自发地脱离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当初的“学术轨道”，近年开始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努力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要体谅他们是站在“负起点”而不是“零起点”）。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人口学者（比如李建新、穆光宗、陈友华、王广州等人）头脑中的“条条框框”比上一辈要少得多。

美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如果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完全归罪于西方国家也不公平，因为中国本土提出控制人口的大有人在。我们只能说20世纪70年代，国际和国内控制人口的思潮合流了。

笔者相信，美国控制全球人口是出于“利己也利人”的动机（当然美国利益优先）。连洛克菲勒三世本人可能动机也并不坏（他还是有名的慈善家，可能或多或少真的认同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作为一个富人，如果让他过上发展中国家那种穷日子，可能他会觉得“没有生存的必要”。美国很多民众（尤其是富人）有类似的想法。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懂得自发控制人口，需要他们去帮助。

二战后，美国出现“婴儿潮”，生育率在1957年达到3.71的顶峰，人口增长很快。而当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本土控制人口的思潮非常高涨，这应该属于一种“自然反应”（当时中国的马寅初等知识精英也有这

^① Charlie Rose, “Charlie Rose Talks to Henry Kissinge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Bloomberg, January 20, 2011,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05/b4213015834652.htm.

种反应），不可苛责。《人口爆炸》作者保罗·埃利希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30多亿减少到5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2亿减少到1.35亿^①。只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而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成本（物质成本和政治成本）更低，因此更加热衷于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避孕“不是正当的政治或政府活动、职能或责任”。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推翻了早先的禁令，使避孕行为合法化。1968年，美国约翰逊总统曾经任命过一个关于“人口与家庭计划”的机构，研究推广计划生育的问题。1970年，国会通过了《公共保健服务法》的第十章（Title X），给青少年和贫困家庭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以及一些生殖健康服务^②。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女服务员Norma McCorvey，声称遭到强暴怀孕，她找不到一个愿意为她进行非法堕胎的人。女权主义者鼓励她向反堕胎法发起攻击，这就是著名的“罗诉韦德案”。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人称之为“第二次内战”。美国堕胎数由1969年的2.7万例增加到1975年的103万例。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急剧下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国会曾经想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1976年通过另外一项法律，禁止将联邦医疗补助方案用于堕胎服务。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社会全面趋向保守。影响美国人口政策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朱利安·西蒙等人的经济、人口、资源理论。美国政府认识到，人口是资源而不是负担。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

给Title X 法案的拨款也逐年下降，裁减大量的机构和人员，如果保持在1980年的资助水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话，那么2007年应该获得7.59亿美元的拨款，但是事实上2007年给Title X的拨款只有2.83亿美元，并且Title X项目中用于家庭计划的比例从1980年的44%降低到2006年的12%。而与此同时，用于Medicaid（医疗补助）的比例却从20%上升到70%。也就是说，作为“家庭计划”的专门法案，现在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罗诉韦德案”的当事人Norma McCorvey虽然在1973年赢了官司，不过却生下了孩子。最初几年，她是全美知名的女权斗士，进入堕胎诊所工作，她渐渐发现了堕胎

^①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2.

^② 易富贤：《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12月21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12/21/content_1025281.htm。

对于婴儿的不人道，后面成为“反堕胎斗士”。

美国共和党也一直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国会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否决^①。2003年，国会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Partial-Birth Abortion Ban Act）。小布什总统随后签署了这一法案，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该法案获得了70%的民众支持。“美国民权联盟”的Talcott Camp指出，该法案连怀孕头12周到13周所采取的堕胎手术都要加以禁止。

2012年8月，美国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竞选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通过一项取缔堕胎的宪法修正案，赋予未出生胎儿不可剥夺的生命权^②。

从某种角度讲，1973年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和1974年《NSSM-200》是姊妹关系，前者反映内政，后面反映外交。

由于“罗诉韦德案”是“内政”，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并且是“公开”的，美国民众有机会进行反思，从而纠正相关的一些错误政策。而《NSSM-200》是“外交”，无关民众的利益，并且是“绝密”的，民众无从反思，错误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并且中国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在国际上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使得美国很多普通民众不知道真相。

美国很多决策的制订并没有经过公众同意，而是由少数几个“权力比总统还要大”的人士（如基辛格）决定的。很多决策不但公众不知道，连总统也不一定知情。如果1974年将《NSSM-200》进行投票的话，不但在全民投票中通不过，连在议会也通不过。而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控制人口的一些组织和个人作为利益集团，必然本能地为自身的利益不惜手段，包括夸大世界人口危机。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西方国家内部有很多人是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者毛斯迪（Steven W. Mosher）1979年在中国调研，回美国后递交报告反对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但是被斯坦福大学取消博士学位；他后面成立人口研究所，并以身作则，共生育了9个孩子^③。美国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在20世纪80年代就坚决反对中国计划生育，并与毛斯迪等人一起谴责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计划生育。2011年8月

^① Julie Rovner, "Partial-Birth Abortion: Separating Fact from Spin", NPR, February 21, 2006, <http://www.npr.org/2006/02/21/5168163/partial-birth-abortion-separating-fact-from-spin>.

^② Matt Rourke, "AP sources: GOP platform draft keeps amendment to end abortions with no stated exceptions", *washingtonpost*, August 21,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ap-source-gop-platform-draft-keeps-amendment-to-end-abortions-with-no-stated-exceptions/2012/08/21/b45565c0-ebce-11e1-866f-60a00f604425_story.html.

^③ Steven W. Mosher,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pop.org/about/our-president-803>.

2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说时称“完全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拜登的此番讲话遭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强烈抗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批评拜登：“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可怕而野蛮的，副总统对这一政策的默许将对美国民众的道德底线产生震撼。”^①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瑞安认为拜登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的观点“非常极端”^②。他们反对计划生育，当然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宗教的、政治的。本文所引用并公布的很多美国政府对于人口控制的内部资料，也得益于美国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是美国学者首先整理出来并发表的。正是因为美国内部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控制全球人口，因此基辛格、洛克菲勒基金、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东西方中心等采取了秘密方法，避免让公众知道。如果美国公众知道真相，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

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在对控制全球人口问题上出现分裂并导致政策摇摆。比如美国政府曾于1986~1992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期间）、2002~2008年（小布什总统期间）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NSSM-200》也是在老布什时代被解密的。而克林顿、奥巴马时代又恢复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其实克林顿、奥巴马比老布什更加清白，他们对当初出台《NSSM-200》的一些背景并不了解（就像现在中国领导人不了解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背景一样），可能只是被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内某些团体所忽悠，轻信了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没有深究其严重后果。比如他们相信控制人口有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提高妇女教育水平、降低妇女和儿童死亡率（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控制人口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因为生育率过快地下降必然导致老年化和社保危机，而妇女比男人长寿几岁。少子化也提高了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发病率。

国际思潮的多样化本来是很正常，尤其是在人口问题上自古争论就很大。经过各方面博弈，国家政策总体还是比较理性的；由于有纠偏机制，即便走入歧途也会很快纠正过来。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在优生方面一些错误思潮在二战的时候就被纠正；70年代控制人口的错误也在80年代被纠正。印度在1977年也很快纠正了1976年在人口控制上的极端做法。

中国学术和制度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政策很容易根

^① Jennifer Rubin, "Romney slams Biden on 'one child' comment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3,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right-turn/post/romney-slams-biden-on-one-child-comment-in-china/2011/03/29/gIQAh2qYJ_blog.html.

^② "Transcript And Audio: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 NPR, October 11, 2012, <http://www.npr.org/2012/10/11/162754053/transcript-biden-ryan-vice-presidential-debate>.

据某些人的偏好一面倒地受多样化的国际思潮中的某一种思潮所影响。宋健等少数几个学者的短时间形成的观点很快就转变为国家政策。

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是害人害己。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减少给美国的经济机遇。中国今后人口老化和萎缩必将给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将远超过目前日本和欧洲人口老化给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后果。中国的人口与美国人口一样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停止计划生育不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第4章

中国的人口现状

计生委的预测靠谱吗

1990年以后中国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尽管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还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有下面几个原因。

① 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还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大滑坡（下文将详述）。而当时的养育成本还相对较低，农民还养得起两三个孩子，因此超生比较普遍。

② 1980年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同时，也实行包田到户政策，农村自主性提高，“晚、稀、少”政策无法再维持，婚育年龄提前，而1962年之后的出生高峰女孩在1980年后到了生育年龄，大量的低龄育龄妇女形成出生堆积，总和生育率受进度影响“失真”，但终身生育水平并没有时期生育率反映的上升幅度大。

③ 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传统的生育文化也得以恢复（各地续修族谱、复修宗祠现象比较普遍），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强烈抵制一胎化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不下去。自1982年开始各省份陆续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1984年中央被迫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大部分农村地区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

④ 1979年起大量下放未婚青年返城，造成了城市的一个出生高峰，但是对全国的出生没有影响。

1984年人口政策松小口之后，引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人的不满和一些国际组织的“焦心”。国家科委的“马孔子”学派非常活跃，积极游说“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政策”。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在全国人大召开之际，国家科委通过各种渠道把他们的报告带到会场^①。牛文元、胡鞍钢也出版了从“持续发展”角度支

^① 《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9月2日，<http://nmpc.people.com.cn/GB/127024/9972958.html>。

持计划生育的专著^①。受宋健等人的观点的影响，1990年后国家对计划生育非常重视。

1982年，湖南省常德地区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作为典型推广到全国^②。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明确提出“对造成人口失控的要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③。各地纷纷下发了“一票否决制”的通知^④。根据胡鞍钢的话：“自1991年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⑤

更重要的是，1990年后，社会经济发展（包括中学入学率的提升、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启的民工潮）本身就降低了农民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而当时又实行医疗、教育、住房等的产业化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民众的养育能力。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采纳胡鞍钢等人的建议），将财力向中央集中；基层政府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农民身上转移，增加了农民的超生成本。1990年之后生育率几乎是跳跃性下降。

表4.1 不同来源的生育率资料^⑥

年份	国家统计局	国家计生委			第五次人口普查
		1992年	1997年	2001年	
1986	2.42	2.46	2.59		
1987	2.59	2.57	2.66		
1988	2.31	2.28	2.41		
1989	2.25	2.24	2.4		
1990	2.17	2.04	2.29	2.29	2.37
1991	2.01	1.66	1.75	1.77	1.80
1992	1.86	1.47	1.57	1.59	1.68
1993	1.71		1.51	1.52	1.57

① 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1989年8月，载中国科学报编：《国情与决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温志宏、刘梦羽：《采访牛文元：大道至简》，中国网（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4期），2009年4月17日，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9-04/17/content_17625738.htm。

② 《“一票否决”泛滥是行政惰性使然》，人民网（来源：《南方日报》），2011年10月1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15884276.html>。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1991年5月12日），人民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7/content_2587830.htm。

④ 贾志勇：《浅谈一票否决制度》，《人口学刊》，1992年第1期。

⑤ 姚忆江、袁瑛：《胡鞍钢：“人口政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http://news.nfmedia.com/nfzm/content/2010-03/18/content_10228835.htm。

⑥ 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3月号。

续表

年份	国家统计局	国家计生委			第五次人口普查
		1992年	1997年	2001年	
1994	1.56		1.32	1.41	1.47
1995	1.43		1.33	1.45	1.48
1996	1.55		1.35	1.36	1.36
1997	1.46			1.27	1.31
1998	1.45			1.34	1.31
1999	1.45			1.29	1.23
2000				1.45	1.22

也就是说，199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至少在那个时候就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当时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不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超生漏报（尤其是女婴漏报），预测中国人口在2000年会超过13亿、在2010年超过14亿。因此，1996年制定的“九五”计划提出：“全国人口2000年要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要控制在14亿以内，任务艰巨。”^①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

2000年11月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②，中国人口只有12.6583亿（其实还有水分），根本没有13亿，说明以前的预测是严重脱离实际的。2000年人口普查也证实生育率确实只有1.22，那么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就不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及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如此低的生育率。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是1.22。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学术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漏报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普查的时候0~9岁人口漏报，于是应用一些数学方法，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③将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

^① 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1996年3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http://www.people.com.cn/zgrdxw/zlk/rd/8jie/newfiles/d1150.html>。

^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331_15434.htm。

^③ 博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研讨，2006年10月28日下午，中国科技馆304会议室。<http://www.dajunzk.com/renkoufayan.htm>。

(将出生人口增加1/3)，也太大胆了。

胡鞍钢等人还专门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规划制定的建议：不能因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①。

根据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建议，2001年“十五”计划提出，2005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②。2001年还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推迟的13亿人口日

依照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1995年的预测，中国人口在2000年达到13亿；按照他们2000年的预测，中国人口在2005年达到13.3亿。但是“13亿人口日”到2005年1月6日才姗姗到来（其实还有水分）。而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并没有被击醒。相反，他们还为“计划生育将中国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而沾沾自喜^③，仍然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迅速，对资源、环境、就业造成压力。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则估测：“我国人口承载力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表示，人口众多依旧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预计2020年人口总量将达14.3亿。连人口学界的开明派学者顾宝昌也认为：“中国人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10年就有1个亿的新增人口，这样推测再过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极限。”^④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误导决策

“十五”计划提出“十五”期间增加人口控制在6257万人以内，但国家统计局数据认为这五年只增加了4013万。2005年11月又进行了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⑤。那么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但2005年11月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还认为：“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2033年前后将达到峰值15亿

① 胡鞍钢：《我国可持续发展十大目标——关于“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年第4期。

② 《中国的人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553_3.htm。

③ 《特别策划：13亿人口的分量》，人民网，2005年1月1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06966.html>。

④ 《中国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 第13亿人如何确定》，中国新闻网，2005年1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1-06/26/524913.shtml>。

⑤ 《各地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及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2005/html/0803.htm>。

左右，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①

2004年2月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担任组长，宋健和徐匡迪任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至2006年4月，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得出如下结论^②：

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② 目前生育率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建议“十一五”期间应保持政策稳定。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独生子女政策不但没有必要放宽，相反还需要加强。因此，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③。各地掀起了抓计划生育的高潮，出现了广西博白事件等众多恶性事件。

当时人口学家中对中国人口峰值的最低预测应该算蔡昉了。他修正了过去认为中国人口高峰会达到16亿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14.4亿的顶峰^④。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反驳了蔡昉的观点，依照他的观点，2010年中国人口应该达到13.6亿^⑤，但“六普”显示只有13.4亿。

2010年9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对媒体说，如果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不变，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5亿人，到时就可以放开二胎政策了^⑥。根据张枫的预测，那么近年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以上人口，总人口在2010年将超过14亿，可见张枫预测之

① 吴珊：《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13.7亿 男女比例失衡严重》，人民网（来源：《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5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3858072.html>。

②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政府网，2007年1月11日，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677.htm。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07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1/22/content_5637713.htm。

④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论坛》，人民网，2005年9月11日，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280050909151001_ctdzb_040。《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人民网，2006年2月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4072035.html>。

⑤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页。

⑥ 薛冰妮、孙骏：《广东省计生委负责人：2033年有望放开二胎》，《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24日，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9/24/content_16145931.htm。

荒谬!

中国年增人口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00多万下降到“十一五”期间的600多万。并且随着育龄妇女在2011年后开始快速下降，每年出生人口将不断减少；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在快速增加。因此，“十二五”期间平均年增人口将远少于“十一五”，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10年7月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却得出这样的结论：“预计‘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意味着“十二五”年均增长1000万人，远超过“十一五”），“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达到15亿人”^①。在“六普”结束几个月后，计生委和人口学会仍然坚持这些观点^②。他们的建议显然是假定生育率在2.0以上（才能让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9亿），并被“十二五”规划采纳。

2012年9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仍然坚持说：“到现在我们的总人口是13.47亿，现在通过官方报告的这个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③

笔者的人口预警是准确的

2005年2月，笔者在假定国家统计局数据准确的前提下，在《从统计数字看停止计划生育的紧迫性——尴尬的13亿人口日》中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只会达13.309亿^④；在香港版《大国空巢》（第346页）中将这一预测修改为13.3285亿人。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5章中从多个方面质疑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包括从30多个角度质疑了1.8的生育率，认为人口普查低年龄组漏报率最多只有10%^⑤。

2010年11月1日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2012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表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不含军人），与笔者的预测结果（13.3285亿人）完全一致，而与国家计生委1996年（14亿人）、2001年（14亿人）、2005年（13.7亿人）以及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① 曾利明：《中国人口老龄化提速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遇困境》，新华网，2010年7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10/c_12319927.htm。

^② 《经济转型倒逼人口均衡》，《瞭望》，2011年1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1-01/04/c_12944529.htm。

^③ 《对话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凤凰卫视，2012年9月30日，<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209/40566062-bb77-42ef-815c-93f62c9887af.shtml>。

^④ 易富贤：《从统计数字看停止计划生育的紧迫性——尴尬的13亿人口日》，《东亚经济评论》，2005年2月26日。<http://www.e-economic.com/info/1494-1.htm>。

^⑤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

组（13.6亿人）的预测结果相差甚远。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也证实了2000年低年龄组漏报确实只有10%左右（也有可能2000年是准确的，而2010年普查存在重报），说明2000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3多。

表4.2 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各年龄人数比较

年份	2000年普查		2010年普查	
	年龄	人口	年龄	人口
2000	0	13793799	10	14454357
1999	1	11495247	11	13935714
1998	2	14010711	12	15399559
1997	3	14454335	13	15225032
1996	4	15224282	14	15893800
1995	5	16933559	15	18024484
1994	6	16470140	16	18790521
1993	7	17914756	17	20775369
1992	8	18752106	18	20755274
1991	9	20082026	19	21543466

笔者在2000年开始反思计划生育，呼吁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率先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①。如果当时采纳笔者的观点，调整人口政策要主动得多。

必须承认的是，笔者过去自制的一些“鸟銃”并不符合人口学“枪炮”的“学术标准”，有些方法也确实需要完善，但有些是因为笔者与主流人口学者存在战略分歧。

“六普”后人口学家仍拒不承认普查结果

“六普”初步结果在2011年4月28日公布后，笔者计算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②。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广州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只有1.4多^③。

① 易富贤：《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中国报道周刊》（来源：人民网，2004年7月），2004年9月12日，<http://www.china-week.com/html/2249.htm>。

② 易富贤：《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停止计划生育的紧迫性》，《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30日，<http://www.eeo.com.cn/eo/jjgcb/2011/05/02/200236.shtml>。肖中洁：《现在不放开生育政策更待何时》，东方早报，2011年5月11日，<http://www.dfdaily.com/html/113/2011/5/11/603107.shtml>。

③ 韩永：《二胎的官方路线图》，搜狐网（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9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110922/n320230659.shtml>。

但是2011年5月1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人口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还有1.6，建议二胎政策软着陆^①。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在2011年7月29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有1.63，在“单独生二胎方案”、“全面放开二胎方案”下，2050年中国人口仍然分别还有14亿、15亿人。彭希哲并引用美国高盛研究所的预测，认为废除一胎化后中国人口到2050年会增加到近17亿，并将继续增加。他认为，虽然人口快速减少是灾难性的，但综合考虑（水、粮食、资源、气候等），中国理想方案是实行“单独生二胎方案”或其他二胎过渡方案使人口平稳有序地减少^②。

2011年11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仍然说，“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达到15亿人”、“二胎政策的放开应该十分慎重”^③，认为“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④。翟振武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计生委官方还认为生育率在“十五”期间是1.8左右，“十一五”期间是1.7左右，现在还在1.65左右^⑤。翟振武对《南方周末》说，计划生育政策还要继续实行，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必须控制生育率，韩国、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1、1.0，我们现在离得还很远呢^⑥！2011年4月26日，翟振武还被国家计生委推荐，给政治局委员上课，宣传他的这些观点^⑦。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之后^⑧，北大人口学教授曾毅在2012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上仍然将这一数据修改为1.6，并据此推销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⑨。曾毅认为，即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能稳定在2.0左右，中国人口也将达到

① 胡雅君：《生育率严重低于预期 学者建议放开二胎》，《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17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1-5-17/xNMDAwMDIzODYxNw.html>。

② Xizhe Peng,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cience. 2011 Jul 29;333(6042):581-7.

③ 《全国31省“双独”家庭均可生二胎 人口会激增吗？》，新华网（来源：北京晨报），2011年11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27/c_122340832.htm。

④ 《专家：老龄化无法逆转 调整计生政策时间点已到》，《瞭望》，2011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10/c_122017675.htm。

⑤ 韩永：《二胎的官方路线图》，搜狐网（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9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110922/n320230659.shtml>。

⑥ 鞠婧、胡涵：《人口爆炸的“引线”已经拆除——专家解读第六次人口普查》，《南方周末》，2011年5月5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8903>。

⑦ 《胡锦涛：加强任务落实不断开创人口工作新局面》，新华网，2011年4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7/c_121355105.htm。

⑧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4页。

⑨ 《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简报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2012年第23期（总第985期），2012年6月27日，<http://www.nsd.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6101>。

近15亿的顶峰；继续独生子女政策，2080年还会有9亿多人。郭志刚教授在该论坛以及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的文章中也认为放开二胎的话，生育率可以提升1.94，人口峰值在2030年达14.93亿，本世纪末稍低于13亿人^①。

2012年6月27日，在“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西部战略——国际论坛”上，西安交大人口所李树茁所长认为中国生育率有1.5，如果继续现行生育政策，人口下降到13亿；放开单独（夫妻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人口会接近14.5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会稳定在15亿左右；取消生育政策，人口会快速增长到16亿~17亿^②。

2012年7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说：南开大学人口学教授原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生育率）1.181可能不准，……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6上下”。郭志刚认为，“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反映的数据看，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低于正常情况下人口更替2.1左右的水平”^③。2012年7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为《1.8还是1.181？中国生育率仍一头雾水》的文章：原新认为，算上低龄小孩漏报，流动人口中高龄妇女重复登记的因素，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1.7；而郭志刚认为是1.54^④。

“六普”查明了广东的生育率只有1.06。但是2012年7月11日，广东省计生委仍然坚持说广东的生育率有1.75；华南师范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广东“80后”平均生育1.81个孩子。省计生委主任骆文智表示，将坚定不移地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⑤。

2012年8月，翟振武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将来即使放开二胎，对第三胎也会有管理。他说：“那种认为放开了二胎政策民众也不会生的观点，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如此，那你还主张放开二胎干吗？就别主张放开二胎了。’”^⑥

2012年10月26日，李建民在《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发布会上，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那么每年将出生约4700万），总

① 郭志刚：《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第96~111页。

② 李树茁：《中国正进入低生育时代 未来6000万男性或不能成婚》，财经网，2012年6月27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2-06-27/111914365.html>。

③ 肖明：《超低生育率引学界震惊 学者上书全国人大松绑二胎》，《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7月6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2-7-6/zNMDY5XzQ2ODgzNw.html>。

④ 肖明、袁荃荃：《1.8还是1.181？中国生育率仍一头雾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7月10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2-7-10/wOMDY5XzQ3MDkwOQ.html>。

⑤ 辛均庆、高明明：《我省将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南方日报》，2012年7月12日，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7/12/content_7103447.htm。

⑥ 贺莉丹：《二胎是否放开引争议 学者称生育权利应还给民众》，新浪网（来源：新民周刊），2012年8月15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8-15/121224972347.shtml>。

人口会在2044年达到15.35亿顶峰。他们建议分步放开二胎^①。

2012年11月，张维庆还认为“中国全国生育率约为1.7”。基于这种判断，他建议逐渐放开二胎，由目前的“双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改为“单独”（夫妇中一方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二胎^②。

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之所以不承认2000年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和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国家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的话可能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心态：“如果生育率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③很多计生委官员、人口学家将“人口控制”作为终生的信仰、毕生奋斗的目标和职业。1.2、1.18的生育率使得他们信仰破灭、学术信用破产。

对他们来说，将生育率修改为1.8是最安全的，略低于他们认为的世代更替水平2.1，一旦放松人口政策，生育率反弹后会超过2.1，人口会继续快速增长。决策层又不懂人口，并且过于迷信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建议，因此只能“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以前的理论之所以一次次破产，是因为他们的两个核心数据是错误的：生育率根本就没有1.8，“六普”已经证实了1996~2010年平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仍然高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出生性别比高达12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105），世代更替水平怎么可能也是2.1？

现在他们仍然拒不承认人口普查的超低生育率，认为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1.6（赵白鸽甚至说还有1.8）；也还坚持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他们预测放开二胎后，头几年每年出生人口会达到4700万（是2010年的3.4倍），今后总人口会达到甚至超过15亿；全面取消计划生育的话，人口会达到16亿、17亿甚至以上。这恐怕不能算是“学术争论”了，而是“有意误导”！面对这种人口恐吓，决策层（假如缺乏政治魄力的话）敢停止计划生育吗？

2010年生育率能有1.6吗

“六普”最重要的数据之一是短表《表3-1 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和长表《表6-4 各地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及总和生育率》，后者根据长表《表6-3 全国育

^① 张艳玲：《研究机构建议分步放开二胎生育》，财新网，2012年10月27日，<http://china.caixin.com/2012-10-27/100452848.html>。

^② 《国家计生委：前官员“放开二胎说”不算数》，中国经营网，2012年11月30日，<http://www.cb.com.cn/1634427/20121130/430329.html>。

^③ 《人口计生委于学军谈“稳定生育政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10日，<http://www.gov.cn/zxft/f31/wzzxgd.htm>。

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计算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①。

如果借用长表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短表6-4的年龄别死亡率，笔者计算短表3-1的2010年的生育率为1.27。王广州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推算2000~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38，其中2000年的生育率为1.34（上限为1.38，下限为1.30）、2010年生育率为1.29（上限为1.32，下限为1.25）^②。

短表的生育率比长表高，可能是长表出生人口存在“漏报”（相对于育龄妇女的抽样比）。但是更可能是短表低年龄组的重报率高于育龄妇女，因为：①“六普”的设计就是重点防低年龄组漏报，必然导致重报；②“六普”结果远低于预期，各地补查过程更多地修改短表（增加人数），而长表更难修改。

长表6-3虽然只是9.41%人口抽样，但是信息量却非常大（对于判断生育率来说，1%人口抽样调查信息量就很大了）。15~49岁这35个育龄妇女组和35组出生人口数是配套比例关系，即便某几个年龄组存在“漏报”或“重报”（相对于总体抽样比），也不至于影响总结果。

医学研究的一些思路值得人口学借鉴。比如，测活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可以用荧光染料fura-2或fluo-3。fura-2是双波长的比例关系，这种比值法可排除因染料本身浓度、光学通路，以及仪器灵敏性的变化等因素引入的误差，可以获得准确的细胞内钙浓度。而fluo-3是单波长，可以测出细胞内钙的变化和相对浓度，但是难以如fura-2那样获得准确浓度，因此医学研究一般都喜欢用fura-2。普查长表6-3相当于fura-2，是“双波长”，所获得的生育率比较可靠；而短表3-1、6-4、长表1-4相当于fluo-3，是“单波长”。短表3-1人口总数的误差（比如福建就是靠后面补查、修正，增加10.8%才“凑够数”）比长表6-3生育率的误差可能还要大。

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6-5的1.22的生育率，是根据长表6-6（是由35组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组成的“双波长”）计算出来的^③。但是人口学家们却认为短表3-1的低年龄组人数不准确而加以修正，将生育率修正为1.8。2010年普查证实，2000年的长表6-5的生育率是基本准确的，而修正后的1.8的生育率误差太大。

因此，“六普”长表6-3的1.18的生育率的权威性不能轻易否定（毕竟这是人口普查中唯一有年龄别数据支持的生育率数据）。当然适当修正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远

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② 王广州：《2000~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估计》，王广州新浪博客，2012-06-2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b61160101677b.html。

③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koupucha/2000pucha/pucha.htm>。

离这个数据，说明修正的方法和逻辑可能有问题，要及时回头（对照1.18），不要走得太远。

短表3-1显示0岁人口为1379万，但是1、2、3、4岁人口却分别为1566万、1562万、1525万、1522万，很多人认为是普查年0岁人口存在漏报，生育率远不止1.181、1.27。

但是短表6-4却显示2010年0岁人口为1578万（那么生育率应该为1.45），还略高于1-4岁人口（分别为1561万、1562万、1531万、1490万）。

长表6-3中15~49岁妇女为35725466人，是短表3-1同龄379779700人的9.41%（抽样比）。长表2010年出生1190060人除以9.41%的抽样比，那么短表出生人口应为12650937人（用存活率计算，0岁人口应为1260万）。长表6-3这35个年龄组妇女的抽样比的平均值±标准差=9.45%±0.65%，那么她们所生的35组孩子（合计为1190060人）的抽样误差也不会太大。因此用长表6-3以抽样比推算短表的0岁人口为1260万，虽然不是很精确，但逻辑是合理的，误差不会太大（但是比生育率的误差要大，因为这已经转变为“单波长”了）。

那么，2010年0岁人口到底是1379万、1578万还是1260万？

笔者曾与游允中教授（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副司长，曾指导中国1982年及以后的几次普查）讨论过人口普查，他说最终结果并非“查出来的”，而是根据普查原始结果，用某种逻辑“算出来”的。

表4.3 “六普”短表3-4、6-4和统计年鉴出生比较（万人）

年龄	表3-1	表6-4	统计年鉴	
			年份	出生
0岁	1379	1578		
1岁	1566	1561	2009	1615
2岁	1562	1562	2008	1608
3岁	1525	1531	2007	1594
4岁	1522	1490	2006	1584
5岁	1473	1491	2005	1617
6岁	1480	1368	2004	1593
7岁	1343	1381	2003	1599
8岁	1367	1375	2002	1647
9岁	1425	1429	2001	1702

从短表3-4、6-4看，0岁人口“人工刀斧痕”很大，其他年龄误差并不大。可能是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折衷处理，让低年龄组人口与以前公布的统计年鉴结果接近；只调整短表3-1（以及长表1-4）的0岁人口，使得生育率不远偏离1.18。如果1-4岁也如0岁那样同样大幅调整，那么意味着国家统计局过去几年的人口统计是错误的（前几年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错误就太大了），人口总数就不衔接了。

2005~2010年的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近年2/3的孩子是该年龄生的）与1999~2004年基本一致，而城市化率、中等教育普及率、高等教育入学率、高中及大学毕业生占育龄人口比例比1999~2004年更高，出生人数怎么反而比1999~2004年更多了？有可能是事实（突破政策限制的人越来越多），也可能是国家统计局做了技术处理，让1~4岁人口尽量与近年统计年鉴出生一致，而统计年鉴的出生又是尽量接近小学招生人数。因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六普”和“五普”的实际主持者，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人口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和“六普”的顾问翟振武一直坚持用在校人数来校正出生人口，否定人口普查的生育率。

短表3-1的6岁（2010年入学）人数比7岁（2009年入学）人数多了10.2%；但是2010年入学人数只比2009年多了3.3%。短表6-4的5岁（2011年入学）人数比6岁（2010年入学）人数多了9.0%；但2011年入学人数只比2010年多了2.7%。由此可以窥见“六普”短表的低年龄组可能存在重报。

2002~2011年这十年小学招生人数（1996~2005年出生）平均是“六普”（短表3-1）以年龄别存活率回推6岁人数的1.1949倍（下面将详述）。根据“六普”回推，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6岁人口分别为1521万、1523万、1557万、1557万、1348万；那么以1.1949倍计算，这些年小学招生应该分别为1817万、1819万、1861万、1860万、1611万。如果今后几年的小学招生达不到上述人数，那么说明“六普”短表的0-5岁人数有“额外”（相对于其他年龄组）的重报，据低年龄组人数推算的生育率就偏高。

人口学家将2010年的1.18的生育率修改为1.6，理由是“低龄小孩漏报，育龄妇女重报”^①。但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认为，总漏登率只有0.12%，有些指标（如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按分年龄妇女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漏登率要相对高一些^②。

^① 肖明、袁荃荃：《1.8还是1.181？中国生育率仍一头雾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7月10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2-7-10/wOMDY5XzQ3MDkwOQ.html>。

^②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根据短表3-1，即便总人口的0.12%总漏报（160万）全部是0~9岁（1.464亿）漏报的，意味着这个群体漏报率也只有1.0%，对生育率没有影响；即便这160万全部是0岁漏报的，那么2010年生育率也只有1.4。

以“六普”统计表的数据为依据，总人口133277万（统计表上的133285万人总数是将100岁及以上3.5934万人统计了两次，这种低级错误出现在严肃的人口普查统计是不可原谅的；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认为2000~2005年间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误导性甚大），其中0~14岁人口22132万（0岁为1378.6万），15~49岁人口77383万，50岁及以上人口33762万。

假设真的没有漏报（0.12%可忽略），2010年生育率以1.27为准（短表3-1）。2010年要达到1.6的生育率，15~49岁育龄妇女分母得减少20.625%；意味着光是15~49岁年龄组（男女）就重报了1.5960亿（ $77383 \times 20.625\% = 15960$ 万），假如50岁及以上人口没有重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1.7317亿（ $133277 - 15960 = 117317$ 万）。如果50岁及以上人口也有同样高的重报率的话，那么也重报了6963万（ $33762 \times 20.625\% = 6963$ ），2010年总人口只有11.0353亿（ $133277 - 15960 - 6963 = 110353$ 万）。即便生育率要达到1.5，那么2010年总人口也只有11.62亿。

突破0.12%漏报率的底线，假设2010年0~14岁人口有10%的漏报（就不只是比0.12%“相对高一些”了），总漏报2213万（意味着“六普”总漏报至少为1.6%，而不是0.12%）， $22132 \times 10\% = 2213$ 。如果育龄妇女没有重报的话，那么2010年生育率也只有1.397（ $1.27 \times 1.10 = 1.397$ ）。2010年要达到1.6的生育率，光出生人口分子增加10%还不够，15~49岁育龄妇女分母还得减少12.6875%；意味着光是15~49岁年龄组就重报了9818万（ $77383 \times 12.6875\% = 9818$ ），扣除0~14岁的2213万漏报人口，净重报7605万（ $9818 - 2213 = 7605$ ），假如50岁及以上人口没有重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2.5672亿（ $133277 - 7605 = 125672$ 万）。如果50岁及以上人口也有同样高的重报率的话，那么也重报了4284万（ $33762 \times 12.6875\% = 4284$ ），总净重报11888万（ $9818 + 4284 - 2213 = 11888$ ），2010年总人口只有12.14亿（ $133277 - 11888 = 121389$ 万）。即便生育率要达到1.5，2010年总人口也只有12.79亿。

可见，部分人口学家们采用的是“顾头不顾腩”的伪逻辑：将2010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6，那么总人口就有数亿对不上数，这还叫普查？

《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4（又是一套双波长

数据），比2010年普查的1.18又下降了许多。如此之低的生育率需要高度重视，不能简单地以“漏报”为由一味“修正”。

判断人口问题的感性与理性

很多人认为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低于实际生育率，因为他们从微观角度感觉生育率并不低，来自“超生”家庭的孩子很多，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很多中国运动员就来自超生家庭。

其实，一方面，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大都是1987年前后出生（中国体育代表团平均年龄为24.68岁），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生育率还在2.4左右。也就是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有兄弟姐妹，是很正常的。

另一方面，大众的感性认识有时候并不准确。比如一个人群共100个孩子，有21个来自三孩家庭，32个来自两孩家庭，47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人会觉得生育率很高，因为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不到一半。但是计算一下，会发现这100个孩子是70个妇女生的（7个生三孩，16个生两孩，47个生一孩），外加10个不生育的妇女（目前有1/8的家庭不孕不育），共80个妇女，平均每人只生了1.25个孩子（生育率）。

香港生育率只有1.0，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说由于香港医院出生的孩子有一半是大陆孕妇的，香港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5。但是香港“超生”仍然很严重，比如伏明霞就生了三个。香港相当大比例孩子也来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因为有很多家庭一个都不生。

美国40岁以上妇女有1/5没有生育过孩子，但是美国从1989年以来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1附近，虽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几个的（比如阿肯色州州议员吉姆夫妇婚后生了19个孩子），主流家庭也生育三个孩子。

“六普”显示，2010年全国生育率只有1.181，城市为0.882（北京0.707），镇为1.153，农村为1.438。根据“六普”表6-1，2010年全国出生孩子中，第一孩的占62.2%，第二孩的占31.3%，第三孩的占5.3%，第四孩的占0.97%，第五孩或以上的占0.28%。北京出生孩子中，第一孩的占85.2%，第二孩的占13.6%，第三孩的占1.1%，第四孩的占0.08%，第五孩或以上的占0.02%。就是说，即便生育率只有0.7的北京，出生人口中仍然有相当部分来自多子女家庭（有农民和流动人口，还有杨支柱这样的超生者）。

要达到一些人推测的1.5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20个孩子大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1个生四孩，11个生三孩，25个生两孩，33个生一孩；120个孩子中

4个（3.3%）来自四孩家庭，33个（27.5%）来自三孩家庭，50个（41.7%）来自二孩家庭，33个（27.5%）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010年，城市化已经为49.7%（户籍人口城市化也接近40%）了，农村独生子女比例也不低，新生孩子中只有27.5%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要达到一些人口学家们所认同的1.6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28个孩子大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2个生四孩，13个生三孩，26个生两孩，29个生一孩；128个孩子中8个（6.3%）的来自四孩家庭，39个（30.5%）来自三孩家庭，52个（40.6%）来自二孩家庭，29个（22.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有人说城市生育率低是可信的，但农村生育率仍然很高。其实，农村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比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3个、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个，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妇女（1.76个）^①。

进城的农民工的生存压力、抚养的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户籍人口，生活标准和生育观念也受到了城市的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农村的养育成本也增加非常快，以前可以就地入学，现在由于生源减少，五六所小学撤并为一所，需要坐车或走很远的路上学，有些边远山区的孩子，甚至需要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并且农村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2010年城市化率为49.7%（其中20~39岁育龄人口中城市化率为56.31%）。

需要松散的大人口学

从理论上，废止计划生育不需要生育率水平标准，因为生育权是人类过去从未被剥夺过的基本的权利。但是，几十年来，人口学者一直用虚假的生育率夸张预测人口，制造“人口爆炸”假象。正是由于1980年宋健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中国政府才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会稳定在“最佳”的1.8，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

另一方面，人口学家与“可持续发展”学者一起给决策层和民众灌输了“人口上限”、“最适人口”、“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理论，与“人口爆炸”理论一起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紧急避险的理论陷阱，给大众塞进了一个心魔，地球都快毁灭了，还谈什么人权和价值尊严？让很多人（包括很多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丧失了道德、

^①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国家计生委网站（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2007年3月21日，http://www.chinapop.gov.cn/xxgk/tjgb/200806/t20080626_154455.html。

伦理、人权底线，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那么如果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去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必须用“事实判断”摧毁计划生育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破解民众的心魔，让他们知道是“利害”，不是“两害”，才能重建大众的价值判断，重建生命人伦底线，唤醒民众被计划生育理论所近乎泯灭了的人性。

就连顾宝昌等人口学界的开明派，在2004年联名给中央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中还预测，从2005年开始如果全面放开二胎，那么中国人口会在2044年达到16.07亿的高峰。因此建议采取一个为期15年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可以将人口控制在略低于15亿的水平。

其实，即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达不到16亿。主观上，他们的建议是开明的（尤其考虑到他们要艰难地突破自己头脑中的条条框框）；但客观上仍然属于人口恐吓。根据他们的建议，决策层只能小心翼翼走钢丝才能避免人口触及15亿人口上限，放开二胎需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顾宝昌等人2009年给中央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认为“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率”是1.6，建议二孩晚育软着陆。但是即便在“六普”结束后，他们仍然认为2010年的生育率有1.6，预测放开二胎后人口会达到15亿。那么人口政策还用得着调整？

人口学不是艺术，而是一门为各种政策服务的学科。部分人口学家们不能在射出了“心魔”子弹后，闪身躲进“纯学术”的世外桃源里，说自己是无辜的。神州陆沉，百年丘墟，部分人口学者真的不用“任其责”？

在人口政策调整的关键时刻，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站出来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现在不需要人口学者亮出太多的“武器”，只需要他们穿着“军装”亮相。但是保守派人口学者还在呼吁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开明派也只是呼吁试点、过渡二胎（在面临悬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的时刻，他们还在建议“慢慢游”）。

基层计生干部说将计划生育的责任全部归罪于计生人员不公平，认为人口学家是《伊索寓言》里的号兵（虽然手不染血，但是却鼓动其他人去杀人）。如果人口学家不用虚假数据误导决策，那么也不会出现那么多恶性事件。

当然，将责任全部归罪于人口学家也不公平，是中国的决策体系让人口学者形成了“爬蚤心态”，也让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有隙可乘。但是即便如此，梁中堂、李建新、穆光宗等人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他们也没有受到“政治报复”，可见在中国现有的决策体系下还是有学术空间的），其他一些学者也以各种形

式推动政策调整。

科学研究 (research) 本身就是search+search=research的过程, 是允许犯错误的 (包括笔者的一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错误)。如果学术是多样性的话, 个别学者的错误是很容易被其他学者纠正的, 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学缺乏多样性, 并且又只是一门小学科, 容易圈子化, 很难有争鸣, 在政治的参与下, 很容易“达成一致”、形成“话语权”的垄断。

张敏才 (原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 等人口学者又非常傲慢, 认为“人口学是一门科学, 自有它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架构, 要想自成一家, 有所建树, 冰冻三尺, 绝非一日之寒”, 认为笔者没有资格研究人口问题, “业余速成的往往是劣质产品”^①。看来张敏才真将中国人口学当成科学了!

其实, 人口政策攸关每个家庭的利益, 攸关民族的兴衰,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对人口政策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 因为他们是利益集团。并且人口是“生”出来的, 也会变“老”, 最后会“死”去, 笔者是生物医学出身, 还略懂一点“生”、“老”、“病”、“死”常识, 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也还学过人口统计学。而张敏才等人是既不懂“生” (比如, 由于不知道不孕率在快速增长, 认为“低年龄组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矛盾的”; 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育龄妇女还有多少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 滑稽地认为放开二胎后的头几年生育率会超过4.4^②; 也不知道剖腹产等对今后人口素质和经济的危害), 又不懂“老”、“病”、“死” (不知道今后老年医学将为解决“人口问题”起关键作用), 但却垄断着“生死攸关”的人口政策。

由于打着“人口学”的旗号, 无论是政界、媒体界、学术界, 一提到人口问题, 就说需要征求人口学家们的意见 (等于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拱手让数百位人口学者垄断; 这就导致虽然主流人口学家的能力和学术信用很差, 但影响决策的能力却超强)。其实, 人口学 (Demography) 的英文定义: Demography 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学科性质决定了人口学只是一门视野狭小的“术”的学科, 根本无力承担“策”的重担, 何况中国人口学者连本职的人口统计都做不好。

尤其是, 中国人口学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 一开始就是为计划生育服务的, 全名应该是“人口控制学” (人口学家应该叫做“灭口专家”), 而中国需要

^① 张敏才、邓焱:《以实际行动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兼试对〈大国空巢〉点点评》,《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5期。

^② 张艳玲:《研究机构建议分步放开二胎生育》,财新网,2012年10月27日,http://china.caixin.com/2012-10-27/100452848.html。

的是“人口发展学”。人口学家们被灌输的是“人口控制论”思想，对“人口发展”来说是负起点（比“零起点”的普通老百姓要低得多），他们在学术上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行政上受制于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的会长张维庆、名誉会长彭佩云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是现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因此，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研究结论不敢突破“停止计划生育”的上限，只能在核桃壳里做道场）和鸵鸟心态（认为存在漏报，生育率不会那么低，人口控制还是有必要的）。在人口观念上，全国人民都已经过河了，一些人口学家们却还在摸石头。但是他们内心也是知道“计划生育”不能长期生存的，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

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相对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生育率持续低迷，过度迷信人口学家的建议也是原因之一。

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其影响超过政治和经济制度，需要战略大视野。人口学者对人口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伦理、人权、国防、外交等问题的见解未必比普通老百姓高明（这倒不能怪他们，因为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

要记住这人命关天的惨痛教训，今后的人口学，应该是一门松散的大学科，分属于各种学科（其实绝大多数学科都与人口有关，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综合起来就能获得全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学者也是一种保护，不必为学术的失误承担政治风险），不需要保留或另设“人口学会”。

停止计划生育之后，要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是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201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

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存在的问题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质量比较高。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被认为质量不高。2010年7月19日，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成员梁中堂教授在《瞭望》发文评价2000年的人口普查：“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

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①

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只有12.0亿人，经过复查、补漏变成12.426亿，然后又额外修正1.81%，才变成了公布的12.658亿。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分析，2000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2亿^②。王广州分析了漏报和重报后在《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数量则应该在12.26至12.48亿之间”^③。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结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和教训，实现‘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④。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漏报，2011年人口普查漏登率只有0.12%；但是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但尽管如此，汇总的人口数仍然低于预期。根据广东省《粤人普办字[2010]55号》，连广东这样的人口流入大省的人口也低于预期^⑤。各省市都进行了复查、补查工作。以福建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六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省最后公报人口比普查汇总人口多了10.8%。如果全国都像福建这样，那么普查汇总人数只有12.09亿，是“额外”加了1.3亿才变成人口普查公布的13.397亿人。笔者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中分析认为，“六普”净重报率在3.8%到5.5%之间，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在12.7亿到12.9亿之间^⑥。

甘肃一位基层普查员来信：“‘六普’很特别，一开始，上面就规定了应该普查的人数。由于实际人口达不到应该普查的人数，我们将一些人已经死了多年，但户籍还没有注销的人也纳入了普查范围，这样下来还不够，只好把一些户口迁出的人也纳

① 梁中堂：《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瞭望》，2010年7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7/19/c_12349696_2.htm，2011年9月10日。

②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③ 王广州：《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

④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读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网站（来源：人民网），2011年4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dt/t20110429_402722652.htm，2011年9月10日。

⑤ 关于在人口普查复查阶段做好复查补漏工作的紧急通知，粤人普办字[2010]55号，<http://sg.shunde.gov.cn/data/2011/02/14/1297669805.doc>，2011年9月10日。

⑥ 易富贤：《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FT中文网，2011年5月1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8>，2011年9月10日。

人普查范围，这样才凑够人数，交了差。”

天涯网友留言：“人口普查摸底调查时，县里汇总上来的数字为29万多，报到省里后，受到了通报批评，认为不符合专家推算的参考值。于是把已经死亡和已经迁出但没有销户的人全部纳入统计，再加上外出半年以上的全部统计为常住人口，同时随意编一些死亡和出生人口，这样常住人口增加到了31万多。但仍然达不到参考值，只能在县普查办大量编造普查短表。因为长表不好编，容易看出来。最后常住人口终于增加到了32万多，完成了这次人口普查。”可见，长表的相对可信度比短表要高。

2010年低年龄组到底有多少人

张为民、崔红艳在2002年的文章中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政策水平，甚至连续几年在1.3左右，很难解释，只能判断2000年普查实际登记的0~9岁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他们假定：① 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0%；② 全国上学的年龄统一为6周岁（单看一年当然不合理，但如果看连续几年的累计情况还是大致可行的）；③ 普查试点11月1日与9月1日各年龄人口数的时点差异忽略不计。他们将人口普查各年龄人口数回推到入学年龄人数，与小学入学人数对比，对比发现2000年普查的6~10岁人口漏报了1208万^①。2003年他们以同样的逻辑，用1997~2002年小学入学人数数据，估算普查4~9岁漏报了1996万人，占该年龄普查登记人数的18.94%，如果0~3岁人口也按此比例漏报，则漏报1018万，从而2000年普查0~9岁共漏报了3014万^②。

翟振武说：“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③他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在校生数据与2000年普查10岁以下人口的比值高于1，这是不正常的”，他以小学在校人数为参照论证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④。

张为民、崔红艳、翟振武认为“五普”的低年龄组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1.465，是矛盾的，从而认为0~9岁人口存在漏报。2008年，张为民再次发表文章，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普查的误差主要来自于人口漏报”^⑤。千方百计防止漏报应该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指导思想。

① 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人口总数的初步评价》，《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李虎军：《中国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政策有待调整》，《南方周末》，2005年12月16日。

④ 翟振武、陈卫：《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

⑤ 张为民：《对我国人口统计数据质量的几点认识》，《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政策允许妇女人均生孩子数）是郭志刚等人计算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原始数据，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他们额外乘以1.06之后变成1.465的^①。笔者曾质疑过他们调整的方法^②。另外，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可信的，因为存在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很多允许生二胎的只生一个。比如北京、上海的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0.7。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政策生育率是“无穷大”（还在鼓励生育），但是2010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实际生育率分别只有0.5（户籍人口）、0.895、1.122。因此，张为民、崔红艳、翟振武等人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分析指出，用假定入学率为100%推算出生人口的方法是不正确的^③。小学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100%。“毛入学率”并不是粗略计算的意思，而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在校人数）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由于无法准确知道学生年龄的分布情况，所以在确定教育发展目标时，只能使用“毛入学率”。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小学毛入学率大于100%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比如印尼在1981~2009年平均为118%；印度在2003~2008年平均为113%；柬埔寨在2001~2009年平均为121%；缅甸在2003~2009年平均为113%；1977~2008年巴西、墨西哥分别平均为134%、113%；中上收入国家（2010年总人口为24.5亿）在1999~2009年平均为111%。中国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照道理，小学毛入学率应该更高（比如流动人口希望在家乡也保留学籍）。

笔者在这里按照张为民等人的逻辑重新比较出生人口与小学入学人数的关系。同样假设：① 全国上学的年龄统一为6周岁；② 普查试点时点与小学入学时点各年龄人口数的时点差异忽略不计。只是不假设小学入学率是100%。

采用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为坐标，用线性插值获得1980年到2000年之间各年的年龄别死亡率，据此制作生命表，获得年龄别存活率 $[L(n+1)/L(n)]$ 。2000年到2010年之间各年的年龄别存活率，是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如2010年男性为71.54岁，女性为74.94岁），选取远东地区的中相应的预期寿命的男女生命表，计算年龄别存活率。

①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② 易富贤：《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2月6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易富贤：《再质疑政策生育率》，光明网光明观察，2010年10月9日，http://guancha.gmw.cn/2010-10/09/content_1296031.htm。

③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372页。

将人口普查的各年龄组人数用年龄别存活率回推到入学年龄（6岁）人数，比如，2000年普查时4岁人口减掉2年的死亡应为2002年小学入学人数，6岁人口应为2000年小学入学的人数，7岁人口加上一年的死亡应为1999年小学入学的人数，……依此类推。

张为民、崔红艳也是用生命表留存率计算死亡情况，方法与笔者的是一样的，结果也一致，比如张为民回推2000年普查的4、5、6、7、8、9岁人口到6岁时分别为1519万、1692万、1647万、1793万、1878万、2012万；用笔者的方法，分别是1520万、1692万、1647万、1793万、1878万、2012万。

表4.4 普查登记人数与相应年份入学人数的比较（万人）

年份	入学人数	普查回推到入学年龄人数				入学人数与普查人数之比			
		1982	1990	2000	2010	1982	1990	2000	2010
1980	2942	2410	2369	2330	2358	1.221	1.242	1.262	1.248
1981	2749	2181	2181	2150	2176	1.260	1.261	1.279	1.263
1982	2672	2043	2060	2081	2121	1.308	1.297	1.284	1.260
1983	2544	1939	1948	1818	1860	1.312	1.306	1.400	1.368
1984	2473	1854	1896	1906	1988	1.334	1.304	1.297	1.244
1985	2298	1948	1939	1913	2025	1.180	1.185	1.201	1.135
1986	2258	1805	1929	1857	1926	1.251	1.171	1.216	1.173
1987	2095	1703	1813	1928	1987	1.230	1.155	1.087	1.054
1988	2123	1982	2205	2327	2264	1.071	0.963	0.912	0.938
1989	2152		2021	2019	1973		1.065	1.066	1.091
1990	2064		1906	2043	1994		1.083	1.010	1.035
1991	2073		1996	2053	2015		1.038	1.010	1.029
1992	2183		2136	2329	2288		1.022	0.937	0.954
1993	2354		2420	2639	2592		0.973	0.892	0.908
1994	2537		2402	2466	2466		1.056	1.029	1.029
1995	2532		2306	2521	2674		1.098	1.004	0.947
1996	2525		2252	2627	2820		1.121	0.961	0.896
1997	2462			2012	2166			1.224	1.137
1998	2201			1878	2085			1.172	1.056
1999	2030			1793	2085			1.132	0.973

续表

年份	入学人数	普查回推到入学年龄人数				入学人数与普查人数之比			
		1982	1990	2000	2010	1982	1990	2000	2010
2000	1947			1647	1885			1.182	1.033
2001	1944			1692	1807			1.149	1.076
2002	1953			1520	1593			1.285	1.226
2003	1829			1442	1525			1.269	1.199
2004	1747			1395	1542			1.252	1.133
2005	1672			1139	1395			1.468	1.198
2006	1729			1338	1447			1.293	1.195
2007	1736				1426				1.217
2008	1696				1367				1.240
2009	1638				1343				1.219
2010	1692				1480				1.143
2011	1737				1473				1.179

1980年小学入学者是1974年出生的，入学人数为2942万，是1982年普查回推人数2410万的1.221倍，是1990年普查回推人数2369万的1.242倍。

从上表可见，1980~2010年小学入学人数与普查登记人数的比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1980~1987年是入学人数大幅多于普查回推人数，1988~1996年是二者基本持平，1997~2010年是入学人数再次大幅多于普查回推人数。张为民、崔红艳只比较了1997~2002年，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

比较四次人口普查，可见1980~1987年小学入学人数是普查回推人口的1.2倍左右或以上，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模式还不是很稳定，留级、退学、反复入学等比例还比较高，而当时教育成本还很低，不至于影响地方财政。

1988~1996年，入学人数基本等同于普查回推人数，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留级、退学、反复入学现象减少，教育成本在提高，当时的教育经费（包括教师工资）由乡、村承担，就在村、乡领导的眼皮下，学校想通过多报学生数获得更多拨款是不可能的，当时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拖欠教师工资很普遍，在教育统计上是斤斤计较。而当时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仅仅从1982年的20.6%增加到1996年的29.4%，年均只增加0.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几年入学人数与普查回推人数持平，是一个特例。

1996年之后，小学入学人数再次大幅超过普查回推人数。1997~2006年入学人数

是以2000年普查回推人数的1.243倍。“六普”重点是防漏报，尤其是在防20岁以下年龄组的漏报上花了很多工夫（必然导致重报），但是即便如此，入学人数仍然大幅超过普查回推人数，还是没有“找回”张为民所说的“2000年普查0~9岁共漏报了3014万”。其实，1996年后入学人数超过普查回推人数其实是可信的。

① 尽管1986年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是直到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才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变成一个工程操作^①。1994年7月3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9月1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九十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均提出到2000年全国小学入学率达到99%以上。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自1995年9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各级政府将提高入学率作为政绩考核。到2000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从1994年的86.6%提高到1997年的93.7%、2000年的94.9%、2004年的98.1%。

② 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无力支付农村教育经费，因拖欠工资而引发的教师维权事件在全国很普遍，各地被迫纷纷试点“县财乡发”，由县财政负责教育经费。2001年，国务院更是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而乡镇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②。乡、村领导对入学人数的态度从“防重报”（防止学校冒领教育经费）转变为“防漏报”（以免因为有“辍学”而被上级惩罚）。而县长根本不可能如乡长、村长以前那样获得准确的学生人数。学校有了多报学生数以获取更多教育拨款的制度空间。此外，农村学校非常欢迎进城农民工孩子在家乡保留学籍，因为可以获得额外学杂费；城市学校对农民工孩子也是欢迎的，因为可以收取借读费。有些小学还通过虚报人数以“保校”（防止被撤并）。

③ 根据国际城市化的规律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而1996年恰恰是中国城市化的拐点，此后城市化率加速增加到2000年的36.09%、2010年为49.7%，1997年到2010年年均增加1.5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的增加，

① 翟博、刘华蓉、李曜明、张滢：《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来自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报告》，《中国教育报》，2012年9月9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2-09/09/content_77821.htm。

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国办发〔2002〕28号，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75.htm。

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又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完善，多次入学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存在户籍制度，一些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同时，还在家乡“入学”以保留学籍（便于今后升学）。

因此，1996年之后入学人数超过普查回推人数是非常合理的。2000年普查低年龄组人口数据是可信的（如果不考虑“五普”后面额外“修正”的1.8%的人口，光是从统计表看的话，那么“五普”的质量比“六普”要高）。1997~2006年入学人数是以2000年普查回推人数的1.2425倍；1997~2011年入学（1991~2005年出生）人数共28013万，只是2010年普查回推人数（24621万）的1.1378倍，这可能是因为“六普”因为过度防漏报而出现了重报。

假定1997~2011年各年入学人数是实际人数的1.1901倍（将入学人数是“五普”1997~2006年回推的1.2425和“六普”1997~2011年回推的1.1378平均所得；而2002~2011年入学人数也是“六普”回推的1.194倍），以此推算这些年6岁实际人数共为23538万，再根据年龄别存活率回推2010年5~19岁人数为23489万（其中5~9岁为7139万）。假定2010年0~4岁人数与5~9岁人数是一致的（两个时段对应的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基本一致），为7139万（如果生育率只有1.18，那么0~4岁人口就还没有这么多，而只有6148万），那么2010年0~19岁人口共为30628万（比“六普”的32121万少1493万）。

《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4。那么“六普”的低年龄组是否存在严重的重报？如果小学毛入学率已经恢复到1980~1987年的水平（126%），那么2010年5~19岁人口只有22188万；假设2010年0~4岁人数与5~9岁人数一致，那么2010年0~19岁人口共为28933万（比“六普”少3188万）。

由于对生育率和出生人数的误判，在“六普”之后张为民再次得出这样一个明显不符合逻辑的结论：“预计中国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①当然，如果一直按照目前的思路修改出生人数的话，人口是可以在2032年才“负增长”的，但是今后的普查会发现上亿人口对不上数了，而很多人还指望这“上亿劳动力”养老。

用年龄别存活率估算人口总数

本书用年龄别存活率来验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到底重报了多少人口。研究思路：由于各年龄组每年都有一些死亡，上次人口普查各年龄组人口依照年龄别存活

^①《统计局专家：2032年中国或达人口零增长》，新华网（来源：《新京报》），2011年4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9/c_121360849.htm。

率逐年减少。

本书用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获得的1981年、1989年、2000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制作生命表，计算年龄别存活率。只采纳普查统计表的人口数据，不考虑历次普查的现役军人（1982年为423.8万人，1990年为319.9万人，2000年为249.9万人，2010年为230万人）。

固定用1989年的年龄别存活率逐年计算，1982年普查表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8岁及以上人口）还存活95844万人。而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表的数据，8岁及以上人口共有95484万。可见用这种模拟死亡率的方法计算只误差360万（ $95844-95484=360$ ），误差率只有0.377%。

同样，依照1981年的年龄别存活率逐年计算，1982年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5287万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少197万（ $95287-95484=-197$ ），误差率只有0.206%。

即便依照2000年的年龄别存活率逐年计算，1982年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6427万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多943万（ $96427-95484=943$ ），误差率只有0.988%。

误差的原因还是因为死亡率改变，1982年到1990年间实际平均年龄别存活率要比1989年、2000年的略低一些，比1981年的略高一些。

如果用1981、1989年、2000年年齡別死亡率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获得1982~1990年每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再制作生命表，用获得的每年的存活率计算，那么1982年的1003913156人到1990年的时候还存活95677万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8岁及以上人口多194万（ $95677-95484=194$ ），误差率只有0.203%。

从上可见，用年龄别存活率来推算人口非常准确。由于目前寿命延长已经非常缓慢，即使用8年、18年后的年龄别存活率来估计以前的死亡情况，误差率也非常低。上面分析也说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吻合率非常高，两次人口普查的质量确实是很高的。

201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

既然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存在很大的问题，而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质量是公认很高的，那么我们不妨直接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测2000年、2010年人口情况。分四种死亡率来模拟1990年后人口变化：

① 年龄别存活率逐年改变。以1989年和2000年年齡別死亡率为坐标，用线性插

值获得1989年到2000年之间各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制作生命表，计算每年的存活率。2000年以后各年的年龄别存活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从远东男女生命表计算获得。

② 1990年到2010年之间的年龄别存活率统一用2000年生命表的年龄别存活率计算。

③ 1990年到2010年之间的年龄别存活率统一用1989年生命表的年龄别存活率计算。

④ 1990年到2010年之间的年龄别存活率统一用美国2010年预期寿命（男性为75.8岁，女性为80.8岁）下的年龄别存活率计算（从远东生命表获取相关数据）。说明：中国目前医疗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比美国落后几十年。

1990年人口普查时间是7月1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时间是11月1日，因此计算2000年人口时额外考虑了4个月的死亡情况。本书所说的2000年及以后年份的人口均是指11月1日的人口。

第1种方法是最符合实际的，以该方法的结果为准，其他四种方法的结果只作为上下限参照。

第2种方法计算2010年人口的结果应该接近实际，因为2000年的年龄别存活率应该介于1990年和2010年之间。

第3种方法计算出的存活人口数应该稍低于实际，而第4种方法计算出的存活人口数高于实际，因为中国1990~2000年实际平均年龄别存活率比中国1989年的要高，而比美国2010年的要低。

1990年人口普查表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13051万。

以第1种方法计算，到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还存活106064万人，到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还存活97009万人。

以第2种方法（2000年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到2000年还存活106382万人，到2010年还存活97782万人。

以第3种方法（1989年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到2000年还存活105504万人，到2010年还存活96191万人。

以第4种方法（美国2010年预期寿命）计算，到2000年还存活108231万人，到2010年还存活101194万人。

根据“六普”短表3-1^①，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101156万。

以第1种方法计算，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009万，而“六普”却显示为

^①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267页。

101156万，说明“六普”重报了4.28%（ $101156 \div 97009 = 1.0428$ ）。如果考虑到“六普”普查表之外除军人外还有465万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那么重报率比4.28%更高。“六普”公报的总人口133972万（统计表的人口加上军人等）以4.28%重报率回推，那么2010年总人口应该为128480万（ $133972 \div 1.0428 = 128480$ ），也就是说“六普”净重报了5493万（ $133972 - 128480 = 5496$ ）。

同理，以第2种方法（2000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2010年人口为129503万（说明“六普”净重报3.45%），与第1种方法比较接近。

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认为中国2010年人口为13.41亿^①。联合国、中国官方和学界对中国1990年之前的出生人口分歧不大，因此联合国的20岁及以上人口数据应该是准确的。联合国的资料认为中国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503万，与笔者上面第1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只相差494万（ $97503 - 97009 = 494$ ），误差只有0.51%；与笔者第2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只相差279万（ $97503 - 97782 = -279$ ），误差只有0.29%。三种方法互相吻合，说明笔者估算人口的方法是可靠的。

联合国数据的不准确体现在2010年20岁以下人口。联合国高估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认为1990~1995年生育率为2.01，1995~2000年生育率为1.80，2000~2005年生育率为1.70，2005~2010年生育率为1.64，2010年0~19岁人口为36631万；而“六普”显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0~19岁人口只有32121万。

同样，以第3种方法（1989年年龄别存活率）计算，2010年总人口只有127396万（说明“六普”净重报率为5.16%）。

以第4种方法（美国2010年预期寿命）计算，2010年总人口为134022万。可见，即便中国1990年到201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年龄别存活率跨越几十年，达到美国2010年的水平，2010年中国人口也只有13.4022亿，与“六普”公报所说的13.397亿相当。

如果0~19岁人口采纳上面“2010年低年龄组到底有多少人”中分析的以小学毛入学率119.01%回推的30628万，那么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下，2010年人口分别为127637万（ $97009 + 30628 = 127637$ ）、128410万、126819万、131822万。如果0~19岁人口采纳以小学毛入学率126%回推的28933万，那么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下，2010年人口分别为125942万、126715万、125124万、130127万。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2000年的人口情况。可以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2000年0~9岁人口。1990年的113051万总人口，按照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到2000年（1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还存活106064万、106382万、105504万、108231万。2010年人口普查的17480万10~19岁人口，按照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的重报率和年龄别存活率回推，2000年的0~9岁人口分别为16828万、16999万、16758万、17516万。那么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下，2000年人口分别为122892万（106064+16828=122892）、123381万、122261万、125747万。

如果尊重2000年普查的0~9岁人口（15913万），那么第1、第2、第3、第4种方法下，2000年人口分别为121977万（106064+15913=121977）、122295万、121417万、124144万。

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只应该有（第1种方法），与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的估算（12.2亿人）是一致的。即便中国1990年到2000年的预期寿命达到美国2010年的水平，2000年中国人口也不可能有普查公报所说的12.658亿。2000年人口普查后“补查”出的4000多万人口只有一半是合理的，而额外“修正”进去的1.8%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严格依照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来推测2010年人口，结果又将不同。1991~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采纳2010年人口普查的0~19岁的性别比，1991~2000年各年的生育率采纳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①，2005年的生育率采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2010年的生育率采纳“六普”的结果，中间缺失年份用线性穿插，1991~2010年的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如下：

表4.5 1991~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以女性为100）

年份	生育率	性别比	年份	生育率	性别比	年份	生育率	性别比
1991	1.800	105.9	1998	1.310	116.6	2005	1.333	118.4
1992	1.680	107.3	1999	1.230	117.3	2006	1.303	118.2
1993	1.570	107.5	2000	1.220	118.2	2007	1.272	118.5
1994	1.470	108.9	2001	1.243	118.5	2008	1.242	119.7
1995	1.480	112.1	2002	1.265	118.9	2009	1.211	121.1
1996	1.360	113.9	2003	1.288	118.8	2010	1.181	118.0
1997	1.310	115.5	2004	1.310	118.7			

① 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3月号。

年龄别存活率采纳上面第一种方法，那么2000年总人口只有12.2亿，2010年只有12.5亿（其中0~19岁人口为28094万，那么1991年以来的小学毛入学率为130；这个数据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漏报，但是值得高度重视）。

再比较一下普查人口与户籍人口。1990年人口普查（7月1日）人口为113368万，加上下半年增加的823万，那么年底应该为114191万；而1990年底公安户籍人口为112954万，加上320万军人为113274万。可见，1990年户籍人口比普查人口少917万（因为有人没有户口）。而2000年底户籍人口为123672万，加上250万军人为123922万^①。但是根据上面分析，2000年人口只有12.2亿，比户籍人口还少了1000万。其实这是可以解释的，因为1990年以来人口流动性增大、人户分离现象突出，而中国的很多利益都与户口相关，人们有获取户口的强大动力，虽然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户口，但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取两个或多个户口的人数也在加速增加，这就导致户籍人口超过了普查人口。

笔者没有获得2010年户籍人数，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声明“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有1370万人没有户籍”^②，猜测2010年户籍人口应该在13.26亿左右。

2000年之后，城市化在加速，流动人口更多，那么户籍人数与实际人数的差距应该在200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如果能够获得户籍分年龄、性别人口，笔者可以与历次人口普查比较，分析出户籍人口比实际人口多出的大概数量。

笔者曾与一些公安系统的朋友讨论过，他们认为“六普”前户籍管理确实有一些漏洞，存在“多户口”现象（比如为了高考、为了各种城乡福利）。“六普”结束后，规范了户籍管理，“多户口”现象大为减少。

共有三套全国人口数据：人口普查、公安户籍资料、教育在校学生数。其中最准确的应该是人口普查。在校学生数通常应该多于实际数据。而当流动人口少的时候，公安户籍人数应该比实际人数少（因为毕竟还有人没有户口）；而当流动人口多的时候，户籍人数可能会比实际人数多（尤其是在“六普”之前）。原则上，只能用人口普查数据来校正其他数据，而不能用其他数据来否定人口普查数据。

“六普”数据失真，是与其千方百计防漏报的制度设计有关，“专家推算的参考价值”在逻辑上有问题，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降低了普查质量。人口普查的不准确，将误导很多决策（比如包括社保在内的各类保险业、宏观经济）。

结论：2000年人口应该只有约12.2亿，而不是普查表上的12.426亿和普查公报的

① 崔红艳、张为民：《对2000年人口普查准确性的估计》，《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统计局专家：2032年中国或达人口零增长》，新华网（来源：新京报），2011年4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9/c_121360849.htm。

12.658亿。2010年人口应该只有约12.8亿，而不是普查公报的13.3972亿。

尊重人口普查

有人会问，你既然在低年龄组生育率上要尊重“六普”的权威性，怎么在人口总数上又否定“六普”的权威性？

其实这并不矛盾，承认“六普”关于生育率的权威性，是因为迄今没有比人口普查更权威的数据了（有待今后有更准确的普查来校正“六普”的低年龄组人口），比如“六普”中2010年1.181的生育率有详细的年龄别数据支撑，是出生人口与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的比例关系，很难有太大的误差。历史地看，“六普”也印证了“五普”的生育率是基本可靠的。“六普”最大的价值是基本查清了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平息了20年来对生育率的争论，根据“六普”的生育率资料足以停止计划生育。

但是如果完全承认“六普”20岁以上人口数据，等于否定了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但是这两次普查是很难否定的。流动人口越少，人口普查质量越高。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流动人口比较少，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普查是中国人口普查的绝唱，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普查，今后很难获得更准确的普查结果了。应该承认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性，今后数十年都应该以这两次普查为坐标。

人口普查也不可能获得非常完美的数据，学者进行适当的修正是必要的（王广州、郭志刚、陈友华等人做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但问题是，几十年来，很多人口学家一直在漂亮的“战术”游戏（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中“搅浑水”，耽误了“战略”。将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将1.18的生育率修改为1.6，这难道还是学术问题？

既然作为整体，中国人口学没有“去伪存真”的信用，只有“去真存伪”的记录，那么这次人口政策调整就更加需要充分尊重人口普查结果（总比人口学家修正后的数据更准确），毕竟“六普”数据主体仍然是客观调查数据。但是今后人口普查应该吸取教训。

在以下章节中，笔者仍然是采纳“六普”的数据。

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

生育率是影响今后人口的最大变量。中国国家计生委、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

主流人口学家对人口的预测每次都破产，是因为不但高估了现有人口，也高估了未来生育率。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从来没有准确过，是因为每次都错估（笔者怀疑是有意误导）了生育率。

其实，生育率的走势有高度规律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可以用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判断中国现在和今后的生育率。

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的关系

HDI是联合国使用的一项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包括人均购买力、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时间。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分析发现HDI越高，生育率越低，二者高度负相关^①。2010年，联合国开始修改了HDI的标准，HDI与生育率的相关度有所降低，但2010年二者的相关度仍然有-0.8427。由于2010年以前的HDI与生育率的相关度更高，尤其是印度各邦、中国各省的HDI仍然是用2010年以前的标准，因此本书仍然采纳2010年以前的HDI来诊断生育率。比较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中的各国历年HDI^②，以及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各国历年总和生育率（TFR）^③，发现1980年、2007年的HDI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855、-0.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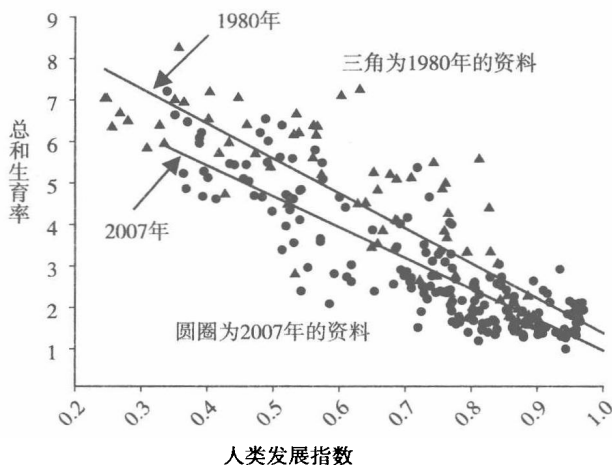


图4.1 1980年、2007年的HDI与生育率相关图

①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

②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9_EN_Complete.pdf.

③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可见，从1980年到2007年，全球HDI在上升，而TFR在下降，TFR下降程度超过HDI上升程度。同等HDI下，2007年的TFR要比1980年低。

虽然总体来说随着HDI的提高，生育率不断下降，但在同等HDI水平的国家中，东亚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低（在一个国家内部，包括华人在内的东亚裔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古巴）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要低（避孕条件更好，电视、电脑等普及率更高）；穆斯林地区和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生育率高于其他地区；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的地区，后面即便停止家庭计划并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然比同等HDI水平的其他地区要低。

2010年，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两国的生育率分别为1.58、1.67^①。

中国大陆2010年的HDI相当于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和中国台湾90年代初期水平，这些地区当年生育率都只有1.7左右。

印度2007年的HDI为0.612（相当于中国1991年的水平）。表4.6的HDI采用印度妇女儿童发展部2006年的资料^②，生育率采用印度内政部2010年的资料^③。

表4.6 印度各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总和生育率（TFR）

邦	中文名	HDI	TFR
	全国	0.605	2.5
Kerala	喀拉拉	0.836	1.8
Maharashtra	马哈拉施特拉	0.699	1.9
Tamil Nadu	泰米尔纳德	0.682	1.7
Delhi	德里	0.675	1.9
West Bengal	西孟加拉	0.668	1.8
Punjab	旁遮普	0.665	1.8
Himachal Pradesh	喜马偕尔	0.634	1.8
Karnataka	卡纳塔克	0.632	2.0
Haryana	哈里亚纳	0.604	2.3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World Bank, September 28, 2012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Gendering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Recasting the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 and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of India. 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2009, p11, <http://wcd.nic.in/publication/gdigemSummary%20Report/GDIGEMSummary.pdf>, 2011/9/10.

③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estimates of fertility indicators”，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 statistical report 2010,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pp.48, http://www.censusindia.gov.in/vital_statistics/srs/Chap_3_-_2010.pdf.

续表

邦	中文名	HDI	TFR
Jammu & Kashmir	查谟-克什米尔	0.601	2.0
Gujarat	古吉拉特	0.599	2.5
Jharkhand	贾坎德	0.594	3.0
Andhra Pradesh	安得拉	0.588	1.8
Bihar	比哈尔	0.542	3.7
Rajasthan	拉贾斯坦	0.527	3.1
Chhattisgarh	恰蒂斯加尔	0.523	2.8
Assam	阿萨姆	0.495	2.5
Uttar Pradesh	北方	0.490	3.5
Orissa	奥里萨	0.474	2.3
Madhya Pradesh	中央	0.461	3.2

印度的生育率还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比如2001年印度教徒的生育率为3.1，而穆斯林的生育率却为4.1^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2010》列出了中国各省市的HDI。

表4.7 2008年中国各省市HDI^②

排名	省市	HDI	排名	省市	HDI	排名	省市	HDI
	全国	0.793	11	黑龙江	0.808	22	陕西	0.773
1	上海	0.908	12	福建	0.807	23	宁夏	0.766
2	北京	0.891	13	内蒙古	0.803	24	四川	0.763
3	天津	0.875	14	山西	0.80	25	江西	0.760
4	广东	0.844	15	河南	0.787	26	安徽	0.75
5	浙江	0.841	16	湖北	0.784	27	青海	0.72
6	江苏	0.837	17	海南	0.784	28	云南	0.71
7	辽宁	0.835	18	重庆	0.783	29	甘肃	0.705
8	山东	0.828	19	湖南	0.781	30	贵州	0.690

^① Irudaya Rajan S, "District Level Fertility Estimates for Hindus and Muslim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0, no.5 (January, 2005): pp.437-446.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2010》，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04页，<http://www.undp.org.cn/pubs/nhdr/nhdr2010cn.pdf>。

续表

排名	省市	HDI	排名	省市	HDI	排名	省市	HDI
9	吉林	0.815	20	广西	0.776	31	西藏	0.630
10	河北	0.810	21	新疆	0.774			

印度HDI在0.635以上的邦的生育率全部低于2.0。而中国即便西藏的HDI也有0.63。而中国HDI倒数第二的贵州的HDI相当于印度排名第三的泰米尔纳德邦（生育率1.7）。而且中印比较还需要考虑生育文化的差异。比如新加坡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在1990年分别为1.65、1.89，在2000年分别为1.43、1.59，在2010年则分别为1.02、1.13^①。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在1987年分别为2.25、2.77^②，在2010年则分别为1.8、2.0^③。也就是说，在同样的HDI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将低于印度。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不考虑补偿性生育的话，连贵州的生育率都达不到1.9，全国生育率最多能达到1.7。

生育率下滑是“势能”，是免费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HDI与生育率是负相关关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实行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举手之劳就可将生育率提前推下悬崖。

而鼓励生育却需要昂贵的“动能”，是高成本（物质成本和文化成本）的。从国家角度看，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鼓励生育的“马力”足，因此生育率上升更快，这个时候HDI又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关系^④。从个体看，穷人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压力很大，结不起婚，离婚率可能会更高（贫贱夫妻百事哀），生育率将更低；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富人，养育能力高，婚姻稳定，生育率会更高。也就是说，传统的“越穷越生”将转变为“越富越生”，穷人的生育权的保障将是今后政治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后需要比较各种反映社会生活的指标（如人均住房面积、通勤时间、城市容积率、基尼系数、离婚率、结婚率、育龄人群性别比、收入水平、房价收入比、教育负担、就业压力等等），综合成一个与生育率正相关的“人口发展指数”，并以此指导

① “Population Trends 2011”,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pp.15,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demo.html>.

② Saw SH, “Ethnic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 Biosoc Sci, Vol.22, No.1 (Jan 1990), pp.101-12.

③ Madam Zarinah Mahari,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Malaysia: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15th Conference of Commonwealth Statisticians, New Delhi, India, 7-10 February 2011, http://www.cwsc2011.gov.in/papers/demographic_transitions/Paper_1.pdf.

④ Mikko Myrskylä, Hans-Peter Kohler & Francesco C. Billari, “Advances in development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s”, Nature, vol.460, no.7256 (Aug 2009), pp.741-3.

各地的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等。

妇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5~2009年各国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青年（15~24岁）妇女识字率资料^①，比较其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与生育率相关系数高达-0.848，青年妇女识字率与生育率相关系数也高达-0.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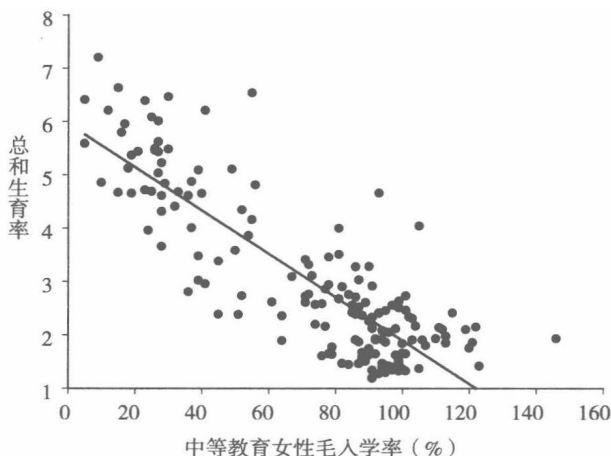


图4.2 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图

欧洲在1970年之前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大多低于80%^②，此后快速上升，生育率也快速下降。

表4.8 欧洲各国历年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GER；%）和总和生育率（TFR）^③

年份	1971		1975		1980		1985	
	GER	TFR	GER	TFR	GER	TFR	GER	TFR
西班牙	50.9	2.86	65.9	2.79	86.9	2.22	93.3	1.63
英国	74.9	2.41	82.2	1.81	83.0	1.89	85.0	1.80
希腊	55.1	2.30	66.0	2.37	74.3	2.23	88.1	1.68

①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UNICEF, November 2009, pp. 24-27. http://www.unicef.org/rightsite/sowc/pdfs/statistics/SOWC_Spec_Ed_CRC_Statistical_Tables_EN_111809.pdf.

② Ole Briseid, Françoise Caillods, "Trend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they relevant for African countries?"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November, 2004, pp.49,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90/139018e.pdf>.

③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续表

年份	1971		1975		1980		1985	
	GER	TFR	GER	TFR	GER	TFR	GER	TFR
匈牙利	70.9	1.92	71.5	2.35	82.5	1.91	86.0	1.83
意大利	55.7	2.41	63.7	2.21	70.6	1.64	72.4	1.39
比利时	80.6	2.21	82.4	1.74	90.8	1.67	98.2	1.49

2009年，中国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为81%（城市已经与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与伊朗相当，高于泰国（79%）。

2009年，中国青年妇女识字率为99.3%（15岁及以上总人口识字率也高达93%），与发达国家一致。2005~2010年，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为1.66，那么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只能达到这个水平。

人均GDP与生育率的关系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①，以现值美元（current US\$）为标准，各国2005~2009年平均的人均GDP的log值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747，人均购买力平价（PPP）的log值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更是高达-0.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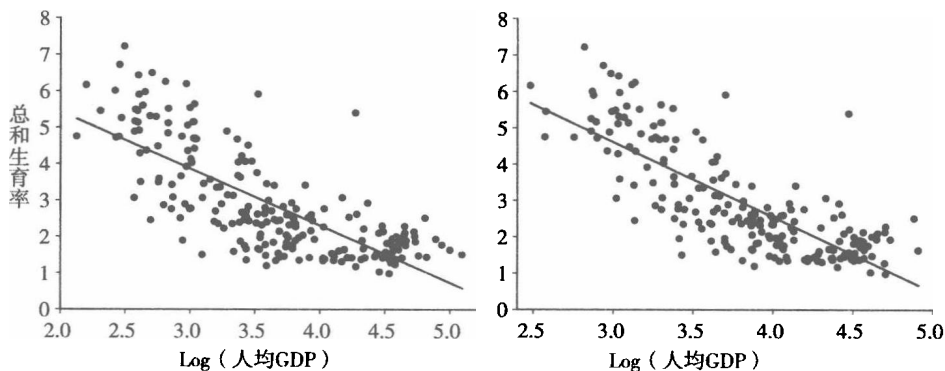


图4.3 人均GDP、人均购买力平价（PPP）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图

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基准^②，中国大陆2008年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台湾1985年（生育率1.89）、韩国1987年（生育率1.55）、泰国2002年（生育率1.68）、伊朗2007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年（生育率1.76）。可见，先行国家和地区在达到中国2008年的人均GDP的时候，平均生育率大概只有1.7左右。

有人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促进了HDI的增加和人均GDP的提高，这也是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初衷。但事实并非如此。2007年中国的HDI是1975年的1.457倍，印度是1975年的1.461倍。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来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① 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② 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③ 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④ 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种方案比第1种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种方案比第1种方案人均GDP只少2.86%（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2.86%的收入，因为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这多出的40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却多生41%孩子（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种方案比第1种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这还只是从5年的角度看，从更远的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可见指望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是行不通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对“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根本没有理论依据。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①。

性别不平等指数与生育率的关系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1》有一项指标叫做“性别不平等指数”^②，指数越

① Jean Dreze, Amartya Sen, "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2-142.

②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39-142, http://www.gm.undp.org/HDR_2011_EN_Complete.pdf.

低，妇女地位越高。性别不平等指数与生育率的相关系数为0.7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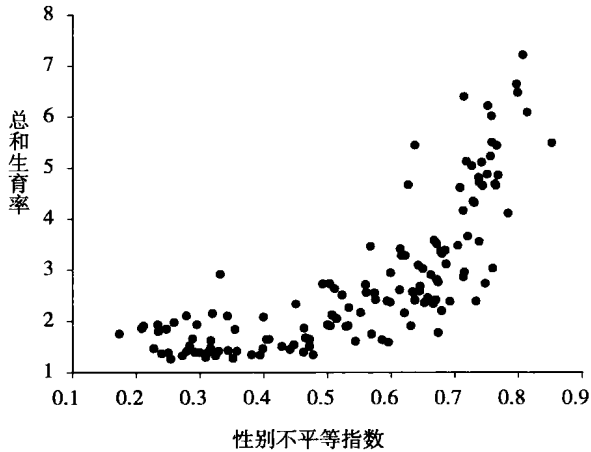


图4.4 性别不平等指数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图

与中国HDI相近的其他国家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普遍在0.45左右，但中国只有0.209，与英国相当，低于美国的0.299、泰国的0.382、伊朗的0.485、印度的0.617。

避孕率与生育率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0》各国15~49岁育龄妇女避孕率资料，比较其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二者相关系数高达-0.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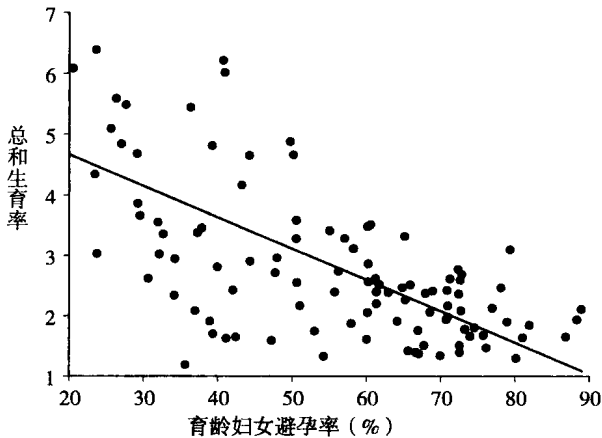


图4.5 育龄妇女避孕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图

上面已经提到，在同等的人类发展指数、同等的女性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情况下，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要低。这可以从妇女避孕率角度进行解释。伊朗曾经实行家庭计划，进行避孕宣传和教育，大幅地提高了避孕率。伊朗现在废止了家庭计划，并且在鼓励生育，但是避孕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避孕率一旦上升将很难逆转，现在伊朗的妇女避孕率还高达73.3%，而中东地区同等发达水平的约旦的避孕率只有57.1%（2010年生育率还为3.8）。泰国生育率过低，也是因为其避孕率高达81.1%。韩国生育率超低，原因之一是韩国曾实行家庭计划，现在尽管在鼓励生育，但妇女避孕率仍为80.2%。

避孕率代表的不仅仅是避孕本身，更代表大众的生育观念和生育心理。中国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30多年，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妇女避孕率高达86.9%（美国为72.8%，法国为71%），世界第三。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避孕率也很难大幅下降。从避孕率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生育率很难反弹，今后中国生育率将比日本和韩国还要低。

城市化水平与生育率的关系

总体来看，城市化率越高，生育率越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生育率下降很难逆转。朝鲜的HDI和人均GDP都不高，但生育率在2000年之后就低于2.1了，重要原因是因为朝鲜的城市化水平高，2010年为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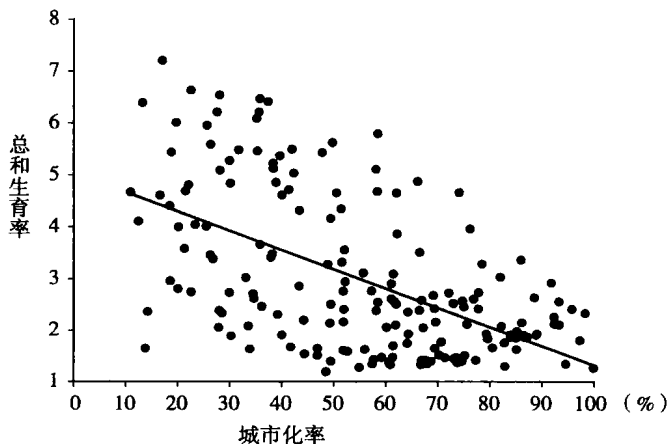


图4.6 城市化率与总和生育率相关图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0》各国城市化率，比较其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

二者相关系数为-0.565，相关性不算太强，这是因为各国的城市规划不同。有些城市是可以“生产”人口的，有些城市（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城市）则不然。中国城市规划是沿着日、韩、台的老路，意味着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很难反弹，今后还将继续下滑。

综上所述，各项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不约而同地提示，停止计划生育，不考虑补偿性生育高峰的话，2010年生育率只能达到1.7左右，然后会继续下降。

计划生育到底少生、“超生”了多少人

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和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断降低。HDI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867，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与生育率相关系数高达-0.848，是用来“诊断”生育率的两个最佳指。当HDI低于0.5的时候，生育率都维持在6.0左右的高水平；当HDI高于0.5的时候，生育率会自发下降。中国的HDI在1975年就已经为0.53了，意味着即便20世纪70年代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

世界银行将世界分为低、中、高收入三种国家，2010年人口分别为7.96亿人、49.17亿人、11.27亿人，其中“中收入”国家又细分为“低中收入”（24.52亿人）、“高中收入”国家（24.65亿人）。中国属于“高中收入”国家，印度属于“低中收入”国家。各国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资料采纳《世界发展指标2011》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①。意大利、印度、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都随着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的提高而不断降低（各国左侧起点是1970年，右侧终点是2009年）。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Public Reports: Table 25: Historical data - secondary education”, UNESCO, <http://stats.uis.unesco.org/unesco/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3676>. “Basic education and literacy”, UNESCO, 1990, pp.15,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pdf/27_44.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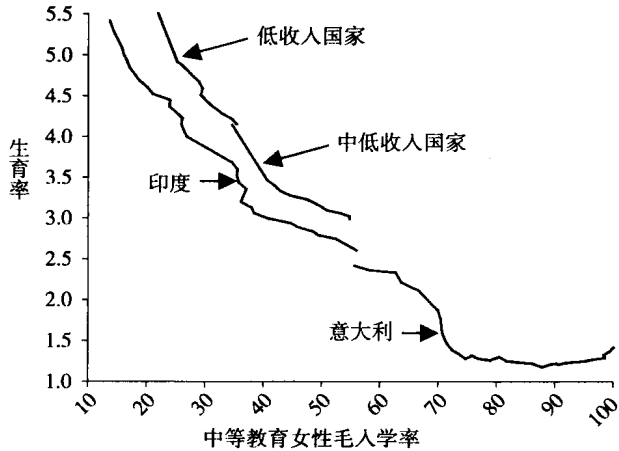


图4.7 1970~2009年各国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和生育率的相关图

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计生委认为是计划生育的功劳。其实更大程度是因为基础教育在1968年开始跨越性提高，当时不但基本普及了初中，而且高中也相当普及，并且还有各种扫盲、补习班。

表4.9 中国历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在校人数统计^①

年份	招生人数 (万人)				在校人数 (万人)			
	中专/职中	高中	初中	小学	中专/职中	高中	初中	小学
1966	5	21	273	1879	47	137	1113	10342
1967	1	14	198	1403	31	127	1097	10244
1968	2	63	649	1753	13	141	1252	10036
1969	1	104	1023	2206	4	189	1832	10067
1970	5	239	1176	2832	6	350	2292	10528
1971	21	321	1235	3388	22	559	2569	11211
1972	27	479	1247	3604	34	858	2724	12549
1973	29	452	1139	3369	48	923	2523	13570
1974	33	541	1345	3250	63	1003	2648	14481
1975	34	633	1811	3352	71	1164	3302	15094
1976	35	861	2344	3161	69	1484	4353	15006
1977	37	993	2368	3112	69	1800	4980	14618

^①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续表

年份	招生人数(万人)				在校人数(万人)			
	中专/职中	高中	初中	小学	中专/职中	高中	初中	小学
1978	45	693	2006	3315	89	1553	4995	14624
1979	49	614	1728	3102	120	1292	4613	14663
1980	78	383	1551	2942	170	970	4538	14627
1983	124	260	1317	2544	236	629	3769	13578
1985	183	258	1349	2298	387	741	3965	13370
1990	196	250	1370	2064	519	717	3869	12241
1995	328	274	1752	2532	821	713	4658	13195
2000	315	473	2263	1947	993	1201	6168	13013
2004	433	822	2078	1747	1124	2220	6475	11246

韩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从6.0的高水平上快速下降，与毛入学率的上升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基础教育其实与韩国相差不大。中国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从1970年的23.5%快速上升到1973年的43.5%、1978年的55.7%，生育率也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3年的4.5。1973年底开始的“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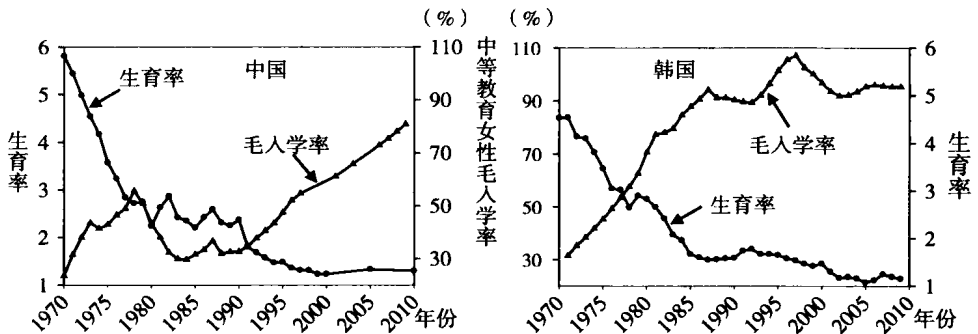


图4.8 中国、韩国历年生育率和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

1980年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且政策强度很大，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育率尚能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原因之一是教育大滑坡。中国初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分别从1975年的60.4%、90.6%下降到1982年的32.3%、66.2%。1990年之后，中国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再次快速攀升，生育率也快速下降。

中国计划生育共少生了多少人

国家计生委认为，由于计划生育，到1998年底，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①。2006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少生4亿多人，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②。

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指标，并结合文化和制度背景，分析认为197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到2005年其实只减少了2.3亿多人口，其中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只减少了1.3亿人口，所谓“计划生育少生4亿多人”是错误的^③。

但201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仍然宣传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少生4亿人，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5年到来^④。2011年10月30日，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目前的人口规模可能会超过17亿。”^⑤

笔者在这里以印度、世界（除中国外）、泰国为坐标，以HDI和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为指标，再粗估一下中国计划生育到底少生了多少人。

表4.10除了印度2010年的人口是采纳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外^⑥，其他均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⑦。

表4.10 以各国1970~2010年人口增速推算中国2010年人口

国家	年份	人口(亿)		比例	中国人口(亿)
		1970	2010	2010/1970	2010
中国		8.146			
印度		5.539	12.07	2.179	17.75
世界(除中国外)		28.816	55.55	1.928	15.70
泰国		0.369	0.69	1.872	15.25

① 张维庆：《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关于人口热点问题的问与答》，《求是》，2006年第9期。

②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政府网，2007年1月11日，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677.htm。

③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73~103页。

④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世界70亿人口日”迟来五年》，新华网（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0/27/c_111126444.htm。

⑤ 《面对70亿人的世界——专访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新华网，2011年10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30/c_111134137.htm。

⑥ C.Chandramouli, “Provisional Population Totals Paper 1 : Census 2011”, 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Registrar General & Census Commissioner, http://www.censusindia.gov.in/2011-prov-results/data_files/india/paper_contentsetc.pdf。

⑦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中国人口在1950~1970年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人口比例稳定在22%，如果1970~2010年仍然与世界同步增长，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应为15.70亿人。泰国2010年人口是1970年的1.872倍，如果同期中国人口同速增长，那么2010年应为15.25亿人。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11年3月1日，印度人口为12.102亿，那么2010年底人口应该为12.069亿人，是1970年的2.179倍。如果中国人口同期也增长2.179倍的话，那么2010年人口应为17.75亿。可见，国家计生委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少生4亿多人”其实是假定中国人口增速与印度一样。

表4.11 各国历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①

国家 \ 年份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7
中国	0.53	0.533	0.556	0.608	0.657	0.719	0.756	0.772
印度	0.419	0.427	0.453	0.489	0.511	0.556	0.596	0.612
泰国	0.615	0.658	0.684	0.706	0.727	0.753	0.777	0.783
韩国	0.713	0.722	0.760	0.802	0.837	0.869	0.927	0.937
世界								0.753

印度的HDI一直远远低于中国，2007年印度的HDI相当于中国1991年的水平。中国HDI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世界平均HDI为0.753，中国为0.772，在所列182个国家中排92位，前面91个国家人口为21.1亿人，排在中国后面的90个国家人口为31.4亿人。《人类发展报告2011》采用新的HDI标准，世界平均为0.682，中国为0.687，在所列187个国家中排101位，前面100个国家人口21.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86个国家人口33.8亿人，也就是说除中国外全球39%人口的HDI比中国高，61%人口比中国低。即便在1975年，虽然中国HDI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是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拉高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除中国以外的全球31.6亿人口中，仍然有50%以上人口的HDI比中国低。也就是说，1970年以来的过去40年间，中国的HDI一直高于世界大多数人口。

①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235-236.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72008_EN_Complete.pd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167-170.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9_EN_Complete.pdf.

表4.12 各国历年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 (%)

年份	国家	中国	印度	泰国	世界	年份	国家	中国	印度	泰国	世界
1971		31.4	13.8	14.6		1990		32.6		29.9	
1973		43.5	14.8	17.0		1991		34.7		30.6	45.2
1976		46.4	16.2	22.0		1992		37.6		33.9	
1977		49.0	16.8	24.0		1993		40.5	34.8	38.2	
1978		55.7	17.2	24.6		1994		43.4	35.7		
1980		43.3	18.9		39.0	1995		47.5	35.6		
1981		38.1	20.3			1996		52.0	35.9		
1982		32.3	21.1			1997		54.7	37.2		
1983		29.8	24.2			2001		61.1	38.5	62.4	58.3
1984		29.6	24.0			2003		65.9	44.8	64.6	61.2
1986		33.3	26.3			2006		72.9	49.5	73.1	63.6
1987		36.7	26.1		43.0	2007		75.4	52.5	78.1	65.1
1988		31.9	26.5			2008		78.1	56.0	77.4	66.4
1989		32.5	27.0			2009		80.9		78.9	66.8

从1970年到2010年这40年间，中国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一直远远高于印度；只在1981~1995年这15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25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即便在1981~1995年，由于发达国家毛入学率超过90%（而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到30%），大大拉高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然比世界多数人口的毛入学率要高。1982年，中国青年妇女的识字率就高达82%（1990年为91%，2000年达到99%），而1990年世界平均只有78.6%（2000年为83.8%，2009年为86.8%），印度在1981年、1991年、2006年分别只有40%、49%、74%。事实上，1950~1970年，中国人口增速就已经低于“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1970年中国人口是1950年的1.47倍，而“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1950年的1.6倍。

可见，无论是从HDI还是从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判断，如果当年不实行计划生育，1970~2010年中国生育率下降应该低于世界平均生育率，但是中国的寿命比世界平均要长。综合评估，1970~2010年中国人口增速应该会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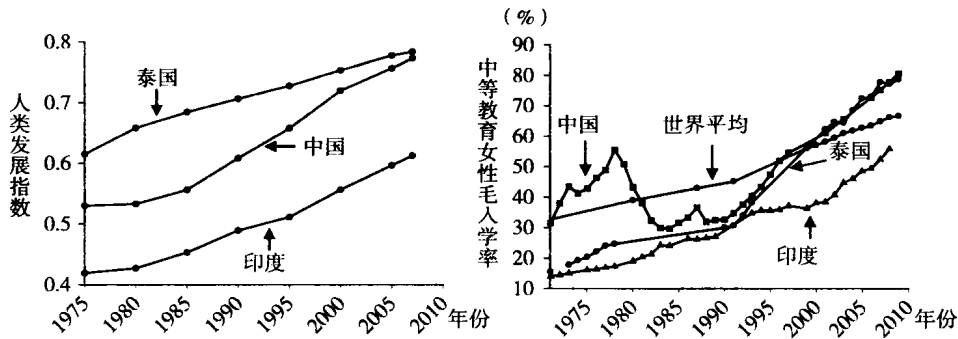


图4.9 中国、印度、泰国历年人类发展指数、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

泰国与中国的比较应该分为两个阶段。1970~1982年，泰国的HDI和人均GDP高于中国，但是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却远远低于中国，这段时间泰国的生育率应该高于中国。1983~2010年，泰国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略低于中国，而HDI和人均GDP仍然高于中国，但差距都在不断缩小（2000年后，泰国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接近中国，而高等教育入学率一直高于中国；2007年后，HDI低于中国；2011年，人均GDP也低于中国），这段时间泰国的生育率应该低于中国。作为整体，1970~2010年中国人口增速应该与泰国差不多（或者略高一点）。

当然，泰国也是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的软性影响，否则生育率不会下降得这么快。但是中国即便从没有实行过硬性的计划生育，也很难排除受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软性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不实行计划生育，2010年人口应该能达到15.25亿（泰国速度），不会达到15.7亿（世界速度），更不会达到17.75亿（印度速度）。

2010年人口以“六普”的13.397亿计算，1970年到2010年的计划生育共少生了1.85亿人（ $15.25 - 13.397 = 1.853$ ）；2010年人口以上面分析的12.8亿计算，1970年到2010年的计划生育共少生了2.45亿人。

假如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会有多少人

那么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少生了多少人口？根据上面各项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生育率应该在1.7。中国1980年的HDI相当于印度1997年的水平（印度生育率为3.3），但教育水平高于印度1997年的水平。印度2008年的生育率为2.6（2010年为2.5），该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1年的水平。

我们假设中国1980年的生育率为3.1，然后逐渐下降到2010年的1.7，那么1980年之后的生育率如下：

表4.13 1981~2010年中国、泰国的生育率

年份	国家	中国	泰国	年份	国家	中国	泰国	年份	国家	中国	泰国
1981		3.053	3.202	1991		2.587	2.054	2001		2.120	1.695
1982		3.007	3.024	1992		2.540	2.001	2002		2.073	1.683
1983		2.960	2.859	1993		2.493	1.952	2003		2.027	1.673
1984		2.913	2.707	1994		2.447	1.906	2004		1.980	1.663
1985		2.867	2.571	1995		2.400	1.862	2005		1.933	1.654
1986		2.820	2.451	1996		2.353	1.821	2006		1.887	1.642
1987		2.773	2.346	1997		2.307	1.785	2007		1.840	1.629
1988		2.727	2.256	1998		2.260	1.755	2008		1.793	1.614
1989		2.680	2.179	1999		2.213	1.73	2009		1.747	1.598
1990		2.633	2.113	2000		2.167	1.71	2010		1.700	1.598

可见，笔者这种估算出的中国的生育率比泰国实际生育率略高（从HDI、教育、人均GDP综合评价，1980~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应该略高于泰国）。201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中方案（需要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才能实现）下中国的生育率^①。

表4.14 联合国中方案下2010~2100年中国的生育率

年份	生育率	年份	生育率	年份	生育率
2010~2015	1.56	2040~2045	1.73	2070~2075	1.93
2015~2020	1.51	2045~2050	1.77	2075~2080	1.95
2020~2025	1.53	2050~2055	1.81	2080~2085	1.97
2025~2030	1.58	2055~2060	1.84	2085~2090	1.98
2030~2035	1.63	2060~2065	1.88	2090~2095	2.00
2035~2040	1.68	2065~2070	1.90	2095~2100	2.01

除了上述生育率外，还采用以下参数：

① 1980年的各年龄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不含军人；军人数量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少，尤其女兵比例低，不影响预测）依照年龄别存活率回推两年。由于1982年人口普查是7月1日，因此本预测的时间点也是每年的7月1日。

② 出生性别比固定为106。

③ 年龄别存活率：1980~2000年的男女年龄别死亡率以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每年为1组）为坐标，中间年份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获得，制作生命表，计算存活率。2000年以后的则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比如2010年男女预期寿命为71.5、74.9岁，2100年则分别为82.6、86.5岁），选取联合国远东地区的男女生命表，计算年龄别存活率。

④ 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标准化的年龄别生育率是指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0的情况下的年龄别生育率，比如2000年普查的25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为129.0‰，总和生育率是1.22，那么25岁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为105.7‰（ $129 \div 1.22 = 105.7$ ）。以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别生育率为坐标（15~49岁育龄妇女，每年为1组），中间年份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获得。2010年以后则采纳联合国对中国的预测数据（15~49岁妇女，5年一个年龄组）。在预测的时候，用总和生育率乘以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就得出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

首先验证笔者方法的可靠性。在已知现有年龄结构后，人口预测需要知道几个关键参数：年龄别存活率（相应的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出生性别比，预测方法万变不离其宗。先采纳联合国方案的2010年中国人口结构以及低方案下的今后历年出生性别比、年龄别生育率、预期寿命，再用笔者的方法预测今后的人口。联合国中方案认为2050年、2100年中国总人口分别为12.96亿、9.41亿，笔者方法的结果分别为13.09亿、9.72亿，分别误差1.0%、3.3%。联合国低方案认为2050年、2100年中国总人口分别为11.30亿、5.06亿，笔者方法的结果分别为11.41亿、5.28亿，分别误差0.9%、4.3%。误差的原因可能是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结构是5岁一组（如0~4岁、5~9岁），预测参数（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年龄别生育率、预期寿命）等都是5年一总结（如2010~2015年、2015~2020年）；笔者将2010年人口结构分拆成1岁一组（如0岁、1岁、2岁、3岁、4岁），将预测参数分拆成1年一组（如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时候，出现了误差。但是这种误差在战略角度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现在人口预测从战术方法上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误差只是“两”），难点在于在战略角度对参数的准确把握（误差为“斤”）。

依照上面的参数，预测的中国人口结果如下：

表4.15 1980~2100年中国人口结构

年份	人口 (亿)	占世界 (%)	中位年龄 (岁)	年龄比例 (%)			抚养比 (%)		
				0~14岁	15~64岁	65+岁	儿童	老年	总
1980	9.77	22.0	21.4	35.8	59.6	4.6	60.0	7.7	67.7
1990	11.69	21.9	23.6	29.6	64.8	5.7	45.7	8.8	54.4
2000	13.61	21.9	27.2	29.0	64.2	6.8	45.2	10.6	55.9
2010	14.65	20.9	30.4	21.9	70.5	7.6	31.0	10.8	41.8
2020	15.44	19.8	33.9	18.3	71.3	10.5	25.6	14.7	40.3
2030	15.89	18.7	38.3	16.8	69.3	14.1	23.9	20.3	44.3
2040	15.94	17.5	42.7	15.4	65.4	19.5	23.2	29.8	53.0
2050	15.67	16.4	45.2	15.1	63.6	21.7	23.2	34.2	57.3
2060	15.13	15.3	46.1	15.2	58.6	26.7	25.1	45.5	70.7
2070	14.49	14.3	46.5	15.6	56.5	28.6	26.4	50.6	77.0
2080	13.80	13.4	45.9	16.3	56.3	28.3	27.3	50.2	77.5
2090	13.18	12.7	44.9	17.0	56.3	27.8	28.2	49.4	77.6
2100	12.75	12.2	44.3	17.6	56.5	27.2	28.7	48.2	76.9

注：“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世界其他国家人口采用联合国的中方案。

可见，假如1980年后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中国人口在2010年7月1日应该为14.65亿。

2010年人口以“六普”的13.397亿（“六普”是11月1日，那么2010年7月1日应为13.37亿）计算，截至2010年，1980年到2010年的计划生育共少生了约1.28亿人（14.65-13.37=1.28）；2010年人口以上面分析的12.8亿计算，1980年到2010年的计划生育共少生了约1.85亿人。当然，这只是大致估算，人口预测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笔者这种估算仅供参考。

假如1980年后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将在2036年达到15.97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降低到12.75亿人，还是难以遏止人口老化和占全球人口比例下降的趋势。但是相对于计划生育来说，人口结构就更合理，老年化程度更低，劳动力更充足，经济结构也更健康，也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

1980年后共“超生”了多少人

1980年之后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开小口”后形成了现行人口政策。根据郭志刚教授等的研究，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38，乘以1.06（考虑到其他因素）之后修正为1.465^①。笔者认为这种修正幅度太大^②。这里假定1981~1983年的政策生育率为1.2（由于部分少数民族有较宽松的政策），1984~2010年的政策生育率为1.42（1.38乘以1.03的修正系数）。

中国城市政策生育率略高于1.0，在还有人超生的情况下（2000年、2010年城市出生孩子中二孩及以上孩次者分别为15%、23%），2000年、2010年全国城市实际生育率分别只有为0.86、0.88。2000年、2010年北京城市（不包含农村和镇）出生孩子中二孩及以上孩次者分别占8%、14%，但是生育率分别只有0.62、0.70。如果没有超生，城市生育率会更低。2010年城市妇女的不生育率（包括不孕、单身、丁克等）超过了30%（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高）。农村的不生育率会低一些（女性单身、丁克比例低一些，但是仍然存在不孕人群）。保守地假定妇女不生育率在1981年为3%，2010年为20%，中间用线性穿插。

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采纳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0~9岁人口的性别比（不考虑男女死亡率的差异）。

表4.16 1981~2010年不育率、生育率、出生性别比

年份	不育率 (%)	生育率		性别比 (%)	年份	不育率 (%)	生育率		性别比 (%)
		政策	现实				政策	现实	
1981	3.0	1.2	1.16	107.4	1996	11.8	1.42	1.25	118.5
1982	3.6	1.2	1.16	107.8	1997	12.4	1.42	1.24	120.4
1983	4.2	1.2	1.15	108.7	1998	13.0	1.42	1.24	122.1
1984	4.8	1.42	1.35	108.6	1999	13.6	1.42	1.23	122.7
1985	5.3	1.42	1.34	108.7	2000	14.1	1.42	1.22	117.8
1986	5.9	1.42	1.34	108.5	2001	14.7	1.42	1.21	118.5
1987	6.5	1.42	1.33	109.1	2002	15.3	1.42	1.2	118.9
1988	7.1	1.42	1.32	110.1	2003	15.9	1.42	1.19	118.8

①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② 易富贤：《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2月6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易富贤：《再质疑政策生育率》，光明网光明观察，2010年10月9日，http://guancha.gmw.cn/2010-10/09/content_1296031.htm。

续表

年份	不育率 (%)	生育率		性别比 (%)	年份	不育率 (%)	生育率		性别比 (%)
		政策	现实				政策	现实	
1989	7.7	1.42	1.31	111.6	2004	16.5	1.42	1.19	118.7
1990	8.3	1.42	1.3	111.8	2005	17.1	1.42	1.18	118.4
1991	8.9	1.42	1.29	113.5	2006	17.7	1.42	1.17	118.2
1992	9.4	1.42	1.29	114.6	2007	18.2	1.42	1.16	118.5
1993	10.0	1.42	1.28	115.2	2008	18.8	1.42	1.15	119.7
1994	10.6	1.42	1.27	116.6	2009	19.4	1.42	1.14	121.1
1995	11.2	1.42	1.26	117.8	2010	20.0	1.42	1.14	118

以“政策生育率”扣除“不育率”计算出“现实生育率”。当然，这种估算也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因为参数很难准确把握，比如政策生育率随着城市化的变化而变化，很难获得准确的不生育率数据。

以1980年的人口结构，采纳上面的参数估算，那么201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如表4.17所示。

表4.17 2010年分年龄人口、1981~2009年人流数(万人)

年龄	无超生	普查	实际	无计生	年份	人流
0	764	1379	1322	1886		
1	778	1566	1502	1897	2009	611
2	800	1562	1498	1912	2008	917
3	824	1525	1463	1935	2007	763
4	856	1522	1460	1958	2006	731
5	900	1473	1413	1985	2005	711
6	959	1480	1420	2012	2004	714
7	1027	1343	1288	2046	2003	722
8	1098	1367	1311	2088	2002	681
9	1169	1425	1366	2145	2001	628
10	1227	1445	1386	2217	2000	666
11	1280	1394	1336	2321	1999	676
12	1329	1540	1477	2435	1998	738
13	1373	1523	1460	2547	1997	659

续表

年龄	无超生	普查	实际	无计生	年份	人流
14	1410	1589	1524	2648	1996	883
15	1434	1802	1729	2730	1995	748
16	1445	1879	1802	2784	1994	947
17	1442	2078	1992	2814	1993	950
18	1428	2076	1990	2820	1992	1042
19	1405	2154	2066	2808	1991	1409
20	1378	2803	2280	2785	1990	1349
21	1343	2656	2301	2746	1989	1038
22	1289	2447	2388	2664	1988	1268
23	1227	2570	2401	2563	1987	1049
24	1158	2266	2117	2445	1986	1158
25	1096	1993	1975	2339	1985	1093
26	1055	1971	1883	2273	1984	889
27	875	1948	1995	2253	1983	1437
28	870	2232	2174	2262	1982	1242
29	868	1957	1784	2277	1981	870
合计	34178	54964	52103	70593		26589

表4.17中的“普查”是指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实际”中的20岁及以上人口是采纳“201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中第一种方法计算结果，0~19岁人口是将2010年普查的各年龄人数以4.28%的重报率推算；“无计生”是指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人流手术数是根据《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①，1971~2009年共有3.22亿（其中1981~2009年共2.66亿）胎儿被人流（当然，其中相对比例是父母自愿人流的；但此外也还有一些私人诊所、小医院的药物流产并未计算进去）。假如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相当部分被流产的胎儿是有机会出生的。假如没有“超生”，那么被人流的胎儿数量将大幅增加。

可见，假如没有超生，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1.01亿（在2004年达到11.08亿后开始负增长），其中0~29岁人口只有3.41亿（1981~2010年共出生3.54亿），比2010年人口普查的5.50亿少2.09亿，考虑到低年龄组死亡情况，那么1981~2010年共超生

^① 《2010年计划生育手术情况统计表》，《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了2.16亿。由于2010年存在4.28%的重报率，那么以“实际”人口为标准，1981~2010年共超生了1.87亿。正是这超生的人口挽救了中华民族，降低了老年化程度，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额外”的活力。

假如2010年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后的生育率采纳联合国预测中国的中方案（见上面的资料），其他参数（包括出生性别比、预期寿命）与上面“假如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会有多少人”一致。2010年年龄结构采纳三种方案：①上面方法计算的“1980年后就停止计划生育”下的2010年人口结构（无计生）。②2010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普查）；③1980~2010年没有超生情况下2010年人口结构（无超生）。

表4.18 三个方案下2010~2050年人口结构比较

年份	总人口（百万）			老年抚养比（%）			总抚养比（%）		
	无计生	普查	无超生	无计生	普查	无超生	无计生	普查	无超生
2010	1465	1333	1101	10.8	12.0	13.5	41.8	34.3	32.5
2020	1544	1377	1091	14.7	17.6	20.5	40.3	41.3	37.6
2030	1589	1365	1051	20.3	25.0	32.1	44.3	45.3	50.7
2040	1594	1328	979	29.8	37.9	56.1	53.0	59.1	76.7
2050	1567	1264	889	34.2	44.1	57.8	57.3	67.3	80.5

可见，假如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结构会更好。假如没有“超生”，中国的人口结构更为畸形。



第 5 章

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

1998年：小学在校人数开始减少

假定全国上学的年龄统一为6周岁，小学学制6年，初中、高中学制均为3年，大学学制4年，那么6~11岁人为小学生源，12~14岁人口为初中生源，15~17岁人口为高中生源，18~21岁人口为大学生源。根据人口普查（用存活率推算），小学生源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10年之内减少40%；初中、高中生源分别在2003年、2006年开始负增长，8年之内减少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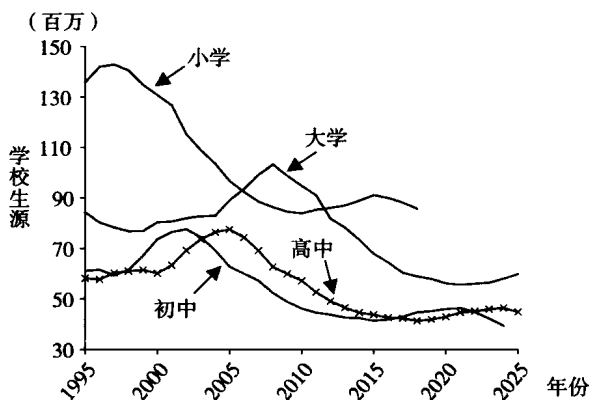


图5.1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生源

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也印证了这种趋势^①，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1年的0.99亿；小学招生人数是从1995年开始负增长，从1994年的2537万下降到2005年的1672万。初中招生、在校人数则分别在2001年、2004年开始负增长。高中招生、在校人数分别在2006年、2008年开始负增长。大量的中小学被撤并，小学、初中学校数分别从1997年的62.88万所、6.48万所减少到2011年的24.12万所、5.41万所。造成教育资源闲置和巨大的浪费，大量民办教师

^① 《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index.htm>。

失业，专职小学教师也从1999年的586.1万减少到2011年的560.5万人^①。

1999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1998年高校招生人数只相当于该年18岁人口的5.7%，还略低于印度。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的目的是为了使得中国的教育模式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错。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现在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普及化阶段。

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扩招，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4万增加到2000年220.6万、2011年681.5万。教育部宣布，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9%^②。而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11》，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在1975年、1994年、1997年、2002年突破50%，2009年则分别为86%、55%、59%、59%。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毛入学率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大学还有很大的扩招空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一定适龄人口（中国是指18~22岁人口）的百分比。但是在使用这一指标时，需要明确其具体内涵以及它的局限性^③。比如美国等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淘汰率比较高（而中国的毕业率比较高），美国的毛入学率的分子中还包括了外国留学生（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并且美国25岁以上的在校学生数就占大学总在校生数的38%，很多人拿多个大学学位。因此，美国高等教育实际毛入学率比86%要低得多；即使毛入学率仍然较高，也并不代表该国大学生的相对数量就大。中美高等教育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美国官方通常使用的是更有实际和可比意义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即分子、分母都是18~24岁的人口数。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从1970年的25.7%增加到1990年的32.0%、2010年的41.2%^④。也就是说，在美国2010年的适龄人口中也只有41%的人在接受高等教育。

2011年，中国高校招生681.5万，已经相当于该年18岁人口的32.8%了。而18岁的人口却从2006年开始负增长，从2005年的2577万减少到2011年2077万、2028年的1367万（比2005年下降差不多一半）。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后负增长。如果继续保持

① 《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208/141305.html。

② 董洪亮、肖思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5%》，人民网，2011年3月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4259502.html>。

③ 李勇：《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内涵及其局限性》，中国教育网，2010年8月11日，http://www.edu.cn/about_ping_lun_1071/20100811/t20100811_506933.shtml。

④ “The Population 14 to 24 Years Old by High School Graduate Status, College Enrollment, Attainment, Sex,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October 1967 to 2009”，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hhes/school/data/cps/historical/TableA-5a.xls>。

2011年的招生规模，那么2028年招生人数将相当于18岁人口的50%。2011年，高校招生人数已经相当于高中毕业人数的86.5%了，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已经达到88.6%了，高校扩招的空间其实已经非常小了。今后生源竞争将非常激烈，部分生源还被香港、台湾以及国际的大学吸引去（同时转移走大量学费），大陆的高校将大量破产。

今后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循序渐进，如果继续大跃进式地发展，将导致：①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业、生活压力很大；②由于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大量企业将破产或迁移海外；③生育率快速下降。

韩国、中国台湾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可能与其大跃进式地发展高等教育也有关：增加了家长的养育成本，提高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从而降低生育愿意），挤压生育时间，改变生育观念，抬高婚育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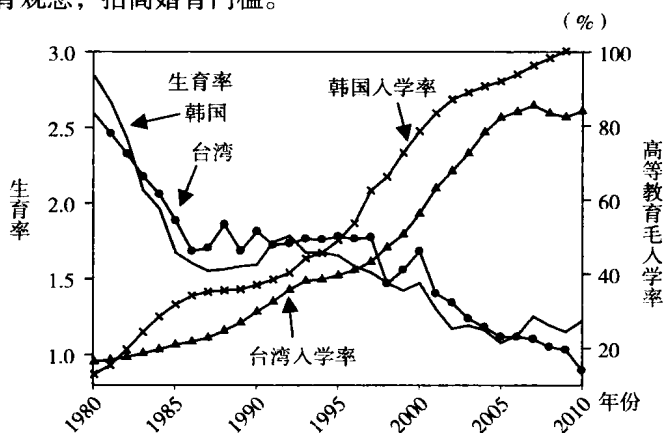


图5.2 中国台湾、韩国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生育率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11》和台湾官方资料^①，各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80年分别为：美国53.4%、法国24.9%、英国18.6%、日本30.9%、韩国12.8%、中国台湾16.2%；而在2009年则分别为：美国85.9%、法国55.3%、英国59.0%、日本58.6%、韩国100.0%、中国台湾82.2%。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中国台湾也接近美国了。要知道，韩国、中国台湾的国际留学生并不多，淘汰率也低于美国，如此之高的毛入学率意味着净入学率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国台湾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从1980年的11.07%提高到2011年的68.3%。

韩国、中国台湾大跃进式地提高高等教育，既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又迎合了家长的“孟母情节”和“望子成龙”的心态。由于少子化，韩国一些公立中小学已经形

① 《教育统计指标》，台湾“教育部”网站，<http://www.edu.tw/files/publication/B0013/100indicators.xls>。

成虚设，家长竞相将子女送往各种补习班，教育成本非常高，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陷入恶性循环。其实，中国也正在走韩国的老路，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今后生育率还将继续下降。

高等教育大跃进却可能降低制造业的竞争力。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也意味着企业所需的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将补充不足（毕竟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各层次的劳动力，某些员工由企业培训比由大学培训更好）。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①，韩国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从1991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8.1%、2010年的17%（低于日本的25.3%、德国的28.4%、法国的22.2%、英国的19.1%）。意味着韩国制造业可能将萎缩，出口占全球比例可能即将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可能将比日本1995年之后要大。

今后，中国高校生源短缺，在家长（独生子女寄托了家长所有希望）和高校强大的推动力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步韩国、中国台湾的老路继续飙升，可能导致“人口制造业”和“物质制造业”双重下降。

不要一味地将“重视教育”推向道德高地。对“断子绝孙”的教育模式需要摒弃，而需要探索“生生不息”的教育模式。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格外小心，需要循序渐进。总体来说，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一种趋势，但是需要大幅改革，在学制上不能挤压生育时间，在内容上应该由过去的“抑制生育”转变为“促进生育”（美国一些中学就开设了家务的课程），今后教育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

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开始减少

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计生委、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都在强调劳动力过剩，并以此强调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媒体也都在炒作“民工潮”。

然而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但当时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却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不足为虑（2007年后才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②。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中国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庞大，

^① The World Bank: “Employment in industry (% of total employment)”,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IND.EMPL.ZS>.

^② 蔡昉：《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中国网（来源：《南方周末》），2007年5月11日，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yzyj/txt/2007-05/11/content_8238165.htm。

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①。

然而近年的情况表明，劳动力短缺并非“局部性、暂时性、结构性”，而是愈演愈烈、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湖南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

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中国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6亿顶峰后，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几乎同时出现民工荒。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暂时掩盖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2012年20~39岁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而到2032年，该年龄组人口只有3亿（比2002年减少1/3），对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

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对19~22岁劳动力的变化最为敏感，该年龄段人口在2009年达到1.0亿的顶峰后，在2010年开始负增长，到2021年下降一半。这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企业可能将倒闭或撤离中国。

在民工荒让“劳动力过剩”论破产后，蔡昉等人口学家近年引进“刘易斯拐点”理论解释中国劳动力短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蔡昉认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很难上涨；中国出现民工荒，意味着到了刘易斯拐点。蔡昉认为：“只有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才意味着该国已经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它才可能走向发达经济；不经过这个转折点就永远属于落后经济。”该观点对经济学界以及决策层影响甚大。笔者在《国未富，人已荒——兼论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一文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刘易斯拐点理论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价值^②。

蔡昉自己也承认：“真正很明显地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他国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一转折。”^③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所以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因为这三个地区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温和的计划生育）。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导致劳动力的供应相对不足。

①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政府网，2007年1月11日，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677.htm。

② 易富贤：《国未富，人已荒——兼论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2期。

③ 蔡昉：《中国走向发达经济的关键转折》，《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3日，http://www.21cbh.com/HTML/2008-9-15/HTML_VG64VPS8PX8X.html。

蔡昉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这是根据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情况判断的。但这三个地区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向现代经济迈进，是因为15~64岁总劳动力和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都还在增加。

日本20~39岁人口是在2001年才不可逆转地快速减少，韩国、中国台湾则分别是在1995年、2002年才开始减少。将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39岁劳动力是1995年之后才开始减少。中国大陆经济比发达国家落后近百年，比日本落后40年，比中国台湾和韩国落后20多年，但是中国大陆20~39岁人口在2003年就开始负增长，15~64岁总劳动力负增长时间（2014年）比韩、台还要早2年。可见，中国现在的用工荒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不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2008年：17~20岁男性兵源开始负增长

中国人口在1820年达到3.8亿人之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50年仅仅增加到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口却增加迅猛^①，英国人口从2124万人增加到5013万人，美国人口从998万人增加到1.52亿人，俄罗斯帝国/前苏联地区人口由5476万人增加到1.80亿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人口也快速增长，从1870年的344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万人。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快速下降，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中国17~20岁男性人口在2007年达到顶峰，到2017年将下降40%。可能是考虑到兵源数量在快速下降，2011年的新兵役法将原有应征最低年龄由18岁改为17岁，也放

^①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宽了上限年龄^①。2005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已占64%。今后军队中独生子女比例将非常高，战争中稍有牺牲，就足以引发全国范围的反战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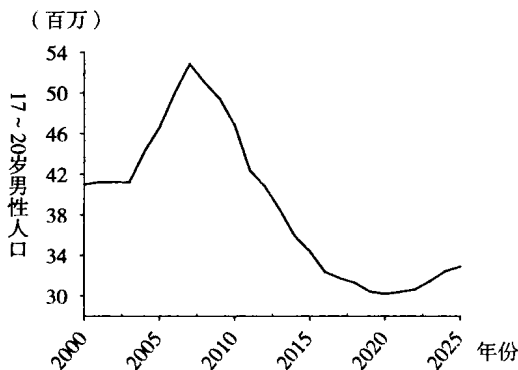


图5.3 中国每年17-20岁男性人口

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但科技来源于人的智力，科技进步依赖于综合国力（取决于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并且人的战斗意志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国防力，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部队的素质堪忧。另外，中国今后将由于老年化而无法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军队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将会导致军心不稳。而邻国印度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2倍，今后兵源数量是中国的2倍，综合国力也将远超中国。

人口学家夸大中国的人口数量和未来的人口预测，不但阻碍了计划生育的废止，也不利于中国的外交和正常的国防发展。国际社会根据中国官方的夸张的人口数据过高地估计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防范中国崛起；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过于乐观（比如胡鞍钢认为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倍多，人类发展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2倍）。在中国这个靶子的掩护下，印度是实实在在地在崛起。

2012年：育龄妇女开始减少

2010年7月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得出结论：“预计‘十二五’时期的出生人口数量会多于‘十一五’时

^① 《征兵工作条例》，人民网（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1年10月18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8221/74407/229756/232197/15933673.html>。

期，‘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①

依照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说法，意味着，2010年后的五年时间内将增加5000万人口（13.9亿-13.4亿=0.5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需要生育率在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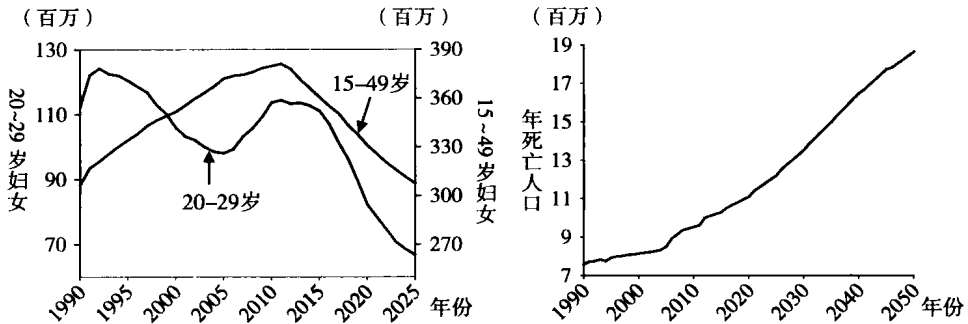


图5.4 中国每年育龄妇女人数和死亡人数

中国15~49岁总育龄年龄妇女一直在不断增加，2005年之后20~29岁黄金生育期妇女（2/3的孩子是20~29岁妇女生育的）出现了一个高峰。但是在2011年总育龄年龄妇女达到3.8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20~29岁妇女也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在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比2011年减少43%）。意味着即便生育率能稳定在以前的水平，每年出生人口也将快速减少。

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1990年的763万、2000年的813万、2011年的960万。2012年后，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高方案每年死亡人数略多一些），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增加到2030年的1350万、2050年的1862万。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

“十一五”期间年均只增加了600多万人。即便“十二五”期间的生育率能够稳定在“十一五”期间的水平，那么出生人口数量也会少于“十一五”时期。

“十二五”时期增加人口将远远少于“十一五”期间，2015年人口不可能达到计生委所预测的13.9亿。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结论刚出来，我就在博客文章中认为他们的预测又将破产。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将他们的报告撕成了碎片，2011年只增加了644万人（其实还有水分），没有1000万；年底总人口只有13.4735亿人。即便假定2012年、2013年年增人口与2011年一样为644万（事

^① 曾利明：《中国人口老龄化提速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遇困境》，新华网，2010年7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10/c_12319927.htm。

实上会更少，因为育龄妇女更少、死亡人数更多），那么2013年底人口只有13.6023亿。2013年就开始“完善人口政策”的话，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那么2014年、2015年需要增加2977万人才能让2015年的总人口达到13.9亿。由于每年死亡上千万，意味着这两年需要出生5000多万。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让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9亿。

而要达到“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所预测的2033年达到15亿人口，需要让2014~2033年生育率稳定在2.2以上才行。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不可能的。

2012年：总抚养比止跌攀升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蔡昉等人口学家将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所引起的总抚养比降低称之为“人口红利”^①。蔡昉2011年还坚持说：“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人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因此，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②胡鞍钢等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③。2006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④

蔡昉2011年说：“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随后转而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⑤他赞成放开二胎^⑥。其实，依照蔡昉等人的“低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的标准，不但不应该放松人口政策，而且还需要实行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以继

① 蔡昉：《未来靠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网（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9月2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5753110.html>。

② 蔡昉：《挖掘无限的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凤凰网（来源：《财经》杂志），2011年1月28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wenjujiuye/20110128/3343446.shtml>。

③ 胡鞍钢：《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地区差距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胡鞍钢：《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目标与对策：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之一》，《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1999年。

④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政府网，2007年1月11日，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677.htm。

⑤ 蔡昉：《未来靠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网（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9月2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5753110.html>。

⑥ 丁婷婷：《蔡昉谈人口政策：如何调整已有部署》，新浪网（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3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110321/01149562675.shtml>。

续降低总抚养比。因为调整人口政策虽然能够降低老年抚养比，但同时也增加了儿童抚养比，反而提高了总抚养比。比如根据联合国2010年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在2050年以前，总抚养比在高方案下最高，低、中、高方案下2030年的总抚养比分别为39%、45%、51%，2050年分别为62%、64%、67%。在低方案下，2040年的总抚养比只有55%，相当于欧盟1960年和1980年的水平（那段时间经济发展相当不错）、日本1961年、美国1977年和1994年的水平，在全世界来说仍算是很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人口红利”（依照蔡昉的标准）过几十年仍然没有消失。

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34%，即便2013年稍有上升，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历史最低点还要低（日本总抚养比最低点是43%，美国最低点是49%），怎么就叫“人口红利消失”？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将二者混为一谈很容易掩盖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的资料，笔者比较了1961~2010年日本、欧盟的人均GDP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关系，发现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从1960年到2011年，日本的儿童抚养比从47.0%下降到21.0%，老年抚养比从8.9%上升到36.9%；人均GDP增长率由1961~1969年的平均9.11%下降到1993~2011年的平均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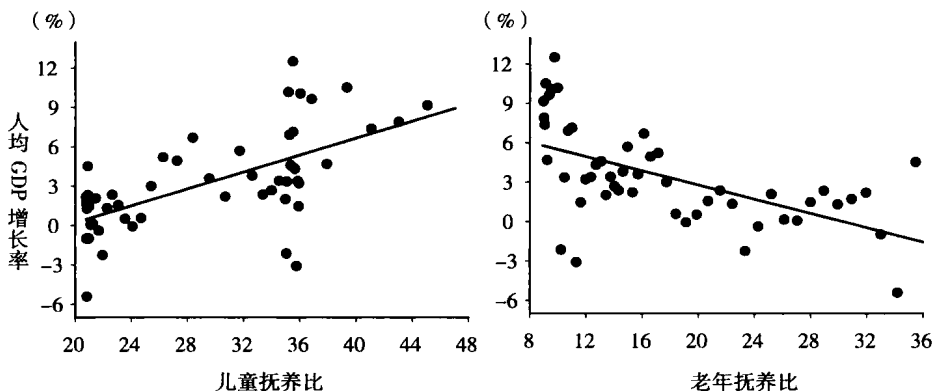


图5.5 1961~2011年日本人均GDP年增长率与抚养比的相关图

欧盟也是如此，从1960年到2010年，儿童抚养比从39.7%下降到23.2%，老年抚养比从15.3%上升到26.4%；人均GDP年增长率由1961~1969年的平均4.03%下降到2002~2011年的平均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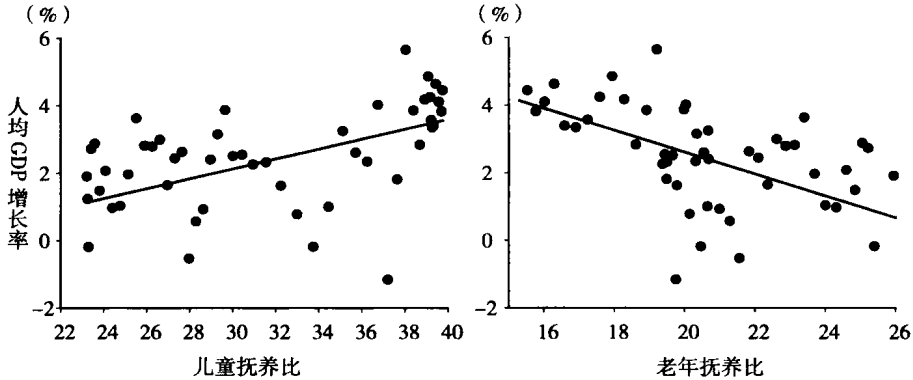


图5.6 1961~2010年欧盟人均GDP年增长率与抚养比的相关图

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投资）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还债）上升越快。日本生育率从1949年的4.3快速下降，在1973年后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只有1.5，2000年后徘徊在1.3左右。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儿童人数减少，儿童抚养比下降，进而使得总抚养下降。儿童减少使得后续年轻劳动力的不足，老年抚养比在1970年后快速攀升，但由于儿童抚养比下降幅度大于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总抚养比仍然继续下降，在1992年跌到43.1%的低谷。以1993年为转折点，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开始超过儿童抚养比下降幅度，总抚养比止跌回升，与此同时经济开始出现危机。1983~1992年这1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4.3%，但1993~2002年这10年年均只增长0.79%。依照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后生育率稳定在1.32），今后日本儿童抚养比将稳定在19%左右的低水平，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202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950年的水平，然后在2100年达到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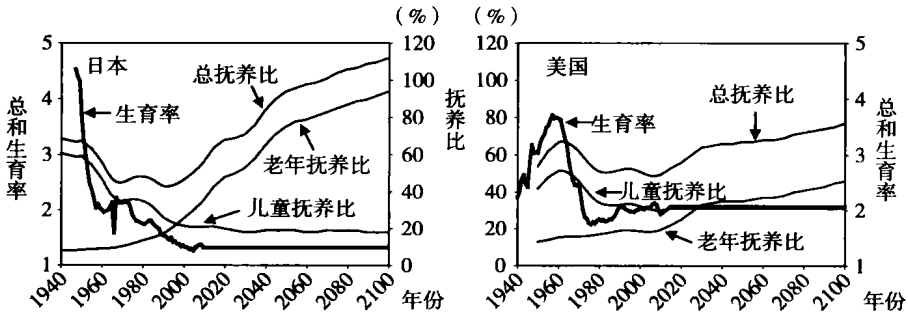


图5.7 日本、美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和抚养比

同样的总抚养比，如果主要是儿童抚养比的话，说明未来经济潜力很大；如果主

要是老年抚养比的话，说明经济乏力。比如日本在1960和2010年总抚养比均为56%，但1960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47%、9%，经济朝气蓬勃，年增长率为12%；而2010年则分别为21%、35%，经济已经持续低迷了十多年。

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导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下降。但在80年代，生育率出现回升，1989年之后稳定在2.0左右或以上，儿童抚养比也基本稳定在32%左右。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缓。

美国生育率和儿童抚养比下降平缓、幅度小，老年抚养比也上升得比较平缓、上升幅度也小。2050年、2100年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为35%、46%，而日本却将分别高达75%、94%，今后两国经济前景可想而知。

蔡昉说：“像我们都要老一样，一个国家都会从年轻型到老年型。越发达的国家老龄化程度越高，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很快，老龄进程快是必然的。”^①但是从美国的情况可见，如果能够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儿童抚养比可保持在31%左右，人口不会快速老化的。美国今后将远远比日本要发达，并非如蔡昉所说的那样“越发达的国家老龄化程度越高”。

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后就快速下降，在1990年后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只有1.22，2010年只有1.18。2010年儿童抚养比只有22%；而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5%；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中国201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70年左右水平，相当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儿童抚养比为35%，韩国1990年则为37%。

中国儿童抚养比的超低是因为中国0~14岁的儿童比例太低，2010年普查显示只占总人口的16.6%（世界平均为26.8%），在2010年全球（其他地区采用《世界发展指标2011》的资料）19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人口的99.6%）中，中国大陆的儿童比例排倒数第34位（倒数第1、2、3位的分别是香港、澳门、日本）。在中国前面的156个国家总人口47.0亿，排在中国后面的33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只有7.7亿。也就是说除中国大陆以外，只有14%的人群的儿童比例比中国低，另外86%的人群的儿童比例比中国高。而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的儿童比例（35.5%）刚好与世界平均水平（35.3%）一致。

图5.8是全球人口上千万的81个国家（占全球94%的人口）的儿童比例比较。

^① 任鹏：《先解决“未富”才能解决养老》，人民网（来源：《齐鲁晚报》），2012年10月23日，<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2/1023/c25408-1935002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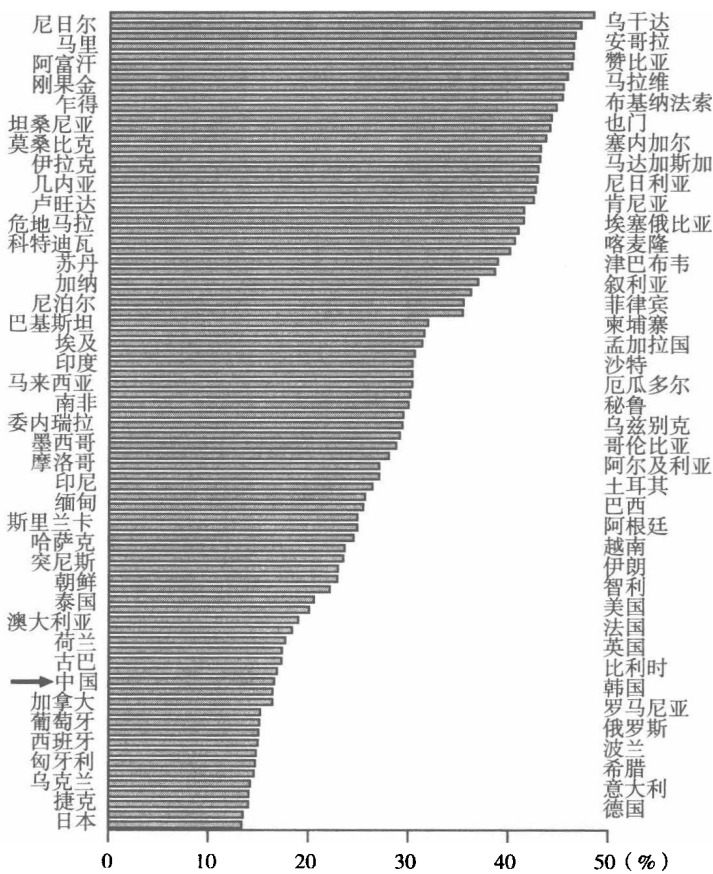


图5.8 2010年各国0~14岁儿童比例

可见中国人口负债非常严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的大幅上升。这个拐点就是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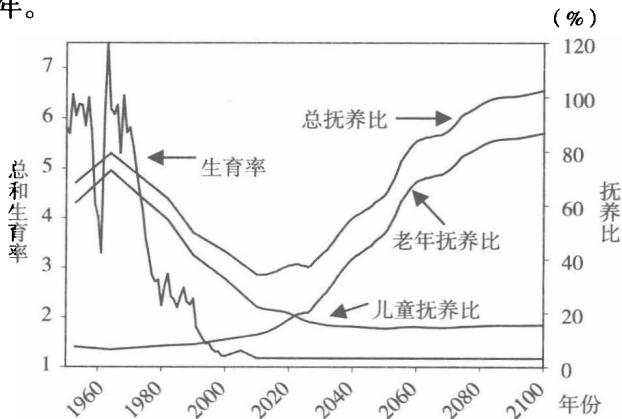


图5.9 中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和抚养比

2012年中国老年抚养比达到12.5%，总抚养比开始止跌回升（类似日本1993年）。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即将跳跃性下降。

如果继续2010年1.18的生育率，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将分别在2050年达到50%、64%，在2100年达到87%、102%。中国今后的经济前景非常不妙。

可见，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如蔡昉、胡鞍钢所说的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

2014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负增长

劳动力是最核心的国力，从日本的情况可见劳动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日本在1990年前后，劳动力接近顶峰（中国现在也一样），经济如“日”中天，1989年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民众都对未来经济持乐观态度（就像现在的中国）。

但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很多经济学家为日本的衰退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是经济政策失误，是周期性的；但哪有十多年还走不出来的周期？有人将日本的衰退归罪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但《广场协议》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日本经济持续萧条，事实上日本GDP在1980~1985年（协议签署前的6年）年均增长4.0%，在1985~1991年（协议签署后的6年）年均增长4.7%。

其实，日本是无“人”为力了。经济是手套，人口是手；经济学家只看到手套，看不到手。劳动力是面粉，经济手段是制面包的技术。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之后开始负增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日”薄西山；1995~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0.9%；GDP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9%下降到2010年的8.7%。由于制造业所需的年轻劳动力补充不足，导致日本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从1993年的34.3%（此前几十年一直稳定在34%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27%，同期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从2200万下降到1700万（并且年龄结构老化），出口占全球比例从9.9%下降到4.8%。1995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国日本占149家（美国占151家，中国占3家），但2012年只占68家了（美国还有132家，中国增加到73家）。

一些人认为，日本衰退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构成对基于制造业的日本经济的威胁，使日本要么转型要么被挤，可是他们没有转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等人

也认为中国可以凭借产业升级获得无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①。

但是经济转型需要年轻的智力和体力，不能靠体力衰减、知识结构老化的中老年劳动力，老气横秋的日本如何进行经济转型？日本在劳动力减少的同时，人口结构也在快速老化，中位年龄从1985年的35.1岁（与中国2010年相当）增加到2010年的44.7岁。年轻人身手敏捷，但老态龙钟如何让经济转型？

日本经济衰退的核心原因是“*They are not making Japanese any more*”（他们不再“制造”日本人了）。“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

2010年，日本劳动力只比1995年下降了6.6%，但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了；而到2050年，日本劳动力将比1995年下降41.2%，意味着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将继续下降。今后，日本经济更将是“日”暮途穷。

欧盟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负增长，也如日本那样，在劳动力负增长前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2011年，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危机并非偶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说，目前困扰欧洲的经济危机可能影响全球，使世界经济出现“失去的十年”^②。

从日本和欧洲各国看，从人口增长到经济增长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但是劳动力减少与经济衰退却几乎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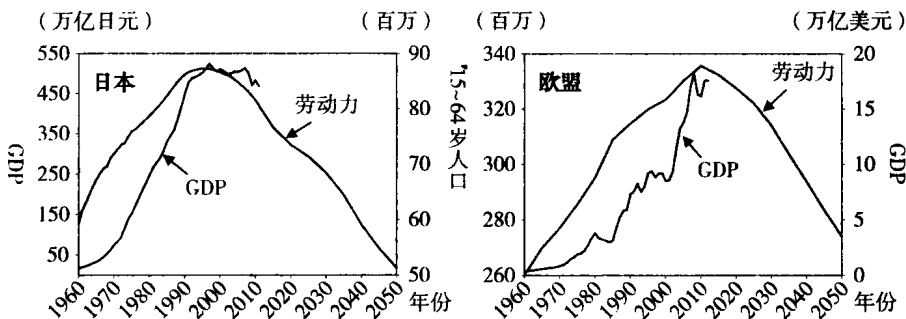


图5.10 日本和欧盟每年15~64岁总劳动力和人均GDP

注：2010年之前的劳动力和人均GDP采纳《世界发展指标2011》的数据，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采纳《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维持现有生育率”方案。

人体每天都会发生DNA水平和细胞水平的损伤，但年轻人能自我修复；人到老年后，有人会得癌症，有人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机体修复力降低。劳

① 蔡昉：《挖掘无限的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凤凰网（来源：《财经》杂志），2011年1月28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wenjujiuye/20110128/3343446.shtml>。

② 《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失去的十年”》，BBC中文网，2011年11月9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mobile/world/2011/11/111109_imf_chief.shtml。

动力代表社会修复能力，年轻劳动力充足的时候，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发达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都在发展过程中自我修复了；但一旦年轻劳动力减少，老年人比例增加，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将成为五花八门的大问题。日本总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欧洲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减少，都几乎在劳动力达到顶点的前突然出现经济衰退，今后的经济走势将难以预料。

源源不断地增加的劳动力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但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在2013年达到9.98亿的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即将减速（如果没有4万亿投资计划，中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就开始减速了）。但由于中国人均GDP基数还较低、城市化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下降速度还不至于如日本20世纪90年代那么快。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欧盟落后近百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落后20年；但是总劳动力下降时间只比欧盟晚4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还要早2年。

中国不但面临劳动力短缺，也面临人口结构老化，中位年龄将从2010年的35岁提高到2030年的44岁，产业升级的能力将越来越难。

有人认为2030年前，中国劳动力总量仍然在9亿以上，比发达国家总和还多，因此不必担心劳动力下降和人口红利消失。其实，劳动力数量减少也意味着劳动力结构在加速老化。日本在1985年的时候，15~64岁总劳动人口为8181万，其中15~39岁占54%，40~64岁占46%；2010年，总劳动人口仍然还有8083万（只比1985年减少1%），但是15~39岁只占47%，40~64岁占53%了。当40~64岁人口开始超过15~39岁人口时，经济就将走向衰退。日本是在1994年达到这一拐点。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作为整体，是在2009年达到这一拐点。美国到本世纪末，15~39岁人口仍然略多于40~64岁人口，因此经济前景远远比日本、欧洲、中国要好。

2010年，中国的15~64岁总劳动人口为9.98亿（15~39岁占55%，40~64岁占45%，相当于日本1985年的结构）；即便2013年后一个孩子都不生，2029年总劳动力仍然在9亿以上；继续2010年的1.18的生育率，2030年总劳动人口仍然有9.2亿，但是15~39岁只占41%，40~64岁却占59%了（相当于日本2030年的结构）。2016年，中国40~64岁人口开始超过15~39岁人口，意味着中国经济即将衰退。

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很可能让“中国制造”既减量，又提不了质。中国占全球500强企业的份额将很难继续高速增加。2002年，印度只有1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但2012年，已经增加到8家了，由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仍将继续增加，今后将有更多的企业进入500强。

就像医生的各种诊断书和处方一样（人不会直接死于“老年”，而是死于相关的

具体某种疾病），经济学家也会对中国经济作出各种“诊断”，开出各种“处方”。但是如果生育率不能有效提高，“病情”是不会好转的，“神医”数量倒可能会不断增加。

2015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6：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正常。尽管1980年的《公开信》认为，不会出现“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很快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人口学者却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为111；但1992年国内大多数人口学家，仍将之误归咎于瞒漏报女婴。“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①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蒋正华1994年还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②

然而后面的调查和普查证实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为120。2002年，国家计生委提出通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来治理性别比失衡；2003年，开始启动“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2005年，成立了“全国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关爱女孩”行动得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这样既符合联合国人口基金“通过‘提高’妇女地位而降低生育率”的理念，又能治理性别比失衡。

但是中国出生性别比不降反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为123。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仍然高达119。

人口学家和计生委认为中国性别比失衡是因为妇女地位低，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

其实，中国妇女地位并不低。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1》^③，“性别不平等指数”（GII）越低，妇女地位越高，中国排名全球第35位（从低往高）。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的GII普遍在0.45左右，比如泰国为0.382，伊朗为0.485，斯里兰卡为0.419，土耳其为0.443。但中国只有0.209（1995年也只有0.267），与英国

^① 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② 蒋正华：《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人口与计划生育》，1994年第6期。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39-142, http://www.gm.undp.org/HDR_2011_EN_Complete.pdf.

(0.209)、爱尔兰(0.203)相当, 低于美国(0.299)、印度(0.617), 高于日本(0.123)、法国(0.106)。世界平均为0.492, 阿拉伯世界为0.563, 拉美为0.445。

妇女劳动参与率与男性之比: 中国84.5%, 世界排名36; 印度40.4%、美国81.1%、英国79.5%、法国81.2%、日本66.8%、泰国81.1%、伊朗43.7%、世界65.9%、阿拉伯世界33.7%、拉美64.7%。

国会中妇女席位: 中国21.3%, 世界排名34; 印度10.7%、美国16.8%、英国21.0%、法国20.0%、日本13.6%、泰国14.0%、伊朗2.8%、世界17.7%、阿拉伯世界12.0%、拉美18.7%。

中国女性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5%, 而美国只有12.2%, 日本为12.5%^①, 德国为16.1%、意大利为28.6%、丹麦为28.8%, 印度为8.3%^②。

1949年后, 中国妇女婚后不需更改为夫姓; 欧美国家大多数妇女婚后仍然改为夫姓。

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 比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中国57.3%的育龄妇女希望生育“一男一女”, 31.6%的育龄妇女表示无所谓^③。中国的汉字“好”从甲骨文开始就是有“女”有“子”。孟子: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 生二胎没儿子比例1/4, 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如果能够生两三个孩子, 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儿女双全的愿望。但是计生委只让生一样, 这就导致了通过B超等手段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 生二胎的性比别为151.9, 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 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 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但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如李小平)却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 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失衡。

中国1980年之前几年虽然也实行计划生育, 但允许生两三个孩子, 当时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 也没有溺女婴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在山西省翼城县、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四个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政策, 性别比都正常, 比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 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 1~4岁平

① 章梅芳、刘兵:《我国科技发展中性别问题的现状与对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 《国际科技人力资源的全球分布与跨国流动的一般发展趋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站(来源: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2009年2月25日,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668/n35728/n36419/11105238.html。

③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国家计生委网站(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2007年3月21日,http://www.chinapop.gov.cn/xxgk/tjgb/200806/t20080626_154455.html。

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也就是说如果允许生两胎，3/4的家庭有儿子，农民就不会选择性别了。

想生男孩并非是思想落后，“偏爱”男孩并不表示“歧视”女孩，事实上还有“穷养儿子富养女”之说。笔者问过来自多国（包括欧洲、非洲和拉美）的朋友，假如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也大多希望生儿子。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从1941年到2011年共进行过10次民意调查：如果只能有一个孩子的话，是选择要男孩还是女孩？

表5.1 假如只能有1个孩子，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

年份	男孩	女孩	无所谓	不确定	没意见
2011年	40	28	26	3	3
2007年	37	28	26	5	4
2003年	38	28	27	5	2
2000年	42	27	25	4	2
1997年5月	36	23	38	2	1
1997年2月	41	29	25	—	5
1996年	41	31	25	—	3
1990年	38	34	24	—	4
1947年	40	25	27	—	8
1941年	38	24	23	—	15

可见，70年来美国的“偏爱男孩”的“落后”观念没有改变。2011年的调查中，18~29岁男女（生育主体）：54%想要男孩，27%想要女孩。18~49岁男人：54%想要男孩，19%想要女孩；18~49岁女人：36%想要男孩，35%想要女孩。保守派男女：41%想要男孩，25%想要女孩；自由派男女：36%要男孩，35%要女孩。自由派不但对男女孩无所谓，相当部分人对是否要孩子也无所谓，生育率远远比保守派要低。可见美国的男人是一面倒希望生男孩。假如美国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性别比失衡可能比中国更严重。

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指出，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方法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①。要彻底根治性别比失衡，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家和计生委为什么不建议停止计划生育，马瀛通的观点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复归正常，生育水平有可能回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上。因此，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复归正

^①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318页。

常的过程中，仍要继续大力降低生育水平。”^①

虽然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光棍危机还没有爆发。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2013年之前，二者比例波动在90%到110%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其中，2008年到2013年低于100%，城市还有“剩女”问题。但是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快速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2018年二者比例超过125%。



图5.11 中国每年初婚年龄性别比

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光棍”。2010年“光棍”数几乎为零，2010年之后“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14年超过1000万（1000万左右问题还不大，1980年、2000年均都在1000万左右），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

婚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俗话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少年夫妻有爱有性有激情；婚姻要经过无数风风雨雨，单靠最初的激情是很难维持的，孩子使得家庭关系变成了三脚架，夫妇俩在精心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感情不断升华；到了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激情已经升华为浓浓的亲情，夫妻俩在子女的帮助下相互搀扶，在孙辈们的嬉戏中一起老去。

但是今后4000万光棍的存在，必然会影响中国传统的婚姻观，造成家庭的不稳定。相当部分国民将处于“家庭内战”之中。真正的战争是暂时的，但是“家庭内战”将是持久战，对国民的影响比几场真正的战争还要大。中国的光棍危机还将冲击周边国家的婚姻秩序，甚至引发国际争端。

^① 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经济秩序有赖于健全的人口结构，有赖于代际传承，人口结构决定经济信用。但是光棍将破坏这种信用。美国的保险业专门研究了单身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单身出汽车事故的比例远远高于已婚人群，因此单身人群必须缴纳很高的汽车保险。大量光棍的存在，可能对保险、金融业构成威胁。

2016年：购房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

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很长，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房地产一旦出问题，整个国家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比如美国2005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危机。

但房地产就像自行车一样，本身没有动力，需要外力。这个外力就是需求，而需求靠人口。美国人口还在增加，房地产对经济有重要的拉动作用；日本由于人口老化和负增长，就不能靠房地产拉动经济了。

房地产对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甚大，有人还据此提出“倒按揭”的以房养老模式。现在中国城市房市兴隆，这一是因为城市化，二是因为购房年龄人口还在增加。中国城市化已经由2000年的36.1%增加到2010年的49.7%，几年后达到60%，城市化将趋缓，对房子的需求将降低。

北京平均初次购房年龄是27岁，中国25~29岁人口在2015年达到1.27亿的顶峰后开始快速下降，到2028年只有0.69亿，下降差不多一半。也就是说2016年之后，房地产市场将快速萎缩，可能将重创经济。

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等他们去世后，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把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现在的住房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今后的年轻人看不上现在的房子。尤其是中国住宅的平均寿命仅为30年，住房必须折旧，越老的房子越不值钱，到老的时候发现房子已经不值钱了，租不出，卖不出。

2018年：总人口开始负增长

从1820年到1950年，世界人口增长主要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西方国家人口增加2.33倍，在人口增长推动下人均GDP增长4.2倍。同期，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从3.8亿增加到5.5亿，只增长0.44倍），人均GDP下降25%。

1950年后，中国人口恢复性增长。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1》的数据，中国人口由1960年的6.6亿人增加到1980年的9.8亿人，但是同期人均GDP（2000年美

元可比价格) 仅仅从105美元(以1990年购买的国际元为标准是662美元, 与1820年相当) 增加到186美元。1980年之后, 人均GDP快速增长, 到2010年为2423美元; 时间上的巧合使得很多人将中国经济增长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 人口学家将之归功于独生子女政策降低了抚养比(人口红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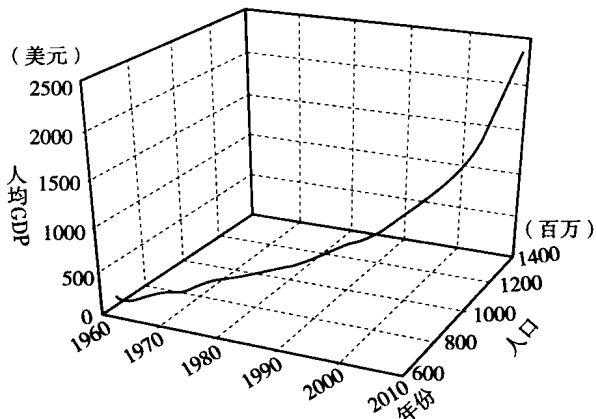


图5.12 中国历年人口和人均GDP三维图

其实, 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是由于人口增长推动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并非独特。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本身并非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而是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各国从人口增长到人均GDP快速增长都有一段多要素(包括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 积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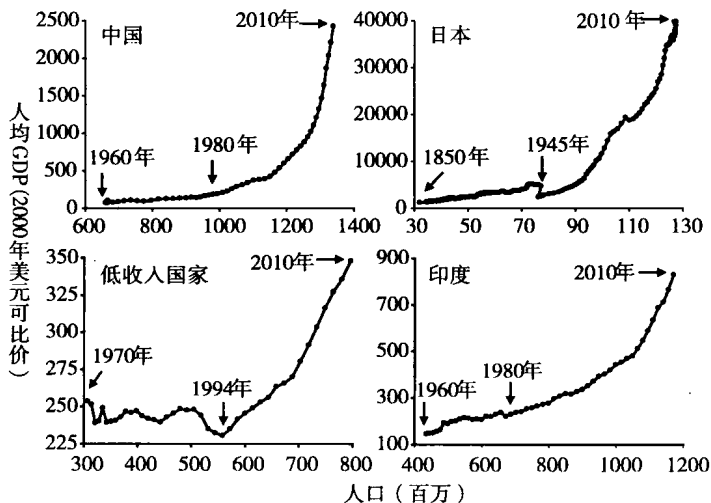


图5.13 中国、日本、印度、低收入国家的人口与人均GDP的相关图

^① 《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紧缺吗? 专家建议提高生育率》, 人民网, 2007年1月17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291303.html>。

日本人口在1870年就开始快速增长，但人均GDP增长却比较缓慢，直到二战后才快速增长。韩国是二战后人口就开始快速增长，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均GDP才快速增长。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在HDI（2010年前的老标准）达到0.5~0.6左右的时候人均GDP才快速增加的。韩国在步日本的后尘，中国在走韩国的老路。印度的HDI比中国落后十多年，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也开始快速上升，2003年到2010年年均增长7%。

《世界发展指数2011》将全球人口分为三组：低收入国家（2010年8.0亿人口）、中收入国家（49.2亿人口）、高收入国家（11.3亿人口，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低收入国家在1994年之前保持6.0左右的高生育率，人口在高速增长，人均GDP却没有增长；但是以1994年为转折点（人均GDP相当于中国1980年的水平），人均GDP开始增长，2004年开始人均GDP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其实，低收入国家的道路就是高收入国家过去两百年老路的浓缩。有人拿朝鲜为反例，但其实朝鲜情况特殊，以前并非独立经济体，依附于苏联（社会发展超前于中国和韩国），现在则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一旦朝鲜的国际环境开始改变，预计不久的将来经济也将快速增长。

中国和印度有人口规模优势，又有完整的经济体系，人力资源和其他经济要素一旦积累到了临界点，不管国际经济体系如何风吹雨打，经济都会快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无疑也部分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16.61‰几乎直线地下降到2011年的4.79‰。中国年增人口也是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01万下降到2011年的644万。

表5.2 中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增人口

年份	增长率(‰)		年增人口(万人)	
	统计	拟合	统计	拟合
1987	16.61	15.16	1801	1712
1988	15.73	14.65	1733	1660
1989	15.04	14.14	1682	1608
1990	14.39	13.63	1634	1556
1991	12.98	13.11	1494	1504
1992	11.6	12.6	1351	1452

续表

年份	增长率 (‰)		年增人口 (万人)	
	统计	拟合	统计	拟合
1993	11.45	12.09	1349	1400
1994	11.21	11.58	1336	1348
1995	10.55	11.06	1271	1295
1996	10.42	10.55	1269	1243
1997	10.06	10.04	1237	1191
1998	9.14	9.53	1135	1139
1999	8.18	9.01	1025	1087
2000	7.58	8.5	957	1035
2001	6.95	7.99	884	983
2002	6.45	7.48	826	931
2003	6.01	6.96	774	879
2004	5.87	6.45	761	827
2005	5.89	5.94	768	775
2006	5.28	5.43	692	722
2007	5.17	4.91	681	670
2008	5.08	4.4	673	618
2009	5.05	3.89	672	566
2011	4.79	2.86	644	462
2012		2.35		410
2013		1.84		358
2014		1.33		306
2015		0.81		254
2016		0.3		201
2017		-0.21		149
2018		-0.72		97
2019		-1.24		45
2020		-1.75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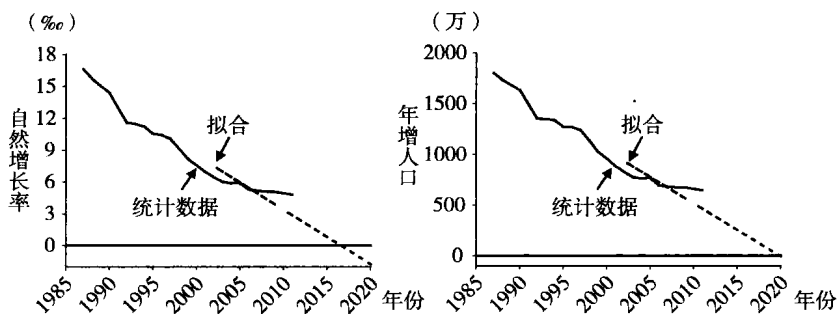


图5.14 根据1987~201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增人口推测今后人口变化

将1987年到2011年的自然增长率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自然增长率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 $y = -0.5125x + 1033.5$ ，拟合优度（R²）达到0.9473。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将在2017年开始为负值。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3.4735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达到13.56亿的顶峰后，于2017年开始负增长。

将1987年到2011年的年增人口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年增人口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 $y = -52.095x + 105225$ ，拟合优度（R²）达到0.9593。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年增人口，年增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为负值，也就是中国人口在2019年达到13.65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近年，年增人口和增长率似乎都偏离了上面拟合直线。其实，这是国家统计局做了技术处理，夸张了每年出生人口。比如根据“六普”，2010年0岁人口只有1379万，而根据依照联合国的预测的中国2010年的预期寿命（男71.3岁、女75.3岁，也基本符合中国目前的医疗状况）及配套的死亡率计算，2010年中国死亡人口应为1000万（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公报也说死亡960万人），那么中国2010年只增加400万左右（增长率只有2.9‰）。但是国家统计局却说2011年增加644万人（增长率4.79‰）。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负增长，将在2050年降低到11.3亿（占全球13.9%）、2100年降低到5亿（占全球8.2%）。其实，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来说还过于乐观，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六普”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今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开始负增长。日本、欧洲都是在人口负增长之前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今后的经济走势

以现值美元计算^①，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GDP占全球比例从1.7%上升到9.3%，购买力占全球比例从2.0%上升到13.2%（人均从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1%上升到67.6%），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比较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历年的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关系，会发现老年抚养比低于12%时，经济可以保持在8%以上的年增长率，但一旦高于12%后，经济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比如日本在1961~1973年，GDP年均增长9.2%；但1977年后老年抚养比超过12%，1977~1994年GDP年均只增长3.9%；1995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1995~2009年GDP年均只增长0.96%。欧盟1976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1976~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1.8%。韩国在1966~2002年（将经济危机的1980年、1998年除外）GDP年均增长8.4%，但2003年后老年抚养比超过12%，GDP年增长率跳跃性下降到2004~2010年的年均3.9%；中国台湾在1964~1999年GDP年均增长8.5%，但2000年老年抚养比突破12%后，GDP年增长率跳跃性下降到2000~2010年的年均4.1%。

2011年之前，中国大陆的老年抚养比一直低于12%，过去30年经济也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当年一样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但是2012年中国大陆的老年抚养比已经为12.6%，2020年将达到17.6%，2030年将超过25%，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即将放缓。

中国虽然在2012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总抚养比止跌回升，2014年劳动力开始减少；但是由于中国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仍然比日本当年要低（中国的老年抚养比要等到2021年才达到日本1993年的水平），人均GDP的基数仍然很低，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中国靠城市化还可以挖掘内需经济，因此中国经济不至于像日本1993年那样突然停滞，还会继续惯性增长一段时间，只是增长速度不容乐观。

以1990年的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为基准，中国大陆2008年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1967年、中国台湾1985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②。那么我们以日本1967年、中国台湾1985年、韩国1987年为起点，相当于中国大陆2008年，然后将三个地区此后各年的GDP年增长率平均，假设为中国大陆2008年后各年的GDP增长率。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e.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表 5.3 据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历年 GDP 增长率推测 2008 年后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率 (%)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		
GDP	人均	GDP	人均	GDP	人均	年份	GDP	人均
11.08	10.05	11.1	10.06	4.07	2.75	2008	8.75	7.62
12.88	12.51	10.64	9.59	11	9.89	2009	11.51	10.66
12.48	10.18	6.74	5.72	10.68	9.47	2010	9.97	8.46
4.29	3.11	9.16	7.91	5.57	4.36	2011	6.34	5.13
4.7	3.36	9.39	8.38	10.28	9.17	2012	8.12	6.97
8.41	6.91	5.88	4.92	6.87	5.59	2013	7.05	5.81
8.03	7.14	6.13	5.19	7.89	6.81	2014	7.35	6.38
-1.23	-3.09	8.54	7.57	7.56	6.54	2015	4.96	3.67
3.09	1.45	9.17	7.62	6.73	5.76	2016	6.33	4.94
3.97	3.21	7	5.98	7.59	6.66	2017	6.19	5.28
4.39	3.39	4.65	3.67	6.38	5.49	2018	5.14	4.18
5.27	4.32	-6.85	-7.52	5.54	4.71	2019	1.32	0.50
5.48	4.6	9.49	8.71	5.48	4.42	2020	6.82	5.91
2.82	2.01	8.49	7.58	3.47	2.59	2021	4.93	4.06
4.18	3.41	3.97	3.21	5.97	5.19	2022	4.71	3.94
3.38	2.68	7.15	6.55	5.8	4.92	2023	5.44	4.72
3.06	2.36	2.8	2.29	-1.65	-2.22	2024	1.40	0.81
4.46	3.8	4.62	4.23	5.26	4.73	2025	4.78	4.25
6.33	5.69	3.96	3.74	3.67	3.28	2026	4.65	4.24
2.83	2.21	5.18	4.83	6.19	5.8	2027	4.73	4.28
4.11	3.6	5.11	4.76	4.7	4.33	2028	4.64	4.23
7.15	6.69	2.3	1.98	5.44	4.94	2029	4.96	4.54
5.37	4.94	0.32	0.03	5.98	5.61	2030	3.89	3.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1》。

今后，中国大陆的情况与当年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一样，2012年到2030年中国GDP还能保持在5.1%的年均增长率，人均GDP还能保持在4.3%的增长率（由于人口还在增加，因此人均GDP增长率低于GDP总量的增长率）。而中国大陆人口即将负增长，今后GDP总量的增长率将略低于人均GDP的增长率。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陆今后的人口结构，结论就不一样了。我们仍然以日本1967年、中国台湾1985年、韩国1987年为起点，相当于中国大陆2008年，比较其后各年的老年抚养比。也以起点年份（比如日本1967年、中国大陆2008年）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为100%，比较此后各年的劳动力变化。

表5.4 比较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老年抚养比和劳动力变化

年份	老年抚养比 (%)				15-64岁人口相当于起点 (%)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2008	11.4	9.6	6.8	7.7	100.0	100.0	100.0	100.0
2009	11.7	9.8	6.9	8.0	100.8	100.6	102.2	101.6
2010	11.9	10.0	7.0	8.4	101.4	102.7	104.3	103.3
2011	12.3	10.2	7.2	8.7	101.7	103.8	106.5	104.8
2012	12.6	10.5	7.3	9.0	101.8	105.0	108.3	106.3
2013	12.9	10.7	7.5	9.3	102.0	106.1	109.9	107.8
2014	13.5	11.0	7.8	9.7	101.8	106.6	111.4	109.6
2015	14.0	11.3	8.0	10.0	101.6	108.3	112.8	111.1
2016	14.5	11.6	8.3	10.4	101.4	109.7	114.8	112.7
2017	15.3	12.0	8.6	10.7	100.9	110.2	116.2	114.5
2018	16.0	12.3	9.0	11.0	100.4	111.1	117.6	116.1
2019	16.8	12.7	9.4	11.3	99.9	111.9	118.6	117.7
2020	17.6	13.1	9.8	11.5	99.4	112.8	119.6	119.5
2021	18.3	13.4	10.2	11.7	99.1	113.8	120.6	121.3
2022	19.1	13.7	10.7	11.9	98.6	114.7	121.5	122.8
2023	19.7	14.0	11.3	12.1	98.3	115.7	122.1	124.0
2024	19.9	14.3	11.9	12.4	98.4	116.7	122.6	125.0
2025	20.2	14.6	12.4	12.6	98.2	117.8	123.1	125.9
2026	20.2	15.0	13.0	12.8	98.1	119.0	123.4	127.1
2027	21.2	15.3	13.5	13.1	97.2	120.3	124.0	128.0
2028	22.8	15.7	14.0	13.4	95.7	121.5	124.7	129.1
2029	24.1	16.1	14.4	13.7	94.6	122.7	125.4	130.3
2030	25.5	16.6	14.9	13.9	93.3	123.7	126.1	131.4

可见，中国大陆的老年抚养比大幅高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当年。日本的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1967年后的22年还增加了23.7%，中国台湾在1985年后的22年还增加了31.3%，韩国在1987年后的22年还增加了26.1%；而中国大陆的15~64岁人口在2014年就开始负增长，2030年（2008年后的22年）比2008年减少6.7%。

也就是说，由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2012~2030年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很难稳定在4%。并且日本、韩国当年面临较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而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

当然，社会毕竟是弹性的，今后具体经济走势是很难准确预测的。笔者这种方法只是提供一种参考。

对中国经济预测最离谱的要算胡鞍钢了，他认为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GDP）将相当于美国的2.0~2.2倍^①。这是在假设中国仍然保持前些年的高速增长率的前提下的预测。

美国的人口结构比较稳定，经济增长比较平稳，1971~1980年年均增长3.27%，1981~1990年年均增长3.25%，1991~2000年年均增长3.44%。从2001年开始，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2001~2011年GDP年均只增长1.58%。但美国经济在2010年开始走向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2017年美国GDP年均增长2.9%。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2011年美国GDP为15.09万亿美元，中国为7.298万亿美元。即便假设在2012~2030年美国GDP年均只增长1.5%，那么2030年也可以达到20万亿美元（2011年可比价）。

中国需要在2012~2030年GDP年均增长9.5%才能在2030年让GDP总量达到40万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而如果中国2011年后的人均GDP增长率依照上面表格的结果，那么2030年中国GDP总量约为16万亿美元。如上所述，中国今后人均GDP年增长率很难保持在4.3%。因此，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赶上美国（除非在汇率上“动手脚”），更不可能是美国的2倍。

美国的人口结构将远远比中国要好。1988年之后美国生育率就一直稳定在2.1附近，而中国生育率在1996~2010年平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2010年，中国、美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34.5岁、36.9岁；2030年，分别为44岁（中国依照联合国低方案为44岁，中方案则是42.5岁）、39.2岁（美国维持现有生育率）；2050年，则分别为53.4岁（中方案为48.7岁）、40.1岁。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劳动力将持续增加，结构也比较年轻（15~39岁人口一直多于40~64岁人口），将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今

^① 《胡鞍钢新书预测2030年中国GDP是美国的2倍》，人民网理论频道，2011年9月2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15775125.html>。

后几十年保持1.5%的年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中国的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15~39岁人口从2016年开始少于40~64岁人口，经济增长率必将快速下降，怎么可能继续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将低于美国。发达国家在达到中国2010年人均GDP的水平之后，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此后20年保持平均5%以上的年增长率。胡鞍钢的这一观点就像他的人口红利理论一样误导甚大。

基辛格显然比胡鞍钢等国内学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危机。2011年1月20日，基辛格接受了知名电视主持人查理·罗斯的采访。罗斯：“2050年，中国会崛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吗？”基辛格：“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出现严重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①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1年12月14日的文章也认为美国根本不必担心中国会超过美国，原因之一是由于计划生育，中国将很快遭遇人类史上最严重的老年化危机，中国劳动人口对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8:1增加到2040年的2:1。也就是说，单就抚养比例的变动所产生的财政支出就将超过中国GDP的100%。而美国由于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经济前景要好得多^②。

美国副总统拜登2012年也说：“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在未来2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相对于退休者的比例将严重下降，中国根本不可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财政问题严重程度要小得多。”^③

老有所养，谁来养

在发达国家正在为老年化而忧心忡忡，并提出鼓励生育的时候，中国一些人口学家（如李小平、彭希哲、马赢通）得出结论：老年化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中国的福音，中国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④。

^① Charlie Rose, “Charlie Rose Talks to Henry Kissinge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Bloomberg, January 20, 2011,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05/b4213015834652.htm.

^② Michael Beckley, “Don't worry, America: China is rising but not catching u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Opinion/2011/1214/Don-t-worry-America-China-is-rising-but-not-catching-up-\(page\)/2](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Opinion/2011/1214/Don-t-worry-America-China-is-rising-but-not-catching-up-(page)/2).

^③ “No way China can sustain its growth - U.S. VP Biden”, Thomson Reuters, Feb 6,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06/usa-china-biden-idUSL2E8D697S20120206>.

^④ 马赢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也认为“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来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提出“城乡一胎、奖励无胎”^①。

但是普通老百姓面对汹涌而来的老年化，既缺乏程恩富等人的那种豪气，也缺乏李小平那种“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路我就跳大江。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过梦一场”的勇气。

很多人指望建立西方那种社会制度来养老。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还是建立在人口代际传承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家里的孩子承担不了“家庭养老”，社会的孩子更加承担不了“社会养老”的。

以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建立社保制度（后面逐渐形成了包括政府养老金、雇主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在内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由于生育率较高，而当时平均预期寿命才60岁左右（2010年已经是78岁），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

在1950年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是7.7:1，2010年则是5.0:1，而2025年将是3.4:1。2011年，Market Watch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说，美国年收入在1.17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者至少要工作到84岁，即使这样，也只有50%的低收入者能退得起休；年收入在1.17万~3.12万美元之间者需要工作到76岁，大概有50%的机会能够存足够的积蓄退休；年收入在3.12万~7.25万美元之间的人士要工作到72岁；年入在7.25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人士大概可以在65岁按期退休，但是也只有大约50%的人退休后有足够的钱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②。

尽管退休年龄在一再延迟（并鼓励推迟退休），但社保仍然危机重重。1998年克林顿总统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保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③2005年，布什总统说：“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

^① 周炯：《人大代表程恩富建议股市交易时间缩短一半》，新浪网（来源：《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80303/08484570868.shtml>。

^② Robert Powell. Many of us won't be able to retire until our 80s. MarketWatch. June 9, 2011.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many-of-us-wont-be-able-to-retire-until-our-80s-2011-06-09>.

^③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SOCIAL SECURITY—February 9, 1998", Social Security Online, <http://www.ssa.gov/history/clintstmts.html>.

尽，全面破产。”^①2010年，美国许多州都承认，它们负担不起曾经许诺的养老金，要削减“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福利。现在，美国国会希望立法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欧洲各国也纷纷在推迟退休年龄。

但推迟退休年龄无疑将遭到公众的抗议，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比如2011年英国为了应对老年化危机，政府推出了退休金改革计划（推迟退休年龄、增加员工每月需缴纳的养老金额度）；但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2011年200万人（全国总人口是6200万）大罢工^②。

美国养老金制度建立了70多年了，并且1988年之后生育率一直稳定在2.1附近，人口结构远远比中国好；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老年化危机比美国要严重得多。

2010年，中国大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9%，该比例相当于美国1956年、日本1979年、中国香港1991年、中国台湾2002年、韩国2004年、新加坡2010年的水平。但是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相应年份的人均GDP（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标准）分别为10914美元、13163美元、18323美元、16855美元、16873美元、约31000美元（2008年为28107美元），而中国大陆2010年人均GDP只有大约7700美元（2008年为6725美元）。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典型的未富先老，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美国那种社保制，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了，养老前景实在不敢乐观。

2010年中国是8.4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目前只有城市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保，依靠全国8亿劳动力来支撑目前的养老体系。但即便如此，养老金也开始出现危机，《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称，2010年，上海、江苏、湖北、湖南等14个省份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入收不抵支^③。最早变老的上海，最先遭遇养老危机，养老金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每年养老金的巨额缺口，已成为上海市本级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④。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1.78亿、1.19亿；而到2037年，将分别超过4亿、3亿；到2050年，分别达到4.5亿、3.4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

^① George W.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February 2, 2005", Social Security Online, <https://www.socialsecurity.gov/history/gwbushstmts5.html>.

^② CNN Wire Staff, "British workers strike over retirement benefits", CNN, November 30, 2011, http://articles.cnn.com/2011-11-30/world/world_europe_uk-public-sector-strike_1_british-workers-strike-strike-protests-pension-reforms?_s=PM:EUROPE.

^③ 任民：《中国近半数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 缺口达679亿元》，中国新闻网（来源：《广州日报》），2011年12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2-26/3557473.shtml>。

^④ 谈佳隆：《上海社保每年亏百亿 俞正声称应控制公务员涨薪》，中国新闻网（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2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2-15/2843168.shtml>。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养老金短缺将是今后各届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由于年轻人口涌向城市，农村养老危机更严重，比如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城市、农村分别为7.66%、10.03%。有些年轻人为了逃避养老的义务，进城后断绝与父母的联系。

有人说靠自己积蓄养老。但是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4000元，辛苦积蓄的10万元只能请2年的保姆。今后物价上涨，辛苦一生积累的养老钱买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养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存钱不如存人，多养个孩子等于买份最好的养老保险。少壮不努力(生几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中国是既不优生，又不优育

先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

优生学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理想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①。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人的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

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优生学理念。罗马的十二木表法准许家长将看得出来有畸形的婴儿处死。“高素质”的罗马人的帝国最终被“低素质”的日耳曼人所灭。

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于1883年首创现代优生学。纳粹德国根据优生学进行种族灭绝，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认为是伪科学），改头换面变成了人口学。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也将优生优育列为国策，可见中国人口政策确实是受国际优生学的影响。

^① Chester G. Star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of Early Greece 800—500 B.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41-42.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高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高；“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也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笔者一直认为，Richest（多样性）比Fittest（完美性）更为重要^①。

社会是一盘五味俱全的菜，谁是高素质？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學生，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城市由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

先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抱着一个自杀性的人口政策，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① 易富贤：《多样比完美更重要》，新华网（来源：《环球》杂志），2009年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9-02/24/content_10883863.htm。

计划生育降低了人口素质

计生委一直宣传说计划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质，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人口素质真的提高了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一群“草莓族”：外表看起来色彩鲜艳，里面却苍白绵软，稍一施压就变成一团稀泥，表层还疙疙瘩瘩的挺有个性。很多独生子女有“娇骄”二气，在一些毕业生招聘会上，有些招人单位直接拒绝了独生子女。对单位来说，与学习成绩、专业素质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精神这些“软件”更加重要。由于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出现一批中国特有的“啃老族”。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结婚年龄，这群人的离婚率非常高。一方面是因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双方性格难以磨合），一方面是双方四个父母的因素（父母过度干预子女家庭）。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该提案认为：“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巨额的超生罚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超生致贫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素质降低。并且一些超生的孩子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的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20岁左右是妇女生小孩的黄金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大多数国家的妇女法定结婚年龄都在18岁或以下，但中国《婚姻法》却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一方面

降低了人口素质，一方面增加了不孕的发病率。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等疾病在二胎及其之后胎次的发病率不到头胎的一半。但是随着生育间隔拉长，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逼近头胎时的发病率）。独生子女政策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增加了人群中疾病的发病率。

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学说

长期认为心脑血管疾病是富贵病，但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戴维·巴克（David Barker）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出生于与死亡记录时发现，生活水平较差的西北地区的成人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反而比富裕的东南部高。1995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疾病的“胎儿起源假说”^①，后面被补充完善为“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学说”（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音译“都哈”）。2003年，成立了国际HOHaD学会^②。

DOHaD学说认为，如果生命在发育过程的早期（包括胎儿和婴幼儿时期）经历不利因素（营养不良、营养过剩、激素暴露等），会导致其组织器官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永久性或程序性改变，将会增加成年后罹患肥胖症、II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呼吸肺功能异常、免疫功能紊乱、骨质疏松、老年痴呆、精神疾患、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③。

DOHaD学说的一些理论基础：

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都属于终末分化的细胞，在出生的时候数量就恒定了，在受到损伤后不能像皮肤细胞那样通过有丝分裂进行修复。在出生后的成长过程中，细胞体积变大，但数量不变。如果子宫内发育不良，将使得神经细胞、心肌细胞数量不足。到了成年之后，有限的心肌细胞将超负荷运作，增加心脏疾病的风险。

人体通过肾单位将血液的废物排出体外并调节血压。肾单位数目出生后不再增长。子宫内肾发育不良在出生后是无法弥补的，成年后有限数量的肾单位超负荷工作容易出现死亡，部分肾单位损耗后将导致高血压，高血压进一步导致肾单位死亡，形成恶性循环。

高胆固醇血症是脑卒中、冠心病、心脏猝死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高胆固醇血症是不健康的饮食所致。其实，血液中的胆固醇只有少部分来源于食物，

^① Paneth N, Susser M, "Early origi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Barker hypothesis")", BMJ. 1995;310:411-2.

^②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 <http://www.mrc.soton.ac.uk/dohad>.

^③ Barker DJ,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theory", J Intern Med, 2007; 261:412-7.; Calkins K, Devaskar SU, "Fetal origins of adult disease", Curr Probl Pediatr Adolesc Health Care, 2011; 41(6):158-76.

仅靠减少胆固醇摄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高胆固醇血症。血液中的胆固醇主要是肝脏合成的，肝脏并控制着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当胎儿在子宫内肝脏发育不全（比如编码某些关键酶的DNA甲基化减少），成年之后就会出现高胆固醇血症。

胰岛素是在进食后由胰岛 β -细胞分泌的，它传递信号给体内的胰岛素感应组织，使之通过吸收葡萄糖来降低血糖含量到一个正常值。 β -细胞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基本发育完成。胎儿的营养供应不足将一方面影响 β -细胞的发育，另一方面降低肌肉和脂肪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会导致成年后的糖尿病。

服用多子丸而怀孕多胞胎，往往会因为子宫内发育不良出现畸形、死胎，即便存活，也会导致大量成年后的疾病（自然的多胞胎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孩子还是应该一个一个地生。

“造物主”通过侦察胎盘血流的营养状况预测胎儿出生后的生活水平，从而“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胎儿器官。如果出生后生活水平有偏差，更容易患病。低体重、低身高的新生儿在出生后一般都会有一段赶超阶段，但赶超得越快意味着今后疾病的发病率越高。如果营养过剩，也不利于胎儿发育。比如出生体重和糖尿病发病率的关系呈U型，即出生体重过高和过低的人最易患糖尿病^①。出生时高体重儿女孩成年后乳腺癌发病率更高。

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资料和动物实验支持HOHaD学说。1944~1945年，荷兰发生饥荒，那些在饥荒时期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甚至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等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以南卡州为中心的美国东南部地区中风的发病率非常高，被称为“中风带”，这个区域肾衰、肥胖、糖尿病的发病率也非常高，高昂的医疗成本威胁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研究发现，“中风带”地区患者（几十年前出生）出生时的低体重儿比例很高，原因是他们的母亲的骨盆很小，使得孩子在子宫内发育不良；而他们母亲骨盆小，又是因为她们在幼年的时候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D。回顾历史，发现从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地区一直很贫穷，尤其黑人更是如此。研究美国纽约和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些患者的家族史，也发现类似现象^②。可见，营养不良既是贫困的结果，也是贫困的原因。

中国近年也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发现1958~1961年饥荒年代出生的子代，其成年

^① Wei JN, Li HY, Sung FC, Lin CC, Chiang CC, Li CY, Chuang LM, "Birth weight correlates differently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youth", *Obesity*, 2007;15:1609-16.

^② The barker theory, <http://www.thebarkerttheory.org>.

后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大大增加^①。

也就是说，人之初这1000天（从怀孕开始到2周岁）的发育将影响今后一生的健康，有些影响甚至会持续好几代人。

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称DOHaD理论为“新的科学”。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罗马就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发表演讲中说：“所有的研究都已得出极为明确的结论：从妇女怀孕的第一天起直至孩子二周岁生日的关键1000天内，良好的营养对于拯救生命与提高人的一辈子认知能力和体力具有最大的影响。”因此2010年，美国政府与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爱尔兰政府和世界其他领导人联合启动了“1000天计划”，给孕妇、婴幼儿提供合理的营养^②。

2003年，Barker教授加入了美国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Kent Thornburg教授领导的的心脏研究中心。笔者这些年也正在进行该方向的研究^③，并有幸当面向Barker教授和Thornburg教授请教过。

剖腹产、人工喂养后患无穷

人生最初关键的1000天对今后社会的长期健康、稳定和经济繁荣非常关键。最佳的“优生”是自然生产，最佳的“优育”是母乳喂养。

除了母乳外，对婴儿来说，没有真正安全的食物。母乳喂养对母亲的内分泌平衡、产后恢复大有好处，母乳喂养还大大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母乳喂养的孩子在生理、心理发育上都要优于非母乳喂养的孩子，并且成年之后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也明显降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单纯用母乳喂养婴儿6个月，6个月后再继续母乳喂养的同时适当添加辅助食品，并号召各国必须将婴儿纯母乳喂养率提高到80%以上；但是根据卫生部2012年的资料，当前我国出生后6个月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

① 婊娟、杨慧霞：《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研究现状》，《国际妇产科杂志》，2011年1期。

② 《国务卿克林顿在罗马就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发表讲话》，《美国参考》（来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2011年5月6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1/05/20110509134252x0.238088.html>。1000 Days, <http://www.thousanddays.org>。

③ Yi FX, Bird IM. “Pregnancy-specific modulatory role of mitochondria on adenosine 5'-triphosphate-induced cytosolic [Ca²⁺] signaling in uterine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 *Endocrinology*, 2005 ;146:4844-50. Yi FX, Magness RR, Bird IM, “Simultaneous imaging of [Ca²⁺]_i and intracellular NO production in freshly isolated uterine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 effects of ovarian cycle and pregnancy”, *Am J Physiol Regul Integr Comp Physiol*, 2005;288:R140-8. Yi FX, Boeldt DS, Gifford SM, Sullivan JA, Grummer MA, Magness RR, Bird IM, “Pregnancy enhances sustained Ca²⁺ bursts and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activation in ovine uterine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 through increased connexin 43 function”, *Biol Reprod*, 2010 ;82:66-75. Yi FX, Boeldt DS, Magness RR, Bird IM, “[Ca²⁺]_i signaling vs. eNOS expression as determinants of NO output in uterine artery endothelium: relative roles in pregnancy adaptation and reversal by VEGF165”, *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 2011;300:H1182-93.

30%。^①

同样，经过产道出生才是“正道”，而剖腹产是“旁门邪道”。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普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不应该高于10%，在专门收治疑难病例的特殊医院，剖腹产的比例也不应该高于15%。但中国的剖腹产比例目前已经高达46%了（一些妇产科医生认为“可能会达到60%甚至70%”）^②。中国剖腹产比例攀升的原因大致如下：

① 子宫是一次性器官。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人只能生一个孩子，并且生育意愿也下降，没有超生的意愿，子宫成了一次性器官，没有必要珍惜。

② 医院责任。剖腹产“短、平、快”，医院的医疗责任轻，收入更高。医院非常愿意剖腹产。

③ 疼孩子：误以为挤压对孩子不利，剖腹产孩子更加聪明。其实刚好相反，胎儿受压的同时也对脑部血管循环加强刺激，增强脑的功能；剖腹产还因为医源性早产导致神经细胞数量不足。

④ 怕影响体形和性爱。其实这是错误的，自然顺产反而更有利于产妇全面恢复。顺产后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阴道的弹性，不会影响性生活。绝经期之后妇女会出现阴道萎缩，尤其是未生育或剖腹产的妇女萎缩更严重；而自然生产过的妇女内分泌更加平衡，在绝经期后，阴道萎缩会相对较轻，性生活的质量会比剖腹产的更高些。

⑤ 怕疼。自然生产产程长，年青一代娇气，怕疼痛。

⑥ 盲目营养，巨大儿比例增加。此外，孕妇产道脂肪多也不利于自然分娩，这也导致剖腹产增多。

⑦ 选择良辰。有些人希望孩子有一个好八字，选择良辰剖腹产。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为了追求虚渺的“天时”（好的生辰），却去破坏“地利”，是不明智的做法！

⑧ 育龄的延迟。中国初育年龄不断延迟，高危妊娠比例增加。

⑨ 前一胎是剖腹产，第二胎也选择剖腹产。其实，第二胎仍然是可以选择自然顺产的，但需要与医生商量。

怀孕是最重要的生理过程，尾声就是高潮，剖腹产等于是删减了这一生理过程的

① 蒋彦鑫、徐晗：《卫生部：中国半岁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30%》，新华网（来源：《新京报》），2012年8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8/02/c_123511479.htm

② 操秀英、唐婷：《透视剖腹产率畸高的背后》，《科技日报》，2010年1月31日，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1/31/content_151980.htm。

最为关键的部分，对母婴都是不利的。对母亲来说，剖腹产手术增加大出血和感染的机会，增加麻醉及手术意外、羊水栓塞（患可致命）的风险，还不利于妇女内分泌的平衡，增加乳腺癌、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的病因之一）等妇科疾病的发病率。

对孩子来说：

① 剖腹产让孩子提前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周出生，导致医源性早产。上面已经提到，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肾单位、胰岛 β -细胞等都是在出生前就完成发育，出生后不再增加数量。“宫内3天，宫外1年”，子宫内的发育分秒都很重要，在母体内没有完成的某些发育，在出生之后是很难补偿的。从国家来说，胎儿在子宫内发育时间平均每减少几个小时，对整体人口素质都有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在“优生优育”上的所有努力抵消不了将剖腹产比例提高1%所造成的危害。医源性早产，还可以引发一系列早产儿并发症，如颅内出血、视网膜病或残废甚至死亡。

② 降低免疫能力。自然生产的孩子，经历母亲阴道中大量乳酸杆菌等的洗礼，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免疫接种。这些益生菌及早在新生儿无菌的消化道安营扎寨，占领优势制高点，然后形成多样化菌群，保持菌群平衡。而剖腹产的新生儿错过了最重要的免疫接种，他们的消化道让来自皮肤的金葡萄球菌等卡位，形成多样化菌群的速度比较缓慢，甚至到7岁时仍与顺产儿有差别，免疫系统的形成一辈子都落后一步，抗感染能力弱，易感冒，过敏、哮喘等发病率高。^①

③ 小儿多动症、统合失调症、协调能力差。自然生产时，胎儿受压的同时也对脑部血管循环加强刺激，并且挤压是必要的触觉和本体感学习。但是剖腹产让胎儿丧失了人生的最重要的锻炼机会，未经“训练”就投入到“人生的战场”上，“直面惨淡的人生”，胎儿从宫腔直接取出受到气压骤变的影响而产生损伤，因为在剖腹产时，小儿胸部未受挤压，易出现缺氧症状，使婴儿的大脑发育受到损害，影响智商和运动功能。

④ 肺部疾病。自然分娩时，产道挤压可将积存的胎儿肺内以及鼻、口中的羊水和粘液挤出。但剖腹产由于孩子未经产道挤压，胎肺液不能充分排出，易患上“湿

^① Maria G. Dominguez-Bello, Elizabeth K. Costello, Monica Contreras, Magda Magris, Glida Hidalgo, Noah Fierer, and Rob Knight, "Delivery mode shapes the acqui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initial microbiota across multiple body habitats in newborns",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vol. 107, no. 26 (Jun 2010), pp. 11971-5.

Negele, Joachim Heinrich, Michael Borte, Andrea von Berg, Beate Schaaf, Irina Lehmann, H.-Erich Wichmann, Gabriele Bolte, "Mode of delivery and development of atopic disease during the first 2 years of life", *Pediatr Allergy Immunol.* Vol. 15, no 1 (Feb 2004), pp. 48-54.

Salminen I, G R Gibson, A L McCartney, E Isolauri, "Influence of mode of delivery on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in seven year old children", *Gut*, vol. 53, no 9 (Sep 2004), pp. 1388-1389.

肺”，发生新生儿窒息、肺透明膜等并发症。

⑤ 剖腹产婴儿死亡率比自然分娩高，术中也可能伤及胎儿或术后牵拉导致胎儿骨折或是发生羊水栓塞等。

剖腹产还影响母乳喂养：

① 剖腹产导致生产与激素水平不同步，研究发现，剖腹产术后产妇泌乳的始动时间，也就是胎儿娩出至产妇自觉乳胀、挤压乳房时第一次有奶水排出的时间，要比自然分娩的新妈咪晚近10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孩子可能习惯了人工喂养，而不愿意再吸母乳了。

② 体内的催乳素水平偏低。

③ 术后的体位限制、疼痛、心理因素等影响母乳喂养。

④ 选择剖腹产的产妇往往也娇气，她们往往同时选择人工喂养。

因此剖腹产比例增高也意味人工喂养比例的增高。

此外，剖腹产还不利于今后生育：

① 有剖腹产史的孕妇在今后妊娠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子宫破裂，胎儿可能流产或留下终生障碍；产妇会大出血，甚至切除子宫。

② 剖腹产破坏子宫完整性，今后的胎儿在一个不完整的子宫环境下发育。

③ 由于剖腹产的风险，很多妇女再生育意愿降低。

④ 剖腹产成本高，增加生育成本。

中国出生后6个月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30%，意味着70%的孩子没有获得“安全食品”。中国50%的孩子是剖腹产，意味着一半的人口是“出生缺陷”。作为整体，今后中国的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肾功能衰竭、肥胖症、精神疾患等发病率将很高（从个体看，发病概率还是不高的，“过去”的家长不必过于担心，但“今后”的家长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而那时，中国又是劳动力短缺、老年化严重的时期。

中国表面上是“优生优育”，但实际上是既不“优生”，又不“优育”。需要站在国家战略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了！

失独家庭数量在快速增加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舍小家，为大家”，小家是舍了，大家也完了！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坚持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

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①。

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为“稀有品”，孩子承载着六位长辈的全部希望，也因此成了罪犯报复社会的目标，2010年连续校园凶杀案让全国人民都揪心。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如何度过余年？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是一柄悬在几乎每一个家庭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计划生育让这一代人很多断子绝孙，让下一代人举目无亲。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②，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就已经占了15.6%；1980年到1989年由于生育率还稳定在2.4，独生子女比例也稳定在19.3%左右。1990年之后生育率急剧下降，独生子女比例也不断提高到1995年的35.1%、2000年的49.5%、2005年的64%。依照2010年的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采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历年的独生子女的比例，假设2006年到2010年独生子女比例也是64%，那么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其中70%是产生于1991年之后，50%产生于1998年之后，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家庭在加速增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计算，每出生1万人，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近年，死亡率略有下降，也大约有4%的孩子在25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26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2.2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51岁的时候有近千万已经遭受丧子之痛。现在正常人群就有1/8家庭不孕不育了；妇女生育能力在27岁就开始下降，而人们普遍晚育，孩子10岁以后夭折，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失独者潘教授对中央电视台说：“凡是独生子女的家庭都是在走钢丝，只不过我们掉下去了。”

对人类来说，后代不仅仅是血脉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价值观和文明的延续。在古代，“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但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却将有数百万个“断子绝孙”的家庭，世代相传的生命链在他们身上戛然而止，不但传统的“养儿防老，养子送终”变得不可能了，甚至连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变得是奢求了，有些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几岁，并且女人比男人长寿几岁。很多失独家庭的妇女在失去了孩子之后，丈夫也离她们而去，她们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困境，更有精神上的孤寂。

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是建立在健全的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对部分失

^① 穆光宗：《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学习时报》，2004年10月18日第四版。

^②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2005/renkou.htm>。

独家庭来说，既然无法“慎终”，也就无从“追远”，他们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胁社会稳定。

目前还只有上百万失独家庭，比例还非常低，如果能够妥善处理，给这些家庭以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慰藉，还是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的。

但是今后却有近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即便由于成功补生，上述失独家庭数量减少一些，但是相对于目前上百万的失独家庭来说，仍然是数量级的差别，对社会的震撼力将是非常巨大。而其他家庭也大多只有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是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失独家庭。

因此，失独家庭的加速增长，不仅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遏制独生子女家庭增长的势头，减少今后失独家庭的数量；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应对失独危机的能力。



第**6**章

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适度人口”理论摧毁古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奠定了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了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多地生孩子，强调多子多福。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儿育女^①。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最完善、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维持人口数量不超过一定数量的国家，能自给自足而又不难管理。国家对人口进行严格管理是合法和有益的”，“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③。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④。这算是最早的

① 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

②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

希腊以“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将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抛到弃婴场去），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文明灭亡不可避免。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艾德温·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1888）一书中最先较系统地提出了“适度人口论”。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彭格勒（Joseph Spengler）分别在1952年和1972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该书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呈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增长的极限》掀起了强大的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的人口政策。

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中国历史上担忧人口过多者也大有人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人口2000

万左右，但秦国的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同为法家的商鞅和李斯受到秦王的重用，而韩非子却不能为秦王重用。很多人认为韩非子抱屈。其实，秦始皇不重用韩非子是有其道理的。秦国是采纳商鞅、李斯的“人众兵强”的人口思想而崛起，而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商鞅和李斯刚好相反，而与两千多年之后的欧洲的马尔萨斯非常相近。韩非子认为，人口饱和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韩非子只见树木，而商鞅和李斯却看见森林。所幸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将《韩非子》视为邪说而不加采纳，否则，中华民族早已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小民族了。

唐初诗人王梵志，反对“多生”，以诗歌形式写出了不少计生“标语”，比如：“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

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认为，人口素质比数量重要，“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少生”、“优生”理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庸惰之辈”。

明朝中国人口曾经达到6000多万，大臣徐光启（1562~1633年）提出“生人之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的观点，比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说法早了近两百年。但是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瘟疫等因素，人口锐减。

乾隆皇帝看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发现人口激增，不无忧虑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五倍的意思），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当时，中国的人口3亿多。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乾隆五十八年写了《治平篇》，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分析了人口膨胀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这是全世界的第一篇人口专论，比英国学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了5年。

如果说徐光启、洪亮吉和马尔萨斯是因为处在人口增长期，没有预见能力的话，那么被中国现在人口学界尊称为“中国马尔萨斯”的汪士铎就纯粹是马后炮了（就像1980年的计划生育一样），因为从1800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整体增加已经非常缓慢。汪士铎1850年还在惊呼“人多之害”，汪士铎主张以“复族诛之法，推广连坐之条”、妇女犯有死罪一律“皆（斩）决而无监候（死缓）”、溺女婴以减少女人、听

任灾疫流行等办法以减少人口，保证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平衡。

清朝皇帝没有采纳洪亮吉、汪士铎的观点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在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几乎没有增加，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例也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00年的26%，2011年更是只有19%了。要是清朝皇帝采纳洪亮吉、汪士铎的观点控制人口的话，现在中华民族可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族了。

近代研究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的著作浩如烟海。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 Cohen）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书中对人类在近400年来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迄今为止，估计数已问世65个之多。这些估计数的差别大得惊人，从最低的不足10亿到最高的超过1万亿。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中国人口容量的估算相对比较保守并且趋同，早在解放前，中国有的学者就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适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人口数量发展目标的是孙本文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的《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成为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热门问题，田雪原、陈玉光、宋健、宋子成、孙以萍、王浣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胡鞍钢、曹明奎、毛志锋、朱国宏、袁建华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推测数据。对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宋健，因为他的人口控制论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1981年，宋健、田雪原等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①。2010年，宋健仍然坚持“适度人口”、“零增长”、“不悖老年化”理论，并认为应“尽早确定中国21世纪下半叶的适宜人口数量”^②。

由于1980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不争论”的政治、学术大环境，以及宋健等在人口学界的权威性，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多受宋健等人结论的影响，以至于都得出类似的结论。根据蒋正华的综述：“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角度不同、方向各异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人或16亿人左右，而超过18亿人到20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就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而言，人口数目约在7亿人到10亿人之间。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远期人口以保持4亿人为好。”^③

① 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6期，第21～31页。

② 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③ 蒋正华、张羚广：《中国人口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06年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认为，继续现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会达到15亿人口极限，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①。

与宋健的人口思想一脉相传的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观点，李小平以美国现在的标准，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将人口降低到3亿。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网特邀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嘉宾聊天室，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②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应该实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以此来较快“先控后减”总人口，递减到大约5亿左右。那么才能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③。他在2010年主编出版了《激辩“新人口策论”》^④，将笔者的观点作为乙方，将他自己和李小平等支持计划生育的观点作为“甲方”，花了很大篇幅批驳笔者的《大国空巢》。宋健为该书撰写特稿（相当于序言），称赞李小平的观点“极中肯綮”。

要是中国人口只有7亿、5亿会怎样

现在回过头来检验宋健等学者的预测，发现他们的预测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预测未来，过去的一二十年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预测是错误的。比如宋健等（1981）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的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全国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孩子，在100年内依靠我们自身的土地资源，饮食水平将不可能达到美国目前水平；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当时的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还出现粮食大量过剩，粮仓爆满，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不知这些学者又作何感想？

假如宋健的“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纵

^①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政府网，2007年1月11日，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677.htm。

^②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谈免费强制婚检和富人超生》，新浪嘉宾访谈，2006年3月8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

^③ 周炯：《人大代表程恩富建议股市交易时间缩短一半》，《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日，引自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80303/08484570868.shtml>。谭皓，常旭：《社科院专家称中国人口应先控后减到5亿人》，《华商报》，2010年3月12日。

^④ 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第二，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其实，美国的发达不是因为人口少，相反，美国的崛起恰恰是人口推动的。现在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应。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已达3亿。张敏才等中国一些人口学家为美国担忧，认为人口增加将导致美国国力、生活水平下降^①。但是美国很多学者认为人口增加意味着繁荣，美国突破人口3亿大关象征着美国比起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制度上更具吸引力。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美国人口是一百年前的4倍，但是美国人比1906年生活得要好多，平均寿命从48岁增加到78岁；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美国控制了致命传染病的流行；美国人民呼吸的空气更新鲜，饮用的水更清洁，食品更加丰富多样，住房面积更宽敞。他认为，没有理由质疑生活质量上升的趋势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起变化。同时，Griswold认为，美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说，自1900年以来，美国人口一直维持1.31%的增长。但在过去15年里，降到每年1.16%。200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跌到1%以下。因此，Griswold认为，美国突破人口3亿大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他说，美国人口众多才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②。

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87%，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2010年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2.7%，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阿根廷面积相当于印度的84.6%，2010年人口只相当于印度的3.5%，但12亿人口的印度是世界大国（今后还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4000万人口的阿根廷根本算不上大国，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2010年，俄罗斯人均国土面积是美国的3.8倍，但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2%。俄罗斯

^① 张敏才：《美国高度关注人口安全——聚焦人口数量》，国家计生委网站（来源：《2005年中国区域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5年6月30日，http://www.chinapop.gov.cn/rkl/dcyj/200506/t20050630_121522.html。

^② Daniel T. Griswold, "America, 300 Million Strong", The Cato Institute, October 11, 2006, <http://www.freetrade.org/node/514>.

斯人口从1992年就负增长，但是人口却加速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集中，因为其他城市都趋于消亡，只有两个大城市还有些活力。莫斯科的人口在1989年为897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莫斯科人口增加到了1150万；而有些学者推测，莫斯科实际人口在1300~1700万之间^①。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2平方（远远比中国少）^②，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

中国目前县城缺乏活力，人口往地级、省会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广州聚集。一旦人口负增长，地、省城市也将缺乏活力，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更加拥挤。

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减少新生人口，这意味着社会持续老化，等人口以这种方式减少后，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比例已经很低了（很容易惯性地降到几千万乃至灭亡），人口结构已经是不可持续发展了（抚养比将达到历史最高，缺乏创新能力，也缺乏生育小孩的愿望）。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2010年总人口13.4亿，27岁及以下的人口有5亿，37岁以下的人口有7亿。根据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即便2010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也要在2053年后人口才会降低到7亿（没有43岁以下的人口了），到2064年还才会降到5亿（没有58岁以下人口了，由于没有了育龄妇女，意味着民族灭绝），到2075年后才会降到3亿。

假如生产力停滞不前的话，理论上是在存在人口承载上限；但是生产力水平低，也意味着人口再生产的效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寿命短），实际人口是难以达到人口承载上限的。比如，清朝之前，中国人口只在明朝曾短时超过6000万^③；但是当时湖南、广西等很多南方地方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说明中国人口承载上限超过当时的实际人口。2008年中国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4倍，但人均GDP却增加了14倍^④。因此，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来断言未来人口上限，是刻舟求剑。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⑤，如果生育率沿着低方案走的话

^① Herbert Mosmuller, "Moscow population: capital may hold 17 million people", Telegraph, 03Jun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sponsored/russianow/society/8555676/Moscow-17-million-people.html>.

^② 阿尔乔姆·日丹诺夫：《住房问题困扰俄居民 亟待政府出台有效措施》，《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5月28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2/05/1761410.html>。

^③ 《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ekoubiao.htm>。

^④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⑤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其实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中国实际生育率将比联合国低方案还要低），中国人口将分别在2081年、2100年降低到7亿、5亿。201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34.5岁（发达国家是39.7岁），而到2081年将是59岁；2010年是8.4个（发达国家2010年是4.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到2081年将是1.15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也就是说，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假如不鼓励生育的话，中国人口确实能够在100年以内降低到程恩富所期待的5亿左右，但老态龙钟的国家如何“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耕地和粮食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原因是认为中国资源短缺^①。1980年以来长期宣传是中国人均耕地只有印度的一半，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②，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2011年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说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的1/4，耕地接近警戒红线，粮食需求将冲击世界粮食市场，应该将中国人口有序地减少^③。

粮食危机是控制人口思潮的重要依据。1970年，《人口爆炸》作者埃利希警告道：“在接下来的10年内，至少每年1亿至2亿人将会因饥饿而死亡……”他还预测20世纪80年代早期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并且把“只有”5亿人因饥饿而死描述为一种“乐观的”景象^④。现在看来，当初的预测全部破产，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⑤，1970年世界粮食产量只有10.2亿吨（人口为36.9亿），但2008年突破了25亿吨（人口为66.9亿），粮食增长远远快于人口增长，人均粮食在不断提高。“粮食危机”倒没有饿死人，但“粮食危机理论”却“吓死”了数亿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响应这种理论控制人口）。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于1994年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很大轰动。包括徐匡迪在内的很多人将布朗的预

① 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6期，第21~31页。

② 隋喜文：《“吃饱饭”是了不起的成就》，《人民日报》，2009年11月4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314210.html>。陈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升华》，《人民日报》，2004年3月25日第九版，<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5/2409233.html>。

③ Xizhe Peng,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cience, Vol. 333 no. 6042 (29 July 2011), pp. 581-587.

④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30-132.

⑤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看成是对中国人口问题敲响了警钟，认为必须继续计划生育。

其实，布朗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口1990年11.43亿，依照布朗的预测，中国人口2000年13.07亿，10年增加1.63亿，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43亿，10年只增加1亿，比布朗的预测少40%。布朗说到2017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2045达到16.6亿。其实，即使中国1980年就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达不到布朗的预测数字。

布朗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年均耕地减少1.2%的事实为依据，预测中国的人均耕地将从1990年的0.08公顷（1.2亩）下降到2030年的0.03公顷（0.45亩），前景让人十分担忧。布朗采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传统耕地面积，这些数据和后来用卫星遥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严重偏小。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1980年和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分别为14.90亿亩和14.246亿亩。后面经过卫星遥测，2000年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公布了截至1996年10月末的全国耕地总量，比同期原口径增加了5.26亿亩，达到19.506亿亩^①。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工业和交通用地占用耕地，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太低。比如日本和韩国农业用地分别只占国土面积的14.2%和19.6%，而中国农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9.4%。中国工业化后占用农业用地比例将远远低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由于城市和道路用地，中国耕地面积下降到2005年的18.31亿亩^②。当时联合国、主流人口学家们以及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的牛文元等人都预测在现行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16亿的高峰^③。这些学者建议保护耕地，受他们的误导，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公布了研究成果，也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更加决定了决策层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决心。

其实，“以耕地来限制人口，再以人口来约束耕地”这种缩手缩脚的发展思路是有问题的。中国由于对耕地的限制，城市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北京、上海超过1.5万人）这种高密度进行规划的。中国2011年城市化已经达到51%，占全国人口一

① 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国家统计局，2001-08-01，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t20020331_15502.htm。

② 《1983年—2006年中国耕地面积（表）》，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年12月11日，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07-12/11/content_9371101.htm。

③ 陶春：《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学习时报》，第200期，<http://discovery.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44594.htm>。王桂玲：《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

半的城市人生活在6万多平方公里（不到1亿亩）的土地上（只占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必然导致高房价、高民生压力、城市拥挤、环境污染。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耕地撂荒现象却非常严重，2011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①。也就是说，中国撂荒的耕地总面积可能已经超过了城市总面积。此外，由于年轻劳动力短缺，南方很多适合种植双季稻的地方改种单季稻。现在有人提出复耕进城农民的宅基地。其实，既然耕地不是问题，何必打农民的宅基地的主意？宅基地被破坏，也意味珍贵的乡村文化被破坏，人文地理的损失今后是很难弥补的。宅基地是“心灵的家園”，与墓地一样，攸关生育文化的兴衰。这事得慎重，不可一窝蜂地推行。

事实上，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中国人口也难以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15亿、16亿。那么采纳“18亿亩耕地/15亿人口”（1.2亩/人）的标准，14亿人口只需要16.8亿亩耕地。“多出”的1.2亿亩（8万平方公里）耕地加上耕地之间的“非耕地”，可以给城市发展提供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40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美国芝加哥、费城的标准）计算，可以容纳4亿多城市人口。而中国2011年城市化已经在51%，也就是有6.5亿左右人口已经在城市生活；今后以14亿总人口、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将在9.8亿，只比目前多3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规划根本不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既可以吃得好，也可以住得舒坦。

其次，1.2亩/人的耕地标准本身就没有科学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产还将大幅提升，对耕地的需求还将减少。即便中国人口真的达到15亿（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不可能的）、甚至20多亿，粮食也不是问题。即便大城市全部依照美国芝加哥、费城的那种城市规划（中小城市甚至可以实行更为宽松的土地政策），中国也是有足够土地的。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10》^②，全球土地和耕地分布很不均匀，全球陆地总面积13003万平方公里，其中苏联、美国、加拿大、大洋洲、蒙古这五个地区陆地总面积为4970万平方公里（超过全球38%），但是2010年人口只有6.71亿（不到全球10%）。美国、加拿大、苏联、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共10.6亿人口，占全球15.4%，但却拥有全球41.5%的耕地。

2008年，全球人口超过两千万的国家共有55个，人口60.4亿，占全球89.5%的人

^① 《新华纵横：土地撂荒隐忧》，新华网，2012年4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2-04/22/c_123017764.htm。

^② “FA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0”，FAO，<http://www.fao.org/economic/ess/ess-publications/ess-yearbook/ess-yearbook2010/en>。

口、91.3%的耕地、87.5%的粮食产量。除中国以外的54个国家总人口47亿，有25个国家（18亿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比中国高，其他29个国家（29亿人）的HDI比中国低。

表6.1（基本是依照HDI排序）的中国的耕地数据（18.27亿亩）采纳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号）》^①，人均森林面积采纳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世界森林状况》的资料^②，其他数据采纳《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10》的资料（其中人口、耕地、粮食产量是2008年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量、蛋白、脂肪以及谷物和肉类自给率是2005~2007年资料）。其中粮食包括谷物（占世界粮食的92.3%）、薯类（按5公斤鲜薯折1公斤粮食计算）、豆类。人口密度是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中国2008年人口为13.44亿，是过于夸大的。

表6.1 人口上2000万的55个国家耕地、粮食产量、膳食营养成分比较

国家	人口 (百万)	人口 密度	人均 森林 (亩)	人均 耕地 (亩)	产量		人均每天膳食			自给率(%)	
					人均 粮食 (公斤)	谷物 亩产 (公斤)	热量 (大卡)	蛋白 (克)	脂肪 (克)	谷物	肉类
澳大利亚	21	3	106.28	31.34	1773	118	3186	106	143	355.1	166.8
加拿大	33	4	139.88	20.34	1862	220	3530	104	145	166.5	135.3
日本	127	349	2.94	0.51	103	395	2806	92	90	24.1	51.7
法国	62	113	3.86	4.42	1164	497	3553	113	164	184.3	101.4
美国	312	34	14.63	8.21	1313	483	3770	114	161	131.3	106.8
西班牙	45	89	6.14	4.21	554	197	3271	108	151	62.1	113.3
意大利	60	203	2.30	1.79	371	336	3657	112	158	78.2	75.7
英国	62	254	0.71	1.47	429	467	3442	104	145	98.6	64.8
德国	82	236	2.03	2.18	640	480	3530	99	143	113.6	100.7
韩国	48	497	1.94	0.48	154	472	3074	88	86	26.2	69.1
波兰	38	125	3.68	4.95	787	232	3397	101	114	98.1	113.3
阿根廷	40	15	11.06	12.04	944	211	3001	94	108	302.4	120.2
墨西哥	109	56	8.96	3.43	349	207	3245	92	95	63.6	81.4
委内瑞拉	28	32	24.69	1.44	178	255	2582	71	74	60.7	94.2

①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年2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t20080229_402465309.htm。

② 《2011年世界森林状况》，联合国粮农组织，<http://www.fao.org/docrep/013/i2000c/i2000c.pdf>。

续表

国家	人口 (百万)	人口 密度	人均 森林 (亩)	人均 耕地 (亩)	产量		人均每天膳食			自给率(%)	
					人均 粮食 (公斤)	谷物 亩产 (公斤)	热量 (大卡)	蛋白 (克)	脂肪 (克)	谷物	肉类
沙特	25	12	0.59	2.05	100	347	3133	87	87	24	54.7
罗马尼亚	21	93	4.62	6.12	825	188	3510	111	109	100.9	71.6
马来西亚	27	82	11.36	1	92	250	2908	79	84	21.4	87.8
俄罗斯	141	9	85.83	12.91	806	152	3272	97	92	117.5	65.4
巴西	192	23	40.59	4.77	466	235	3099	84	105	95.1	142.2
哥伦比亚	45	41	20.16	0.61	130	268	2662	65	72	42	99.8
秘鲁	29	23	35.37	1.9	207	261	2426	67	41	51.6	98.5
土耳其	74	96	2.30	4.37	420	187	3482	99	103	104.8	103
乌克兰	46	79	3.17	10.59	1244	200	3230	89	92	139.6	89.8
泰国	67	132	4.23	3.38	614	197	2529	57	56	140.3	118.3
伊朗	73	45	2.27	3.49	202	153	3042	84	67	83	98.1
中国	1345	144	2.31	1.36	384	364	2974	89	90	99.6	99.2
斯里兰卡	20	320	1.40	0.93	204	248	2392	55	47	66.4	
阿尔及利亚	34	14	0.65	3.27	58	110	3104	86	67	32.5	
菲律宾	90	303	1.28	0.88	270	215	2518	59	49	77.3	94.7
叙利亚	21	116	0.35	3.32	139	114	3049	80	103	81.7	99.6
印尼	227	125	6.23	1.45	360	321	2535	56	51	88	97.9
越南	87	281	2.37	1.09	525	338	2769	72	59	111.9	98.1
乌兹别克	27	64	1.80	2.37	258	305	2525	75	69	88.9	
埃及	82	82	0.02	0.51	294	509	3163	91	53	68.3	84
南非	50	41	2.79	4.38	320	293	2986	81	81	86	87.8
摩洛哥	32	71	2.43	3.82	186	67	3230	89	62	52.5	100.5
印度	1181	397	0.87	2.01	246	165	2301	56	48	102.1	113.1
朝鲜	24	198	3.57	1.7	225	247	2146	58	36	76.7	99.2
伊拉克	30	69	0.41	2.59	76	81					
缅甸	50	76	9.62	3.21	719	239	2438	70	59	100.9	
也门	23	43	0.36	0.84	37	67	2032	54	46	21.5	
巴基斯坦	177	230	0.15	1.72	209	187	2251	57	67	111.3	100.2

续表

国家	人口 (百万)	人口 密度	人均 森林 (亩)	人均 耕地 (亩)	产量		人均每天膳食			自给率(%)	
					人均 粮食 (公斤)	谷物 亩产 (公斤)	热量 (大卡)	蛋白 (克)	脂肪 (克)	谷物	肉类
尼泊尔	29	201	1.89	1.23	304	158	2349	60	40	96.9	100
孟加拉国	160	1229	0.14	0.74	317	259	2250	49	29	89.8	99.9
肯尼亚	39	68	1.34	2.05	96	80	2060	58	47	77.4	100.3
苏丹	41	17	25.38	7.51	137	39	2266	72	65	76.9	100.4
坦桑尼亚	43	48	11.81	3.39	213	82	2017	50	34	88.2	100.2
加纳	23	103	3.18	2.83	254	111	2849	59	48	65.7	68.3
乌干达	32	161	1.41	2.68	159	103	2247	49	43	84.7	
尼日利亚	151	166	0.90	3.72	338	107	2708	62	67	85.7	
科特迪瓦	21	65	7.58	2.04	171	115	2515	50	49	47	90.3
埃塞俄比亚	81	81	2.28	2.53	198	110	1952	56	21	94.1	
莫桑比克	22	28	26.15	3.02	132	56	2071	37	38	59.1	90.1
刚果(金)	64	28	35.99	1.56	75	51	1585	25	24	62.9	
阿富汗	27	42	0.75	4.3	138	132					
世界	6750	52	8.96	3.07	404	234	2778	77	79	100.8	100.9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科技含量、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2009年的谷物粮食平均亩产是364公斤,而印度只有165公斤,世界平均只有234公斤。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67.7%,但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1.56倍(但印度粮食也不是问题,因为很多印度教信徒吃素,不需要大量粮食转化为肉类,并且印度单产提高潜力很大)。除中国以外的54个国家中,有33个国家(39.6亿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多,但是却只有17个国家(13.7亿人口)的人均粮食产量比中国多。

表6.2 2007年各国人均每年膳食品种(公斤)比较^①

国家	膳食	谷物	薯类	蔬菜	水果	肉类	鸡蛋	牛奶	鱼、海产
世界		147	62	119	69	40	9	85	17
中国		153	62	280	64	53	17	29	27

^① Food Balance Sheet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 <http://faostat.fao.org/site/368/default.aspx#ancor>.

续表

国家 \ 膳食	谷物	薯类	蔬菜	水果	肉类	鸡蛋	牛奶	鱼、海产
印度	153	25	65	45	3	2	69	5
日本	115	33	106	58	46	20	76	61
韩国	142	16	213	79	56	10	27	53
美国	112	58	128	111	123	14	254	24
巴西	114	65	46	109	81	8	125	7
俄罗斯	153	134	114	72	61	14	173	19
伊朗	183	54	194	158	33	8	66	7
泰国	126	18	40	91	28	10	23	31
欧盟	125	77	117	104	86	12	241	22
非洲	144	131	57	56	16	2	39	8
东南亚	167	36	53	70	25	5	16	28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10》，2005~2007年世界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为2778大卡，中国为2974大卡，在所列173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99%）中位居65位，排在中国前面的64个国家2010年总人口19.6亿人（占全球28.7%）。世界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77克，中国为89克，世界排名48位，前47个国家总人口15亿（占全球21.9%）。世界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79克，中国为90克，世界排名63位，前62个国家总人口17.4亿（占全球25.4%）。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和国际分工的原因，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美国农业资源如此丰富，但蔬菜、水果、鱼和海产的自给率也分别只有94%、70%、71%。法国对鱼和海产的自给率只有38%。与日、韩依赖进口（主要是因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原因，而不是耕地不足，事实上日本水稻仍然能够自给）不同，中国粮食、肉类、蛋类的自给率都在100%左右，而蔬菜、水果自给率超过100%（有出口）。

欧美国家的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已经太高，增加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之间的矛盾之中，丹麦已经开征“脂肪税”以求降低膳食脂肪和热量的含量，德国、英国等也可能跟进^①。美国经济学兼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在他的《人类的状况》中引用了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没吃的愁，吃的多了更愁。”

^① 《丹麦开征世界上首个“脂肪税”》，新华网（来源：CCTV），2011年10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1-10/02/c_122115905.htm。

美国寿命比其他发达国家要短，医疗制度是主要原因，但膳食热量高也是原因之一。日本比较健康长寿，就是因为其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比欧美国家要低。中国已经“吃”得比日本、韩国还要好了（以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量、蛋白、脂肪为标准），只要适当优化饮食结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将欧美的饮食结构作为追求目标。事实上，由于饮食习惯的差异，中国也不可能达到欧美那种饮食结构，比如海外华人的饮食习惯与国内基本一致。

中国农业潜力巨大：

① 单产增长潜力还很大：中国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亿吨（人口5.4亿）增加到2011年的5.5亿吨，主要贡献来自于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由每亩68.6公斤增加到300多公斤。谷物中除了水稻亩产较高外，中国的小麦、玉米的亩产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表6.3 各国历年谷物粮食亩产（公斤）^①

年份 国家	1961	1965	1970	1980	1990	2000	2009
世界	95	109	122	154	192	204	234
中国	81	118	143	197	288	317	364
印度	63	57	76	90	126	153	165
韩国	213	202	248	270	390	429	472
德国	161	190	212	282	361	430	480
法国	152	207	225	324	406	483	497
埃及	194	252	261	273	380	485	509
荷兰	246	245	251	379	464	527	602
美国	168	203	210	251	317	390	483
比利时						535	642

如果今后中国谷物亩产能够达到现在韩国、美国和德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粮食将增产30%；如果能够达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那么中国粮食将增产70%。

中国目前平均水稻亩产为430公斤，玉米亩产不足400公斤，而袁隆平的超级稻（适合低海拔地区）2011年亩产突破了926公斤^②，云南常规稻“楚粳28”（适合于高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颜珂：《超级稻试验田亩产达926.6公斤》，《人民日报》2011年9月20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5699545.html>。

海拔地区) 2010年亩产突破1000公斤^①, 陕西、内蒙等多地玉米都已经突破亩产1000公斤, 新疆甚至创下玉米平均亩产达1330公斤的单产纪录^②。中国薯类亩产不到法国、荷兰、美国的40%, 甚至还不如印度。说明中国粮食单产增长潜力还很大。

② 土壤改造: 目前18亿亩耕地尚有2/3左右为中低产田, 单产尚有很大提高潜力。今后还将出现土壤革命。中国气候条件良好, 南方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 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

③ 新耕地潜力: 2010年中国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成果显示, 我国具有不同适宜程度的耕地后备资源约8亿亩, 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③。也就是说, 计划生育初期所谓的“14亿亩耕地”是不对的, 后面“18亿亩耕地”也是不对的。

④ 沙漠利用: 以色列沙漠半沙漠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3, 但由于管道和滴灌技术的成功, 耕地从16.5亿平方米增加到44亿平方米^④。中国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约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 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 耕地还将大为增加, 由于光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少虫害, 可以发展高产优质作物。昔日的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正变成沃野良田, 将成为陕西第二粮仓^⑤, 种植出亩产高达13000斤的土豆, 创全国亩产之冠^⑥。中国的沙漠盆地有大量地下水, 随着太阳能成本的降低, 可以就地取水、淡化、灌溉, 可以增加大量的耕地。

⑤ 草原利用: 中国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目前对食品(肉、奶制品)的贡献度还很低, 潜力巨大。

⑥ 三色农业并重: 除了传统的绿色农业外, 白色农业(微生物农业)和蓝色农业(海洋农业)也将兴起^⑦。中国作物秸秆每年约有5亿吨, 如用1亿吨通过微生物发酵, 可得相当于400亿公斤的饲料粮, 是我国每年饲料用粮的50%。中国大陆近海仅200米等深线内可开发利用的就至少有22亿亩(相当于11亿亩陆地良田)。

① 钟欣:《云南水稻品种亩产达近千公斤》,《京华时报》2011年2月4日002版, <http://qh.people.com.cn/GB/182778/15809308.html>。

② 王瑟:《新疆玉米创单产纪录 平均亩产达1330.94公斤》,中国新闻网(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10月21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0-21/3405038.shtml>。

③ 章轲:《国科协报告:中国后备耕地8亿亩 40%较好开发》,人民网(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5月2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708475.html>。

④ 《以色列:节水农业富国富民》,上海农业网(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7月27日, http://www.shac.gov.cn/fwzx/hwzc/scyhy/200712/t20071214_202075.htm。

⑤ 金灿强、张鑫:《毛乌素沙漠变成沃野良田 榆林打造陕西第二粮仓》,人民网(来源:西部网),2011年10月8日, <http://sn.people.com.cn/GB/190197/229721/15819031.html>。

⑥ 《沙漠里种出的高产土豆》,中央电视台第七套,2011年11月9日, <http://sannong.cntv.cn/program/meirinj/20111106/103869.shtml>。

⑦ 杨康泉:《三色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作物学会(来源:《农民日报》),2006年6月25日, <http://www.chinacrops.org/kjyw/kjxw458.htm>。

⑦ 室内农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大棚迅速普及，目前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青海、西藏、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有史以来没有生长过农作物的地方，不但长出了农作物，还高产稳产，如今不但不用调入蔬菜，反而成为蔬菜出口的重要基地^①。美国、荷兰、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均提出了建造“垂直农场”的设想（并准备兴建），在摩天大楼种植粮食、蔬菜、水果，甚至养殖水产品和牲畜^②。

可见，新型农业革命已经开始，对粮食的过度担忧是杞人忧天。如果中国今后会出现粮食危机，绝不会是因为耕地不足，而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过度短缺而农业机械化没有及时跟上。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既合作又竞争，国际关系变幻莫测，主粮最好能够自给，但也不应排斥适度的国际分工（毕竟当代社会是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国农业资源充足，巨大的农产品市场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将中国这么大一个农产品市场拱手让人从经济和就业角度看是不合算的。

淡水资源

根据国际权威水研究机构美国太平洋研究所的水资源资料和世界银行的2010年人口资料^③，68%的世界淡水资源集中在占全球23%人口的7个地区：美洲、苏联、大洋洲、印尼、缅甸、刚果（布）、刚果（金）。其中，南美人口只占全球5.7%，但水资源却占全球的1/3。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尼，名列世界第六位。2010中国人均淡水（每人每年）为2200立方米，只是世界平均水平（8207立方米）的1/4。但是在太平洋研究所所列的172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98%）中，人均水资源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只有70个国家，人口占全球23.9%，水资源占全球77.5%。可见“世界平均”毫无意义，76.1%的人口人均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国际上对缺水国家的标准是依据瑞典水文学家马林·法尔肯马克所下的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可更新的淡水供应量在每人每年1700立方米以下，那么这个国

① 孙凯：《到底谁能断言中国耕地的警戒极限？》，《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5月，<http://news.sina.com.cn/c/2004-05-12/14483211629.shtml>。

② 《美科学家要建造垂直农场：在摩天大楼里种庄稼》，新华网（来源：广州日报），2011年4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4/10/c_121285647.htm。胡梓盟：《荷兰：农场建室内 不再依赖自然》，新华网，2011年4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4/13/c_121297243.htm。郑风田：《不妨建农业摩天大厦来降房价》，《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13期，<http://www.chinanews.com/estate/2011/04-06/2953649.shtml>。

③ “The World’s Water 2008-2009 Data”，Pacific Institute, pp.197-201, <http://www.worldwater.org/data20082009/Table1.pdf>。“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家就会定期或经常处于少水的状况，被定义为水资源紧迫；如果每人每年水供应量在1000立方米以下，那就会感到水紧缺，被定义为水资源缺乏^①。2010年共有25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

表6.4 2010年25个水资源缺乏国家的人均水资源（立方米/每人每年）

国家	水资源	国家	水资源	国家	水资源
阿尔及利亚	403	安提瓜和巴布达	586	卡塔尔	30
布隆迪	429	巴巴多斯	293	沙特阿拉伯	87
佛得角	605	圣基茨和尼维斯	458	新加坡	118
吉布提	338	巴林	92	阿联酋	20
肯尼亚	745	以色列	223	也门	170
利比亚	94	约旦	146	塞浦路斯	362
摩洛哥	908	科威特	7	马耳他	170
卢旺达	489	马尔代夫	95		
突尼斯	436	阿曼	354		

以色列人均淡水只有223立方米，但发明了滴灌以后，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农业产出却翻5番^②，蔬菜、水果自给有余，还大量出口。

2010年共有41个水资源紧迫的国家，除上面水资源缺乏的国家外，还包括下面16个国家。

表6.5 2010年其他16个水资源紧迫国家人均水资源（立方米/每人每年）

国家	水资源	国家	水资源	国家	水资源
布基纳法索	1063	南非	1000	巴基斯坦	1347
科摩罗	1633	津巴布韦	1591	捷克共和国	1520
埃及	1070	海地	1403	丹麦	1100
厄立特里亚	1199	印度	1629	波兰	1652
马拉维	1161	韩国	1426		
索马里	1687	黎巴嫩	1144		

欧洲国家除了上面所列的捷克、丹麦、波兰外，比利时（1912立方米）、罗马

^① Falkenmark M and Lindh G, "How can we cope with the water resources situation by the year 2015?" *Ambio*, 1976, vol 3, no 3-4, pp.114-22.

^② 《以色列：节水农业富国富民》，上海农业网（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7月27日，http://www.shac.gov.cn/fwzx/hwzc/scyhy/200712/t20071214_202075.htm。

尼亚（1973立方米）的水资源也比中国稍少，德国（2301立方米）、英国（2581立方米）、西班牙（2411立方米）则与中国大致相当。中国的邻国印度（1629立方米）、韩国（1426立方米）的人均水资源也远比中国少。

2011年一份提交给第14届世界水大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全球拥有的淡水资源足够使粮食产量在未来数十年内翻番。所谓缺水，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大量的雨水被浪费或从未被利用。水资源问题最终并非资源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挑战”^①。

现在淡化海水已具成本优势，今后随着新能源的开发以及海水淡化技术的提高，海水淡化成本将继续下降，即便现在严重缺水国家今后水资源前景也比较乐观。

矿产资源

中国是世界矿产资源大国之一，探明矿产资源储量占全球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②。

全球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十分不均衡，比如根据1999年的资料，在40个矿种中，有13种矿产3/4以上的储量集中在3个国家，有23种矿产3/4以上的储量集中在5个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矿产消费大国实施矿产资源全球化战略是其必然选择^③。

以铁矿为例，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1年公布的数据，中国铁矿石储量占全球的12.5%（人均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4%），似乎中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但换种算法，结论就不同了：将2010年全球68.4亿人口分为3个群体：中国人均铁矿石储量17.2吨；“富铁五国”（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人口4.2亿（只占全球6.2%），但却拥有全球63.4%的铁矿石储量，人均铁矿储量276吨；剩下的50.8亿人口（占全球74.3%），只拥有全球24.0%的铁矿石储量，人均铁矿储量8.7吨。也就是说，中国人均铁矿储量比全球6.2%的人口少，但却比全球74.3%的人口多。

同样，中国锰矿储量占全球的8.2%，人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但是由于人口只占全球4.6%的“富锰五国”（乌克兰、南非、巴西、加蓬、澳大利亚）拥有

^① 刘彤：《专家：全球水资源足以让粮食产量翻番》，新华网，2011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1-09/28/c_122097910.htm。

^② 刘然，《我国矿产资源总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三 找矿潜力大》，人民网科技频道，2010年7月19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186218.html>。

^③ 张新安、陈丽萍、刘伟、王正立：《世界主要矿产的地理分布》，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http://www.cnnm.com/world.htm>。

80.6%的锰矿储量，中国人均锰矿储量是世界其他75.8%人口的2.8倍。

因此，中国矿产资源储量占全球12%，其实意味着中国人均矿产资源相当可观。并且中国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种比较齐全配套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经发现了171个矿种，探明储量的已经达到了159种，其中20多种矿的探明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如钨矿（占全球65.5%）、锡矿（占全球28.8%）、锑矿（占全球52.8%）、稀土矿（占全球50%）等大约12种位居世界第一^①。

并且，中国还有进一步找矿的巨大潜力：

① 中国有很好的成矿先天条件。

② 还有90%以上的已经发现的矿产地没有进行进一步深入工作。

③ 我国有很多处女地没有开展勘探工作。

④ 我国目前已发现矿床的勘探和开采深度普遍偏浅。国际上一些矿业大国目前矿床的勘探开采深度可以达到2500米到4000米以下，南非还在计划开采地下6公里的矿产，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矿产开采深度都小于500米。所以，深部还有很大找矿潜力。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今后的增长主要是靠内涵式，增加附加值来实现，而不是靠外延式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来实现。比如钢铁业多数人的共识是，中国钢铁产量的峰值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产量将会像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大致持平甚至下降，以后将主要靠提高钢材质量、性能来满足需求。钢铁是这样，其他原材料也都会是这样。这样，对矿石资源的需求不会再猛增，甚至可能下降。最近铁矿石价格的大跌，很可能就是一个前兆。

朱利安·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指出，地球的“可以发现的资源”和“存在于地壳中的资源”远远超过“已知储量”。而按照“可发现的资源”或“存在于地壳中的资源”来计算，几乎所有矿物资源的耗竭都是遥遥无期的，并且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上升时，就刺激了人们去开发它们的替代品。例如，铜过去主要是制造各种生活用的器皿和电线的，当价格上升时，就被塑料制品和光纤纤维替代。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会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更加富裕，担心自然资源有一天会用尽是多余的，人们完全可以微笑着面对未来。西蒙的理论对里根政府及以后的美国政府的人口和经济政策影响很大。

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多。根据世界银行《世

^① 刘然：《我国矿产资源总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三 找矿潜力大》，人民网—科技频道，2010年7月19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186218.html>。

界发展指数2011》的资料^①，2005~2009年自然资源收益对GDP的贡献率，中国为3.5%，美国为1.5%，欧盟为0.8%，日本只有0.038%，连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分别只有6.5%、7.1%，倒是最不发达国家（8亿人口）却平均高达17.9%。弗雷德曼的《凌志车和橄榄树》有这么一段：一个美国人好奇地问一个伊朗工程师：“你们这个国家要是没有石油，可怎么办呐？”伊朗工程师回答道：“要是真的没有了石油，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

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把目光局限在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

能源

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大致经历了柴草、煤炭、石油三个能源时期。在柴草时代，主要是借用兽力、风力（风车）、水力（水车）；1765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使得昔日几乎是“非资源”的煤炭一跃而成为人类主要能源，成为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开发的原动力和人民的必需品；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石油化工业的产生，“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总体来说，人类花费在能源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断减少的。今后能源占收入的比例将更加下降。能源的每一次突破，都导致人类生活水平质的提高。

1953年，哈伯特（K.M.Hubbert）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预言：石油的生产会在一个时候到达巅峰（Peak Oil）；之后，即使价格再上升，石油产量也不会再增加，直到所有石油都被开采。这是“石油危机论”的理论依据，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当时认为：世界石油年消费量由1950年40亿桶增到1970年的165亿桶；如果按这种速度，1971~2000年这30年世界石油总需求将达到1.75万亿桶，其中2000年的需求就有1300亿桶；而1971年的累积探明储量仅为5200亿桶^②。

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了战后发达国家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了西方国家对全球资源和人口的担忧；以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为平台，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Peter R. Odell, *Oil and Gas: Crises and Controversies 1961-2000, Volume 1 - Global Issues*, Multi-Science Publishing Co. Ltd., 2001, pp. 171-172.

其实，当时对石油消费的预测过于夸张，而对石油储量的预测过于保守。依据跨国石油巨擘BP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①，1971年到2000年世界石油消费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8%，而不是7.5%；2000年只消费了280亿桶石油，而不是1300亿桶。而全球石油探明储量却在不断增加。

表6.6、6.7来源于《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可见全球能源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表6.6 各地区能源储量占全球比例（%）

地区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中东	54.4	40.5	0.1
委内瑞拉	15.3	2.9	0.1
苏联	9.1	31.3	26.5
美国	2.2	4.1	27.6
加拿大	2.3	0.9	0.8
中国	1.1	1.5	13.3
印度	0.7	0.8	7.0
欧盟	0.5	1.3	6.5
非洲	9.5	7.9	3.6

表6.7 世界历年石油储量和年产量（亿桶）

年份	储量	产量	储产比
1980	6675	230	29
1985	7713	210	37
1990	10032	239	42
1995	10290	249	41
2000	11049	273	40
2005	12197	297	41
2010	13832	300	46

注：“储产比”是指假设将来的产量继续保持在当年的水平，那么还可以开采的年限。

^①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http://www.bp.com/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Chinese_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1.pdf。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http://www.bp.com/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spreadsheet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1.xls。

就是说，石油是越采越多，1980年认为全球石油只能开采29年，但2010年却认为还可开采46年。

BP公司所公布的2010年13832亿桶石油，其实还不包括新探明的储量和潜在的石油储量。比如BP认为伊拉克、加拿大、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分别为1150亿桶、321亿桶、2112亿桶，但伊拉克2010年认为其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431亿桶^①，2011年加拿大认为光是其阿尔伯塔省油砂中的石油数量估算就有1.7~2.5万亿桶^②，美国政府则估算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超过5130亿桶^③。世界上的石油越采越多，到底还能开采多少年，谁也不知道。

天然气也是越采越多，探明储量从1980年的80.97万亿立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187.14万亿立方米，而潜在储量更是远远高于目前的探明储量。BP公司认为美国2010年天然气储量为7.7万亿立方米；但随着勘探工作的推进，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继续增加，光马塞勒斯页岩气田就拥有14万亿立方米页岩气资源^④。页岩气产量的额外供应已中止了美国大规模进口天然气的计划，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到1378亿立方米，占天然气产量的22.6%，使得美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由2005年的16.7%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10.8%，更令美国天然气价格在最近一年中下跌了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今后将变成一个“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⑤。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的报道，行业咨询公司Wood Mackenzie的报告称，随着中国积极开发自身庞大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中国将大幅削减天然气进口，2020年以后，本土的天然气将足以满足中国大多数新增的需求^⑥。根据2012年3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报告，中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42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区），和目前我国常规天然气可采资源潜力（2011年动态评价结果为32万亿立方米）相当；按照中国当前天然气消费量计算，25万亿立方米页岩气可供中国使用近200年。2011年4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报告称，全球页岩气可采储量为6622万亿立方

① 宋腾、徐俨：《伊拉克探明石油储量升至1431亿桶 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网（来源：新华网），2010年10月5日，<http://energy.people.com.cn/GB/12879767.html>。

② 《加拿大油砂生产的未来》，国际石油网，2011-10-18，<http://oil.in-en.com/html/oil-14231423571166321.html>。

③ 高铁军：《美国称：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跃居全球第一位》，人民网，2010年1月23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0828919.html>。

④ 宋玉春：《全球天然气过剩出路何在》，《中国石油化学杂志》，2011年第2期，http://www.sinopecnews.com.cn/shzz/content/2011-03/21/content_953650.shtml。

⑤ 《IMF预计美国将成为一个天然气出口国》，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1-06-29，<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1/06/29/001339436.shtml>。

⑥ 卡萝拉·霍约斯：《研究：中国将减少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7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744#utm_campaign=2G110008&utm_source=marketing&utm_medium=campaign。

英尺，其中美国为862万亿立方英尺，中国则高达12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36万亿立方米），为全球第一^①。波兰、乌克兰、奥地利和德国等国的页岩气资源前景也很乐观，将加剧全球天然气市场的供应过剩。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所说的中国煤炭探明可采储量1145亿吨（1000米以浅保有储量约1万亿吨）其实是2003年以前的数据^②，现在数据远不止这些，比如2003年前，新疆探明煤炭储量共993亿吨；而截至2011年11月，新疆新增探获煤炭资源量已超过3200亿吨^③。2011年12月22日，新疆鄯善县沙尔湖煤田前期勘探结束，已探明储量约892亿吨，居亚洲之首^④。山西、内蒙等地近年也发现很多大型煤矿。中国并已经在率先攻克了百万吨级煤直接制油技术瓶颈^⑤。

中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率超过50%，与美国相当，欧盟超过80%，日本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石油更主要要看国际市场。目前探明的和潜在的石油、天然气储量至少可以满足今后上百年的需求。而2010年煤炭探明储量可以满足今后118年的煤炭生产需求，如果考虑到潜在储量，那么可开采时间更长。

其实，哈伯特的预言是一个封闭的数学模型（中国计划生育理论也如出一辙）：可根据储量和产量预测耗竭时间。但是事实上，世界能源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⑥。

① 不断发现新的油田、气田、煤田。

② 开采效率在不断提高，若技术进步提高石油采收率10%即可满足地球50年需求。

③ 新能源取代石油。剑桥能源学会曾预测，全球范围从化石类能源向其他能源形式的逐渐过渡将在这个世纪发生。不过，这一过渡与石油供应不足无关，而在是因为人们有了更好的替代选择。正如石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石头了。

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在《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认为，石油永远用不完。因为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上升过高时，人们就用其替代品作燃料

① 刘杰：《中国“页岩气革命”即将上演》，网易（来源：《中国联合商报》），2012年3月23日，<http://money.163.com/12/0323/20/7TAC6QPT002524SO.html>。

② 李慧莲、李希琼：《突破煤炭工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新浪网（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月1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112/0924599099.shtml>。

③ 钟秀玲：《新疆新增3200亿吨煤炭资源量》，新华网（来源：《新疆日报》），2011年11月16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1-11/16/content_24135735.htm。

④ 杜静：《新疆沙尔湖煤田探明储量居亚洲之首 892亿吨煤炭将揭“面纱”》，新华网，2011年12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12/22/c_111276701.htm。

⑤ 惠小勇、于嘉、任会斌：《中国在全球率先攻克百万吨级煤直接制油技术瓶颈》，新华网，2012年10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10/c_113320378.htm。

⑥ 阿马蒂亚·森：《别为地球人口瞎操心》，光明网光明观察，2011年10月27日，http://guancha.gmw.cn/2011-10/27/content_2859462.htm。

了。剩下的石油由于开发成本太高，无人开发，石油自然不会用完。很多东西能替代汽油，比如秸秆乙醇汽油、甜菜生物质汽油、纤维素生物质汽油、生物柴油、微藻生物柴油等，前景非常广阔^①。就像我们现在笑古代人不会用煤碳、石油一样，后人也会笑我们现在对能源的担忧是端着金饭碗讨米。

美国现在很多政治家（比如参与美国2012年总统初选的现任德州州长佩里）也在反思美国的能源政策。现在是需要能源的时候，却耗费巨资进口能源（增强竞争对手的实力），等到今后新能源出现后，现有的国内传统能源却没有用了。他认为，美国应该开采本土能源，既省钱，又增加本国就业。2012年8月24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表示，自己上任后将大力提升石油产量，到2020年可以使美国能源生产自给自足，届时除可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外，还可带来超过1万亿美元的收入^②。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也提出，到2020年使美国进口石油减半。2012年，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将在2015年超越俄罗斯而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在2017年前后超过沙特而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在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根据2011年的《BP 2030世界能源展望》^③，未来20年全球能源效率会加速提高。石油需求增长将相对放缓（年均增长1.1%），天然气成为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年均增长2.1%。增长最快的燃料是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每年增长8.2%，对能源增长的贡献率将从5%增至18%（光从技术角度看，贡献率可以更大，但由于目前很多设备都是依赖传统能源的，设备的更新需要时间）。核能和水电也将稳步增长。所有非化石燃料对能源增长的总贡献率将达到36%。现在来看，根本不用等到化石能源枯竭的那一天，廉价而清洁的新能源早已取代化石能源。

近年兴起的行波堆技术不但能将核裂变发电厂的天然铀的利用率从目前的0.7%提高到30%~40%、甚至60%~70%，而且只产生很少的核废料。2010年，国家能源局电力司核电处筹备建立了行波堆办公室，协调我国各方面力量研发行波堆技术^④。印度、英国等国在进行钍能源的研究。钍的储量是铀的3倍，且与利用率只有0.7%的铀相比，钍的利用率几乎是100%，并且核废料只需封存500年即可丧失高危害的放射

① 王小润：《我们用什么替代石油？——两院院士闵恩泽谈可替代能源》，《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5版，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2-03/29/nw.D110000gmrB_20120329_1-05.htm?div=1。

② 《罗姆尼承诺大增石油产量 2020年实现能源自足》，中国新闻网，2012年8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8-25/4132971.shtml>。

③ 《BP2030世界能源展望》，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2030-Energy-Outlook-CHN.pdf。

④ 段心鑫：《国家能源局筹备成立行波堆办公室》，《中国能源报》，2010年9月13日第19版。

性，而铀至少需要数万年。目前已知的钍储量至少可满足全球1万年的能源需求^①。现在各国也都在研究无污染的核聚变（以海水为原料）。如果行波堆、钍能源和核聚变技术能进入实用阶段，不但能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而且也解决环境问题。电能解决了，流动能源也将不是问题，比如用电能液化空气，液态空气在汽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就可以驱动汽车^②。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1》的资料，2008年中国能源净进口只占总能源的5.8%（主要是石油），印度占24.6%，日本占82.1%，韩国占80.3%，美国占25.3%，欧盟占51.3%。中国2008年人均每年用电2455度，欧盟是6381度，日本是8071度，意味着中国今后用电量将增加两三倍。中国目前煤电占80%，水电占17%，核电不到2%（美国是20%，日本25%，欧盟28%，法国77%）。中国是世界第三煤炭大国，水能资源世界第一，煤电和水电总量还有增长的空间，但煤电比例将下降，水电比例估计很难增加，核电比例将增长（中国核燃料资源丰富），增长最快的将是新能源。中国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海洋能、地热能等都非常丰富^③，在能源方面将非常从容。中国在能源上有较大需求，意味着在新能源方面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对今后的政府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环境

200多年来，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④，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如粮食危机）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但是这一脉伪科学谱系很能蛊惑人心，一个预测破产之后，又改头换面，继续占领舆论高地，现在重点是用气候危机（全球变暖）来控制全球人口。中国和印度是煤炭大国，碳排放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30年少生4亿人，为延缓全球变暖做出了贡献^⑤，她建

① 《英着手研究“钍能源”比核能更安全强大》，人民网（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6月14日，<http://energy.people.com.cn/GB/14891784.html>。于欢：《首座钍基反应堆开建在即 印度积极追逐钍核》，《中国能源报》，2012年7月9日第7版，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2-07/09/content_1079655.htm。

② 黄蓉芳、吴晶平：《伯明翰大学副校长：洗衣已不用水 开车将不用油》，人民网（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7月16日，<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2/0716/c71661-18524523.html>。

③ 何祥麻：《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的发展前景》，人民网，2009年6月8日，<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4/157548/9430064.html>。

④ Nicholas Eberstadt, "Doom and Demography" The Wilson Quarterly, January 20, 2006, <http://www.aei.org/article/24201>。

⑤ 《赵白鸽：30年少生4亿人，每年减排18亿吨》，人民网，2009年12月10日，<http://nmpc.people.com.cn/GB/10553489.html>。

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成果文件^①。赵白鸽的观点引起一些西方媒体的叫好^②。

根据《世界发展指数2011》的资料，中国目前人均碳排放刚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高收入国家人口只占全球16.5%，碳排放却占全球44.85%。如果全球变暖是因为碳排放的话，那么需要改变的是发达国家的“活的方式”，而不是剥夺中国孩子“活的权利”。

增加森林面积可以部分缓解温室效应，但是世界森林资源分布很不均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世界森林状况》^③，2008年全球森林面积40.3亿公顷，65.3%分布在只占全球14.4%人口的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大洋洲、刚果（金）这6个地区。中国只占全球5.1%的森林面积。即便中国的耕地全部变成森林，也只增加3%全球森林面积，对全球气候影响不大。

如果全球变暖真是因为碳排放，那么只能期望新能源，如果继续依赖化石能源，即便人口再减少，也无法阻止全球变暖。而新资源的开发依赖于年轻的体力和智力，没有可再生的人口就没有可再生的资源和可再生的环境。

即便今后真会出现极端气候，也宁愿让孩子与全球孩子一样灿烂地活几十年甚至繁衍几代，而不能让其死于母腹。如其减少婴儿，不如让他们长大自己想办法。难道能因为孩子反正到老年后会去世，就干脆不让孩子出生？能因为担心数十亿年后地球会毁灭而现在提前结束人类文明？《人口与发展》作者、英国肯特大学Frank Furedi教授强烈抨击靠计划生育搞环保的观点。他说，人类的生命永远都应当是“宝贵的、特殊的”；但是，在消极论者眼中，新生命被贬值成了“污染物”。他反讥道：要是人类完全消亡了，全球变暖的危机岂不是就彻底解决了^④？

其实，“碳排放引起全球变暖”在学界争论很大（笔者对此不敢妄评），很多知名学者并不认同（发表了很多论文，出了很多专著，在此不赘述）。一些政治家也不认同这一理论，比如美国德州州长佩里认为全球变暖理论是一个用虚假数据堆积起来的科学骗局，不足为信^⑤。用一个不可知的危险来剥夺现实的生育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明智的。

^① 陈文仙：《中国官员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成果文件》，新华网，2009年12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10/content_12627119.htm。

^② Diane Francis, “The real inconvenient truth”, Financial Post, Dec. 8, 2009, <http://www.financialpost.com/story.html?id=2314438>。

^③ 《2011年世界森林状况》，联合国粮农组织，<http://www.fao.org/docrep/013/i2000c/i2000c.pdf>。

^④ Frank Furedi, Really Bad Ideas: Population control, <http://www.frankfuredi.com/index.php/site/article/3>。

^⑤ STEVE PEOPLES, Perry: Theory on manmade global warming unproven, based on scientists manipulating data, Startribune, August 18, 2011, <http://www.startribune.com/127935933.html?source=error>。

以环保的名义限制人口固然不对，但保护环境还是有必要的。

导致中国目前城市环境恶化的原因有：

① 所有国家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过高能耗、高污染情况，根据《BP 2030世界能源展望》^①，英国的单位GDP（以2009年的购买力为标准）的能耗在1885年左右达到顶峰（大约是中国2010年的1.9倍）后开始缓慢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低于中国2010年的水平；美国的单位GDP的能耗则是在1920年左右达到顶峰（大约是中国2010年的2.1倍）后开始下降。伦敦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153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1605年人口增至22.5万，1700年增至70万，1800年增至96万，1900年增加到670万，1939年达到862万的顶峰。由煤支撑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英国的伦敦曾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但现在由于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伦敦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降低到了16世纪的水平，今天，那里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无数英国文学作品中曾经描绘过的沿街滚滚而下的黄雾已经消失了踪影^②。中国农村不久前还主要以烧柴为主，20世纪80年代不少山柴都被砍光了，但随着近段时间煤和液化气在农村的推广，以前的秃山重新变为青山。德国环保界曾经认为人口导致环境污染，但是现在已经转变观念，认为人口既能破坏环境，但更能改善环境。柏林工业大学的环境学教授Johannes Kuchler（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对笔者说他将与中国环保界交流德国环保界的新观点。

② 中国城市化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滞后。中国城市规划对土地限制太严，容积率太高，导致单位面积污染太重。

③ 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工业产品最消耗资源、制造污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工地，输出高污的工业产品换取低污的高附加值产品，必然伴随城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

但中国的环境从趋势看是乐观的。

① 根据《世界发展指数2011》，以2005年购买力为标准，中国的每千美元GDP的能耗已经从1980年的1164千克油当量下降到1990年的691千克油当量、2008年的280千克油当量（相当于美国1985年的水平）。2009年，美国、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能耗分别为170、147千克油当量/千美元。中国的单位GDP的能耗预计将步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

^① 《BP2030世界能源展望》，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2030-Energy-Outlook-CHN.pdf。

^② 梁紫星：《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大科技》，2004年第3期。

继续下降。

② 中国森林面积持续增长，由1990年的1.57亿公顷增加到2000年的1.77亿公顷、2010年的2.07亿公顷，森林覆盖率由1990年的16.8%增加到2010年的22.2%（荷兰、英国森林覆盖率分别只有11%、12%）^①。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双缩小；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减少^②。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牧民进城，中国总体生态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③ 从长远看，中国今后新增能源主要在新能源，因此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结论

① 假如真的存在资源承载问题，继续现行独生子女政策，今后几十年总人口仍然在11亿以上，仍然需要开发新资源、改善环境；而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总人口也难以达到14亿，比现在稍有增长，调整一下“活的方式”就可以了。

② 中国的资源（土地、粮食、矿产、石油、淡水）和环境完全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

③ 中国人口很快将达到峰值，以后将停滞甚至下降，那么，资源、环境保证问题，今后主要是满足既定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而用不着再担心应对人口数量增长增加的需求，因此更没有理由对资源约束过于担忧。

④ 人口资源是第一资源，不但能够“乘法”地开拓新资源，也能改善环境，今后有14亿、15亿或更多人口的中国比只有11亿或更少人口的中国的人均资源更充足，人均收入也更高，生活环境更好。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曹清尧：《国家林业局发言人曹清尧向社会各界致以新春祝福》，人民网，2005年2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4132/44175/3166201.html>。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complex, abstract pattern of overlapping, curved lines and a grid. The lines are drawn in a dark, textured style,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grid consists of thin, intersecting lines that form a series of irregular, curved cells. The overall effect is that of a stylized globe or a network of connections.

第7章

用国际视野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伊朗为曾提倡二胎后悔莫及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据说李光耀还向中国介绍过新加坡控制人口的经验，对中国的计划生育起了推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并且李光耀受优生学影响很大，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励低教育水平的人进行节育手术。

新加坡生育率从1960年的5.45急剧下降，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又是受优生学误导），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02^①，与中国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中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简称《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4年制定“优生保健法”。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

^① “Population Trends 2011”，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pp.15,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demo.html>.

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①，但是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只有0.895了。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应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②。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新加坡1986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当于韩国1992年的水平^③，新加坡1986年的人均购买力平价相当于韩国1994年的水平^④。中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早两年。新加坡在1984年就已经鼓励部分人生3个以上孩子；而韩国在1996年才废止控制人口出生政策。新加坡在1986年就解散家庭计划组织了；韩国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解散“韩国家族计划福祉协会”，而是在1999年将它改为“韩国家庭保健福祉协会”。韩国在1987年就全面鼓励生育，但在2004年才正式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生育率下降的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而德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之后，却没有像美国、英国、法国那样稳定在1.7这个坎上，而是继续下降到80年代的1.4、90年代的1.3。西班牙的生育率下降时间比较晚，70年代后期还维持在2.6左右，但80年代初开始快速下降，90年代之后只有1.2了。由于德国、西班牙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已经很难回升了。

中国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

① 蔡宏政：《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台湾社会学刊2007 39：66-106，<http://society.nhu.edu.tw/teacher/hjtsai/hjtsai.files/p065-106-%5B1%5D...pdf>。

② 顾宝昌：《韩国、伊朗低生育率之惑》，新浪网（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7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721/03202337158.shtml>。

③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9_EN_Complete.pdf。

④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间生育率徘徊在1.65的时候。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中国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中国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中国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调整主要是政府（李光耀）主导，而韩国、中国台湾的政策调整则是尊重人口学家的建议。但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学科和中国大陆的一样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并将中国台湾和韩国作为“少生快富”的典范而宣传），中国台湾前家庭计划研究所所长张明正现在还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在为过去的家庭计划歌功颂德；韩国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在1995年也认为最佳的生育率是1.6，提出“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关爱女孩”，鼓励妇女参与物质再生产而不是人口再生产；韩国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仍然只是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①。

中国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中国台湾、韩国目前经济还不错，是因为到2015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

但是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中国台湾、韩国的劳动力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②

新加坡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第12年就解散了家庭计划组织，第13年就开始鼓励生育了。中国台湾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的第6年提出“三个不嫌多”，第9年将人口政策由人口控制转变为人口发展，第23年明确鼓励生育。韩国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的第14年人口政策由人口控制转为人口发展，第22年开始鼓励生育。

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从1991年就低于更替水平，到2012年已经23年了，即便依照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标准，也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解散计生委、鼓励生育的时机了。

^① 顾宝昌：《韩国、伊朗低生育率之惑》，新浪网（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7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721/03202337158.shtml>。

^② 《韩去年出生率全球最低 学者称20~30年内社会崩溃》，新华网，2005年8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26/content_3407418.htm。

表 7.1 根据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①，推算中国大陆今后的生育率

年份	新加坡	中国台湾	韩国	年份	新加坡	中国台湾	韩国	年份	中国大陆
1960	5.45	5.75	5.98	1995	1.71	1.78	1.65	2008	1.72
1965	4.7	4.82	4.95	1996	1.70	1.76	1.58	2009	1.62
1970	3.09	4.00	4.53	1997	1.64	1.77	1.54	2010	1.64
1974	2.36	3.05	3.81	1998	1.49	1.47	1.47	2011	1.72
1975	2.08	2.83	3.47	1999	1.48	1.56	1.41	2012	1.71
1976	2.11	3.08	3.05	2000	1.60	1.68	1.47	2013	1.80
1977	1.82	2.70	3.02	2001	1.41	1.40	1.3	2014	1.70
1978	1.76	2.71	2.65	2002	1.37	1.34	1.17	2015	1.70
1979	1.79	2.66	2.90	2003	1.27	1.24	1.18	2016	1.71
1980	1.74	2.52	2.83	2004	1.26	1.18	1.15	2017	1.67
1981	1.72	2.46	2.66	2005	1.26	1.12	1.08	2018	1.66
1982	1.71	2.32	2.42	2006	1.28	1.12	1.12	2019	1.62
1983	1.61	2.16	2.08	2007	1.29	1.10	1.25	2020	1.59
1984	1.62	2.05	1.76	2008	1.28	1.05	1.19	2021	1.47
1985	1.61	1.89	1.67	2009	1.22	1.03	1.15	2022	1.43
1986	1.43	1.68	1.60	2010	1.15	0.90	1.22	2023	1.43
1987	1.62	1.70	1.55					2024	1.29
1988	1.96	1.85	1.56					2025	1.25
1989	1.75	1.68	1.58					2026	1.16
1990	1.87	1.81	1.59					2027	1.15
1991	1.77	1.72	1.74					2028	1.19
1992	1.76	1.73	1.78					2029	1.16
1993	1.78	1.76	1.67					2030	1.13
1994	1.75	1.76	1.67					2031	1.14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999 - 2010年育龄妇女生育率》, 台湾“内政部社会司”网站, sowf.moi.gov.tw/stat/year/y02-04.xls, 2011年9月10日。“Birth Statistics in 2009”, Statistics Korea. <http://kostat.go.kr/portal/english/news/1/8/index.board?bmode=read&aSeq=178637&pageNo=&rowNum=10&amSeq=&sTarget=&sTxt=>, 2011/9/10.

中国2008年HDI为0.793^①，相当于韩国1989年、新加坡1982年的水平^②。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基准，中国大陆2008年的人均GDP相当于新加坡年1976年、中国台湾1985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③。

新加坡由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生育率比较高，对中国大陆的参照作用不如中国台湾和韩国。假定中国大陆2008后情况与中国台湾1985年、韩国1987年后的情况一致，将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平均，可推算出中国大陆在停止计划生育情况（不考虑补偿性生育）下今后大致的生育率。

可见，不考虑补偿性生育的话，中国大陆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后4年生育率将稳定在1.7左右，然后快速下降到2031年的1.14。但是由于中国大陆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文化的破坏、对生育观念的冲击、对经济模式的固化更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能否达到1.7还难说，如果不及时鼓励生育，今后将沿着比中国台湾、韩国更低的路线下滑。

中国大陆应该吸取中国台湾、韩国的教训，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今后5年是其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如果错过了时机，今后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仍然会一泻千里。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改革派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人口学家的鼓动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只生二胎，最多只能有三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但是联合国人口司和伊朗的人口学家拒绝承认伊朗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这一事实，他们预测，1976~1986年期间出生女孩高峰将引发另一个“出生高峰”（张维庆、翟振武等中国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也一直用“出生高峰”进行恐吓），生育率会再次反弹。在他们的忽悠下，伊朗政府也就拒绝使用客观调查结果作为决策依据，没有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2005年出台的第五个发展计划继续重申了政府致力于生育控制的政策。事实表明，伊朗并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5年的1.8。

2005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的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在议会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2010》，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04页，<http://www.undp.org.cn/pubs/nhdr/nhdr2010cn.pdf>。

^②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67-170,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9_EN_Complete.pdf。

^③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发表演讲说：“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①内贾德严厉批评二胎方案：“有人主张只生两个孩子，这意味着40年后伊朗民族将失去一切。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防止民族老化。”内贾德愤怒地说：“伊朗有人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限制生育，40年前，西方许多国家提倡家庭计划，他们认为少生孩子生活就越好。但这些国家的人口现在已经老龄化了，于是，他们又通过金钱奖励的办法鼓励所有家庭多生孩子。”^②他说：“伊朗甚至具备养活1.2亿人（实际人口是7000多万）的能力。西方国家的人口呈负增长，担心如果我们的人口增加，可能会支配他们。”内贾德表示应该制定新的法律，使拥有较多孩子的妇女能够相应减少工作时间，但却能领取全额工资。伊朗鼓励生育政策遭到改革派反对，改革派报纸发表评论说：“大多数国家都在讨论如何控制人口，而伊朗却反其道而行之。”^③一方面由于鼓励生育的时机已晚，一方面由于改革派的杯葛，伊朗的生育率已经难以回升了，2010年继续降低到1.67。

朝鲜、越南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2000年之后生育率就一直低于2.1了。越南于1988年开始实行允许生二胎的计划生育，生育率从1988年的3.91下降到1999年的2.05。越南2010年的HDI只相当于中国2001年的水平，2010年人均GDP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但2005年以来生育率只有1.8^④。

国际、国内都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

曾毅等人口学者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生育率反弹，又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⑤，建议用“二胎方案”过渡^⑥。因此顾宝昌、曾毅等人于2004年、2009年两次联

① 《伊朗总统鼓励国民多生多育》，BBC中文网，2006年10月23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070000/newsid_6076200/6076234.stm。

② 安国章：《内贾德警告说必须防止人口老化》，人民网，2010年4月3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1501097.html>。

③ 张淑惠：《伊朗人也搞计划生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2006年10月27日，<http://gb.cri.cn/12764/2006/10/27/1865@1275881.htm>。

④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27 September，2011 update，<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⑤ 曾毅：《人口增长要非常慎重 坚持晚婚晚育政策》，搜狐财经，2007年12月2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71221/n254231628.shtml>。

⑥ 曾毅：《关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时机与方案的探讨》，光明网光明观察，2006年9月19日，<http://guancha.gmw.cn/uploadfile/2006-9/19/20069191565513.PDF>。曾毅：《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2009年1月，No.C2009001，<http://old.ccer.edu.cn/download/9713-1.pdf>。

署提议，在提倡晚婚和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由现行的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他们预测，从2005年开始如果全面放开二胎，那么中国人口会在2044年达到16.07亿的高峰。因此建议采取一个为期15年的、“分类实施、逐步放开”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先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第2个孩子，到2020年全面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2个孩子，在此方案下生育率稳定在2.0左右，总人口会在2029年达到14.7亿高峰。

2009年，他们认为“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率”是1.6（思维与韩国的人口学家一样），建议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其实，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生育率也很难稳定在1.6，靠逐步放开二孩是不可能将生育率稳定在1.6的。并且1.6的生育率虽然为“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但并不为历史所接受。

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因为20世纪60年代“提倡二胎”，现在后悔莫及，中国大陆为什么还要沿着它们50年前的错路走？并且顾宝昌等中国人口学家2009年的建议连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都不如，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生育率还高于5.0，并且只是“提倡二胎”。1996年后中国生育率只有1.4了，顾宝昌等人2009年的建议却是“放开二孩、防止多孩”，并且还要“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

他们总结认为：“只要继续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的稳定。”^①可见，他们的目的仍然是人口控制，而不是人口发展。

曾毅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并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成果要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阅”^②。但是曾毅等人预测的核心依据都是错误的。

① 曾毅的预测是建立在将近年出生人口虚夸近40%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认为200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7，继续实行政策，到2012年总和生育率仍然还有1.61。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已经再次证实，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② 曾毅认为依照“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会一直稳定在2.0左右（2012年为2.05，2022年为2.01，2030年为1.98），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因此人口高峰将达到

① 顾宝昌：《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http://www.iwep.org.cn/download/upload_files/m55qp145hzbmb2nhyfducx5520110714142812.pdf。

② 岳振：《中国新生儿性别比失调，10年后5000万男人打光棍》，人民网，2010年10月13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2942240.html>。

14.8亿。这是错误的预测。首先，即便生育率真的能够稳定在2.0左右，人口高峰也不可能达到14.7亿、14.8亿。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稳定在2.0，总人口也难以达到14亿。韩国、中国台湾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年左右，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总和生育率只有0.9、1.2了。依照曾毅等人的二孩方案，最多只能生2个孩子，而不孕、单身、丁克比例在不断攀升，生育率竟然能够稳定在2.0？到2030年生育率还有1.98？

③ 曾毅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预测的实现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以后的全国时期实际平均总和生育率（2.05）与全国实行二孩政策地区2000年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差不多。”这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试点二胎的地区生育率都在1.6以下。

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但是曾毅在2012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上仍然将2010年生育率数据修改为1.6，并据此继续推销他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①。曾毅仍然认为，即便放开二胎，中国人口也将达到近15亿的顶峰；继续独生子女政策，2080年还会有9亿多人。

越南文化和制度背景与中国类似，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1988年开始实行二孩政策。1987年生育率还有4.1（中国在1979年只有2.75，1990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1993年预计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2.9，2015年达到人口更替水平2.1^②。哪知道实际上生育率降低到2000年的1.98、2010年的1.8。

中国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只有1.6。当然在这些试点地，政策取向仍然是“人口控制”，仍然在大力宣传、鼓励“少生”。即便如此，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仍然高于全国水平（2000年、2100年全国生育率分别为1.22、1.18），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以及联合国）将全国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修正为1.8、1.6，从而得出“二胎试点区生育率比全国更低”、“独生子女政策对降低生育率没有实质性作用”、“计划生育不是老年化等人口危机的原因”等结论。根据这些结论，那么计生委和人口学家根本不必为中国人口危机承担任何责任，30多年计划生育所减少的孩子是“自然消

① 《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简报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2012年第23期（总第985期），2012年6月27日，<http://www.nsd.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6101>。

② 汝小美（国家计生委国际合作司）：《越南的2001~2010年人口战略》，《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年第3期。

亡”的！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可以生二胎，少数民族有更宽松的人口政策，但是“六普”显示全疆生育率只有1.5。

可见，放开二胎（政策取向仍然是“人口控制”）不足以恢复人口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应该无视人口学家的建议，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而应高调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出生高峰有多高

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如果没有补偿性生育高峰，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能达到1.7（如果“六普”0~4岁年均均为1510万人是可信的话，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应该还会达到1.7；如果2010年、2011年1.18、1.04的生育率是大致准确的话，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不可能达到1.7，能达到1.5就不错了）。稳定几年之后会快速下降。因此今后不会有人口膨胀压力。笔者征求过多位人口学者的意见，他们也认同我这一判断；连李建民等保守派学者都认为生育率会在补偿性高峰之后的202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现在的问题是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出生高峰有多大？一些人口学家担心会出现较高的补偿性出生高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①。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是“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成果^②。核心人物李建民（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如果全国同时放开二胎（“同放二孩”），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21年超过15亿，在2044年达到15.35亿顶峰，到2050年还有15.19亿。他们建议分步放开二孩（“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全国全面放开二胎。到2020年后才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即便是“分放二孩”，总和生育率也将在2014回升至3左右，在经过四年小幅波动以后开始下降，202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③。

① 曾毅：《人口增长要非常慎重 坚持晚婚晚育政策》，搜狐财经，2007年12月2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71221/n254231628.shtml>。

② 刘世昕：《多位人口专家建议分步放开“二孩”》，人民网（来源：中青在线），2012年11月1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2/1101/c1007-19460913.html>。

③ 张艳玲：《研究机构建议分步放开二胎生育》，财新网，2012年10月27日，<http://china.caixin.com/2012-10-27/100452848.html>。

根据李建民等人的预测，“同放二孩”后头几年生育率会超过4.4，意味着每年出生4700万，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即便是“分放二孩”，头四年生育率也波动在3.0，出生人口也有3200万，是2010年的2.3倍。根据这种预测，决策层根本就不敢“同放二孩”，连“分放二孩”都会犹豫不决，更不会停止计划生育了。

要估算2013年政策调整后的补偿性出生高峰，首先需要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政策限制了多少人出生。30岁以下属于正常生育，如果200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出生高峰是在2001年后），那么当时想补生的妇女在2013年基本上丧失了生育能力（2000年的30岁及以上妇女到2013的时候已经43岁或以上了），因此可以大致认为2013年后的补偿性出生孩子的母亲是2000~2013年被政策压制生育的妇女。假如2000~2013年没有计划生育限制，应该已经出生多少人？这需要判断生育率走势。前面已经分析，生育率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的升高而降低。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1》^①，中国200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当于泰国1992年（生育率为2.00），中国2010年的HDI已经高于泰国（生育率为1.58），印度2010年的HDI（该年生育率为2.5）相当于中国1993年的水平。印度2006年HDI相当于中国1995~2000年水平的邦^②，2010年的时候的生育率都低于1.9^③。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2》^④，2001~2011年泰国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略低于中国，印度2010年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相当于中国2000年的水平。前面已经从多个角度分析，认为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生育率最多有1.7。

那么，假设中国200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以泰国和印度较发达的邦为标准，还有所高估），此后保持在1.7（事实上不可能，而会沿着台湾地区、韩国的老路继续下降）。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为1.0的情况下的年龄别生育率）以2000年、2010年普查为坐标，中间用线性穿插；2010年以后的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预期寿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死亡率）也采纳联合国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由于考虑到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Human development statistical annex",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11_EN_Tables.pdf, pp. 127-130. Retrieved 2 November 2011.

^② Gendering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Recasting the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 and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of India. 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2009, p11. <http://wcd.nic.in/publication/gdigemSummary%20Report/GDIGEMSummary.pdf>, 2011/9/10.

^③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estimates of fertility indicators", 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 statistical report 2010,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pp.48, http://www.censusindia.gov.in/vital_statistics/srs/Chap_3_-_2010.pdf.

^④ World bank, "School enrollment, secondary, female (% gross)",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2012,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SEC.ENRR.FE>.

“五普”低年龄组可能存在漏报，0~9岁人口由“六普”的10~19岁人口依照年龄别存活率回推），以上述这些参数预测，那么总人口在2014年只有13.9亿，在2021年只有14.2亿，在2032年达到14.4亿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只有13.8亿；2013年0~12岁（2001~2013年出生）人口共2.43亿。

而根据“六普”，2010年的0~9岁（2001~2010年出生）人口共1.46亿；假设2011~2013年出生人口与2008~2010年一样多，为0.45亿，那么2013年0~12岁人口共为1.91亿（ $1.46+0.45=1.91$ ，该年龄段死亡率很低，可忽略）。也就是说，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2亿人（ $2.43-1.91=0.52$ ）。假如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后，以前被限制出生的孩子一窝蜂地被补生出来，2014年人口也达不到14亿，2021年也达不到15亿。

即便假设2000年中国的生育率为2.5（这是不可能的），线性下降到2010年的1.7，那么2013年0~12岁人口也只有2.59亿。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也有0.68亿人（ $2.59-1.91=0.68$ ）。

何况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只有一部分会被补偿性出生。

其实，生育是很难补偿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但是战后却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1910年、1911年、1912年、1913年、1914年法国的生育率分别为2.57、2.46、2.49、2.47、2.34，五年生育率平均为2.46，共出生398万人^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生育率跳跃性下降到1915年的1.52、1916年的1.23、1917年的1.34、1918年的1.56、1919年的1.59，这五年只出生了158万人。假如没有战争，生育率仍然保持在2.46的话，那么1915~1919年应该出生384万人，也就是说一战让法国少生了226万人。

战后法国出台了一系列人口发展政策，制定了多子女家庭卡制度，给生育8个或以上孩子的女性颁发“法国家庭荣誉勋章”（这一制度延续至今）；立法规定不仅堕胎是非法的，而且传播避孕方法也是非法的。当时避孕方法仅限于避孕套、避孕帽和子宫颈帽等，并且还比较昂贵，禁止堕胎和传播避孕方法后，有效地增加了避孕的难度。

^①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ACCORDING TO THE MARITAL STATU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 France, http://www.insee.fr/en/ppp/bases-de-donnees/irweb/sd2005/dd/excel/sd2005_t5_11.xls, 2011/9/10. “LIVE BIRTHS AND STILL BIRTHS BY MARITAL STATUS (METROPOLITAN FRANCE WITHIN TODAY'S FRONTIER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France, http://www.insee.fr/en/ppp/bases-de-donnees/irweb/sd2005/dd/excel/sd2005_t34_fm.xls, 2011/9/10.

照道理说，战争结束后，育龄人口返回家园，经济复苏，又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20年、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生育率分别为2.69、2.60、2.42、2.41、2.36，平均为2.50，与战前1910~1915年的2.46没有差别，也与1925~1929年的2.32没有差别。也就是说，法国的生育率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几乎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英国在一战时也出现生育率下降。战前的1910~1914年英国年均出生104万人。战时的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1919年分别只出生96万、92万、79万、79万、83万，年均86万人。战后的1920年、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分别出生113万、100万、92万、90万、87万，年均96万人^①。

德国年均出生人数从战前1910~1914年的182万人下降到战时1915~1919年的109万人。战后的1920~1924年年均只出生144万人。

可见，英国和德国由于没有像法国那样出台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

中国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年均出生2077万（根据官方公布的出生率和总人口计算）^②。1959年、1960年、1961年“大跃进”期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大量妇女闭经和月经失调，生育率分别只有4.3、4.02、3.29；出生人口分别只有1650万、1392万、1190万，三年合计4232万。如果这三年的生育率也为6.0的话，那么应该出生6550万人。也就是说“大跃进”导致妇女少生2318万人（6550-4232=2318）。照道理说，压制了三年的生育在“大跃进”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别只有6.02、7.5、6.18、6.08。只有1963年算是补偿性高峰，出生2959万（如果生育率为6.0的话，只应出生2367万）；也就是说，大跃进少生了2318万，只在1963年补生了592万（2959-2367=592）。

日本1963~1965年平均生育率为2.07。1966年是日本不吉利的火马年，部分人避开这年生孩子，生育率降到1.58。照道理说，1966年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但是1967~1969年平均生育率只有2.09，1966年少生的孩子并没有“补生”出来！

新加坡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只在1988年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上升到1988年的1.96，1989年再跌回1.75。而中国台湾、韩国、伊朗这些曾提倡二胎的地区，在由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过

^① “Vital Statistics: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ference Tables”, Spring 2012 Update - Annual Time Series Data, <http://www.ons.gov.uk/ons/re/vsobl/vital-statistics--population-and-health-reference-tables/spring-2012-update/annual-reference-table.xls>.

^②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程中根本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①。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②。

当年法国是战争硬性抑制了生育，战后会出现生育高峰；中国现在是生育政策硬性抑制了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后应该会出现补偿性生育。但中国现在的情况与法国当年有很大的不同。计划生育30多年，少生的文化已经成为大众心理，经济模式、分配制度、城市规划、住房设计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爬蚤心态），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生育率很难回升。那么补偿性出生高峰到底有多大？下面从生育年龄妇女数量、结扎率、不孕率、妇女已生育情况、生育意愿等方面进行大致推测。

各年龄育龄妇女以“六普”为准，忽略死亡情况（事实上，“六普”由于重报，很多年龄组人数比“四普”还多）。

根据《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③，1971~2009年共有4071万男性、12462万女性被结扎绝育。绝育对象基本上都是生育两个或以上孩子的夫妇，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他们也基本没有再生育的意愿，做结扎再通术的比例将非常低，复孕率就更低。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的时候，有突击结扎现象；90年代后期以来手术例数基本趋于平稳。根据一些医学文献资料，结扎时妇女平均年龄约为29岁，假设某年结扎对象都是29岁的妇女或其配偶（丈夫绝育的话，意味着妻子也间接“绝育”），单看一年当然不合理，但如果看连续几年的累计情况还是大致可行的。以2005年为例，该年男性输精管、女性输卵管绝育手术分别为19.9万例、141.9万例；那么假设1976年出生的妇女（2005年时为29岁）中有161.8万人（ $19.9+141.9=161.8$ ）被绝育或间接“绝育”，占该年出生妇女（1036.9万人）的16%（ $161.8 \div 1036.9=0.16$ ）。

女性的卵母细胞的产生仅发生在胎儿期，出生后数目逐年减少。卵巢储备，是

① 顾宝昌：《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http://www.iwep.org.cn/download/upload_files/m55qp145hzbmb2nhyfducx5520110714142812.pdf。

② 韩琳：《兵团计生委主任刘戈玉：创造良好人口环境》，新华网，2006年4月3日，http://bt.xinhuanet.com/2006-04/03/content_6633607.htm。《席小平组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座谈会上的意见反馈》，国家计生委网站（来源：国家人口计生委巡视组），2011年6月23日，http://www.chinapop.gov.cn/stjzz/xsz/xsgz/201106/t20110623_360297.html。

③ 2010年计划生育手术情况统计表，《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指卵巢产生卵子数量和质量潜能。随着年龄增加, 卵巢储备不断下降, 到30岁的时候, 下降到人生最大储备的12%, 而到40岁, 只剩下3%了^①。妇女生殖能力在27岁就开始下降, 35岁后加速下降, 因此, 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 不孕率不断提高。中国目前不孕率为12.5%左右(主要是指生育旺盛期人群), 参考国外关于年龄别不孕率的文献^②, 假定中国30岁、35岁、40岁、45岁妇女不孕率(包括妇女本人及其配偶的原因)分别为12%、22%、46%、70%, 中间用线性穿插。

根据“六普”长表《6-12 全国按年龄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平均存活子女数》^③, 可计算出各年出生的妇女到2010年人均已存活的孩子数。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已婚、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3个、1.76个和1.46个^④。还有一个特殊的国情, 就是1999年后大学扩招的大学生陆续进入婚育阶段, 他们的工作压力和经济压力非常大, 生育观念也已经改变, 婚育门槛已经提高, 生育率会很低。

由于怀孕到出生有9个月的滞后期, 如果2013年春天“两会”后停止计划生育, 对2013年的出生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出现。

1969年以前的出生的妇女到2014年时候, 都已经是46岁以上了, 既缺乏生育意愿(平均已经有1.7个或以上孩子了), 也基本丧失了生育能力。1983年以后出生的妇女还属于正常生育阶段, 不存在补生。补偿性生育得靠1969~1983年出生的妇女。

表7.2 停止计划生育后的补偿性生育的妇女情况

出生(年)	妇女(万)	人均已生孩数		绝育(万)	不孕率(%)	生育妇女(万)	还将生(万)
		2010年	2013年				
1983	968	0.84	1.14	187	12.0	688	427
1982	1105	0.94	1.22	187	14.0	790	427
1981	965	1.05	1.29	187	16.0	654	307

^① Wallace WHB, Kelsey TW, "Human ovarian reserve from conception to the menopause", PLoS ONE, vol. 5, no. 1 (January 2010), e8772,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008772>.

^② Leridon H, "A new estimate of permanent sterility by age: sterility defined as the inability to conceive", Popul Stud (Camb), vol. 62, No.1 (2008 Mar), pp.15-24.

Ulla Lars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fert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29, No.2, pp. 285-291.

Larsen U, Menken J, "Measuring sterility from incomplete birth histories", Demography, Vol.26, No.2(May 1989), pp.185-201.

^③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④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国家计生委网站(来源: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 2007年3月21日, http://www.chinapop.gov.cn/xxgk/tjgb/200806/t20080626_154455.html.

续表

出生(年)	妇女(万)	人均已生孩子数		绝育(万)	不孕率(%)	生育妇女(万)	还将生(万)
		2010年	2013年				
1980	932	1.14	1.29	199	18.0	601	282
1979	972	1.22	1.29	182	20.0	632	297
1978	957	1.29	1.29	178	22.0	607	285
1977	889	1.35	1.35	168	26.8	528	216
1976	1011	1.41	1.41	162	31.6	581	203
1975	1037	1.45	1.45	166	36.4	554	172
1974	1122	1.49	1.49	175	41.2	557	150
1973	1171	1.51	1.51	158	46.0	547	137
1972	1207	1.54	1.54	180	50.8	505	111
1971	1227	1.56	1.56	199	55.6	456	91
1970	1340	1.60	1.60	215	60.4	446	71
1969	1223	1.63	1.63	232	65.2	345	45

根据“六普”长表6-12，到2010年的时候，1983年、1982年、1981年、1980年、1979年、1978年出生的妇女分别平均已经存活0.84个、0.94个、1.05个、1.14个、1.22个、1.29个孩子。但是到2013年又过了3年，这些年出生的妇女又生了一些孩子，上表在2010年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平移调整。

以1983年出生的妇女为例，根据“六普”短表3-1，该年人数为968万；根据《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该年出生妇女有187万直接或间接绝育。该年出生者到2013年已经30岁了，不孕率为12%。那么尚能生育的人数为：总数968万-绝育的187万=781万， $781万 - 781 \times 12\% 不孕率 = 688万$ 。这688万尚能生育的妇女中，人均已经有1.14个孩子了，以平均意愿生1.76个孩子计算，她们人均还将生育0.62个孩子（ $1.76 - 1.14 = 0.62$ ），共将生育427万孩子（ $688 \times 0.62 = 427$ ）。

依此类推，1969年出生的1223万妇女到2013年为44岁，扣除232万绝育者和65.2%的不孕者，还有345万尚能生育，人均只愿再生0.13个孩子（ $1.76 - 1.63 = 0.13$ ），共将生育45万孩子。也就是说，1969~1983年出生的妇女还将补偿性生育3223万孩子（即便不将被结扎者计算为“不育”，补偿性出生也多700万），只相当于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补偿性出生。当然，这只是大致估算，并不是非常精确的。

假如没有补偿性出生高峰的话，停止计划生育后总和生育率只能达到1.7左右。

依照联合国预测中国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以生育率为1.7计算，1983年以后出生的妇女（预测时将1983年及以前出生的妇女去掉）将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非补偿”生育1522万、1527万、1522万、1503万、1492孩子，在2014-2021年共“非补偿”生育1.2亿孩子。

将3223万补偿性出生分为5年，假定分别为1000万、900万、650万、450万、223万；加上“非补偿”出生，那么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出生大约2522万、2427万、2172万、1953万、1715万（这只是大致推测），还达不到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多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

事实上，上面的推测已经是过于夸张了，因为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3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从1986年的1.68人，降到2006年的1.1人^①。

中国大陆情况也如此。以江苏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省城乡都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同时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即单独二孩政策）。经过20多年，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越来越多的婚育年龄的人符合生二孩的条件。但是2006年末在六个县的调查表明，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妇女中，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只有不到1/10；在这些符合生育二孩的妇女中只有45.1%表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而在这些认为生育两个孩子最理想并已经有一孩的妇女中，却只有21%明确表示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打算^②。

此外，中国剖腹产比例非常高，在50%左右，真的停止计划生育了，很多妇女会顾虑重重而放弃生育。

因此，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在“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补偿性出生”累计可能很难达到3000万，也不可能赶在一年内补生。想补生的妇女即便还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经是高龄，不是想怀孕就能马上怀上的（有些需要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生理的差异就可以将补偿性高峰分散。并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是在两会之后，那么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况，即便补偿生育，也不可能全部挤在这两三年（有些夫妇还会观望几年，才会下决心怀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妇女是在35岁，甚至40岁后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还有部分会在

① 《台湾生育率直线下降 五年后将成一胎化社会》，人民网，2006年8月14日，<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2/14875/4700650.html>。

② “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课题组：《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018年后才“补偿生育”。因此，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依照李建民的说法，即便是“分放二孩”，2014~2017年生育率波动在3.0，到2022年才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那么2014~2021年共出生2.2亿人，扣除“非补偿”生育的1.2亿，共补偿性出生1.0亿，远远超过被政策限制出生的0.52亿。如果“同放二胎”，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总人口会在在2021年超过15亿，那么意味着2014~2021年共出生2.4亿多人，共补偿性出生1.2亿。其实，即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2013年也只“多生”1亿多人。而李建民却认为光是补偿性出生就有1亿多。

笔者曾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驳斥李建民等人关于社会抚养费的观点^①。李建民等人的建议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①他们将补偿性出生人数夸大了几倍（大大夸张了对社会的冲击力）。②人口政策调整后冲击（对医疗、教育、民众心理）最大的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广人稀的农村多生一些人根本没有影响，为什么还将农村放在第二步？③目前生育意愿已经很低，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差不大（在城市更是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说，放开城市，不如放开全国；放开二胎，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北京大学的李建新、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等人口学教授也不认同李建民等人的预测，他们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生育率不会超过2.0。李建新认为：“惯性思维下，我们都大大低估了生育率‘不反弹’的风险”，“但凡有人口学知识和正视我国人口现实的学者，都会对放开二孩生育率反弹超过4.4的预测心生质疑。但是《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居然就用了这背离中国现实的预测方案作为预警选项，这是严重的误导。也许决策者看到这结果后却又裹足不前了，再一次延误了纠错的良机”。王广州在博客中说：“今天看了报告总和生育率4.4的出处，直觉认为该研究和研究结论差的码子不是一般的大。第一，堆积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释放干净，比如3~4年；第二，新增一孩育龄妇女不可能马上生育二孩。这就是所谓总和生育率法的缺陷，分母是不区分妇女的孩次结构的。所以，时期生育率指标已经不反映客观实际，已经失去测量的意义。”^②

①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246页。

② 王广州：《今天看了总和生育率4.4的原文，感觉差的码子有点太大》，王广州新浪博客，2012年11月2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b61160101dj3b.html。

补偿性出生高峰越高越好

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政策连续性”的政治思维的影响，人口学界也形成了因陋守旧的学风，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

其实，平稳意味着僵化，僵硬代表死亡，灵活才代表生命力。纵观人类历史，出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都是高峰、低谷交替。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就是凭借1872~1944年的出生大高峰（1944年的出生人口是1872年的3.8倍）和战后1947~1949年的团块世代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基。

美国凭借两次大的出生高峰（1957年的出生人口是1933年的1.87倍，1990年的是1973年的1.33倍）奠定了强国地位。而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国力也开始走向衰退。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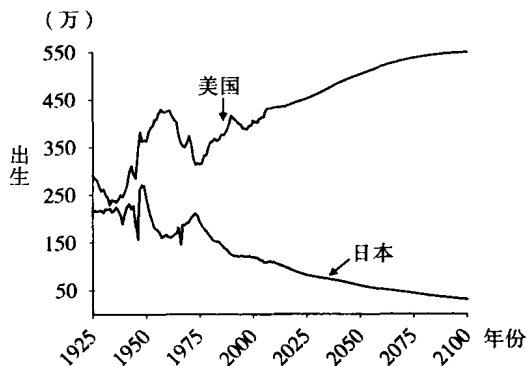


图7.1 美国、日本每年出生人数

注：2010年后的生育率资料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稳定现有生育率”方案（生育率：美国2.07，日本1.32）。

1925~1949年，美国、日本的出生人数相差不多，分别出生5495万人、6990万，美国是日本的1.27倍^①。转折点是在1949年，美国生育率从1949年的3.04上升到1957年

^① 《男女别人口·人口增减及人口密度（明治5年~平成21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www.stat.go.jp/data/chouki/zuhyou/02-01.xls，2011年9月10日。Sharon Jayson, Is this the next baby boom? USA TODAY, 7/17/2008, http://www.usatoday.com/news/nation/2008-07-16-baby-boomlet_N.htm.

的3.71，同期出生人数从365万增加到431万；同期日本的生育率从4.32下降到2.04^①，出生人数从269万下降到161万。1957年是第二个转折点，美国的生育率从1957年的3.71下降到1973年的1.88，出生人口从431万下降到314万；日本的生育率却稳定在2.1附近，由于上一个生育高峰到了育龄期，出生人口从1957年的161万增加到1973年的211万。1973年是第三个转折点，日本的生育率在1973年后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然后一泻千里，在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为1.75、1.54、1.36、1.39；出生人数从1973年211万下降到2009年108万。而美国出生人数却在1973年开始止跌回升到1990年的416万，生育率回升到1990年的2.08，其后生育率基本稳定在2.1附近。

表7.3 美国、日本人口结构比较

年份	人口（百万）		人口比	中位年龄（岁）		65+岁比例（%）	
	美国	日本	美/日	美国	日本	美国	日本
1950	158	82	1.9	30	22.3	8.3	4.9
1980	230	116	2.0	30	32.6	11.3	9.0
2010	310	127	2.4	36.9	44.7	13.1	22.7
2030	361	117	3.1	39.2	52.3	19.9	31.1
2050	402	100	4.0	40.1	56.0	21.3	38.7
2070	436	81	5.4	41.3	58.3	22.7	41.1
2100	472	57	8.3	43.5	60.4	26.0	44.2

1950年，日本人口结构远远比美国要年轻，正是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日本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2010年年龄结构已经老于美国了。而到2100年，日本中位年龄将是60.4岁，而美国只有43.5岁，差不多是两代人之间的差距。1862年，美国和日本人口数量一致。美国人口在1950年是日本的1.9倍，在2010年是日本的2.4倍，而到2100年将是日本的8.3倍。

不同的人口政策，对短期的总人口影响并不大，但一百年、两百年回过头来看，发现当年人口政策差之毫厘，足以改变今后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法国、德国、英国的历年出生人数也不是平稳的，一战、二战都出现生育率的下降，战后也都出现出生高峰。

^① Michael Sutton, "lowest-low fertility in japan:consequences for a once-great nation", bulletin of geography socio-economic series no. 12/2009, http://www.bulletinofgeography.umk.pl/12_2009/04_sutton.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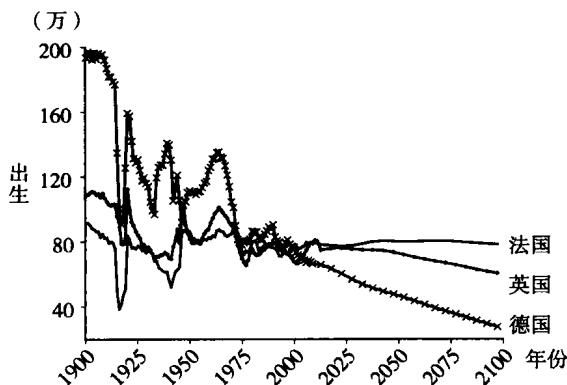


图7.2 法国、德国、英国的历年出生人数

注：2010年后的生育率资料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稳定现有生育率”方案（生育率：法国1.97，德国1.36，英国1.8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出生人数由1912年的80万下降到1916年的39万^①。战后，法国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出生人数在1920年上升到84万。

二战中，法国出生人数下跌到1941年的52万。战后，法国政府再次出手，出生人口回升到1947年的87万（是1941年的1.67倍）。依照中国的一些人口学家的观点，这是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的，但是却让法国恢复了人口持续发展的能力。假如法国出生人数没有20世纪20年代、40年代这两次跳跃性上升，那么法国早已经因为老龄化而崩溃了。法国两次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法国的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现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生育率却能在1990年代止跌回升，2008年已经回升到2.0。

一战时，英国的出生人数由1914年的103万下降到1917年的79万；战后的1920年，出生人数增加到113万，是1918年的1.43倍。但是其后英国的出生人口再次下跌到1933年的69万低谷，随后一直徘徊在低水平。二战后，英国出现婴儿潮，1947年出生103万（生育率为2.68），是1941年的1.47倍（生育率为1.73）。1964年后，生育率再次下降，1973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1975~2005年徘徊在1.7、1.8左右（平均每年

^①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ACCORDING TO THE MARITAL STAT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 France, http://www.insee.fr/en/ppp/bases-de-donnees/irweb/sd2005/dd/excel/sd2005_t5_11.xls, 2011/9/10. “LIVE BIRTHS AND STILL BIRTHS BY MARITAL STATUS (METROPOLITAN FRANCE WITHIN TODAY'S FRONTIER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 France, http://www.insee.fr/en/ppp/bases-de-donnees/irweb/sd2005/dd/excel/sd2005_t34_fm.xls, 2011/9/10.

出生73万)，2010年上升到1.94。

德国出生人口由1913年的179万下降到1917年的91万，下降50%。战后的1920年出生人数恢复到160万（是1917年的1.75倍）。二战中，生育率又快速下降，1945年降至1.36。二战后，生育率回升，1964年生育率达到2.54，出生人数达到135.7万（是1946年的1.47倍）。其后，生育率又快速下降，1975年，东、西德生育率分别为1.45、1.54。西德生育率继续缓慢下降；而东德由于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回升到接近2.0的水平，然后又缓慢下降。1990年德国统一前，东、西德的生育率均为1.4左右。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94年仅为0.77^①。2000年之后，德国东西部生育率趋同在1.35左右，2010年也只上升到1.39。2005~2010年，德国平均每年出生67万人左右，只有1964年的50%。

虽然德国的生育率在1960年以来就一直低于法国和英国，目前与日本相当，但是人均GDP与法国、英国相差无几，经济似乎比法国和英国更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出现衰退。这是因为：① 德国虽然劳动力在1998年就开始负增长，但是欧盟是一体化的，欧盟的劳动力是在2010年后才负增长，德国由于产业结构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好（比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高），德国从其他国家吸取了“能量”；而日本却没有这个优势，相反，传统制造业转移到邻国中国，导致产业空洞化。② 德国的劳动力负增长时间比日本晚、下降幅度比日本小，老年化程度比日本轻。③ 德国吸引了大量移民，而日本却没有。

但是从长远看，法国、英国的未来远远比德国要好。

表7.4 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结构比较

年份	人口（百万）			中位年龄（岁）			65+岁比例（%）		
	法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1950	41.8	68.4	50.6	34.5	35.4	34.9	11.4	9.7	10.8
1980	53.9	78.3	56.3	32.4	36.4	34.4	13.9	15.6	14.9
2010	62.8	82.3	62.0	39.9	44.3	39.8	16.8	20.4	16.6
2030	68.1	77.4	68.6	42.6	49.9	41.7	23.2	28.8	21.3
2050	71.3	68.6	70.4	43.3	52.8	44.2	25.3	33.7	24.4
2070	73.1	58.1	68.9	44.3	53.5	46.6	26.1	35.3	27.8
2100	74.6	44.5	64.2	46.5	56.5	48.7	29.3	39.3	31.3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2010年后的资料采纳“稳定现有生育率”方案。

^① Jürgen Dorbritz, “Germany: Family diversity with low actual and desired fertil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19, no.17(July 2008), pp.557-598.<http://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19/17>.

1950年，德国人口是法国的1.63倍，是英国的1.35倍；英国人口是法国的1.21倍；三国人口结构基本一致。但是150年后的2100年，法国的人口反而是德国的1.68倍、英国的1.16倍；法国和英国的人口结构也比德国年轻得多。

中国每年出生人数也很不平稳。1949年后共出现了三次出生高峰，其中1962~1979年第二个高峰共出生了4.3亿人，就像日本团块世代一样，中国这个出生高峰不但数量多，而且吃苦耐劳，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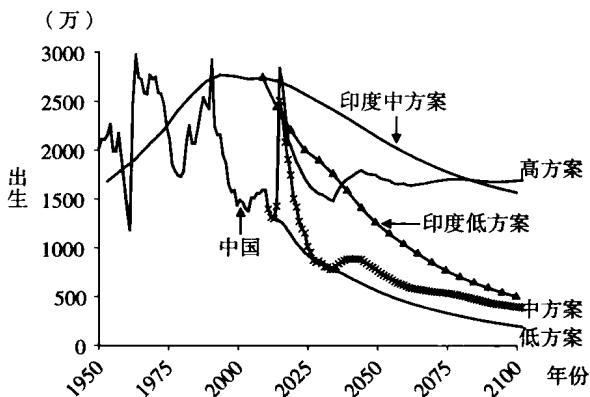


图7.3 中国和印度每年出生人数

注：中国1990年之前的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总人口推算的^①；1990~2010年是根据2010年“六普”的人口结构，用存活率回推的；2010~2100年是根据本书《中国人口展望》一章中的数据。印度的数据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由于是分五年的平均数据，因此曲线比较光滑。

第二次高峰在80年代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又激发了第三次出生高峰，本来应该延续到2000年的，但是由于生育率在1990年后低于更替水平，在1995年后只有1.4左右，出生高峰在1990年之后就半途而止。

第三次出生高峰到了育龄期，本来应该在2005年之后出现第四次出生高峰的，张维庆等国家计生委官员和翟振武等主流人口学家也一直以“第四次出生高峰”为由反对调整人口政策^②。但是“六普”显示，由于超低生育率（被主流人口学家和计生委所误导，没有及时废止计划生育政策），2005~2010年根本没有出现出生高峰，年均出生人数比1977~1980年这个出生低谷还少，而与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相当。也就是说，“第四次出生高峰”被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给忽悠没了！

中国在1975年之前每年出生人口比印度多。但是由于中国从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

①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维庆：十一五时期中国将迎来第4次出生人口高峰》，新华网，2006年5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5/02/content_4502251.htm。王洪禹：《中国将迎来第四次生育高峰 出生即要竞争社会资源》，网易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6月25日，<http://news.163.com/07/0625/15/3HRGFQ76000120GU.html>。

生育，出生人口从1975年开始少于印度。2010年普查显示中国0岁人口只有1379万，而印度近年每年还出生2600多万，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从人口角度看，1975年就已经开始奠定了今后中印国力的差距。

表7.5 中国、印度人口结构比较

年份	印度				中国					
	人口(百万)		65+岁(%)		人口(百万)			65+岁(%)		
	低	中	低	中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950	372	372	3.1	3.1	551	551	551	4.5	4.5	4.5
1980	700	700	3.6	3.6	983	983	983	5.2	5.2	5.2
2010	1225	1225	4.9	4.9	1333	1333	1333	8.9	8.9	8.9
2030	1435	1523	8.8	8.3	1300	1360	1447	18	17.2	16.2
2050	1457	1692	15.6	13.5	1101	1191	1444	30.2	28	23.1
2070	1295	1708	25.8	19.5	815	937	1394	38.9	33.8	22.8
2100	880	1551	35.8	25.4	465	621	1408	42.9	37.7	23.5

印度人口在1950年只相当于中国的67.5%，但是在2010年已经接近于中国了，几年后将超过中国，今后更是远远超过中国。

笔者需要重申的是，印度、美国等国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利于人类文明和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如果日本经济不衰退，对中国的经济推动作用将更大。同样，中国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

中国人口如果依照中方案走，即便是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每年出生人数还达不到印度目前的水平和中国1990年的水平；如果依照高方案走，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也只有两三年的出生人口与印度接近。这样的补偿性高峰又什么可怕的？应该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让这种出生高峰“常态化”才是。

翟振武等人口学家一直有“出生高峰情节”，2000年的时候，他们说有“千禧宝宝”、“龙宝宝”出生高峰，2007年他们说有“金猪宝宝”出生高峰，2008年他们说有“奥运宝宝”出生高峰，2012年又说有“龙宝宝”出生高峰^①；但是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2007年、2008年的出生数并不高于邻近几年。笔者在香港版《大国空巢》中指出，属相对生育率几乎没有影响（日本1966年是唯一的例外）^②。

① 赵颖彦：《专家称2012年将达北京生育峰值》，新浪网（来源：《法制晚报》），2012年1月8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1-08/131623765242.shtml>。

② 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517～518页。

1950~199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2200多万。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都显示，0岁人口只有1379万，生育率分别只有1.22、1.18。这说明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人口学家们却还在担心、炒作出生高峰！

主流人口学家不希望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人口是负担。但既然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那么补偿性高峰越高越好。对待补偿性出生高峰的态度，反映出不同的人口观、历史观和发展观。

无限风光在险峰，每个出生高峰就是一个政绩丰碑，连绵起伏的出生高峰将筑起一道人口的“万年长城”。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

“低生育率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以及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10年，这些国家仍然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

其实，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拉美国家和马来西亚也并没有闲着，而是在贡献最重要的产品——人口。

人口是最宝贵的“可再生资源”，而GDP是人创造的消耗性产品，GDP需要为人口发展服务，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角度评价一个制度是否是可持续的，“生命核算”比“GDP核算”更可靠。1960年，拉美、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没有太大差别，分别为5.98、6.31、5.45、5.75、6.16；1980年分别为4.20、3.79、1.74、2.52、2.83；2009年则分别为2.25、2.67、1.22、1.03、1.15。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GDP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但育龄妇女人均人口产量（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过把瘾就死”、“断子绝孙”的东亚发展模式是世界上最失败的模式。拉美和马来西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

以各国1970年的15~64岁劳动力为100%，到2025年（劳动力都是2010年以前出生的）的时候，日本下降到99.9%（1995年为121%），韩国上升到194%（2015年为207%），马来西亚上升到411%，拉美上升到297%。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拉美和马来西亚有丰沛的人口资源，今后经济还有腾飞的本钱。事实上，近年拉美和马来

西亚的人均GDP年均增速上升势头很不错，已经超过日本，逼近韩国。

表7.6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拉美人均GDP年均增速(%)

国家 \ 时间段	1986 ~ 1990	1991 ~ 1995	1996 ~ 2000	2001 ~ 2005	2006 ~ 2010
日本	4.53	1.10	0.75	1.16	0.46
韩国	8.58	6.74	3.69	4.01	3.50
马来西亚	3.87	6.68	2.46	2.51	2.74
拉美	-0.06	1.56	1.59	1.32	2.89

从趋势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力也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意味着即将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而拉美和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经济将平稳甚至加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2011年智利、巴西人均GDP分别为14394美元、12594美元，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12476美元）。阿根廷2011年人均GDP为10941美元，2003 ~ 2010年人均GDP年均增速高达6.8%，如果继续这种增速，那么也将在2014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不死也得脱层皮，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中方案的预测，2050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拉美的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35.6%、32.8%、15.0%、19.1%；依照低方案，则分别为40.0%、37.2%、17.2%、22.2%。

201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中位年龄分别为44.7岁、37.9岁、37.6岁、26岁、27.6岁；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低方案，2050年分别为57.3岁、56.3岁、55.1岁、41.6岁、46.1岁；根据中方案，2050年则分别为52.3岁、51.8岁、51.4岁、36.9岁、41岁。中国台湾的人口结构与韩国类似。如果生育率不能快速提升，今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将毫无活力（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将置身其外），而拉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结构年龄，经济将是朝气蓬勃。

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1年10月29 ~ 30日，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普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迟福林认为，城市化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 ~ 2020年中国经济可以达到8%的

平均增长，2020~2030年可以达到6%的增长，超越“中等收入陷阱”^①。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学者们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中国完全不必担心“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人与同属大中华文化圈的新加坡人、日本人、韩国人一样，非常勤劳，注重家庭，防范经济风险能力强（比如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日本就要比欧洲好），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有人口规模优势，产业结构完善，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也可以与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提前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了，能否迈出“中等收入陷阱”还真难说，今后等着中国的将是比日、韩更大的“老年化陷阱”。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和印度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中国大陆是超短跑，人口负债比日本要严重得多。

除了废止计划生育外，中国大陆还需要调整发展模式，而不能沿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老路走。中国只有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才能走出“老年化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从人口结构看世界经济格局

本书人口数据除了中国2010年的数据是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外，其他数据均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中、低方案^②。联合国的高方案是不可能达到的，中方案是比较乐观的预测，低方案则是比较实际的预测。

表7.7 各地区人口占全球比例（%）

年份	全球			发达国家			欧洲			拉美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1950	100	100	100	32.0	25.5	34.3	21.6	16.5	23.4	6.6	7.7	6.1
2010	100	100	100	17.9	11.3	18.5	10.7	6.3	11.2	8.6	9.1	8.5
2050a	100	100	100	14.3	11.1	12.8	7.8	5.6	6.9	8.0	6.0	8.0
2050b	100	100	100	14.1	11.4	12.8	7.7	6.0	7.0	8.1	6.8	8.1

^① 匡贤明、梅东海：《展望中国未来10年发展前景——中外学者：中国将在挑战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民网（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11月7日，<http://npc.people.com.cn/GB/16153801.html>。

^②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20 October 2011,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续表

年份	全球			发达国家			欧洲			拉美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2100a	100	100	100	13.4	12.4	12.3	6.6	5.9	6.0	6.2	4.7	5.5
2100b	100	100	100	13.2	12.5	12.4	6.7	6.2	6.3	6.8	5.9	6.4
年份	东南亚			中南亚			西亚			非洲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1950	6.8	7.7	6.5	20.0	22.1	19.3	2.0	2.2	1.9	9.1	11.0	8.3
2010	8.6	9.0	8.8	25.6	30.3	25.0	3.4	4.0	3.3	14.8	22.8	12.7
2050a	8.1	6.5	8.2	26.3	23.2	28.3	4.3	4.7	4.4	23.8	39.7	24.0
2050b	8.2	7.0	8.3	26.6	24.8	28.4	4.2	4.6	4.3	23.6	35.2	23.4
2100a	6.5	5.3	6.0	21.1	15.9	20.2	4.9	4.8	5.0	38.5	49.2	42.8
2100b	6.9	6.2	6.6	22.6	19.4	22.5	4.8	4.7	4.8	35.3	42.0	37.6
年份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总人口	0~14岁	15~64岁
1950	21.8	21.7	22.0	14.7	16.0	14.4	3.2	3.3	3.2	6.2	4.9	6.7
2010	19.5	12.3	21.4	17.8	20.7	17.5	1.8	0.9	1.8	4.5	3.4	4.6
2050a	13.9	7.8	13.2	18.0	15.6	19.4	1.2	0.7	0.9	4.4	4.0	4.1
2050b	13.9	9.1	13.4	18.2	16.8	19.4	1.2	0.8	0.9	4.3	4.0	4.1
2100a	8.2	6.7	7.2	14.3	10.4	13.6	0.9	0.7	0.7	5.0	4.9	4.7
2100b	9.3	8.3	8.7	15.3	13.0	15.2	0.9	0.8	0.8	4.7	4.6	4.5

注：a采用联合国2010年版低方案，b采用联合国2010年版中方案。

表7.8 各地区历年抚养比(%)

年份	全球			发达国家			欧洲			拉美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1950	65	57	9	54	42	12	52	40	13	78	71	6
2010	52	41	12	48	24	24	46	23	24	53	43	11
2050a	53	25	29	72	22	50	73	20	53	53	19	34
2050b	58	32	26	73	29	45	75	28	47	57	27	30
2100a	73	22	51	89	22	67	90	22	68	98	19	79
2100b	67	30	37	78	30	48	78	30	48	79	28	51

续表

年份	东南亚			中南亚			西亚			非洲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1950	73	67	7	71	65	6	73	66	7	81	76	6
2010	49	41	8	56	48	8	57	49	7	78	72	6
2050a	51	20	32	42	20	22	50	27	23	52	41	11
2050b	55	27	28	48	28	20	55	34	21	59	49	10
2100a	89	20	69	81	17	64	73	21	52	56	25	31
2100b	75	28	47	68	26	42	67	29	38	57	34	24

年份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1950	63	56	7	68	63	5	68	59	8	54	42	13
2010	34	22	12	55	47	8	56	21	35	50	30	20
2050a	62	15	48	42	20	22	98	19	79	63	24	39
2050b	64	22	42	48	28	20	96	26	70	67	31	35
2100a	96	21	76	82	17	65	107	22	86	85	23	62
2100b	79	29	51	68	26	43	89	29	60	76	31	45

注1: 总=总抚养比, 儿童=儿童抚养比, 老年=老年抚养比。

注2: a采用联合国2010年底方案, b采用联合国2010年中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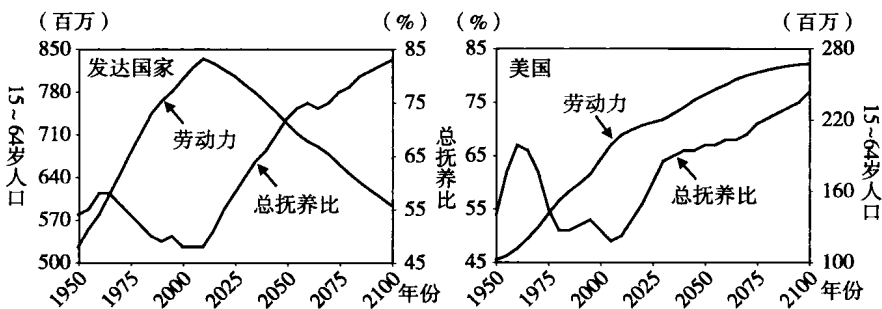


图7.4 发达国家和美国历年总劳动力和总抚养比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中“稳定现有生育率”方案。

发达国家人口(作为整体)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32.1%下降到2010年的17.9%,近年出生人口更是只占全球11%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

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以2010年为转折点，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老年抚养比增加所致），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2011年希腊、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并非偶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表示担心欧洲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①。由于所依赖的人口学基础已经动摇，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将面临重大调整，国际外交格局也将发生巨变。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虽然美国1965年和2040年的总抚养比均为66%，但是1965年是以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为主（儿童、老年抚养比分别为50%、16%），而2040年是以老年抚养比（人口还债）为主（儿童、老年抚养比分别为31%、35%），因此，美国的经济活力将不断下降。但是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比较平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的同时，印度等中南亚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在不断上升。

印度201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相当于中国1995年的水平^②。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标准^③，印度2008年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1998年的水平；以“2000年美元可比价”为标准^④，印度2011年人均GDP相当于中国1998年的水平。印度2003年（人均GDP相当于中国1991、1992年的水平）开始，经济进入稳步高速增长阶段，2003~2011年GDP年均增长8.08%。

同时，印度的人口结构年轻（2010年印度中位年龄只有25岁，中国为34.5岁），印度的繁荣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必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从人口结构看，印度的高速增长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2010年印度的老年抚养比只有8%，相当于中国1975年的水平；2030年将相当于中国2010年的水平（12%）；

^① 《美国担心欧洲经济危机引发动荡》，BBC中文网，2011年12月10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rolling_news/2011/12/111210_rolling_us_eu.shtml。

^②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data>。

^③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④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50年则将相当于中国2023年的水平（20%）。2010年印度的中位年龄为25岁，相当于中国1990年的水平；大约在2035~2040年，印度的中位年龄将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35岁）。

印度2010年城市化为30%，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即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即将进城的数亿人口所释放的经济能量将是巨大的。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24%~30%从事第二产业（工业），中国是28%，等到印度这一比例由目前的14%增加到25%以上的时候，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

从人口结构（如老年抚养比等）看，在203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速；2030~2050年也将保持5%~6%的增速。而中国经济增长将在2012年后跳跃性下降。2001~2011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1.58%。

2011年，美国、中国、印度的GDP总量分别为15.1万亿、7.3万亿、1.85万亿美元。假设美国、中国、印度的GDP年均增长率在2012~2030年分别为1.5%、4%、8%，在2031~2050年分别为1%、1.5%、5%，那么美国、中国、印度的GDP总量在2030年则分别为20万亿、15.4万亿、8.0万亿美元，在2050年分别为24.4万亿、20.7万亿、25.6万亿美元（2011年可比价）。也就是说，在2050年之前，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很难撼动。印度需要在2050年左右才能超过美国，此后非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将跻身世界经济舞台，参与新一轮的博弈。

“高盛全球研究”也预测，印度到2050年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①。摩根士丹利认为印度经济增长率2013年超中国^②。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德华从人口结构分析，认为印度将超过中国，而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③。

世界和中国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近代西方国家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崛起，加上海运的相对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中国历史上沿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昔日的边陲小渔村崛起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深圳。

^① 古力：《高盛预测印度经济将高速增长 2050年或赶超美国》，中新网，2007年1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gjcj/news/2007/01-24/859980.shtml>。

^② 《摩根士丹利：印度经济增长率2013年超中国》，新华网，2010年8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8/18/c_12459601.htm。

^③ 《澳前总理称中国永远也赶不上了美 预言印度将超中国》，人民网（来源：《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3096824.html>。

西部由于有远程贸易所带来的“冰山”成本，经济落后于东部，大量年轻人口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根据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广东省（不含海南）人口占全国比例在1953年、1964年、1982年分别为5.40%、5.66%、5.32%，基本保持稳定；但是2000年、2005年、2010年这一比例却攀升到6.83%、7.17%、7.79%，这主要是由于外来年轻人口的涌入。以2005年为例，广东65岁及以上老人（基本是本省的）占全国的5.84%（与传统上广东人口占全国比例基本一致），但是20~34岁人口却占全国的9.32%。而中西部人口结构却相反，湖南、四川的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国比例分别为5.50%、7.70%，20~34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则分别为4.44%、5.17%。1978年，广东的经济只占全国5.1%，而到2005年却占全国的12.2%。可以说，广东等东南沿海的财富很大比例是中西部年轻人口所创造的，而中西部的一些农村却成了老弱病残基地。

但是从世界人口结构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中国经济中心即将再次改变。发达国家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消费者数量下降；人口结构老化使得人均消费能力也将下降，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将减弱。发达国家经济即将衰退给中国东部沿海提供的贸易和就业机会将会减少。中国人口东流的势头将得以遏止。

表7.9 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例^①

年份 地区	1953	1963	1973	1983	1993	2003	2010
美国	16.36	13.12	12.33	12.79	14.32	13.46	10.85
欧洲	41.59	49.95	52.11	43.82	44.96	45.46	38.34
日本	2.18	3.80	6.43	7.35	8.09	5.67	4.89
中东	2.35	2.68	3.34	6.51	3.43	3.40	4.98
中国	1.40	1.09	0.95	1.17	2.62	5.65	9.94
印度	1.34	1.28	0.52	0.62	0.59	0.87	1.80

发达国家长期占全球贸易的60%以上，但现在开始呈下降趋势。

印度在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0.59%增加到2010年的1.8%。1991年印度实际利用外资仅为0.74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1.7%；

^①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developments in 2009",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us_e/its2010_e/its10_world_trade_dev_e.pd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2010, PROSPECTS FOR 2011", 7 April 2011,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1_e/pr628_e.pdf.

2009年增加到356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31%^①。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而印度年轻劳动力还在不断增加，印度吸引外资的能力将增强。

根据国家商业部网站的贸易数据，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1985年曾高达23.6%；随着日本劳动力下降、老年化加速，这一比重不断下降，1996年为21%，2000年降至17.5%，2010年更降至10.02%。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目前总人口近2亿，但由于生育率只有0.9~1.3，今后三地总消费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都将快速萎缩，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比重也将不断下降。

欧盟在2015年左右人口将开始负增长，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都将萎缩。中欧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将继续下降。

2010年，中国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19.5%，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占美国总出口的7.2%^②。美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占世界比例也将保持稳定。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复兴，一方面由于印度等国的产品开始占有美国的市场，中国产品很难继续保持目前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东盟和印度的崛起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中心的西移。2010年，中国—东盟、中印贸易额分别为2927.8亿美元、617亿美元（相当于1999年的中美贸易额）^③，增长势头凶猛。

东盟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正处于迸发经济活力的时期。2010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的生育率分别为3.14、2.64、2.11、1.82、1.59、2.0、2.75。2001~2010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增加6倍，年增24.2%，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从2001年的8.16%上升到2010年的9.85%。东盟目前人口6亿（超过5亿人口的欧盟，更超过2亿人口的日、韩、台地区），其中，3亿人口的地区可以通过铁路与中国经济融为一体。东盟人均消费能力虽然目前还远不如欧盟和日、韩、台地区，但由于人口结构年轻，中位年龄只有27.5岁（欧洲40.1岁，日本44.7岁），尤其是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人口还将有所增长，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但是从长远看，东盟的经济潜力远不如印度，一方面是人口和市场规模比印度小，另一方面是生育率比印度、巴基斯坦要低，并且可能将快速下降（泰国、越南已经下降）。

^①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1”，“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english/press_e/statis_e/statis_e.htm.

^③ 赵焯：《201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高达617亿美元 远超预期》，中国经济网，2011年1月30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101/30/t20110130_22184750.shtml。

中印两国贸易额由2000年的不到30亿美元^①，增加到2010年的617亿美元^②、2011年的739亿美元，年均增长34%^③。中印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2.1%。2011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印度还只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2010年，印度人口达到12.1亿，生育率还为2.6，10年左右总人口将超过中国，今后将达到15亿人。中印这两个十多亿人口大国之间的贸易必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如果保持目前这种势头，中印贸易额10年之内将超过中日贸易，20年之内将超过中美、中欧贸易。

其他中南亚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也保持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高的生育率。南亚2007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12，相当于中国的1991年的水平^④，意味着该区域即将迎来经济快速发展。巴基斯坦今后将是2亿多人口的市场。而包括中东地区人口增长更快。今后中南亚和西亚将是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全球1/3的市场），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中印、中巴贸易如果通过陆海联运，产品从内地陆运到港口，再绕道马六甲海峡到对方的港口，最后陆运到内地市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更高，还不如直接铁路贸易（不但省却了海运，甚至陆运距离也可能更短）。中国正在修建成都到拉萨的快速铁路，今后将分别延伸到印度、尼泊尔。中国也在考虑修建从新疆到巴基斯坦的铁路。目前，学者和官员们还在讨论修建第三条欧亚铁路大陆桥：由沪昆高铁的昆明站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从土耳其进入欧洲^⑤。其实，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该铁路沿线人口密集，结构年轻，将是今后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活力的一条铁路。

考虑到运输成本、运输时间和消费文化等因素，区域经济比远洋经济的交往更为密切，比如，2010年，韩国、日本、美国、欧盟人口分别为0.48亿、1.27亿、3.1亿、5亿人，中韩、中日、中美、中欧贸易额分别为2072亿、2978亿、3853亿、4797亿美元。从人均角度看，中韩、中日经济交往更为密切。因此，今后中国—东盟、中印、

① 周兆军：《温家宝：中印将签订160亿美元经贸合同》，人民网，2010年12月1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3494367.html>。

② 赵焯：《201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高达617亿美元 远超预期》，中国经济网，2011年1月30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gizh/201101/30/t20110130_22184750.shtml。

③ 《中国和南亚各国共同致力于改善贸易不平衡问题》，新华网，2012年6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6/08/c_112157547.htm。

④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09_EN_Complete.pdf.

⑤ 朱咏梅、王云：《第三亚欧大陆桥：昆明将成枢纽》，《云南日报》网（来源：《春城晚报》），2007年11月19日，http://www.yndaily.com/html/20071119/news_96_178861.html。

中巴的经济交往将非常密切，铁路运输将非常繁忙。

等到中国到印度、巴基斯坦、东盟铁路修通后，中国西部将从开放的“三线”转为“一线”。虽然目前铁路的运输成本仍然高过海运，但由于节省时间成本，可以加快企业的资金的周转。

另外，今后几十年，可能将迎来第三次能源革命，廉价、清洁的新型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将改变运输方式，也将改变经济版图。沿海的廉价海运优势将不复存在。

今后东部通过海运，西部通过铁路，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让中国在国际博弈中占住主导权。

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给中国的东部沿海的机遇正在减少。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今后中国经济更主要依赖内需，而中西部本身庞大的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表7.10 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结构

地区	A	B	C	D	E	F
	总人口	0~14岁	0~14岁 比例 (%)	总人口占 全国比例 (%)	0~4岁占 全国比例 (%)	E/D
全国	133973	22246	16.6	100.0	100.0	100.0
华北	16482	2463.7	14.9	12.3	11.1	90.0
北京	1961.2	168.7	8.6	1.5	0.8	51.8
天津	1293.8	126.8	9.8	1.0	0.6	59.0
河北	7185.5	1209.3	16.8	5.4	5.4	101.4
山西	3571.2	610.6	17.1	2.7	2.7	103.0
内蒙古	2470.6	348.3	14.1	1.8	1.6	84.9
东北	10952	1287	11.8	8.2	5.8	70.8
辽宁	4374.6	499.7	11.4	3.3	2.2	68.8
吉林	2746.2	329.3	12.0	2.0	1.5	72.2
黑龙江	3831.2	458	12.0	2.9	2.1	72.0
华东	39285	6063.4	15.4	29.3	27.3	92.9
上海	2301.9	198.6	8.6	1.7	0.9	52.0
江苏	7866	1023	13.0	5.9	4.6	78.3
浙江	5442	718.9	13.2	4.1	3.2	79.6
安徽	5950.1	1069.9	18.0	4.4	4.8	108.3
福建	3689.4	570.6	15.5	2.8	2.6	93.1

续表

地区	A	B	C	D	E	F
	总人口	0~14岁	0~14岁 比例 (%)	总人口占 全国比例 (%)	0~4岁占 全国比例 (%)	E/D
江西	4456.7	975	21.9	3.3	4.4	131.8
山东	9579.3	1507.4	15.7	7.2	6.8	94.8
中南	37595	6862.8	18.3	28.1	30.8	109.9
河南	9402.4	1974.6	21.0	7.0	8.9	126.5
湖北	5723.8	796.4	13.9	4.3	3.6	83.8
湖南	6568.4	1157.4	17.6	4.9	5.2	106.1
广东	10430.3	1761.8	16.9	7.8	7.9	101.7
广西	4602.7	999.14	21.7	3.4	4.5	130.7
海南	867.2	173.5	20.0	0.6	0.8	120.5
西南	19298	3756.7	19.5	14.4	16.9	117.2
重庆	2884.6	489.8	17.0	2.2	2.2	102.3
四川	8041.8	1364.4	17.0	6.0	6.1	102.2
贵州	3474.6	876.5	25.2	2.6	3.9	151.9
云南	4596.6	952.8	20.7	3.4	4.3	124.8
西藏	300.2	73.2	24.4	0.2	0.3	146.8
西北	9664.3	1719.5	17.8	7.2	7.7	107.2
陕西	3732.7	548.9	14.7	2.8	2.5	88.6
甘肃	2557.5	464.4	18.2	1.9	2.1	109.4
青海	562.7	117.7	20.9	0.4	0.5	126.0
宁夏	630.1	135.4	21.5	0.5	0.6	129.4
新疆	2181.3	453.1	20.8	1.6	2.0	125.1

资料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

中国西部的人口结构远比东部要年轻。西南地区的15岁以下儿童比例（后备劳动力和消费人口）最高，而东北地区比例最低。虽然东南沿海由于先发优势，目前有能力吸引西部人口，但是如果西部能够发展起来，西部人口还是会流回本地（尤其是还有户籍制度的因素）。比如2010年中西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4.5%、14.8%、15.1%、17.1%，东部的广东、上海、浙江则分别只有12.2%、9.9%、11.8%^①。2011年GDP增长率也是东低西高，湖南、湖北、四川、

^① 孙丹：《2010全国各地GDP数据一览，17省份总量超万亿》，新华网，2011年2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2/15/c_121078928.htm。

重庆、贵州分别为13%、13.5%、15%、16.4%、15%；而广东、上海、浙江则分别为10%、8.2%、9%^①。从2005年到2010年，广东、上海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分别从12.2%、5.0%下降到11.5%、4.3%，山东、浙江经济占全国比例也有所下降。而同期中西部省份经济占全国比例在不断回升，湖南从3.57%上升到3.99%，四川从3.99%上升到4.28%。

2010年重庆直接利用外资63.7亿美元^②，占全国6.0%（人口只占全国2.2%）。2008年到2010年，四川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而此前的30年，这一数据仅为93.79亿美元^③。中西部地区正由劳务输出地逐步变成劳务需求地，就地就业的机会在增加，用人企业和劳务市场将同地。而就地务工的综合收益比去沿海打工要高，既能照顾孩子和老人，还可以节省交通成本。

人口决定区域经济、政治在全国的地位。以美国为例，1920年纽约和宾州的人口分别占全国的9.8%、8.2%（经济占全国比例与人口比例基本一致），选举人票分别为43、36票；但是由于人口占全国比例分别下降到2010年的6.3%、4.1%，2010年选举人票分别只有27、18票了。而加州、德州、佛州由于人口占全美比例分别从1920年的3.2%、4.4%、0.9%上升到2010年的12.1%、8.1%、6.1%，选举人票也分别从1920年的11、18、4票增加到2010年的53、36、27票。早期人口变化更主要是人口流动，但是现在生育率的影响变得很关键了。与2000年相比，2010年纽约选举人票减少2票，而德州增加4票，主要是因为纽约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而德州高于全国。以2006年为例，美国全国生育率为2.10，纽约只有1.89，而德州却有2.36。

中国东北生育率非常低（2010年只有0.75），又没有北京、上海那种聚集外地人口的能力，今后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地位将不断下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目前的繁荣是靠聚集外来劳动力，但是聚集人口只是城市发展的第一步，城市要长盛不衰，还必须发展人口，否则今后将成为老年化废墟。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今后将人财两空，会导致区域的长期衰败；注重人口发展，今后将人财两旺。唐太宗等政治家将生育和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员升降标准是高瞻远瞩的，比现在以GDP为主的急功近利的考核标准合理得多。

① 《地方今年GDP增长目标东低西高 19省预期超10%》，《中国日报》网，2012年2月6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jingji/2012-02/06/content_14540983.htm。

② 陈钧：《重庆市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列西部省区市第一位》，中国政府网，2011年1月27日，http://www.gov.cn/gzdt/2011-01/27/content_1793489.htm。

③ 曾小清：《四川近两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改革开放30年总额》，新华网（来源：《四川日报》），2010年10月17日，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0-10/17/content_21151928.htm。

世界人口变局对中国国防的影响

100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现在世界人口格局发生空前巨变，左宗棠当年的主张更具有现实意义。

人口是经济的主体，也是军事的主体，人口结构决定国防实力。传统上，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因为那里有数量不少的匈奴、突厥、蒙古、满族等强悍的民族。

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开始减少，虽然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然远离更替水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国防压力可能会不断减弱。

发达国家人口的老化和萎缩，也决定了中国来自东部沿海的国防压力将减弱。日本和欧洲将被老年化搞得焦头烂额。只有在有足够年轻人口的情况下才有能力将内部危机转嫁给外部；老年化所引发的内部危机将使得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内向。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将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国家，有着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世界第一军事、外交大国。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的不断下降，美国今后将会更加注重合纵连横，而不是单独行动。由于欧洲人口即将负增长、结构在不断老化，国际影响力将不断下降，美国将在新兴国家中寻找新的盟友。重返亚太是美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世界人口结构的巨变，也改变了美国的利益格局。从美国长远利益看（假如美国政治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的话），不应该再将中国视为对手。

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非常低，今后将面临严重的老年化和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台湾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台独势力必将减弱（假如中国大陆能够有效提升生育率的话）。朝鲜生育率也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只有2.0了），至少从人口结构看，朝鲜半岛的火药味越来越淡。朝鲜还有相对丰沛的年轻劳动力资源。预计朝鲜将进行经济改革，将会给韩国以及中国东北带来发展机遇。

东南亚现在生育率还在更替水平以上，尤其是菲律宾的生育率还在3.1，越南的生育率虽然低于更替水平，但仍然远比中国高，今后两国的人口结构远比中国要年轻。虽然这两国单独无力启动争端，但如果出现国际操纵，那就另当别论了。其实维护南海和平，对东南亚和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将错过发展经贸的大好机会。

从菲律宾与日本人口对比可以看出出生高峰对国运的影响。1950年，日本、菲律宾人口分别为8220万、1840万，日本是菲律宾的4.5倍。日本的每年出生人口由

1950~1955年的203万下降到2005~2010年的109万，同期菲律宾每年出生人口则从98万增加到232万。2010年，日、菲总人口分别为1.27亿、0.93亿。如果依照《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中方案，日、菲人口在2050年分别为1.08亿、1.55亿，在2100年分别为0.91亿、1.78亿。如果依照低方案，日、菲人口在2050年分别为0.97亿、1.34亿，在2100年分别为0.55亿、1.08亿。在中、低方案下，2050年日本的中位年龄分别为52.3岁、57.3岁，而菲律宾分别只有32.5岁、37岁。菲律宾2010年生育率还有3.14，目前国力还处于蛰伏状态；但是今后很可能崛起为雄踞太平洋的一个海洋大国。而2010年日本、越南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39、1.82，日本生育率很难大幅提升，越南的生育率还将继续下降，今后两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将下降。

今后，印度人口规模将远远超过中国。两国边界线比较长，一个朝气蓬勃的庞然大物出现在西部边境对于衰老的中国将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口即将负增长，人口在快速老化，而印度等国却是朝气蓬勃，印度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意味着今后年轻劳动力和适龄参军人口都是中国的两倍。2035年、2050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分别为3:1、2:1，而印度却分别是7:1、5:1。国防力和经济力对比可想而知。

2010年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的生育率分别为3.42、6.29、2.59、3.30、2.90。这些国家的年轻劳动力将推动经济发展，也会给中国新疆带来发展机遇和某种国防压力。巴基斯坦目前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4%，但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却相当于中国的1/3了，就中巴边界区域来说，中国在人口上相对于巴基斯坦也处于劣势。

新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本中国的战略纵深之地，地广人稀。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往东部，西部人口越来越稀，和邻国相比人口优势减弱；而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人口又还在快速增加。

纵观世界人口格局，今后中国经济机遇和国防压力都主要来自西部。预计西部将迎来大发展，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民族关系应该会进一步得到改善；但是需要防范目前在东部城市化出现的拆迁等问题转变为西部的民族矛盾。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同样是中国和世界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他们在中国与西亚、中东的贸易和文化交往中将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其实并不高，今后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会很快下降的。应该出台政策，平等地促进各民族的人口发展。

在加强对印度、巴基斯坦、西亚的经济交往的同时，应该加强文化交流（包括增

加留学生)，培育民间友好力量，加深接触，避免误判，尤其要避免激化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处理好中印关系，将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发展。

人类的大多数战争都是争夺现有资源，但是今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依赖新的资源的开发，开源比节流更重要。各国与其为了争夺现有的有限资源而大打出手，倒不如协作发展科技以开发新的资源。印度庞大的年轻人口必将对科技和世界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应积极布局西部的人口和城市

被动不如主动，人防是最大的国防。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城市化过程是人口布局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国城市化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且会影响今后的人口再生产。中国2010年城市化率为50%，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今后城市化将超过70%。由于东部的先发优势，大量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对中国的未来经济和国防布局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使得西部人口越来越稀少，形不成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一方面使得东部大城市人口过于稠密，像东京、汉城、香港、台北那样民不聊“生”（只有人口投入，没有人口产出，等于挥霍人口资源）。

西部开发应该以留住人口为首要出发点。应该在西部建立城市圈，才能从经济学角度防止人口东流。一方面可以利用印度崛起给中国西部的机遇，一方面应对来自西部的国防压力。中国人口即将负增长，等到城市化完成之后，再重新布局人口将很困难。

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今后20年时间内还有1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将迸发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明朝刘伯温曾说过：“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从世界和中国的人口结构来看，西部地区确实充满机遇。

但是水资源和地质的限制（高山、高原、沙漠）制约着西部人口和城市布局。整个西部地区只有四川盆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最强，其中长江边的重庆在水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边建设面积广阔，区位优势明显，完全可以建成一座国际大都市。国家应该将四川盆地建成人口“聚宝盆”，才能使之成为经济宝地和国防宝地，还能辐射西北地区，遏止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的人口东流，改善民族关系。

目前，西部地区的大中型城市还太少，还不足以完成城市化。云贵高原地区属典型的高原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承载力较差。云南水资源分布不

均，大量水资源白白流走。昆明区内没有大江大河过境，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甚至不及沙漠国家。云南具有边贸区位优势，但是昆明本身人口规模难以扩大，消化不了区位优势带来的经济能量（规划中的滇中引水工程将增加昆明、大理等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贵阳位于贵州省喀斯特地貌的中心带，不容易蓄水，也很难建造水库，城市规模无法扩大。长期以来，贵阳作为一个弱势省会，一直不具备带动全省发展的实力。黔中经济区的建成将提高贵阳的辐射能力。但是水资源的匮乏使得昆明和贵阳的产业布局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云贵其他地方都不具备建设较大城市的条件（既缺乏水资源，又因为山区缺乏建设用地）。云贵地区人口可能将继续东流。

沪昆高铁西部沿线地区，只有湘西怀化承载人口的能力最强。怀化处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生态良好，周边水资源丰沛（沅江水量超过黄河；怀化上游的三板溪水库的调节库容超过北京密云水库，供水能力超过给长沙供水的东江水水库），建设面积广（包括鹤城区、中方县、洪江市、芷江县、辰溪县、麻阳县在内的区域是武陵山最大的盆地），借助现代交通工具，有建设成为山区特大城市（从水资源和建设面积角度看，可承载上千万人口）的条件。怀化位于长沙到贵阳、重庆到广州、西安到海南的中点，自古就有“湘黔川鄂桂五省通衢”之称。湘西近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是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曾留下“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等成语，高庙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怀化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怀化的洪江凭借水运优势，曾长期是大西南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中心，民国时期其市场现金流量仅次于湖南省会长沙，对贵州的经济辐射作用超过贵阳；解放后由于交通优势的丧失而逐渐衰落。怀化现在是全国九大铁路编组站之一，沪昆普通铁路、焦柳铁路、渝怀铁路、怀邵衡铁路（与渝怀铁路一起是兰夏铁路的组成部分，2017年通车）、沪昆高铁（客运专线，2014年通车，另外已经规划了遵义—怀化铁路，今后还可能修建西安—怀化—桂林—海南的铁路、重庆—德江—怀化—永州—广州铁路）及沪昆、包茂、娄怀高速公路在城区交汇，芷江机场曾是远东第二大机场，加上两条国家一级通讯光缆在市区交汇，使怀化成为我国东西结合部的交通通讯大枢纽和物流中心。沪昆高铁通车后，预计怀化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9年，国务院已提出成立“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设想；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复《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武陵山扶贫片区（人口3000多万、面积17万平方公里）贫穷的重要原因是远离中心城市（重庆、长沙、武汉、贵阳等），这片广袤的区域本身并无一座中心城市。该区域2010年城市化不到30%，如果不能建成中心城市以增强造血能力，大量人口将外流，将再次陷入贫困，需要持续的输血式扶贫。建议今后在武陵山扶贫片区的基础

上（还应适当调整区划）成立武陵省（秦朝在此区域设立黔中郡，汉朝设立武陵郡，唐朝设立黔中道；民国时期曾多次规划在该区域重新建省，并两次着手实施，都因战争而未能实现），将怀化的鹤城、中方、洪江、芷江、辰溪、麻阳一体化，建成省会城市（城市规模可能将超过贵阳）以辐射武陵山区。丰富的水资源使得怀化在产业结构上与贵阳、昆明有极大的互补性，可共同形成沪昆高铁西线经济带。怀化周边自然资源（矿产、能源、生态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凤凰古城、张家界、梵净山、莨山、芷江—雪峰山抗日战场、洪江古商城、湘西土司城等）也非常丰富，多向发展的潜力巨大。将怀化建成中心城市将是西部开发最重要的一步活棋。还需要在云贵地区和武陵山建设一批中等城市，以遏制西部人口东流。

也应该将四川盆地的宜宾、万州建成中心城市，与成都、西安、昆明、贵阳、怀化一起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都市圈。由于享有巨大的地理（离印度近）和资源优势（离西部矿产资源腹地近），以及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优势，今后这一都市圈将会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并将承载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 8 章

中国人口展望

中国人口展望

联合国2010年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但是建立在错误数据的基础上的，比如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1995年为2.01，在1995~2000年为1.8，在2000~2005年为1.7，在2005~2010年为1.64；认为2010年中国0~19岁人口为36631万人。而“六普”显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2010年0~19岁人口只有32121万人。并且联合国并没有考虑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的补偿性出生高峰。因此，笔者对中国人口进行重新预测。

笔者的未来人口预测采用以下参数：

① 2010年年龄结构：2010年各年龄组人口数采纳“六普”短表《表3-1 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虽然笔者认为“六普”存在4%以上的重报，但是仍然以普查结果为准）^①。

② 年龄别存活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预期寿命（见下表），选取联合国远东地区的男女生命表，计算年龄别存活率。

③ 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由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育龄的推迟，标准化的年龄别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0的情况下的年龄别生育率）也是动态变量。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联合国是5年一组，如2010~2015年为1组，用线性穿插获得每年一组）。在预测的时候，用总和生育率乘以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就得出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以2015~2020年为例，25~29岁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为68，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78，那么25~29岁年龄别生育率为121（ $68 \times 1.78 = 121$ ）。

④ 未来总和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见表8.1）。近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日本为106，美国为105。

^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表8.1 2011~2100年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预期寿命(岁)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预期寿命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男	女
2011	1.181	118.8	1.181	118.8	1.181	118.8	71.7	75.2
2012	1.181	118.4	1.181	118.4	1.181	118.4	71.9	75.4
2013	1.181	118.0	1.300	118	1.3	118	72.1	75.6
2014	1.181	117.6	2.300	110	2.6	110	72.3	75.8
2015	1.181	117.2	2.200	110	2.5	110	72.5	76.0
2016	1.181	116.8	2.000	109	2.3	109	72.6	76.3
2017	1.181	116.4	1.900	109	2.1	109	72.8	76.5
2018	1.181	116.0	1.800	109	2.1	107	73.0	76.7
2019	1.181	115.6	1.615	109	2.1	107	73.2	76.9
2020	1.181	115.2	1.590	109	2.1	107	73.4	77.1
2021	1.181	115.4	1.470	108	2.1	107	73.5	77.2
2022	1.181	115.2	1.430	108	2.1	107	73.6	77.4
2023	1.181	115.0	1.425	108	2.1	107	73.8	77.6
2024	1.181	114.8	1.290	108	2.1	107	74.0	77.8
2025	1.181	114.6	1.245	108	2.1	107	74.1	78.0
2026	1.181	114.4	1.160	108	2.1	107	74.3	78.1
2027	1.181	114.2	1.150	108	2.1	107	74.4	78.2
2028	1.181	114.0	1.185	108	2.1	107	74.6	78.4
2029	1.181	113.8	1.155	108	2.1	107	74.8	78.6
2030	1.181	113.6	1.125	108	2.1	107	74.9	78.7
2031	1.181	113.4	1.135	108	2.1	107	75.0	78.9
2032	1.181	113.2	1.120	108	2.1	107	75.2	79.0
2033	1.181	113.0	1.130	108	2.1	107	75.3	79.2
2034	1.181	112.8	1.140	108	2.1	107	75.4	79.4
2035	1.181	112.6	1.150	108	2.1	107	75.6	79.5
2036	1.181	112.4	1.160	108	2.1	107	75.7	79.6
2037	1.181	112.2	1.170	108	2.1	107	75.9	79.8
2038	1.181	112.0	1.180	108	2.1	107	76.0	79.9

续表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预期寿命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男	女
2039	1.181	111.8	1.190	108	2.1	107	76.1	80.0
2040	1.181	111.6	1.200	108	2.1	107	76.3	80.2
2041	1.181	111.4	1.210	107	2.1	106	76.4	80.3
2042	1.181	111.2	1.220	107	2.1	106	76.5	80.5
2043	1.181	111.0	1.230	107	2.1	106	76.6	80.6
2044	1.181	110.8	1.240	107	2.1	106	76.7	80.7
2045	1.181	110.6	1.250	107	2.1	106	76.8	80.9
2046	1.181	110.4	1.254	107	2.1	106	77.0	81.0
2047	1.181	110.2	1.262	107	2.1	106	77.2	81.1
2048	1.181	110.0	1.270	107	2.1	106	77.3	81.2
2049	1.181	109.8	1.278	107	2.1	106	77.4	81.3
2050	1.181	109.6	1.286	107	2.1	106	77.6	81.4
2051	1.181	109.4	1.294	107	2.1	106	77.6	81.6
2052	1.181	109.2	1.302	107	2.1	106	77.7	81.7
2053	1.181	109.0	1.310	107	2.1	106	77.8	81.8
2054	1.181	108.8	1.318	107	2.1	106	77.9	81.9
2055	1.181	108.6	1.326	107	2.1	106	78.0	82.0
2056	1.181	108.4	1.328	107	2.1	106	78.2	82.2
2057	1.181	108.2	1.334	107	2.1	106	78.3	82.3
2058	1.181	108.0	1.340	107	2.1	106	78.4	82.4
2059	1.181	107.8	1.346	107	2.1	106	78.5	82.5
2060	1.181	107.6	1.352	107	2.1	106	78.6	82.6
2061	1.181	107.4	1.364	107	2.1	106	78.7	82.7
2062	1.181	107.2	1.372	107	2.1	106	78.8	82.8
2063	1.181	107	1.380	107	2.1	106	78.9	82.9
2064	1.181	107	1.388	107	2.1	106	79.0	83.0
2065	1.181	107	1.396	107	2.1	106	79.1	83.1
2066	1.181	107	1.392	107	2.1	106	79.3	83.3

续表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预期寿命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男	女
2067	1.181	107	1.396	107	2.1	106	79.4	83.4
2068	1.181	107	1.400	107	2.1	106	79.5	83.5
2069	1.181	107	1.404	107	2.1	106	79.6	83.6
2070	1.181	107	1.408	107	2.1	106	79.7	83.7
2071	1.181	107	1.418	106	2.1	105	79.8	83.8
2072	1.181	107	1.424	106	2.1	105	79.9	83.9
2073	1.181	107	1.430	106	2.1	105	80.0	84.0
2074	1.181	107	1.436	106	2.1	105	80.1	84.1
2075	1.181	107	1.442	106	2.1	105	80.2	84.2
2076	1.181	107	1.442	106	2.1	105	80.3	84.3
2077	1.181	107	1.446	106	2.1	105	80.4	84.4
2078	1.181	107	1.450	106	2.1	105	80.5	84.5
2079	1.181	107	1.454	106	2.1	105	80.6	84.6
2080	1.181	107	1.458	106	2.1	105	80.7	84.7
2081	1.181	107	1.462	106	2.1	105	80.8	84.8
2082	1.181	107	1.466	106	2.1	105	80.9	84.9
2083	1.181	107	1.470	106	2.1	105	81.0	85.0
2084	1.181	107	1.474	106	2.1	105	81.1	85.1
2085	1.181	107	1.478	106	2.1	105	81.2	85.2
2086	1.181	107	1.476	106	2.1	105	81.3	85.2
2087	1.181	107	1.478	106	2.1	105	81.4	85.3
2088	1.181	107	1.480	106	2.1	105	81.5	85.4
2089	1.181	107	1.482	106	2.1	105	81.6	85.5
2090	1.181	107	1.484	106	2.1	105	81.7	85.6
2091	1.181	107	1.492	106	2.1	105	81.7	85.7
2092	1.181	107	1.496	106	2.1	105	81.8	85.8
2093	1.181	107	1.500	106	2.1	105	81.9	85.9
2094	1.181	107	1.504	106	2.1	105	82.0	86.0

续表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预期寿命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生育率	性别比	男	女
2095	1.181	107	1.508	106	2.1	105	82.1	86.1
2096	1.181	107	1.506	106	2.1	105	82.2	86.1
2097	1.181	107	1.508	106	2.1	105	82.3	86.2
2098	1.181	107	1.510	106	2.1	105	82.4	86.3
2099	1.181	107	1.512	106	2.1	105	82.5	86.4
2100	1.181	107	1.514	106	2.1	105	82.6	86.5

低方案是“稳定低生育率水平”，今后生育率稳定在2010年的1.181。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关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事实上，如果继续现行政策的话，生育率会在1.18的基础上继续下降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后，生育率也很难稳定在1.18的。

中方案是在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其中“补偿性”出生3009万，与上面分析的“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当），2013年之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3、2.2、2.0、1.9、1.8，然后在2019年开始沿着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老路下降到2031年（前面已经分析，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分别早22年、20年，将中国台湾1997年、韩国1999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19年的生育率，依此类推到2031年）。由于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提高分配率，控制房价，调整城市规划，增加教育投入，降低了养育成本，人口控制论的余毒逐渐被肃清，而人口危机全面爆发，对养老等的恐惧，提升了大众的生育意愿，也形成了鼓励生育的强大的民意压力，有形、无形的宣传广泛出现在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媒体上，自2032年始，中国的生育率如联合国低方案那样不断攀升，到本世纪末达到1.51。由于停止计划生育，并出现了补偿性出生高峰，选择胎儿性别的人减少，出生性别比快速下降。

高方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方案：在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5年“补偿性”出生4457万，多于上面分析的“补偿性出生高峰”），2013年后五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6、2.5、2.3、2.1、2.1，其后生育率仍然稳定在2.1（中国近期世代更替水平高于2.1；由于本方案是假定今后性别比正常、死亡率降低，因此今后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还是在2.1左右）。中国人口欠账太多，因此人口仍然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负增长，然后才能稳定。停止计划生育后，无论是补偿性出生高峰还是其后的生育率都不可能达到高方案。但是今后的历届政府应该以高方案为奋斗目标。

其实，中方案也过于乐观，补偿性出生高峰不会这么高。李建新判断，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不会超过2.0。王广州推算，2013年全面放开二胎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均值分别为1.93、1.88、1.87、1.82、1.8，0岁人口均值分别为1954万、1905万、1881万、1823万、1789万^①。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只会略高于全面放开二胎。如果中国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后，像中国台湾、韩国那样不痛不痒地鼓励生育，那么今后20年的生育率很可能比中方案要低（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文化、生育观念、经济模式的影响非常深远）。如果在停止计划生育上还犹犹豫豫、遮遮掩掩，今后更加难以有效鼓励生育，那么今后生育率会更低。

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生育率下降，从1920~1924年的3.18下降到1935~1939年的2.18，下降31%；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生育率由2007年的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1年的1.89^②。一战、二战期间，欧洲都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出现生育率下降。苏联、东欧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治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生育率跳跃性下降。中国是未富先老，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减少，今后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人们的生活压力（包括就业压力）将很大，生育率可能会下降。今后中国鼓励生育的道路将比欧洲现在要崎岖得多。

由于对未来生育率等参数很难准确把握，人口预测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今后经济和社会形势将非常复杂，影响生育率的变量很多，笔者对中国未来人口预测也不可能是很准确的，仅供参考。

表8.2 低方案下的人口结构（百万）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0~14岁	15~64岁	65+岁	中位年龄
2010	1333	14.02		221	993	119	34.9
2014	1341	12.82	11.16	212	995	134	36.7
2015	1342	12.60	11.32	210	994	139	37.1
2016	1343	12.27	11.48	207	992	144	37.5
2017	1343	11.83	11.63	205	987	151	37.9
2018	1343	11.46	11.79	203	983	157	38.4

① 王广州：《2013年全部放开二胎政策——宏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王广州新浪博客，2012年11月2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b61160101dmtx.html。

② Gretchen Livingston, In a Down Economy, Fewer Birth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2, 2011,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1/10/12/in-a-down-economy-fewer-births>. Meredith Melnick, "U.S. Birth Rates Hit Record Lows: Is It the Economy?" TIME, November 18, 2011, <http://healthland.time.com/2011/11/18/u-s-birth-rates-hit-record-lows-is-it-the-economy>.

续表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0~14岁	15~64岁	65+岁	中位年龄
2019	1342	11.01	11.94	199	978	165	38.8
2020	1341	10.58	12.10	195	974	172	39.2
2025	1325	9.14	13.13	167	964	195	41.6
2030	1300	8.48	14.30	147	919	234	43.8
2040	1219	6.93	16.78	118	785	316	49.3
2050	1101	5.58	18.70	97	672	333	53.4
2060	960	4.53	19.16	78	522	360	55.0
2070	815	3.74	17.90	64	434	317	57.2
2080	679	3.08	16.07	53	344	282	58.4
2090	561	2.54	13.30	43	280	238	58.6
2100	465	2.11	10.94	36	230	199	59.1

中位年龄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的自然顺序排列时居于中间位置的人的年龄数值。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43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降低为11.01亿，到2100年降低为4.65亿。

表8.3 中方案下的人口结构（百万）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0~14岁	15~64岁	65+岁	中位年龄
2010	1333	14.02		221	993	119	34.9
2014	1354	24.97	11.35	225	995	134	36.3
2015	1366	23.48	11.52	234	994	139	36.5
2016	1375	20.78	11.65	240	992	144	36.7
2017	1383	19.04	11.78	245	987	151	36.9
2018	1388	17.47	11.91	248	983	157	37.2
2019	1391	15.06	12.03	248	978	165	37.5
2020	1393	14.24	12.18	248	974	172	37.9
2025	1386	9.64	13.15	227	964	195	40.0
2030	1360	8.18	14.30	183	943	234	42.6
2040	1287	8.99	16.82	126	845	316	47.8
2050	1191	7.53	18.76	127	732	333	50.3
2060	1066	6.08	19.25	105	601	360	51.4

续表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0~14岁	15~64岁	65+岁	中位年龄
2070	937	5.61	18.10	89	531	317	54.0
2080	818	5.15	16.53	82	433	303	56.6
2090	713	4.45	14.29	73	353	286	55.0
2100	621	4.06	12.80	65	322	234	54.9

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21年达到13.9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降低为11.91亿，到2100年降低为6.21亿。

表8.4 高方案下的人口结构（百万）

年份	总人口	出生	死亡	0~14岁	15~64岁	65+岁	中位年龄
2010	1333	14.02		221	993	119	34.9
2014	1358	28.22	11.40	228	995	134	36.3
2015	1373	26.68	11.57	240	994	139	36.3
2016	1385	23.90	11.70	249	992	144	36.4
2017	1394	21.04	11.82	256	987	151	36.6
2018	1403	20.38	11.97	263	983	157	36.8
2019	1410	19.58	12.11	267	978	165	37.0
2020	1417	18.81	12.26	271	974	172	37.3
2025	1438	16.26	13.26	280	964	195	38.7
2030	1447	15.32	14.42	263	949	234	40.8
2040	1449	17.41	16.95	236	897	316	43.5
2050	1444	17.11	18.91	257	853	333	41.4
2060	1416	16.43	19.44	251	806	360	41.7
2070	1394	16.86	18.40	246	830	317	41.4
2080	1386	17.01	17.11	252	826	309	40.4
2090	1393	16.77	15.54	252	810	331	40.9
2100	1408	16.93	15.43	250	827	331	41.3

高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43年达到14.50亿的顶峰后略有下降，到2050年降低为14.43亿，到2100年降低为14.08亿。

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口依照联合国的中方案走，那么低、中、高方案下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2050年分别为12.1%、12.9%、15.3%，在2100年分别为4.8%、6.3%、

13.3%。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口依照联合国的低方案走，那么低、中、高方案下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2050年分别为13.6%、14.6%、17.1%，在2100年分别为7.6%、9.9%、19.9%。



图8.1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

注：图中假定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依照联合国中方案走。

也就是说，即便中国人口沿着高方案走，也难以遏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趋势。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人口沿着中方案甚至更低的路线走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在1820年占全球人口37%的国家，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就这样在几十年之内就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极端衰老的国家！

上面是根据“六普”的人口结构进行预测的。但是如本书第四章所分析，“六普”存在4.28%的重报。将“六普”各年龄组以4.28%的重报率进行修正，再用上面的三个方案其他参数预测，那么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2.88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100年分别只有10.56亿、4.46亿。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21年达到13.37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100年分别只有11.42亿、5.96亿。高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43年达到13.91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100年分别只有13.84亿、13.50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了。

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式战略调整

二战前，英、法、美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是“绥靖政策”

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为了推行绥靖政策，他一面在国内打击强硬派，一面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他获得了一面倒的民意支持。

丘吉尔是英国议会中极少数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是多数人都将他的警告视为危言耸听。

“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对德国宣而不战。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被德国人称为“假战”。

由于战事进展不顺，1940年5月10日，众叛亲离、声名狼藉的张伯伦只得“引咎辞职”，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半年后，张伯伦在家乡的孤独抑郁中病逝。毛泽东曾说：“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①

5月21日，德军已经绕过马奇诺防线，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敦刻尔克——一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法国也准备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势万分危急，丘吉尔果断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英国的计划是力争撤离3万人。英国政府通过广播紧急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花花绿绿的私人游艇，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在5月26日到6月4日这短短的8天中，奇迹般地将33.8万人安全撤回英国。丘吉尔宣布：“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绝大部分都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力量。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没有4年后的诺曼底登陆，就没有二战的胜利。敦刻尔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英国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撤退，但是这种撤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停止计划

^① 《1869年3月18日 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诞辰》，人民网（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318/881.html>。

生育也有高度时限性。前面已经分析，生育是很难补偿的。晚停止计划生育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3000多万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当于当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他们将承担重大的家庭责任（可以让数千万家庭降低养老风险）、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部分单一年龄的3000多万（全部是孩子），如果被“过渡”掉了，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相当于战争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2012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开始快速减少，一批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力。而年青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

人口政策现在是进退维谷，但却又是不进则退。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放大（滞后的后遗症逐渐显露，将延续几十年、上百年），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

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才露出了冰山一角，计划生育的政治包袱还没有“浸水”，还来得及将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4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人口总数有上亿对不上数，“水淋淋”的政治包袱将拖垮一切！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长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一再夸张地预测人口总数和补偿性出生高峰会动摇决策层“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一旦下决心调整政策，就不应该拖泥带水踏碎步（各种二胎过渡）。

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不要指望没有产前的“阵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因为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即便有少数人想生三个，也得一个一个地生），也会出现同样大的社会震荡（在农村增加一些孩子不会引起社会震荡，因为农村已经空巢化了，并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舆论焦点），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难产”。今后还得迈停止计划生育这道坎，然后才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却将使得后续的政策滞后，错过鼓励生育的历史时机。

做好“接生”准备

前面已经分析，补偿性出生高峰难以达到3000万。即便有一半的是在第一年出生

（从生育能力和生育规律考虑，是不可能的），那么加上“非补偿”出生，该年总出生人口也难以达到3000万。

就像母亲的产道富有弹性一样，社会也有应付出生高峰的弹性适应能力。即便年出生人口真能达到3000万以上，也不足为虑。一战后的1920年，法国、德国、英国的出生人口分别是战时低谷的2.2倍、1.8倍、1.4倍。二战后的1947年，法国、英国出生人口分别是1941年的1.7倍、1.5倍。中国1963年出生2959万，是1961年的2.49倍。日本1947~1949年团块世代年均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2010年中国0~4岁人口年均1510万，其中0岁人口1379万（根据存活率计算，2010年出生1402万），如果补偿性高峰年出生人口是2010年的2.49倍、2.2倍、1.8倍、1.7倍，那应该出生3491万、3084万、2524万、2383万。

有人说，目前城市大医院的产科床位已经很紧张了。如果出现婴儿潮，接生都成问题。笔者与全国多地的妇产科和其他科的医生讨论过，他们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弹性很大（比如1981年、1982年的绝育手术分别为221万、516万例，但是1983年却高达2066万例；2003年中国医疗资源也满足了“非典”的弹性需求），应付补偿性出生高峰是没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年均出生2500多万（“六普”显示1990年出生2900万）也没有问题，现在医疗水平和条件毕竟还大有提高和改善。

中国的医护人员都接受过全科培训，如果再专门短期培训妇产科，完全可以胜任接生的任务。可以由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担当主力，其他科室的医生和护士担当助手。也可以动用其他科室的诊室和床位，甚至临时租用其他机构的房间为诊所和病房。妇产科医疗资源可以短时间增加数倍。

目前，城市大医院产科床位紧张，是因为市场配置的问题，不是医疗资源问题。停止计划生育或放开二胎后的出生高峰在城市差别不大（在农村略有差别，而基层医疗严重闲置），需要同样力度的医疗资源整合。

要尽量自然生产。当然在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由于孕妇平均年龄大，高危孕妇比例高，剖腹产比例可能难以控制在15%以内。应该将三甲医院的门诊和病床腾出，只接受高危孕妇。正常孕妇的产检和接生由中小医院承担。对高龄孕妇，在孕检、产假等方面要给予人性化关怀。

生孩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发达国家基本是每个产妇有单间；而中国目前还是几个产妇住在一间病房，显得“没有尊严”。刚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政策和土地供应上向医院产科倾斜，投资产科病房（算是政府的人口投资）。等到补偿性出生高峰一过，今后中国的产妇也能享受单间待遇。

停止计划生育还有助于改善医疗市场，增加医院的收入，医院是非常高兴组织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的。

婴儿食品和服装行业的弹性也很大。引导企业将奶粉资源配置到婴儿奶粉上，并合理进口一些婴儿奶粉。尤其是要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

从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做好社会安抚工作。对过去因为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一些损害，比如身体致残、失独家庭，给予适当的补偿和人性化的关怀。公开讨论人口危机（不要再以“政策连续性”为由限制舆论），让大众意识到停止计划生育的紧迫性（有助于消除利益集团的阻力）。通过舆论让那些丧失生育能力的人知道虽然自己不能再生育，但是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有利于完善社保制度，对全民都是有利的。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如果对计生队伍安置不当，将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基层专职的计生队伍并不算庞大（很多人是兼职）。从基层计生人员到省级、国家计生委的官员，很多与笔者有私人联系，他们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他们普遍认为人员安置根本不是问题，计生委相关职能只需要向其他部门转移，比如科技服务处可以向卫生部门转移，人口统计人员可向统计局转移，宣教处可以向宣传、文化等部门转移，财务、人事等其他工作人员也同样分流转移。计生委的下属单位，相关机构和人员划归到其他部门便可。不需要动大手术，也没有大手术可动。撤销计生委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农村的乡镇合并。现在民意是要求撤销计生委，计生干部缺乏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以威胁社会稳定。

如果能有汉武帝和丘吉尔当年那样的政治勇气，再大的出生高峰都能应付得了。政治冲击力远不如当年结束“文革”，政策强度还远不必达到2003年“非典”时期，投资力度也远不必达到前几年的“4万亿计划”。

1984年人口政策松小口后，生育率并未回升，但是就已经“为国内外所焦心”了^①。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有所回升，国内外一些组织会更加焦心。需要提防一些人士在人口统计时夸大补偿性出生高峰和今后的生育率，以阻止中国出台后续的人口发展政策。

^① 《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9月2日，<http://nmpc.people.com.cn/GB/127024/9972958.html>。

投资“造物”，不如投资“造人”

有人担心婴儿潮会对医疗、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冲击。比如曾毅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因此他一直推销二孩晚育软着陆^①。这种观点源于“人口是负担”的经典人口学思想。

在人口问题上，农民远远比人口学家更有远见（因为他们接“地气”）。就是因为他们的远见和勇气，才使得一亿多“超生”者“死里逃生”，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活力。笔者曾跟湘西老家农民讨论过，他们一点不担心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他们说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之分，果树有丰年、平年、歉年之分（结实周期性），出生不可能很均匀。有春耕大忙，才有夏耘和秋收。在歉年可以施肥、修枝（丰年不修歉年剪），迎接另一个丰年。“双抢”的时候（类似现在的补偿性出生），农民动员一切力量抢割早稻、赶播晚稻（急迫程度类似于敦刻尔克大撤退），播种希望和收获丰收，谁也不会怠慢。如果耽误了季节，一年的收成将毁于一旦。而人口学家是“不稼不穡”，是很难达到农民的思想高度的。

有人担心出生高峰对相关行业就业造成冲击。其实，即便农民也必须懂多种手艺，既会插秧，也能培土、除草、收割。在现在社会，即便没有出生高峰，本身就业替代也很频繁，随着就业市场的“季节”变化，职业转换也是很正常的。比如在互联网等的冲击下，2001~2011年这十年中，美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从业人数下降了40.6%^②。

并且就某一行业内部，就业弹性也很大，有“农忙”，也有“农闲”。比如，生源多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多一些；生源少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少一些。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1999年的160万、2005年的505万、2011年的682万，不是照样消化下来了？食品企业不会因为包粽子太累而呼吁取消端午节；端午节可以加班加点包粽子，中秋节可以赶工赶时做月饼，很多企业指望靠这两波生意转亏为盈。

除了市场调节外，政府也需要有所作为。可以借鉴古代平糶制的一些思路。平糶制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首创的，由官方于丰收时买米粮储存，以备荒年时发售，

^① 曾毅：《人口增长要非常慎重 坚持晚婚晚育政策》，搜狐财经，2007年12月2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71221/n254231628.shtml>。

^② Erik Sass, “Newspaper Jobs Shrink 40% In 10 Years”, MediaPost, Sep 19, 2012, <http://www.mediapost.com/publications/article/183378/newspaper-jobs-shrink-40-in-10-years.html>。

可平抑物价、稳定粮食。既可以避免丰年谷贱伤农，更可以在歉年赈济饥民。越国的计然和魏国的李悝总结出“数目字管理”的实践经验。比如计然对越王勾践说：“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灭掉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史记·货殖列传》）。

李悝对魏文侯说：“小饥时就发售小熟时所收购的米粮，中饥时发售中熟所收购的米粮，大饥时发售大熟收购的米粮。所以虽然遭遇水灾、旱灾等大小饥馑，米价不会腾贵，人民也不致离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道理。”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使得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汉书·食货志》）。

如果政府引导得当、市场配置合理，婴儿潮不但不会引起社会混乱，而且会给相关行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以美国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的一半，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①。

日本战后三年的“团块世代”婴儿潮，是日本战后重建的主力军，也被尊奉为日本现代的经济、文化、价值观的缔造者^②。

现在，日本和欧洲出现经济危机，很大程度是因为连续几十年的“人口歉年”。美国经济潜力还不错，是因为既有二战后的“人口丰年”、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歉年”，也有80年代之后的“人口丰年”（从生育率角度评估，只能算是“平年”）。

英国《每日邮报》2011年10月11日报导：年青一代到了65岁时，富裕程度会比他们的父母少25%。他们属婴儿荒（baby bust）世代，这群人的未来在每个层面上，都

^① Paul Zane Pilzer, “A Tale of Two Industries: Two major forces have converged to create one of the greates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nation”, SUCCESS FROM HOME, Vol.1, No.5 (July 2006), pp71-75. <http://www.paulzanepilzer.com/SuccessHomenov05.pdf>.

^② 鞠川阳子：《日本 团块世代的退休后》，新浪网（来源：《理财周报》），2010年3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roll/20100315/05227563497.shtml>。

比婴儿潮（baby boomer）世代要凄凉^①。

古代的朝廷不会因为丰年有“粮食高峰”而特意减产的。中国今后将面临几十年的人口“歉年”，如果现在担心出现“人口高峰”而用过渡方案“减产”人口，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

如果中国将下一轮投资围绕“补偿性出生高峰”，投资医院、食品、教育（规划新建幼儿园、游艺场、小学）等行业，不但有助于应对补偿性高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远远超过投资基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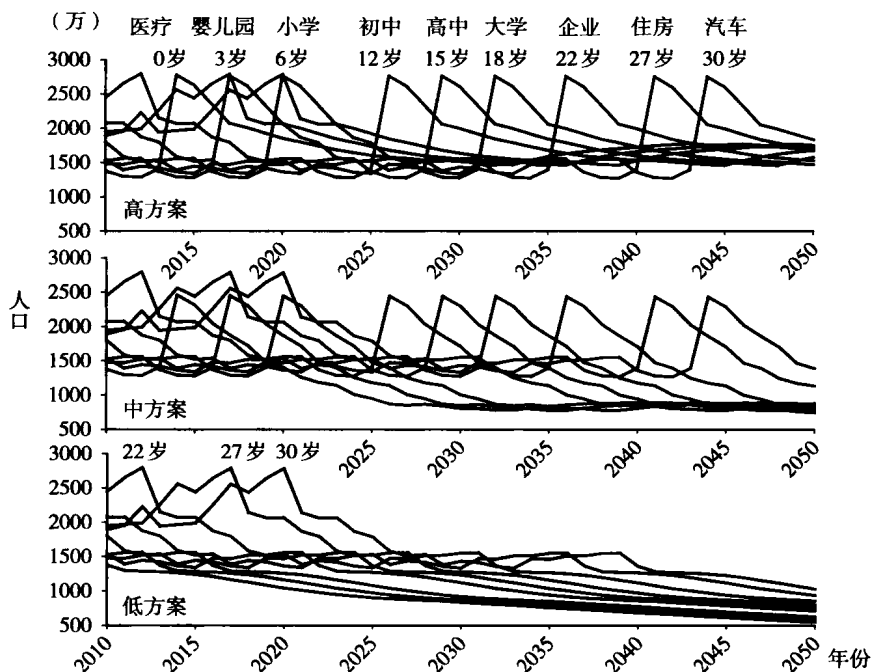


图8.2 “补偿性出生高峰”对今后经济的影响

0岁时将振兴医疗产业和婴儿食品、服装产业；3岁时将给幼儿教育 and 玩具业带来机遇；6岁上小学、12岁上初中、15岁上高中、18岁上大学时，将使得大量学校朽木逢春；22岁大学毕业，将给企业补充年轻血液；27岁、30岁到了购房、购车年龄，房地产和汽车将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江山代有“高峰”出，各引经济三五年。

从图8.2可见，高方案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强，不仅仅高峰迭起，而且底线也更

^① Becky Barrow, “Baby bust” generation: Today’s young “will end up 25% worse off than their boomer parents”, Daily Mail, 11th October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47665/Todays-young-end-25-worse-boomer-parents.html>.

高。而低方案下，不但没有出生高峰，而且底线也不断下降。近期中国经济还不错，是因为还有几个年龄段的交替高峰。比如2012年是22岁人群的高峰，2017年是27岁人群的高峰，2020年是30岁人群的高峰，这几个高峰在推动着中国的经济；等到这几个高峰一过，中国经济将是一潭死水。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是“抢高峰、抬基线”，让人口走势尽量沿着高方案走。

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根据1980年的《公开信》和其他文献，当初提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减少人口可以缓解就业压力^①。

独生子女政策重要“诠释者”田雪原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②。

自由派学者何清涟等学者在很多方面持“不同政见”，但在计划生育上却与政府高度一致。她也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因此坚决支持计划生育^③。

现在很多人也用就业压力作为理由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30年来，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这还很不够。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得坚持下去，绝不能让人口拖累未来”^④。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就业压力大”^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提出要实行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达成“城乡一胎”，并以此来较快“先控后减”总人口^⑥。他的依据之一就是少生孩子减轻就业压力^⑦。人口学者马瀛通也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⑧。

① 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经济日报》，2008年9月25日，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25/content_10107711.htm。张爱茹：《邓小平人口论述中有关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人民网，<http://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83/2641931.html>。

② 田雪原、陈玉光：《从经济发展角度探讨适度人口，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人口研究》，1981年增刊。

③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④ 王东京：《中国人口政策不可轻言改变》，《光明观察》，2006年10月28日。

⑤ 王东京：《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转型》，2007年12月5日，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71205/17074254972.shtml>。

⑥ 周炯：《人大代表程恩富建议股市交易时间缩短一半》，《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日，引自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80303/08484570868.shtml>。

⑦ 区健妍：《程恩富：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享高保》，2006年11月15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6-11/15/content_8525141.htm。

⑧ 马瀛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可见，“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①。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阿根廷失业率比印度还稍高。

有人说，2010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GDP却有5.5万亿美元；印度人口11.71亿，GDP只有1.73万亿美元，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地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5.5万亿美元的GDP只能提供0.66亿个的就业机会，而印度1.73万亿美元的GDP却能提供近5亿个就业机会。近年来，日本和印度的失业率都只有4%左右。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10年人均GDP为1477美元，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43137美元，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

农业社会累死累活还难以维持温饱，无节假日，也没有失业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在失业压力的推动下，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节假日越来越多，社会福利越来越好。可见，失业是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产物，而如何解决失业是改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动力。

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30%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

^① 易富贤：《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困局》，《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第76～83页，<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0902001.pdf>。

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译文：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中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凿门窗造房屋，正因为留有较大的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

生产（“有”）是手段，消费（“无”）是目的。生产为消费者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①。各国都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和谐。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等人认为总抚养比低是人口红利。其实，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总抚养比低于50%并非好事，意味着消费人口不足，劳动力“额外过剩”，会出现高就业压力。总抚养比在50%~60%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美国1950年以来就一直维持在50%~60%，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时社会比较稳定）和现在的印度总抚养比也是在50%~60%。

2009年人口上2000万的国家共有55个，占全球人口的89%。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的数据，整理成表8.5。

表8.5 2009年各国抚养比（%）、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

国家	抚养比			劳动力/ 总人口	国家	抚养比			劳动力/ 总人口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阿富汗	91.7	4.4	96.1	31.8	尼日利亚	79.6	6.3	85.9	32.1
阿根廷	39.0	16.3	55.3	48.7	尼泊尔	62.4	7.0	69.4	45.1
澳大利亚	28.2	19.6	47.8	52.8	巴基斯坦	60.0	7.1	67.1	34.8
孟加拉国	50.2	7.1	57.4	48.1	秘鲁	47.7	9.4	57.1	46.7
巴西	38.5	10.2	48.7	52.4	菲律宾	59.1	5.9	65.0	41.0
加拿大	23.8	19.9	43.7	56.6	波兰	20.9	18.8	39.8	45.7
哥伦比亚	44.5	8.4	52.9	41.5	朝鲜	34.7	13.8	48.5	50.6

^① 《消费能力体现大国实力》，《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1日第11版，<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5160300.html>。

续表

国家	抚养比			劳动力/ 总人口	国家	抚养比			劳动力/ 总人口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德国	20.5	30.5	51.0	51.7	罗马尼亚	21.7	21.3	43.0	44.4
阿尔及利亚	40.3	6.7	47.0	42.5	俄罗斯	20.6	18.0	38.5	53.5
埃及	50.2	7.8	58.0	33.3	沙特	46.5	4.4	50.9	37.7
西班牙	21.7	24.7	46.4	49.9	苏丹	72.0	6.3	78.2	31.2
埃塞俄比亚	77.2	6.0	83.2	49.4	叙利亚	64.0	6.6	70.6	31.5
法国	28.2	25.5	53.8	45.8	泰国	29.7	12.4	42.1	57.7
英国	26.3	24.8	51.1	51.4	土耳其	39.7	8.7	48.5	34.3
加纳	67.5	6.5	74.0	45.7	坦桑尼亚	85.5	6.0	91.4	48.9
印尼	40.7	8.1	48.9	50.0	乌干达	99.1	5.1	104.2	43.5
印度	48.3	7.6	55.8	39.8	乌克兰	20.1	22.2	42.3	49.9
伊朗	32.5	7.3	39.8	40.5	美国	30.0	19.2	49.2	51.9
伊拉克	81.3	6.3	87.5	23.4	乌兹别克	45.7	6.8	52.5	45.2
意大利	21.4	30.7	52.0	42.2	委内瑞拉	46.0	8.4	54.4	46.3
日本	20.8	34.2	55.0	51.5	越南	34.5	8.6	43.1	54.6
肯尼亚	77.4	4.8	82.3	47.3	也门	84.2	4.8	89.0	25.9
韩国	23.5	14.9	38.4	50.6	南非	46.7	6.9	53.7	38.3
斯里兰卡	37.0	11.8	48.8	40.7	刚果	91.7	5.2	96.9	37.8
摩洛哥	42.9	8.2	51.2	37.4	高收入	25.9	22.8	48.7	49.1
马达加斯加	81.3	5.9	87.2	48.9	中收入	46.7	9.0	55.7	41.5
墨西哥	45.9	9.7	55.6	43.3	低收入	69.6	6.3	75.9	45.4
缅甸	37.9	7.4	45.3	54.6	世界	45.2	11.6	56.8	43.6
莫桑比克	84.2	6.3	90.5	47.9	中国1	27.5	11.1	38.7	59.1
马来西亚	47.6	7.2	54.8	42.9	中国2	22.3	11.9	34.2	59.7

注：“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表中的“中收入国家”是指除中国以外的中收入国家，“世界”是指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资料以及“中国1”都来自《世界发展指标2011》；由于世界银行高估了中国的生育率、儿童抚养比和人口总数，因此“中国2”的抚养比采纳2010年人口普查，劳动力采纳《世界发展指标2012》。“劳动力”是指实际劳动力，不是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

从表8.5可见，绝大多数国家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也就是说大约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07亿人口，提供1.59亿劳动力；日本1.27亿人口，提供0.66亿个就业机会；巴西1.93亿人口，提供1.01亿个就业机会。

只有中国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9.7%，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抚养比太低（尤其是儿童抚养比太低）、消费人口太少（尤其是年幼消费者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中国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太高。2009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67.4%，世界罕见，世界（除中国外）平均只有48%，印度只有32.8%，日本为47.9%、韩国为50.1%，美国为58.4%，德国为53.1%、法国为50.5%、英国为55.3%。以男性劳动参与率为100%，中国妇女相当于男性的比例为84.6%，也是世界罕见，印度只有40.4%，日本为66.7%。也就是说，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减少了从事“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而过度从事“物质再生产”。

中国2010年有8亿实际劳动力，如果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如高收入国家那样只有49.1%，那么需要16亿多人口才能保证充分就业。但是中国只有13.4亿人口，意味着中国内需市场只能提供6.6亿个就业机会，“额外过剩”了1.4亿劳动力，内需不足，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是消费者数量的不足。

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11》，2000年中国劳动力为7.28亿，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2.8%，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28亿劳动力就得失业！

印度由于儿童抚养比较高，总抚养比为56%，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只为40%，内需市场旺盛。2003年到2010年，印度GDP年均增长8.2%，这主要靠内需拉动。

假如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么2010年总人口有15.25亿左右。虽然1990年以前的“多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但由于妇女要照看孩子，妇女劳动参与率将大幅降低，实际劳动力与现在相当或稍少，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生产与消费更为合理。

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中国目前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① 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大量的企业将转移到印度、菲律宾、拉美等

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墨西哥商品在美国进口额中的占比从2009年的10%上升到了2011年的12%；中国占美国的市场份额却从2010年的19%降到2011年18%^①。预计将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转移到菲律宾。印度劳动力数量还在继续快速增加，从事第二产业（工业）的劳动力比例也将增加。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24%~30%从事第二产业，中国是27%，等到印度这一比例由目前的14%增加到20%以上的时候，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

② 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1948年到2003年，欧洲占全球进口比例一直稳定在45%左右；但是从2003年到2010年，这一比例从45.0%下降到38.9%，美国也从16.9%下降到13.1%^②。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经济学家预测，2015~2030年，发达国家的储蓄额将呈现下降趋势^③。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降，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

③ 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国内就业，将保护制造业。比如美国过去10年，制造业流失的岗位达560万个；众议院2010年7月底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旨在帮助制造业复苏，增加就业^④。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提出多项新政策，包括2016年创造出100万个新的制造业工作。

④ 当今全球范围内工业领域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即数字化革命。它将改变制造商品的方式和供应链的地理格局，并改变就业的格局。3D打印技术将使得低端生产人员需求下降，将曾经流失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带回发达国家。

这四方面原因将导致国际社会提供给中国的就业机会减少（由于产业链的中断，年轻劳动力的消费给中老年劳动力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在快速减少），而中国的内需市场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量中老年劳动力将失业。

有人说，中国民工荒只是春节后才有，说明只是季节性的；其实不然，春节后民工荒之后，就有大量企业破产或转移，意味着就业机会在逐年萎缩。中国将面临“年轻劳动短缺”和“中老年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的局面。“保增长”是现在的经济目标，“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2011年中东地区（突尼斯、埃及、利

① David Luhnow, Bob Davis, "For Mexico, an Edge o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2012,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0872396390444318104577587191288101170.html>.

②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p.23,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1_e/its11_world_trade_dev_e.pdf.

③ 张雷：《人口老龄化拖累欧洲经济》，《文汇报》，2007年7月12日。引自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5979843.html>。

④ Robert E. Scott, "Make it in America" bills will advance U.S. manufacturing,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ugust 2, 2010,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make_it_in_america_bills_will_advance_u-s_manufacturing.

比亚、叙利亚)发生的政局剧变,其实都与高失业率有关。

蔡昉等人口学家认为产业升级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经济学家樊纲也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①。其实,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会更高。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不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由于需求和消费信心不一样,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增加就业压力^②。日本劳动力短缺后,失业率反而从1980~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2009年的4.65%。中国与日本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中老年劳动力,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如何就业?

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意思是，有稳固产业的人才会有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而没有稳固产业的人就不会有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就会放纵自己，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等到这些人犯了罪，然后国家用刑罚惩罚他们，等于国家故意引导民众犯罪而捕之。

现在各国政治家们也知道“恒产”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努力培植中产阶级。其实孩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古代即便无产阶级也是有产的，因为他们有孩子，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并且，古代婚姻也是“固定资产”（现在离婚率很高，部分婚姻变成了“流动资产”了），信仰是一种“恒产”，工作也是“恒产”（农业社会失业率低）。有孩子、婚姻、工作、信仰这四大“恒产”，因此社会比较稳定。30多年的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这一最大的“固定资产”。数百万失独家庭，4000万光棍，4亿老无所养的老人，他们既缺少人口的“固定资产”，又缺少物质的“固定资产”，将威胁社会稳定。

从人口学角度看，将总抚养比稳定在50%左右并保持出生性别比平衡是最有利于

^① 唐玮：《“人口红利”将耗尽 不充分就业更危险》，《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2月27日，引自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1227/0858467492.shtml>。

^② 杨伟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欧洲就业》，《求是》，2005年7月4日，引自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3514972.html>。刘华新：《德国：提高退休年龄 迎接老龄化挑战》，2008年11月17日，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8350510.html>。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相当于让大家都有“恒产”：一方面由于消费结构合理，大家都有工作这一“恒产”；另一方面由于儿童抚养比较高，性别比平衡，大家都有孩子和婚姻这两大“恒产”。让老百姓都有这三大“恒产”，是最高层次的维稳。

总抚养比太高意味着“不堪重负”的人多，总抚养比太低意味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多，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美国单身以及没有孩子的人必须缴纳较高的汽车保险费，因为他们没有牵挂，出车祸的概率高。中国2010年总抚养比只有34%，“游手好闲”者众，是中国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社会不稳（群体事件高发）的人口学基础。中国目前还有能力维稳，因为劳动力还在增加、经济还在快速增加，既可以在发展中消化社会问题，又有财力维稳。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1年12月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测2013年中国将爆发一系列危机，经济骤然减速，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同时，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找不到老婆的年轻男性越来越多，也成为加剧国内不稳定的因素^①。

虽然美国国防部的预测过于夸张，也是别有用心，但也反映其对中国潜在危机有清晰的洞察力。中国2014年劳动力开始负增长后确实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光棍危机也将在2014年后全面爆发，维稳将变得越来越难。

人口拐点其实也是社会危机的拐点。今后老年危机爆发，总抚养比高攀，“不堪重负”者众，又将产生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不稳。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长期不稳的总根源！停止计划生育不但有利于缓解现在的社会矛盾，也有助于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目前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在2012年之后将面临重大挑战。政治制度将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

2010年中国抚养比只有34%，是最容易让人产生政治遐想的人口结构，经济也高速增长，知识精英们站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上正在用唯美的心态勾画未来五彩缤纷的政治、经济蓝图。但是倒金字塔形的脆弱人口结构可能难以承载奢华的政治、经济制度。

^① 《美狂想2013中国濒临崩溃 美派最庞大舰队包围》，光明网（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12月10日第3版），2011-12-13，http://mil.gmw.cn/2011-12/13/content_3168204.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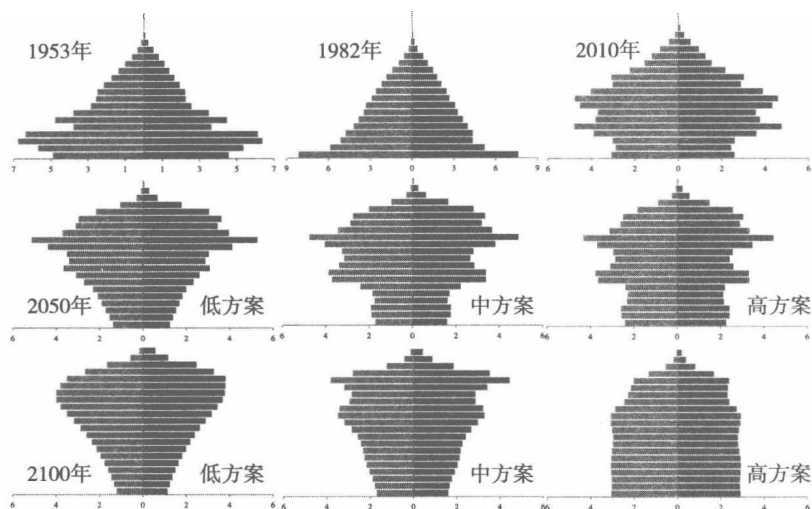


图8.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图

注：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依次是：0~5岁、5~9岁、10~14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

中国人口结构在1953年、1982年都是正金字塔形结构，虽然当时仍然比较贫穷，但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30多年的计划生育，使得2010年人口结构变成了纺锤形（2010年40~44岁人口为1.25亿，20~24岁人口为1.27亿人，但0~4岁人口只有0.75亿人了），虽然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结构变得不稳定了，维稳成本很高。如果今后生育率依照低、中方案走，那么中国今后将是高度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必然导致不稳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高失业压力、国防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今后的国家领导人需要有杂技演员那样的平衡能力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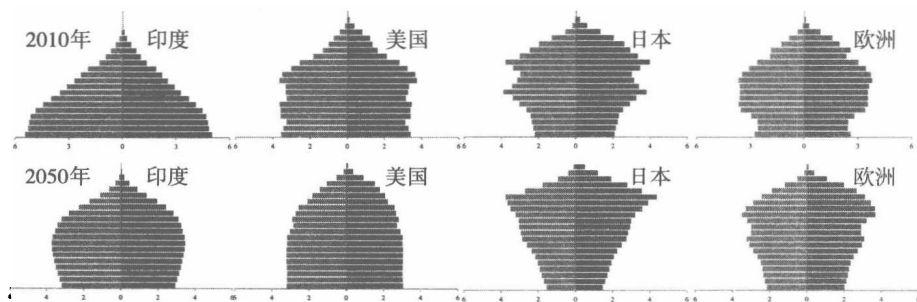


图8.4 2010年、2050年印度、美国、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图

注：2050年印度的人口结构是采纳联合国的中方案，美国、日本、欧洲是采纳“稳定现有生育率”方案。

目前，美国人口结构是柱状形，印度是正金字塔形，都是稳定的人口结构；而日本、欧洲、中国却已经是纺锤形的人口结构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虽然比印度要高，但由于人口结构不稳定，社会稳定度反而不如印度。到2050年，美国、印度仍然是柱状形，今后社会将比中国要稳定得多；日本和欧洲的人口结构也比中国要稳定。

正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不稳定，就更加需要尽快调整政治制度，避免因为双重的不稳定而导致社会混乱。

在参考其他地区的经验的同时，也必须吸取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惨痛的教训。中国提前几十年进入老年化社会，这种跨越式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必须跨越式地探索自己的政改模式（而互联网为此提供了契机），不但要考虑“民生成本”、“民主成本”，更要考虑“生命成本”，将“生命核算”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让家庭结构恢复稳态，才能让国家人口结构恢复稳态，进而让政治和经济结构恢复稳态。

如果中国生育率按照高方案走，那么人口结构将逐渐转变为柱状人口结构，社会将变得比较稳定。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将决定中国今后上百年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格局，解决了人口问题等于帮助今后解决了一大半社会问题，将有利于今后政治制度的平稳转型。

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的问题，意识形态是“如何活”的问题。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历史的细节是经济、政治、军事，但是骨架是人口。历史的总账是以生命进行核算的。细节曾经非常精彩的罗马、吐蕃、蒙古文明，由于经不住生命核算，都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

要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政策和伦理体系（发达国家尝试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成功），将是非常艰难的（这是“技术活”）。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20多年了，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需要的“动能”非常大。生育率要达到高方案，需要改革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其难度比1979年的改革开放要大得多。

停止计划生育有助于缓解老年化和光棍危机

翟振武、邬沧萍等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出生的人口也会老去，

增加今后老人数，“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①，以此为理由反对停止计划生育。翟振武说：“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②

表8.6 三个方案下老年化程度比较

年份	60岁及以上人口（百万）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老年抚养比（%）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2010	177.6	177.6	177.6	13.3	13.3	13.3	12.0	12.0	12.0
2020	242.9	242.9	242.9	18.1	17.4	17.1	17.6	17.6	17.6
2030	345.0	345.0	345.0	26.5	25.4	23.9	25.5	24.9	24.7
2050	447.6	447.6	447.6	40.6	37.6	31.0	49.6	45.5	39.0
2060	427.6	427.6	427.6	44.6	40.1	30.2	68.9	59.9	44.6
2070	386.2	386.2	386.2	47.4	41.2	27.7	73.0	59.7	38.2
2080	334.0	382.1	403.4	49.2	46.7	29.1	81.9	70.1	37.4
2090	277.8	325.7	402.9	49.5	45.7	28.9	84.8	81.0	40.9
2100	232.9	275.5	409.5	50.1	44.4	29.1	86.8	72.7	40.0

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在2053年达到4.5亿的顶峰后会开始下降，但是由于年轻人口下降得更快，老人比例是不断上升的，比如低方案下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将从2010年的13.3%上升到2050年的40.6%、2100年的50.1%。

即便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将增加到2040年的4.0亿、2055年的4.47亿，然后会下降到2070年的4.13亿；但是由于年轻人口下降幅度更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10年为12%）将继续升高：低、中、高方案（2010~2050年平均生育率分别为1.17、1.62、2.08；2050~2100年分别为1.43、1.93、2.43）下，2040年分别为32.1%、29.4%、27%，2070年分别为48.5%、36.8%、28.3%，2100年分别为45.5%、34.1%、26.3%，人口结构怎么可能比近期更

① 邬沧萍、谢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王淑军：《专家解读：人口流动是挑战 人口控制要坚持》，《人民日报》，2006年8月29日。<http://gov.people.com.cn/GB/46736/4755630.html>。《专家翟振武做客新浪谈城市人口控制（实录）》，新浪网，2006年1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1-18/13188903495.shtml>，2011年9月10日。

② 杨琳：《专家：老龄化无法逆转 调整计生政策时间点已到》，《瞭望》，2011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10/c_122017675.htm。

好？从联合国的三个方案也可以看出，相对于低方案来说，提高生育率（中、高方案）更能缓解老年化危机。

2013年之后如论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都不可能改变2074年之前的60岁人口数量和2079年之前的65岁人口数量；但是不同的人口政策下由于出生人口的不同，将改变老年人比例和老年抚养比。本书高方案下，尽管2073年之后的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比低方案要多，但是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却比低方案要低很多。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增长，高方案的老年抚养比也比低方案要低很多。比如到2070年，低方案是1.37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高方案却是2.6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养老负担要轻松得多。从三个方案可以看出，提高生育率（高方案）更能缓解老年化危机。翟振武的关于养老的观点与他“1.8的生育率”一样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9%增至20%的年份为：日本27年（1979~2006年），发达国家（作为整体）60年（1963~2023年），美国75年（1956~2031年）。根据低、中、高方案，中国分别只有23年（2010~2033年）、24年（2010~2034年）、26年（2010~2036年）。面对如此汹涌而来的老年化危机，难道人口政策还需要“平稳过渡”？

同样，今后几十年的光棍危机是已经确定了的。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能够降低出生性别比，一方面多出生的女孩将稀释今后光棍比例。

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超过的部分为“光棍”，“光棍”占22~60岁男性人口的比例为“光棍比”。2010年“光棍比”还基本为0，不存在光棍问题，但是2010年之后开始快速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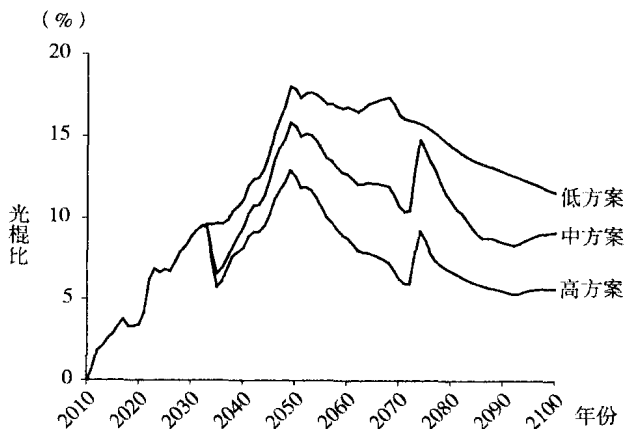


图8.5 三个方案下“光棍比例”

可见，高方案下今后光棍比例最低。也可以看出，计划生育30多年，遗患几十年、上百年。

婴童经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起搏器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认为调整生育政策“在可见的时间里，不会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积极贡献”^①。

笔者并不认同蔡昉的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拐点，缺乏增长点。2008年之后靠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维持了这几年的增长。其实投资“造物”相当于体外“心肺复苏”，只能短时地拉动经济。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不足。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以及其后的较高生育率（“造人”）相当于给经济装上了起搏器，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婴童服装、寝室用品、车床、玩具、游戏软件、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2008年开始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政府行为；而婴儿潮的投资，投资主体是家庭和企业，政府投资只是引线（主要是政策投资）。为孩子投资是一种本能反应，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长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将大大的改善内需市场。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认为：“如果中国希望通过采取某一单一行动就能增强国家的长远经济前景，那就是立即停止计划生育。”^②

百岁老人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0年也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老年人正在迅速增多。这项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③。

① 汪苏：《蔡昉：警惕经济刺激使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财新网，2012年11月2日，<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2/100455237.html>。

② Nicholas Eberstadt, "China's One-Child Mistak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7, 2007, www.aei.org/article/26824。

③ 《科斯：计划生育政策不改 中国无法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深圳新闻网（来源：《财经》），2010年7月22日，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0-07/22/content_4769206.htm。

实体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虽然减速，但还能防止大幅衰退，主要是因为日本依赖于实体经济，在高端制造业占有暂时难以取代的优势，其2009年从事工业的劳动力还占27%（高于欧洲）。2008年后欧洲出现经济危机，而德国能够暂时一枝独秀，也是因为德国在高端制造业上占有优势，2009年其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还高达29%，而希腊、西班牙、英国、法国分别只有21%、25%、20%、23%。因此中国制造业应该是“提质不减量”，将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稳定在目前的27%的水平上（并需要防止年龄结构老化），保持实体经济的优势（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不能像韩国、瑞典那样在少数产业上拥有拳头产品，而是需要在所有产业上都拥有市场优势），才能保证服务业的正常发育（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服务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提供就业机会。

其实，婴童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婴童经济分为“生”和“育”，“生”是“制造业”，“育”是服务业（占70%以上的精力和财力）；但没有“生”，就没有“育”的对象。现在的“人口制造业”（补偿性出生高峰），将为今后几十年的“人口服务业”提供持续的机会。“生”是春播，“育”是夏耘和秋收，一年之计在于春。因此，人口政策的核心还是应该放在“生”，但也要营造良好的“育”的条件，让老百姓既有“生”的勇气，也有“育”的能力。

中国近期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中国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发展婴童经济，通过提升现在的儿童抚养比，而降低今后的老年抚养比，尽量让人口结构由橄榄形恢复到柱形。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出生高峰，将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如果中国能在今后十多年将儿童抚养比提高到30%左右，将总抚养比提高到50%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大为改善。但是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难以达到这一点。

表8.7 三个方案下的抚养比比较（%）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2010	22.3	11.9	34.2	22.3	11.9	34.2	22.3	11.9	34.2
2020	20.0	17.6	37.6	25.4	17.6	43.0	27.8	17.6	45.4
2030	16.0	25.5	41.5	19.4	24.9	44.2	27.7	24.7	52.4
2040	15.1	40.3	55.3	14.9	37.4	52.3	26.3	35.2	61.5

续表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儿童	老年	总
2050	14.4	49.6	64.0	17.3	45.5	62.8	30.2	39.0	69.2
2060	15.0	68.9	83.9	17.5	59.9	77.4	31.1	44.6	75.7
2070	14.7	73.0	87.7	16.7	59.7	76.4	29.7	38.2	67.9
2080	15.3	81.9	97.2	18.9	70.1	88.9	30.5	37.4	67.9
2090	15.5	84.8	100.3	20.8	81.0	101.8	31.1	40.9	71.9
2100	15.7	86.8	102.5	20.1	72.7	92.8	30.3	40.0	70.3

高方案在2050年前确实能提高总抚养比（提高儿童抚养比），但却将大大降低今后的总抚养比（降低老年抚养比）。中国应该将高方案作为努力的目标。

只是高方案目标很难实现，今后就业将是很大的问题。广东等沿海地区就必须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东盟、南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东南沿海地区享受了30多年的政策优惠，利用全国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了，如果最后却又掉过头来争内地的消费市场，那么就太对不住“改革开放”了！

可见，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多得：既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劳动力短缺、光棍危机；既减少现在群体事件，又增加今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以前外向驱动型转变为内需消费型；也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9章

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三事，赵岐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也就是说，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儒家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被视为“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①。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中庸之道”扼杀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新能力。

其实，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早于儒学）。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祖先祭祀仪式，到周朝的时候已经非常完整而系统化。

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圣经》很大篇幅就是记述耶稣的家谱），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西方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此要信仰上帝，《圣经》代代相传。中国认为人是天设地造、父母所生，《易经》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因此要祭祀天地，敬奉祖宗，宗庙、祠堂、神龛的香火不断，家谱、家规、祖训世代相传。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文明延续的标志）却是漫

^① 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学》，1996年第3期，<http://www.psychcn.com/psyhistory/200402/255047606.shtml>。

长的，比养老要重要得多。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因此子孙的“孝”既是回报，也有“功利”。

人到底是不是上帝造的，倒是无可考证；但人是父母造的，这是无可置疑的，家族的“神”是真实存在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祖宗崇拜比西方的上帝崇拜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意义更为全面。信上帝、真主是宗教自由，为什么信祖宗就不能自由？反而是思想落后了？

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

“传宗交代”，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可持续发展”。家族的香火传不下去，难道国家和民族的香火传得下去？俗语说得好：“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子存父先死，孙在祖乃丧。”死得多，生得也多；尽管成千的棺材从门内抬出，但是大门之内却有成万的婴儿在啼哭，薪火相传，永续发展。

人口的持续发展是最高层次的普世价值，相当于人类文明的“宪法”，远远比其后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要悠久得多、重要得多，当然后者也很重要。幸存下来的各个文明对不利于人口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以及民俗都进行过“违宪审查”。

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希腊、罗马文明，但是希腊、罗马却因为人口不能持续发展而导致文明戛然而止。而中华文明由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元素在里面，具有再生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续下来了。儒家文化之所以生命力最强，就是因为其规范了男女分工，理顺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让人口能够“生生不息”，从而能够让文明“生生不息”。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无疑有很多缺陷，但是这套“有缺陷”的传统文化却成功延续了我们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被证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要是采纳现在“完善”的文化和制度，那么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他了。

哈耶克认为，人丁兴旺是文明强盛的重要标志。而中华民族长期是世界大民族，说明我们的文明是先进的。在欧洲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却是辉煌的隋、唐、宋文

明。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与中国经济占世界比例基本是一致的，人均GDP在公元1年、1000年、1500年、1600年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6%、103%、106%、101%。文艺复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落后于西方，但是到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还是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GDP总量则是占全球的33%，还是超过西方（占全球25%）^①。中国超过世界上千年，而落后于世界只是最近两百年时间，并且这两百年时间也是我们传统文化被冲击、人口停滞增长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速引进西方文明，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经济占全球比例还是远远达不到1820年的份额，今后更加不可能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嘲笑祖先创造的传统文明？

除了祖宗信仰和儒学外，中国古代还有道教和很多地方宗教以及后面传入的佛教，公正地说，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中国古代的精神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的比较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动物都有舐犊之情）。远古时代，没有建立起孝文化，养小孩没有回报，全凭动物本能，因此缺乏养育孩子的精神动力（尤其是男人）。

子女对父母回报的本能性并不强，需要经过不断地培养、教化，最会形成了“孝”文化，使得养育子女还能得到部分回报，激发了养育孩子的动力，人口增加，财富的积累也不光是本人，而且还在世代之间，产生了人类文明。

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爱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家族主义），爱民族（民族主义），爱国家（国家主义），爱全人类（全球化），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曾子总结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

因此，从人性的角度看，私有制、家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全球化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与之相对应的政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情怀是最朴素的情感。比如奥巴马在2008年、2012年两次当选美国总统，都得益于少数民族一面倒的支持。

完全否定民族主义其实就像否定私有制一样，都是否定基本的人性。否定了私有

^①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_file_02-2010.xls.

制的国家主义与否定了民族主义的全球化一样，都是空中楼阁。但极端自私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都是有害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家庭养儿防老（family security）已经过时，应该建立西方那种社会养老（social security）制度。

其实，在西方国家建立社保制之前，养老同样是依赖“孝”，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准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

目前，国际上有四类社会养老模式：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或其中两方负担养老保险费用的社会共济型，北欧等一些国家实施的全民福利型，原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实施的国家保障型以及新加坡等少数小国实施的“年金储蓄制”。不过，不管哪种养老制度，不过是将“养儿防老”社会化而已，都是靠年青一代人养上一代人。

由于年轻人口的不足，发达国家都开始出现了退休金危机。参与2012年美国总统初选的得克萨斯州长佩里认为社保系统就是一个庞氏骗局^①。

就是说社会养老连几十年的检验都经受不起，而养儿防老经历了数千年的检验，说明社会养老存在致命的缺陷。

有人认为，养儿防老是自私的。其实并非如此，打个粗俗的比喻，农民养牲口，既是投资又是消费，越养越富；城市人养宠物，是单纯的消费，越养越穷。但并不表明农民对牛等牲口的爱不如城市人对狗等宠物的爱。即便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民也总是尽最大努力将牲口转移到安全地方；而宠物却经常被遗弃。只见流浪狗，未见流浪牛。

可见“图回报”并不表示没有爱。但是儒家的孝比这个层面要高得多。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从物质上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使得主人收益，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能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儿子。传统孝文化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具有统一性。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期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

^① Emily Ramshaw, Jay Root, "Perry Takes Fire From Opponents in First GOP Debate", The Texas Tribune, September 7, 2011, <http://www.texastribune.org/texas-people/rick-perry/perry-takes-fire-opponents-first-gop-debate>.

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的强大动力力量^①。

养育儿女是需要回报的，但回报要适度，父母不能以孝的名义挟持儿女（将当初对儿女的爱当成了高利贷）；儿女不能以爱的名义剥削父母（赖账）。

如果孩子夭亡，那么父母的投资将得不到物质和精神的回报。因此《周礼·曲礼上》：“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孝经》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第二》）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我们从现在的失独家庭的悲惨遭遇可以体会到孔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有人认为应该通过金融手段和社保养老，靠养儿防老对子女不公平。

其实，“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最朴素的真理。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物质资本只有通过人力资本才能保值、增值。通过金融市场养老其实只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从个人角度看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从外界“吸纳能量”。“防老”不一定靠“养儿”，但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如果大家都指望通过金融手段养老，那是极度危险的，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这种投机心理进一步降低民众的生育意愿，社保崩溃！

有人说，现在农村很多有多个子女的老人晚年也很凄惨，儿女都不管父母。其实，这是因为与养儿防老相配套的家族制度、法律和道德伦理体系已经被破坏。

在古代，孝敬父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与“谋反”并列。在严厉的国法和家法面前，谁敢不孝？并且当时长辈掌握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后辈想不“孝”也不行。

“父母在，不远游”，儿子永远在父母的控制范围之内。活动范围小，社会舆论也会迫使每个人遵守“孝道”。父母向下一代投资，能够稳定地得到回报。如果没有社保这个画饼，现在寿命延长，老人需要扶养的时间更长，需要一部比以前更严厉的关于孝的法律才是。

古代family security的时候，由政府来强制惩罚违背孝道者；现在social security的时候，由政府立法强制惩罚社保诈骗，是一个道理。严格来说，不孝相当于金融诈骗、社保诈骗。

给物质投资者以合理回报的市场才是有希望的市场；同样，给人口投资者（父

^① 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学》，1996年第3期。

母)以合理回报的养老体系才是有生命力的体系。养儿防老不仅仅是物质投资和感情投资,更是文明的投资,将养儿的付出与养老的收益挂钩,生育意愿高,不但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也能享受天伦之乐,还能使得文明延续下去,形成良性循环。而社会养老是大锅饭,养小孩的付出与养老获益脱钩,生育意愿低,社保难以为继,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林肯认为:“专利是智慧之火浇上利润之油。”同样,养儿防老是在慈爱之火浇上利润之油,能够持续燃烧下去。而社会养老却是泼上一盆水。对生育行为来说,养儿防老是的正反馈,多子多福;社会养老则是负反馈,多子少福。

养儿防老就像森林的大树,可能并不好看,但是却有顽强的生命力,经受了数千年的检验。而社会养老就像室内的盆景,虽然好看,但是长不大,才几十年就面临危机。

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经济“土壤”发生了改变,无法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需要借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采纳中国古代“井田制”(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集体,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做法,划分政府职责和生育私权,探索并建立起“园林养老”。

婚姻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设计

有学者调查了68种灵长目动物,一夫一妻制11种,多偶制23种,群婚制34种^①。从二态性(雌雄体貌差别)、睾丸占体重比例、排卵期有无征兆等生物学指标看,人类应该介入群婚动物和一夫一妻制动物之间,理想的制度应该是一夫一妻制。从出生性别比(基本上是1:1)来看,也应该实行一夫一妻制。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但是远古时代两性关系非常混乱,人口无法增加,也无从产生文明。“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吕氏春秋·恃君览》),“未有夫妇妃匹之合”(《管子·君臣下》)。这可能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时是以原始群为单位生活的,以集体的力量寻猎食物,并抵御野兽的袭击。这种群婚杂交是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近亲繁殖的后代遗传病发病率很高)和数量的增加的。经过漫长的岁月,认识到“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道理,逐渐形成了乱伦禁忌。

在旧石器时代,妇女在食物采集方面与男人的差距还不算太大,并且“知母不知

^① 郑也夫:《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父”，妇女还有孩子这一“已知的”产品，因此当时是母系社会（但内部仍然由在物质领域占优势的男性主导）。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石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建立了一夫一妻制。

① 身强力壮的男子转入农牧业和手工业等生产性经济领域，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取得支配生活资料的权利，个体劳动也可以生存。此前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习惯和风俗，以协调男女两性关系，但始终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婚姻制度，是因为“昔太古尝无君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势的权力体系来保障婚姻制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石并用时代，由于剩余产品的增多，私有现象出现，建立了强势的可保障婚姻制度的权力体系。

② 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妥协。繁衍后代是生物学本能，雄性动物总是要努力保障后代的可靠性。对有发情期及排卵期有征兆的动物，雄性往往在那一段时期牢牢地看住雌性防止其他雄性染指。在大猩猩中观察者看到，随着身体衰老，老的雄性统治者被推翻，新上任的雄性往往残忍地将老首领的幼崽全部杀掉^①。“性”的欲望是最原始的欲望之一，男人会将性冲动转变为为爱、恨和暴力的（中年之后，睾酮水平下降，男人的暴力倾向也下降），如果若干男性没有性伙伴和繁衍后代的机会，这样的社会必将生活在火药桶上。当男人有了孩子之后，睾酮水平明显下降，尤其当他们每天照看孩子的时候，睾酮水平下降更快，让他们更关注家人^②。郑也夫教授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妥协”^③。

③ 一夫一妻制是最伟大、最成功的女权运动。“性爱”最原始的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男人拥有数量惊人的精子，每毫升精液中有上亿个精子，因此男人希望通过“广种博收”来增加后代的数量。而女人的卵细胞却是有限的，并且由于孕期、哺乳等原因，即便不避孕，现实上每个妇女平均只能生育6个左右孩子，而古代夭折率很高。因此女人希望找个“好男”来养育孩子，提高孩子存活率。如果女人同时与多个男人有染，那么男人因为孩子“产权”不明而不愿意抚养。女人专一其实是明确了男人对孩子的“产权”（男系姓氏其实是“产权”的标志），让女人共享男人物质财富的“产权”，让男人获得了人口财富的“产权”；女人主导“生”，男人主导“活”，让孩子“生活”下去。

① 郑也夫：《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② Tamara Cohen, "Why fathers are faithful: Becoming a dad causes a testosterone drop that makes men less likely to stray", Daily Mail, 12th September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036666/Why-fathers-faithful-Becoming-dad-causes-testosterone-drop-makes-men-likely-stray.html>.

③ 郑也夫：《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但从遗传物质传递来看，一夫一妻制对男人来说是吃亏的。父母各自传给子女22条常染色体和一条性染色体。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分别来自父母），男性有一条X染色体（来自母亲）和一条Y染色体（来自父亲）。X染色体上有1098个蛋白质编码基因；而Y染色体仅有78个基因，当然这些基因非常重要，决定人的很多特征^①。

此外，女人还单独给子女传递了“私房珍宝”——线粒体DNA（37个重要基因）。线粒体DNA内多发的变异能够影响雄性的寿命长短，以及他们老化的速度，但是同样的变异却对雌性的老化模式和寿命不起作用。这是因为线粒体DNA都来自母亲，在“自然选择”这一进化质控过程中，仅会筛选母体的线粒体基因质量。如果一个线粒体发生变异危及男性，则不会对女性造成影响。经过数千代的进化，这些变异只会对男性造成伤害，而不会损伤女性分毫。这是男性的寿命比女性短的原因之一^②。

就是说Y染色体（数千年变异甚小）是“传男”不“传女”，线粒体DNA（数千年变异甚小）是“女传”不“男传”。最理想的姓氏应该是“男姓”，“女氏”，比如张三的父亲姓张（以Y染色体为标志），母亲来自姬氏（以线粒体DNA为标志），那么此人的全名就是“张姬三”。但父系姓氏已经存在数千年，通过家谱可以查询几十代先祖，而想查四五代女性祖先（外婆的外婆的外婆……）都难。现在孩子如果改为母姓，其实是外公的姓，至少从生物学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

男人本来可以通过“广种博收”传播基因的，但一夫一妻制却让丈夫与妻子拥有同样多的孩子，所传播的基因数量就远比妻子要少得多。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柔胜刚，弱胜强。”

有人因为古代还偶尔存在一夫多妻现象，就认为有利于男性。其实恰恰相反。男女的数量基本一样多（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符合生物学原则的），一夫多妻必然导致很多男性找不到老婆，同时也使得一些非常优秀的女性必须与其他人分享一个“好男”，受益者是“劣女”（现在一些条件差的女子也宁愿当二奶、三奶）；既增加婚内的怨女，又增加婚外的旷男。一夫一妻制其实是对“劣男”（也能讨上老婆）和“好女”（用不着与其他女人分享一个“好男”）最有利^③。因此，一夫一妻制是男女双赢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最成功的一次女权运动。

① Mark T. Ross, Darren V. Grafham, Alison J. Coffey, et al, "The DNA sequence of the human X chromosome", *Nature* 434, 325-337 (17 March 2005).

② M. Florencia Camus, David J. Clancy, Damian K. Dowling, "Mitochondria, Maternal Inheritance, and Male Aging", *Current Biology*, vol.22, no.18(Sep 2012), pp. 1717-21.

③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道德的动物》，上海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5页。

有人说：“那么难道就不能实行一妻多夫制？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更有利于提高今后妇女地位。”其实，灵长类动物基本不存在一妻多夫现象（杂婚除外）。男性是物质领域的强者，破坏力也强（雄性激素决定的），一妻多夫其实与轮奸无异，甚至威胁女性的人身安全，难道一个文弱的女性真能像贪官管理二奶、三奶（女性禀赋水平低，因此一夫多妻虽然有家庭矛盾，但还不至于发生暴力事件）那样将几个牛高马大的男子管得服服帖帖？

④ 一夫一妻制充分利用生育能力。古代夭折率很高，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6个左右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如果是一夫多妻制，由于女性有月经周期以及受宠的程度不同，一些妻妾的生育能力将处于闲置状态，比如康熙皇帝共有21个王妃，平均每人只生育2.6个孩子；乾隆皇帝共有17位王妃，平均每个王妃只生育1.6个孩子。如果一夫多妻制比例太高，那么人口就会越来越少。凡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群体，人口增长都比较快，如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及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信徒。

⑤ 一夫一妻制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孩子出生后需要掌握一系列生存技能（上学是很晚近的事情）并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而父亲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①，“子不教，父之过”。双抚养体系还有利于孩子的情感成长。

⑥ 一夫一妻制有利于节省感情成本。中文的“安”字就是“家”里有一个“女”人。一山难容二虎，一家难容二女。如果多有几个妻妾，那么家里就会“不安”，即便男人有财力养多个妻子和孩子，家庭矛盾也很难处理。皇帝和诸侯一夫多妻，但是管理成本也是很高的，不得不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礼教规范，并派专人管理。

⑦ 一夫一妻制有利于人类遗传多样性。很多物种的灭绝是因为丧失了遗传的多样性。一夫多妻制只让少数强势男人和部分女人（争宠失败者可能没有机会繁衍后代）的遗传物质下传，人类遗传的多样性逐渐减少。而一夫一妻制让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有后代，这种遗传的多样性对物种的延续至关重要。此外，人类是早产的动物，在漫长的育儿过程中，又会形成个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社会分工。

婚姻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

① 私有制促成了婚姻制度的建立，而婚姻制度又巩固和发展了私有制。孩子的“产权”的确立比物质财富的产权的确立对人类文明产生来说更为关键（《圣经》也认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繁衍人口和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人口才开始快速增加，才形成人口的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产生人类文明。

① 郑也夫：《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8页。

②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主要包括三大内容：即夫妇之道、孝道和悌道。《颜氏家训·兄弟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后，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礼记·昏义》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可见，夫妇之道是人伦的核心，然后才可能有协调纵向关系的孝道和协调横向关系的悌道，纵向和横向关系一扩展，整个社会伦理关系就得以确定。又以婚姻为起点，推衍出君臣一类的关系，于是，婚姻关系又成为构成政治关系的基础。可见，夫妻关系的确立，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志。

在刚从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的中国殷代，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31世帝王大多是一配，只有祖乙、祖丁和武丁等少数几个帝王有数偶^①。周朝的时候男权有所膨胀，但仍然对权贵阶层的“性自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周礼》记载：天子的后妃“编制”为：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凡一百二十一人（但事实上常常并未“满编”，大多数帝王只有几个王妃）。诸侯一娶九女，且不再娶；大夫是一妻二妾；士则是一妻一妾。而庶民，则只许有一妻与之匹配，故而庶民被称为匹夫匹妇。天子只有一个，诸侯国家也只有几十个，大的诸侯国也只有三个上大夫、五个下大夫、二十七个上士。可见古代的官民比是非常低的，西汉的时候也大约只是1：8000，因此中国古代（尤其是唐朝以前）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现在隐性的一夫多妻制家庭比例可能比古代还高）。

婚姻将“性”关进笼子

人类文明史就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人类通过征服、利用自然界从而形成物质文明；通过征服、利用自身的“自然力”（如性冲动和权力欲）而形成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限制“性”和“权力”的历史。从乱婚、群婚、对偶婚，再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确立，人类允许通婚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性行为越来越不“自由”。

同样，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也一直在设法限制权力。西方以前通过神权限制王权。中国古代创立“天人合一”理论以限制皇权。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就是在驯服统治者，比如《论语》讲：“以温、良、恭、俭、让五德待民；以恭、宽、信、敏、惠五事利民；以尊五美、屏四恶而从政等。”《中庸》讲：“万事以中为度。以诚心、

^① 祝瑞开：《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至诚为修身方法，以达到中庸的目的。为君须知九经之道等。”《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不作独夫民贼。不率兽以食人等。”《尚书》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三位一体。”权力也越来越不“自由”了。

限制权力和性是人类文明的两大主线。限制权力让老百姓“活得更好”；而限制“性”却让人类文明“活下去”，因此比对权力的驯服更为重要。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而一个文明是否能够持续延续，却并不在于驯化了权力，而在于管理好“性”。国亡在“权”，族亡在“性”。事关生死、婚姻等的伦理问题，要比政治问题重要百倍。

欲望“是万恶之首”，同时也是“万物之源”（有“性”才有“性命”，“性”其实是活力的标志，“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凡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理想的“度”是既能压制“恶”，又不妨碍“源”。对“权力”限制不够，将导致暴政；限制过度，权力不敢作为，无法有效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日本似乎有这种倾向），会引起社会大乱。

经过数百万年的艰难探索，人类终于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里，确保性的繁衍人口的首要功能。孟子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适时缔结婚姻，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老百姓都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礼记·坊记》：“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如果淫乱，那么丈夫的孩子的可靠性就无法保证，就破坏了“各子其子”的私有制基础，整个社会将陷入失序状态。因此《新唐书·后妃传上》认为婚姻状况的稳定攸关社会治乱和文明兴衰，“礼本于夫妇，……治乱因之，兴亡系焉”。

但是性冲动和权力欲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第九》）性混乱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人类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巴比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灭亡就是因为“性”从婚姻的笼子里钻出来，淫乱的民风导致人口减少，文明难以延续。

蒙古民族的衰落也是与“性”有关。蒙古族曾是人口众多的强悍民族，统治过欧亚大片地区，但满清入关后，通过喇嘛教人为制造“性别比失衡”，导致性病泛滥，人口锐减^①。

吸取罗马帝国的教训，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①

1740年的英国《女儿经》说：“当与好色男人在一起时，建议女孩不要直视他们的眼睛，因为‘匆匆一瞥胜过万语千言’”；“每一种不道德的好奇心或不纯洁的爱好都是对精神的亵渎……女性听脏话就是在亵渎她的耳朵”^②。这种观点与中国学者陈继儒在《安得长者言》中的观点类似：“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陈继儒总结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见中国明清之后流传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是为了防范淫乱，并不真正反对女性有才。

“饱暖思淫欲”，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性解放”风潮，冲击了传统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离婚率激增，家庭解体，生育意愿下降，堕胎率增加，性病还导致不孕症发病率提高。欧洲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从1960年代的2.6的基础上跳跃性下降，现在只有1.5。

1979年之后，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变本加厉地在中国重演。

① 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② 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等人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③ 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为性解放提供了大量的过剩时间和精力。

④ 西方当年性解放论传播的主力是《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色情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⑤ 中国没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等宗教的顽强反抗。

中国近30年不孕症发病率增加10倍，与此也有很大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令学者和官员都不敢相信的超低生育率。

限制性自由和权力是自然形成的文化秩序。现在性自由思潮的泛滥不过是文化返祖现象。西方国家基本将“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笼子，但是却将“性”这头大魔放了出来，老百姓倒是活的更加“民主”、“自由”了，但是由于超低生育率，文明却难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97页。

^② Eleanor Harding, "Why a young virgin must not look a lusty man in the eye... and other compelling lifestyle advice for the Englishwoman of 1740", MailOnline, 6th September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2034104/Lifestyle-advice-Englishwoman-1740-hammer.html#ixzz1YFz02wQD>.

以“活下去”。中国是“权力”还没有完全关进笼子，而“性”却又溜了出来。

古代鼓励生育的政策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管仲认识到性别比失衡不利于人口发展，建议齐桓公消减后宫人数，不让“宫中有怨女”。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娶妻；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节用上》）即是说，如果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吃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

墨子总结战争损耗人口的原因：双方将士或死于战场（“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或死于饥寒（“饥寒冻饿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并且夫妻分离，减少生育机会（“且大人唯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因此，墨子称战争是“寡人之道”（《节用上》），倡导“非攻”。墨子认为厚葬久丧既浪费财物，又“败男女之交”（《节葬下》），主张“节葬”。墨子看到统治者“使民劳”、“籍敛厚”，致使“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希望轻徭薄赋，以使“民劳而不伤”，“民费而不病”（《辞过》）。墨子认识到性别比失衡影响人口繁衍，“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他反对蓄私，提出要让

“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辞过》）。

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育愿望的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西方文明也认为多子多福，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古希腊斯巴达的立法者来库古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①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锐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并且早育比晚育更有利于优生。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流传千古。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难以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国语·越语上》）。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践“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即便生育孩子，也不利于养育。

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勾践非常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护，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欧美和日本还做不到这一点。

勾践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两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发给吃的。那些孤儿、寡妇、患病的人，贫苦和重病的人，由公家出钱供养教育他们的子女。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两壶酒和一条狗或者一只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

^① 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西汉会要》卷四十七），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西汉初年百姓七岁到十四岁的，每年纳口赋23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每年纳算赋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者，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汉武帝时为弥补抗匈奴战争的军费支出，将口赋年龄改为三岁算起，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许多人不敢生儿育女，有的生下婴儿后也只好加以杀死，“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予民，民产于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书·贡禹传》）。人口损耗严重。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即位后，重用贡禹。贡禹认为造成人口损耗的原因是死亡率高，一是因为赋役繁重；二是因为从天子、王公贵族到富豪人家竞相侈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农民获利甚少，很多农民“弃本逐末”，放弃农业，出现“耕者不能半”的现象。为了降低民生压力，贡禹反对挥霍浪费，建议“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还建议减轻赋役，将原来从三岁起“出口钱”改为自七岁起“出口钱”，以减少民间“生子辄杀”现象，算赋年龄也改为二十岁算起，并建议“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大半，以宽繇役”。贡禹认识到性别比失衡也是人口无法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当时“内多怨女，外多旷夫”，人口出生率不高，主要是汉武帝以后“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和“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造成的。贡禹主张将“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免为庶人”，让她们嫁人生子。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除规定“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外，又“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楛斛，复其夫，勿算一岁”（《东汉会要》卷二十八）。汉朝通过减税来鼓励生育，与美国目前的政策很类似。

晚婚和单身是不利于人口繁衍的，西晋政府法律也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的话，国家代其操办婚事。西方国家也反对单身，1740年的英国《女儿经》说：“老女孩现在被看作是灾难。”^①现在日本生育率超低，与晚婚、单身者比例太高关系甚

^① Eleanor Harding, "Why a young virgin must not look a lusty man in the eye... and other compelling lifestyle advice for the Englishwoman of 1740", MailOnline, 6th September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2034104/Lifestyle-advice-Englishwoman-1740-hammer.html#ixzz1YFz02wQD>.

大，政府苦无良策。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发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规定：“朕肃奉天命，为之父母，平定甫尔，劬劳未堪。厚生乐业，尚多疏简，永言亭育，用切於怀。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顾复，便恐中馈之礼斯废，绝嗣之衅方深。有怀怨旷之情，或致淫奔之辱。宪章典故，实所庶几。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之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贫窶之徒，将迎匱乏者，仰於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褒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其鰥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已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者，并任其情愿，无劳抑以嫁娶。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於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①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

武则天统治时期亦曾颁布过类似的诏令，力图做到“内无旷妇，外无旷夫”。至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将结婚年龄提前，“诸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唐令拾遗·户令》）。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人口。除了鼓励生育外，唐朝还招抚流亡。贞观三年招附塞外民族120万口，贞观三年五年，从突厥那里赎回华人8万余口。开元初，还让2万余人僧民还俗（《旧唐书·玄宗纪上》卷八）。

北宋仁宗时期，颁布“胎养令”，规定怀孕的妇女没有经济来源的，可获得补贴。贫困之家的孩子出生后，能得到钱、米资助，以及减免各种税负。朝廷创办“婴儿局”，收养弃婴；国家出钱，来雇佣养母和收养家庭^②。与欧美现在的政策非常类似。

南宋规定贫乏之家生男生女不能抚养者予以救济，下令各地官府收养因饥馑而遗弃之小儿，民间有收养遗弃小儿者官出粟补助。宋、元也继续把户口增减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和提升奖赏的一个重要标准。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明史·志第三十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第二并非偶然，也不容易：一方面得益于传统的生育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古代皇帝是世袭制，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需要笼络一批深谋远虑之士，思考国家的持

^① 《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

^② 程思明：《北宋冗官制度何以实现藏富于民？》，共识网，2012年11月16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yyl/yulu_2012111671174.html。

续发展，并且当时人们敬天畏神，有道德底线，因此能够建立起可以沿用几千年的制度。周朝的礼仪制度、儒家学说、秦始皇的郡县制度是确保中国在文化上和领土上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在西方政府是任期制或者选举制，只考虑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只要几年内不出问题就行，行事苟且，这也是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①。

古代结婚、离婚制度

西周开始的中国古代婚姻法中，将婚姻视为人生最为神圣的事情，遵循严格的“六礼”：纳采（求婚）、问名（探女方情况）、纳吉（通过双方八字的测算，得到好兆头）、纳征（正式订婚）、请期（双方商定成亲日期）、亲迎（成亲）。南宋之后浓缩成三礼：纳采、纳征、亲迎。并且成亲的时候还要拜天地（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着夫妻结为利益共同体）。成亲之后，还要庙见，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见男方的祖先，向祖宗报个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中国古代强调“从一而终、白头偕老”其实有多重积极意义。

① 古代是自然经济，家庭是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婚姻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对妇女来说是全部：生活场所、工作场所、育儿场所、养老院（现在年轻妇女在家庭的地位是高了，但是在职场上地位并不高）。出嫁后，主要心思如果还放在娘家，将导致新家庭矛盾；一旦离婚，既失婚，也失业，还老无所养，最后还是让父母和兄弟操心。因此，父母都会教育女儿“敬业”，维护女儿在夫家中的地位。“从一而终”其实是很好地保护了妇女利益的，不能随便将妻子扫地出门。

② 婚姻目的之一是“合二姓之好”，一旦离婚就是“结二姓之怨”。婚姻不仅仅是两人之间事情，也是家族的事情。很多家族（如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规中明确规定，如果虐待媳妇，将受到严惩。笔者的洪江易氏家族，宋代从江西迁居湘西700多年（由于是山区，可能还保留很多宋代的习俗），与本县以及周边的溆浦县、洞口县、绥宁县的吴氏、唐氏、肖氏、谌氏、周氏、谢氏等家族结亲，增加族谊。几大

^① Wen B, Li H, Lu D, Song X, Zhang F, He Y, Li F, Gao Y, Mao X, Zhang L, Qian J, Tan J, Jin J, Huang W, Deka R, Su B, Chakraborty R, Jin L,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 Nature, 2004 Sep 16;431(7006):302-5.

家族互相制约，有效地保护了妇女利益。“大户人家”的家规往往更符合文明规则（否则会被嘲笑的）。从祭祀规格（除了清明节、中元节、春节等外，男女祖宗的生日也是家族的节日，需要单独祭祀）和风水的选择看，女性祖先地位至少不亚于男性祖先。除了夫权外，还有舅权（不仅是舅舅本人，而是舅舅家族）。宴席上，舅舅方是需要坐上席的。家庭矛盾首先是小家庭解决（儿子儿媳吵架，公婆一般只会责骂儿子），后请小家族合议，再请大家族仲裁。还解决不了，那么女方家族就出面，代价就很大了（好吃好喝重礼伺候）。还有“舅爷老子外甥王”之说，就是舅舅权力再大，但是得充分考虑外甥的权益的（舅甥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只有亲情），因此在舅舅面前，外甥是无拘无束（在叔叔面前可得规规矩矩），最为自在。女儿、女婿、岳父都上族谱（从现在还保留的族谱看，至少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这样了）。族谱中男的记录比较简单，如：××次子，生卒年月日时，葬于何地，不记录孩子。妻子单独一栏，与夫并列，但更详细，除了生卒葬信息外，还有闺字××，×地××女，儿女数量和名字，女儿××嫁给×地××人。因此，只要找到其他家族的族谱一对，就能够知道外公家族和姑姑家族的资料。儿女双全者才有资格撰写祠堂的对联。还有哭嫁的世俗，一方面说明娘家对女儿不错（否则是哭不出来的），一方面也让女儿回顾一下娘家的亲情。

③ 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不能违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和，那也是因为前世结怨，认命而已），只能婚内恋爱，培养感情。

④ 门当户对强调婚姻的同质性^①。当时的生活是“静止”的，父母是过来人，比孩子更能预测孩子婚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维护夫妻感情比现在的“爱情”更可靠。门当户对还意味着双方家族建立起同样的家族制度，可以防止虐待妇女。现在的生活是“动态”的，远远超出父母的预知能力，包办婚姻风险很大。

⑤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维护家庭是一种社会责任。离婚意味着将家庭矛盾释放到社会，不利于社会稳定。

⑥ 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意味着浪费生育时间。

因此在古代离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男子可以离婚休妻的七项条件（“七出”）：不孝顺父母、无子（还得等到妻子50岁过了生育年龄之后）、淫、妒、恶疾（麻风等传染病）、多言、盗窃。不孝会毁灭家庭投资链，无子会导致家族无法延续，而“淫”会威胁丈夫的孩子“产权”。古代社会还为“七出”设定了限制条件，

^① 陈友华：《人口变迁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大国空巢〉读后感》，《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5期。

叫做“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离婚后无处可去）、与更三年丧（妻子陪同丈夫给婆婆服过三年重孝）、前贫贱后富贵（现在很多人发财后抛弃妻子，这在古代是禁止的）。但是属于“淫”和“恶疾”（会威胁家族的生存）的不适用“三不去”。

其实，西方的婚姻制度也与中国类似，比如古希腊认为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由父母做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①。

从制度上看，中国古代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离”制度，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批唐宋的离婚协议书（放妻书），格式是：首先讲理想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其次讲现实的婚姻状况，亦即离婚的原因；最后说明离婚善后事宜。放妻书没有单方面指责，而是将责任分摊给夫妻双方，如“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拾棒”等等。进一步，放妻书都强调夫妻感情破裂是“宿世冤家，今相遇会”所致，其出路也就只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好说好散。最后，放妻书会拿出一段祝愿对方，如“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在财产分配和抚养上也处理的比较公平，“所要活业，任意分将”、“所有物色书之”。明清时期休书中，却往往语气生硬，遣词造句非常绝情。这说明唐宋时期妇女地位远比明清时期高^②。

而欧洲整个中世纪都禁止离婚，拿破仑为了自己离婚再娶还专门修改法律；爱尔兰到1995年才让离婚合法，但是严格限制离婚条件。

现在很多人从文学作品中看到是古代权贵家庭的妇女地位比男人低。其实，代普通人家是男耕女织、相依为命，谈不上性别歧视。

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产品是物质财富，有能力获得物质财富的男人往往能获得较高的报酬；而物质领域的低能者（如懒汉）通常是受到社会歧视的。同样，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产品”是孩子，古代年轻妇女地位低，是因为她们的“产品”少；“母凭子贵”，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孩子数量增多，并且也长大为“成品”了）之后，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很高的。

其实，职场上也一样，学徒工缺乏技能，效率低，收入也低；但这种低收入却能

① 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

② 张牧之：《最早离婚协议书放妻书：一纸管窥唐人离婚》，新华网（来源：《北京日报》），2012年3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3/07/c_122800018.htm。

激发学徒工学习的积极性，掌握技能。多年的徒弟练成了师，收入也就提高了。这也符合生物学逻辑，比如胎盘的血氧浓度稍低于母体其他部位（如果太低的话，又不利于胎儿发育），这种低氧环境有利于产生一些刺激因子，促进胎儿的生长发育；如果胎盘的血氧浓度与其他部位一样高，那么就无法促进胎儿发育。

西方国家古代妇女地位并不比中国妇女高。1740年的英国《女儿经》要求妇女要学会容忍，即便对酒醉的丈夫。“丈夫喜欢葡萄酒，而不太在乎是不是方便……但只要生活不悲惨，妻子一样可以过。”妻子对丈夫的责任是：“先负责于其人，后负责于其名，再负责其财”。孀妇必须在余生忠于“丈夫的身体，丈夫的回忆和丈夫的孩子”^①。该书描绘了一幅18世纪英国社会的画面：男性为户主，在外从事生产劳动以养家，而女性支持家庭事务。

阶段性来看，古代妇女地位似乎确实比男人低；但从人生整体看，妇女地位并不低。就像太极图一样，从某一断面看，阴阳是不平等的，但是整体是平等的。

在古代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在户外工作的男人往往短寿，还来不及享受儿女的孝就已经去世；而女人却比较长寿，到老年的时候俨然一家之主（有孝文化和家族制度为保证）。古代多八十岁老母，罕有八十岁老父，多子多福，其实主要是母亲的福。

有些人认为穆斯林妇女的地位低，其实这也是偏见。《圣训说》艾布赛尔德的传述中曾记载，穆圣说：“谁有两三个女儿成姐妹，而能善待之，敬畏真主，谁必进乐园。”伊本阿巴斯的传述中也记载，穆圣说：“有女儿而不活埋，而不嫌弃，而不重男轻女者，真主必使其进乐园。”可见伊斯兰教并不是重男轻女的。母亲的地位很高，女人最特殊的工作是做母亲。“天堂就在母亲的足下”，母亲是每个人的启蒙导师和最精心的保育员。感化人性的大功业是慈母之心，人性始于母爱，没有母爱就没有人性。生育行为被作为女性神圣的使命和义务^②。

古代妇女地位未必就比现在低。婚姻不但让妇女获得稳定的家庭和养老保障，也等于有了终身的铁饭碗。至少男方不会要求妻子和男人一样养家拼事业，富贵易妻要被告官，私生子不可以平分家产。现在的女人在家庭、工作、自己和孩子的权益上有这种保证吗？男人靠不住，才有现在的剩女。当然，不是男人靠不住，是法律和经济制度靠不住。

^① Eleanor Harding, "Why a young virgin must not look a lusty man in the eye... and other compelling lifestyle advice for the Englishwoman of 1740", MailOnline, 6th September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2034104/Lifestyle-advice-Englishwoman-1740-hammer.html#ixzz1YFz02wQD>.

^② 马桂兰：《农村回族妇女生育观之浅见》，《柴达木开发研究》，2007年4期。

尊重男女天然的分工

男主外、女主内是人类数千年摸索出来的社会分工。古人强调“男有分，女有归”，男人经营事业，女人经营家庭。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主要受益者。

女人平均在12岁来月经，51岁绝经，根据美国卫生部的资料，周期平均28天，经期平均为5天^①。也就是说女人一生平均有2452天（39年×365天÷28天×5天=2452天=7.0年）在月经中度过。老天爷作为补偿，让女人比男人长寿7年。比如根据联合国数据，2005~2010年，发达国家男性预期寿命为73.4岁，女性为80.4岁^②。

怀孕的话，虽然减少月经次数，但是需要承受怀孕、分娩、哺乳之苦。老天爷又对生育做了另外的补偿：多次生育延迟绝经期。生育期女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远低于男性，而绝经期后却与男性无异。哺乳、积极的性生活减少得乳腺癌的几率。子宫内膜癌在收入丰厚而无生育的妇女中常见。分娩次数愈少，发生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愈大，独身者卵巢癌发病率较已婚者高60%~70%。

女人性周期比男人短，但寿命却比男人长。因此《周易》代表男人的“乾”是一长横；而代表女人的“坤”是两短横，前半辈子与丈夫一起生活，后半辈子与儿女一起生活。如果女人没有孩子，晚年将非常凄惨。

男女分工是天然的。人如此，动物也如此。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难道鸟也进行性别歧视？以“向男性看齐”为标准来判断“平等”并不一定符合女性利益，比如不能要求妇女“平等”地下井采矿、参军入伍。生育是女人天赋的优势，生育权是最高层次的女权，消除性别的天然的生物学差别是对妇女最大的歧视！

就像建筑一栋房子，男人是“建筑工”，女人是“装修工”。从外表只看到房子的框架，似乎男人贡献大。其实，只有经过精心装修，才能功能齐备，才能住得舒适。家中有女人就是“安”，生活就安稳了。目前只给“建筑工”发工资，不给“装修工”发工资，越来越多的女人也选择当“建筑工”，家庭生活质量反而下降。比如一些夫妻都是高薪，都很忙，没有时间管理家务、享受生活，甚至连一个孩子都养不了。

^① “Menstruation and the menstrual cycle fact shee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n Women's Health, <http://www.womenshealth.gov/publications/our-publications/fact-sheet/menstruation.cfm>.

^②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美国2006年人均GDP是4.38万美元，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2007年美国一项报告指出，若全职妈妈所执行的每项工作都给薪，那么一年至少值13.8万美元。一个妈妈通常身兼多职，分饰多角，包括家管、托儿中心的老师、厨师、电脑操作员、洗衣人员、房屋看照人、设备管理员、驾驶、首席执行官以及心理学家，这些复杂又专门的工作，都是妈妈必须兼顾的身份^①。但是全职妈妈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由于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短，到老的时候还拿不到足够的养老金。而那些无孩妇女，却因为工龄长，拿到的养老金更多（别人的孩子提供的）。

现代经济制度就像拿着小利诱惑鱼走向死亡的渔夫（就像清朝的喇嘛政策），将妇女赶出家庭，有些甚至无家可归（终身单身）。只有游得快的鱼才能抢到鱼饵；知识女性更能抢到现代渔夫的鱼饵，容易为膨胀的享乐和物欲思想所俘虏，毁灭个人的不朽的希望和培养新生代的激情。很多妇女单身、晚婚、不生育，与其说是洒脱，不如说是无奈。不少职业妇女心理压力比古代妇女还要大。生孩子是女人的天性，连个孩子也不敢生能叫妇女解放吗？

就像卵子和精子的对比（前者携带更多的基因和营养；后者体积小，游得快）一样，女人是辎重部队（肩负着繁衍人口、照顾家庭的重担），男人是轻装部队。辎重部队即便卸下所有辎重，作为整体，在速度方面也难以赶上轻装部队。由于男人劳动参与率高，面临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大，世界平均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7倍（作为先锋的轻装部队的伤亡率往往比辎重部队要高），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的男性自杀率也分别是女性的2.7、1.8、1.8、1.7、1.7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高，“活得像男人”，忙里又忙外，心理压力大，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②。“关爱女孩”相当于进一步驱使辎重部队“平等”地赶上轻装部队的速度，其实是对妇女的损害。

现代教育之所以“妨生”，并不在于“教育”本身，而是在于教育的内容。古代是儿子跟着父亲“实习”，女儿跟着母亲“实习”，这种差异化的教育兼顾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而现代教育只注重物质再生产，在人口再生产上完全是凭本能。

由于婴幼儿死亡率降低，只需要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就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寿命已经大为延长，育婴期占妇女生命周期的比例远远比古代要低。如果妇女不参与物质再生产，对妇女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不利的。

^① Chris Reidy, Globe staff, "Mom's 2007 salary: \$138K", Boston.com, May 2, 2007, http://www.boston.com/business/ticker/2007/05/moms_2007_salar.html.

^② WHO, "Suicide rates per 100,000 by country, year and sex (Tabl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prevention/suicide_rates/en/. Retrieved 2012-01-26.

为了兼顾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女生的学制需要与男生不同，比如缩短女生早期教育的学制，以让大多数妇女有条件在20~30岁生育黄金期之内生三个孩子。在育婴期之后，提供多样化的教育，给妇女提供就业培训。在制度设计上（包括社保制、经济分配制、婚姻法、税制、科研基金的申请、职称评定），要让妇女在生育上的付出得到合理的回报。目前的学制和经济制度是根据男人的生理制定的，对女性是不公平的。比如男博士毕业后，可以找年轻的太太，生儿育女；而女博士毕业后，部分人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等于生育权已经被“制度化”地剥夺了。

少子化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以前发达国家女人退休年龄比男人要早几年，这意味着女人享受更长时间的退休金，这是对女人生育的回报。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生育率相继低于更替水平，导致社保出问题，不得不推迟退休年龄，并且男女一样了。甚至有人提议妇女退休年龄应该比男人更晚，因为妇女缴纳的社保金并不比男人多，但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享受的退休金比男人多。通常妻子比丈夫年轻几岁，男人去世前大多有妻子相伴，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在晚年平均将孤独地生活多年，而女人对孩子的感情依赖度比男人要大。因此，一个男人口口声声说爱妻子，却又没有勇气让妻子生孩子（或者是不愿意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这种爱其实有点虚伪。

法国的退休新规定考虑到了妇女生育的权益，为抚养3名儿童而休假，退休金交付超过年数下限的法国女性，依然可以提前于男性。此外，过去“每抚养1名儿童，女性的工龄可增加两年”的政策规定，仍旧保持不变^①。

日本妇女寿命比欧美要长，而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欧美，在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都不称职，日本政要对此很恼火，前首相森喜朗甚至认为不生孩子的妇女不配享受养老金^②。

女人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两不误，是人类几千年的追求。牛郎织女和白蛇传的故事寄托了人们的这种愿望。但是普通妇女毕竟不是神仙，难以做到两不误。

目前，包括联合国在内各国评价性别平等是以“物质再生产”为标准，似乎世界妇女地位仍然比男人要低，而中国妇女地位相对来说要高一些^③。如果以“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双重标准来评价，那么世界上男女是平等的，而中国妇女的权益却受到损害。比如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相当于男人的84.5%，而印度只相当于男人

① 《女性退休国外有“弹性” 年龄线划分综合考虑》，新华网（来源：《北京晚报》），2011年3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3/08/c_121163268.htm。

② 《日政客把“多生孩子”视为国家要务》，人民网（来源：《金融时报》），2003年9月12日，<http://japan.people.com.cn/2003/9/12/2003912111927.htm>。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39-142, http://www.gm.undp.org/HDR_2011_EN_Complete.pdf。

的40.4%；但2010年中国妇女平均只生1.18个孩子，印度妇女平均生2.6个孩子。也就是说印度妇女在“人口再生产”上劳动参与率高。以“物质”（即时回报，但是递减的）的标准看，中国妇女地位高。但是以“人口”（回报有几十年的滞后性，但是递增的）标准看，印度妇女的回报要丰厚得多。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低方案）^①，2040年印度是6.3个15~64岁劳动力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中国是2.6个劳动力对应1个老人（事实上还过于乐观）。中国大量妇女将老无所养，而印度妇女却能安享晚年。

联合国人口基金通过各种手段过度地提高妇女在物质领域的劳动参与率，必将降低其在人口领域的劳动参与率。名义上是“提高”妇女地位，但是最终受害者还是妇女，就像当年满清通过提高喇嘛地位而控制蒙古的人口一样。年轻妇女的生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她们不敢生、也养不起3个孩子），那么老年妇女的养老也就无从得到保障。并且少子化也增加了妇女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发病率。

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年轻的时候没有“生机”，年老的时候苦无“生计”。因此，计划生育的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要真正保护妇女权益，就应该放她们一条“生路”！

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落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和各国家/地区官方数据，2010年全球生育率倒数第一的是中国台湾（0.895），倒数第二的是中国澳门（1.09）、倒数第三的是中国香港（1.11，香港人口学教授涂肇庆认为，由于有一半的孩子是大陆产妇生的，香港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5，那么香港应该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五的是新加坡（1.15）、倒数第七的是中国大陆（1.18）、倒数第八的是韩国（1.22）、倒数第十六的是日本（1.39）；而世界平均为2.45，阿拉伯世界为3.21，拉美为2.2，印度为2.6，美国为1.93，俄罗斯为1.59，欧盟也还有1.59。依照文化圈来划分的话，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生育率比其他民族要低。比如新加坡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的生育率在1990年分别为1.65、1.89、2.69，在2000年分别为1.43、1.59、2.54，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在2010年则分别为1.02、1.13、1.65^①。虽然2010年华人还占新加坡人口的74%，但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华人成为少数民族是迟早的事情。

马来西亚的华人生育率也低于印度人和马来人，比如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生育率在1970年均都在5.0左右，在1987年分别为2.25、2.77、4.51^②，在2010年则分别为1.8、2.0、2.8。生育率的变化导致人口比例的变化，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占全国人口比例在1970年分别为33.9%（在二战前华人一度超过40%）、9.0%、55.6%，在1991年分别为26.3%、7.5%、58.7%，在2010年则分别为22.9%、6.8%、60.3%^③。预计到2100年，华人人口比例有可能只占5.5%。华人社团在2002年之前就提出：“1个不够，2个太少，3个差不多，4个刚刚好，5个更加好，6个最美妙”，但是仍然难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④。

印度人的生育率虽然比华人要高，但是比穆斯林要低。比如2001年印度教徒的生育率为3.1，而穆斯林的生育率却为4.1^⑤。喀拉拉邦的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的生育率在1991年分别为1.66、1.78、2.97，在2000年则分别为1.47、1.55、2.28^⑥。

海外华人（以及日裔、韩裔）生两个孩子的为多，只生一个的不少（近年出国到欧美的华人中只愿意生育一个的比例在增加），生三个的少见，生育率是所在国各种族中最低的。比如根据2003年英国伦敦市官方统计，华人生育率只有1.12，远低于英国的1.6和伦敦的1.63。2006年加拿大的华人生育率只有1.2，低于加拿大全国的1.6^⑦。

2009年，美国全国生育率为2.00，其中白人为1.83，拉美裔为2.53，黑人为2.05，亚裔和太平洋岛民为1.74^⑧。假如“亚裔和太平洋岛民”（1600万）中“非东亚裔”（如菲律宾裔、印巴裔、西亚裔、越裔等）的生育率为2.0的话，那么东亚裔（华裔、

① “Population Trends 2011”，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pp.15,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popn/population2011.pdf>.

② Saw SH, “Ethnic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 Biosoc Sci, Vol.22, No.1 (Jan 1990), pp.101-12.

③ Madam Zarinah Mahari,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Malaysia: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15th Conference of Commonwealth Statisticians, New Delhi, India, 7-10 February 2011, http://www.cwsc2011.gov.in/papers/demographic_transitions/Paper_1.pdf.

④ 《马来西亚华人比例下降》，美国之音中文网，2002年7月27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2-07/a-2002-07-27-12-1.cfm>。

⑤ Irudaya Rajan S, “District Level Fertility Estimates for Hindus and Muslim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0, no.5 (January, 2005): pp.437-446.

⑥ Manoj Alagarajan, “An Analysis of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by Religion in Kerala State: A Test of 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22, no. 5-6 (2003), pp.557-574.

⑦ 《20年后加国华裔人口300万 生孩子要努力》，加拿大家园（来源：《世界日报》），2012年5月18日，<http://www.iask.ca/news/canada/2012/0518/135630.html>。

⑧ Brady E. Hamilton, Joyce A. Martin, Stephanie J. Ventura, “Births: Preliminary Data for 2010”,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60, No.2(November 17, 2011), pp.20-21. http://www.cdc.gov/nchs/data/nvsr/nvsr60/nvsr60_02.pdf.

日裔、韩裔，共约600万人）的生育率只有1.3。

依照文化圈的划分，目前生育文化的强弱次序为：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中华文化圈。

中华生育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那么现在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为什么反而是全球最低？其实还是要从生育文化角度上来分析。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率先放弃传统文化，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了“脱亚入欧”，一些传统的节日（如春节）都被废弃。韩国连汉字都废除了。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被当成“落后”思想被反复地扫除，宗祠、祖坟、族谱大量被毁。可以说，整个东亚地区已经礼崩乐坏，都在“脱亚入欧”。

在国际社会的诱导下，日本在1949年就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也在20世纪60年代相继出台家庭计划政策，并被联合国人口基金视为“少生快富”的典范。中国大陆在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更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忽悠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控制人口的政策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传统生育文化一扫而光。

并且，中华生育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瓦解。

① 中华生育文化是建立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的，通过国法和宗法确保了养儿的投入能得到稳定的回报。社保制逐渐取代家庭养老，打断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所依赖的人口投资链，从而也打断了依赖人口传承的物质、感情、文化投资链。

② 古代长辈掌握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并且当时的社会发展缓慢，辛苦一辈子积累的遗产可以传数代人；现代农村土地归集体，长辈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积累的物产几年、几十年就会贬值，不可能作为遗产传给后人。并且年轻人不需要土地就可以谋生，有悖儒家所强调的“父母在，不远游”。因此，长者对晚辈难以有约束力，“孝道”与“家规”无“刚性”。联合型大家庭正在消失，小型核心家庭日益增多。

③ 信仰有从众心理，古代是家族聚居在一起，有共同的祖宗，共同建立起家庙、宗祠，每天都得烧香，香火不能断。现在人口流动大，远离故乡，很多家族已经没有了祠堂、宗庙，一年到头也祭不了几次祖，看过家谱的人没有多少。何况大多数人已经不信祖宗了。而西方国家教堂随处可见，美国有40%多的人每周上教堂。西方和穆斯林看过《圣经》和《古兰经》的人比例还很高。

④ 现行经济制度打破了儒家强调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模式。

⑤ 一个原始部落突然进入现代社会，自杀率会很高；同样，东亚农业社会突然改变自己的传统家庭模式，在短时间就完成工业化，生育率会快速下降。

⑥ 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都是外向型经济模式，工作繁忙、压力大，晚婚晚育普遍，比如2005~2010年日本52.0%（韩国是51.7%、中国香港是57.0%、新加坡是56.0%）的孩子是30岁以上母亲生的，而美国只有37.5%（欧洲是43.6%）的孩子是30岁以上母亲生的^①；并且城市容积率高，住房小、价格高。中产阶级外表光鲜但压力极大。笔者碰到从日、韩、新到美国留学的，留在美国的大多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回去的基本都只生一个，因为压力太大。中国的城市化也在走这条民不聊“生”的老路。北京、上海政策允许生一个孩子，但实际生育率只有0.7；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了。

⑦ 中华文化圈还普遍有“孟母情结”，让孩子站在更高的起跑线上，额外抬高养育成本（经济成本和精力成本）。美国佛罗里达州等多个州要求学校按种族划成绩线，对亚裔要求最高。佛州官员解释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站在不同的起跑线。”^②从个体角度看，这是歧视亚裔。但是从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多少算是无奈之举。如果美国其他族裔都效仿东亚裔，用养三个孩子的成本养一个孩子，那么美国的生育率将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那么低。

虽然现代经济制度对西方的生育文化也有打击，但是毕竟这个制度的建立与其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礼拜天就是安排上教堂的）。从总统手按《圣经》的宣誓，到社区里的教堂，以及日常的祷告，无一不说明着他们的社会还是传承着传统文化。

并且西方的生育文化并不完全是依赖于家庭模式，同时也依赖于宗教。西方的生育文化的“利”是家庭，但“精神动力”却是来自宗教，除了生孩子有回报外，还是因为教义指导他们如此。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高，主要原因就是《古兰经》的力量。就是说西方的生育文化是将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一个篮子鸡蛋摔坏了，还有另外一个篮子鸡蛋。

而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利”在家庭，“精神动力”也在家庭（为了祖宗而繁衍后代），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工业化破坏了家庭结构，将所有的鸡蛋都打碎了。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较多，也能很快

^①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② 熊怡：《美一州要求公校按种族划成绩线 对亚裔要求最高》，中国新闻网（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10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0-16/4250528.shtml>。

恢复。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是由于骨髓造血功能异常导致红细胞减少的一种血液疾病，死亡率极高，有“软癌”之称。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的事件，但是因为传统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够快速恢复。现在中华文化圈就像一个“再障”病人，由于生育文化的缺失，人口和文明难以“生生不息”。

画虎画皮难画骨，东亚地区“脱亚”容易，“入欧”难。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效仿了欧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韩国甚至在文化上也效仿美国，目前有超过50%的人改信基督教，但生育率却未能上升。依照哈耶克的标准，“文化”是数百年、数千年“自然进化”的，靠的是传承。俄罗斯生育率能够回升，“回归传统”是关键。基督教并非扎根于韩国传统的文化，而是嫁接的新文化，没有深厚的历史土壤，因此很难让韩国生育率提升。在美国，不少东亚裔信仰基督教，但是生育率并不高。美国是保守派的共和党和自由派的民主党对弈；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却是两个自由派党派对弈。中国台湾和韩国很多女士为了政治，连婚姻都不要，更不用说生育了；而美国选民很难接受这样的获选人。东亚地区是邯郸学步，失去自我。光有“政治”和“经济”，没有配套的“文化”，人口无法延续，无异于“过把瘾就死”。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子，主、谓、宾齐全。中国台湾、韩国有“宾语”（“民主”、“宪政”），有“谓语”（“追求”），但是却缺乏“主语”（没有人口）。

而中国大陆与东亚四小龙还有不同，因为30多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使得民众产生了爬蚤心态。

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

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是一种“自我设限”，并且将政策生育率设在1.38的超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生育意愿还“跳”了几下，90年代之后都懒得“跳”了，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人口学界却高估农民“跳”的能力，将生育率“修正”为1.8。

下面几个地区最能反映中国人口的“爬蚤”效应。

①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

恩施等试点“二胎”的地区，生育率也全部低于政策生育率。

② 1980年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与全国一样只能生育1胎，后允许生2胎，由于已经执行了十余年的一孩政策，许多青年夫妇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①。“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②。

③ 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许普遍生二孩的政策。但是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③。

可见，中华生育文化已经消失几尽。

① 与其他东亚地区一样，中华生育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被动瓦解。

② 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生育文化（反封建、反宗教）。一方面说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方面却又彻底否定传统文化，难道我们的文明从零开始？

③ 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了计划生育的“爬蚤”。

④ 养育孩子是很辛苦的，但是现在的年青一代生活在小家庭里，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⑤ 中国城市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这种结构很难改变，并惯性地延续。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城的农民也被迫适应这种结构。

⑥ 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片面宣传培育出不少仇视生育的文化，比如：

1980年，陕西省商县龙治民有一女，其妻响应独生子女政策做了节育手术，县长授予其“计划生育先进模范”。龙治民认为杀死劣质人口是为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做贡献。从1980年到1985年先后杀害48人。他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1996年，广东高要市金利镇发生特大投毒案，163人（次）入院治疗，死亡18人。案犯杜润琼说，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因此她要用投毒的方式来抑制人口增长。她说：“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家办事是应该的……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1996年《岭南文化时报》）

就生育文化来说，美国还穿着件破棉袄；法国、英国等国还穿着件夹克；中国却

① 原新：《新疆人口预测与控制探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 韩琳：《兵团计生委主任刘戈玉：创造良好人口环境》，新华网，2006年4月3日，http://bt.xinhuanet.com/2006-04/03/content_6633607.htm。

③ 顾宝昌：《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

是衣不遮体，再不添件衣服，如何熬过漫长的寒冬？

美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回归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欧洲一样，美国也掀起性解放运动。最初是反对性别歧视，同时要求改变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律，主张婚姻自由。此后，从这些合理要求逐渐演变为对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并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主张性爱 and 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性解放使西方社会离婚率激增，美国离婚数由1960年的39.3万例增加到1981年的121.3万例^①。美国的生育率也从1960年的3.65急剧下降到1976年的1.74。

当时美国很多政治家认识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性，民主党人卡特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中反复承诺，他的政府一定要把重建家庭问题置于最优先地位。入主白宫后，卡特曾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②。

共和党总统里根1981年执政之后，美国社会更是全面趋向保守，依赖于宗教的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得以恢复。

洛伊斯案件是美国的性观念转为保守的一个标志性案件。1984年，明尼苏达州的漂亮女矿工洛伊斯起诉对性骚扰持冷漠态度的公司。该案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成为改变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当今美国，几乎所有公司、教育组织都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不少团体相继发起了保护贞操运动。

老布什总统继承了里根的人口政策，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重要性。

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第一场辩论中，克林顿州长、布什总统、独立商人罗斯·佩罗特都强调家庭价值的重要性^③。克林顿说：“一个好家庭应该是：上一代把爱、家教和优秀的价值传给下一代，那里是人们生活的避风港，在那里人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今天，美国许多家庭面临危机。在这次大选中，对家庭价值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我对此并不陌生。我出生时父亲就不在了（注：克林顿出生前3个月，他父亲在一次车祸中死亡），是我的寡母和祖父母给予我家庭价值。我认为，总统对家庭价值取向负有责任，他应该重视美国家庭价值。要设法让那些靠福利生活的

^①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Advance Report of Final Divorce Statistics, 1988”,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39, No.12(May 1991), pp.7.

^② 李铁：《“家庭解体，美国衰落”》，《南方周末》，2012年8月17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79784>。

^③ “The First 1992 Presidential Debate (October 11, 1992)”, PBS, <http://www.pbs.org/newshour/debatingourdestiny/92debates/1stprez3.html>.

人得到工作；有工作的穷人如果家庭有孩子并且每周工作40小时，就要给他们免税，使他们摆脱贫困；应该给有工作的家庭公平的税收政策和定期接受再培训的机会。他们都需要较好的经济。谈到家庭价值，我自己很清楚，没有它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今天晚上是我结婚17周年纪念日，这是我自己的家庭价值的最好体现。”

布什总统说：“洛杉矶等一些大城市的市长来见我，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大都市的衰落源于美国家庭的衰落。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强化家庭。……我对如此高的离婚率表示震惊。离婚难以避免，但现在的离婚率也太高了。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保护美国的家庭。它可以是单亲家庭，但那些单亲家庭的母亲需要帮助，提供帮助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不负责任的父亲对这些母亲尽到应尽的责任——那对强化美国家庭是有帮助的。”

佩罗特说：“有强大的家庭，才会有强大的国家。”

小布什2001年当选总统后承诺他的政府将“对强化家庭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人们走入婚姻并保持婚姻”。白宫耗费20亿美元以“恢复传统婚姻文化”^①。

所有数字均表明美国人（尤其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正在回归家庭观念，性趋向保守，宗教力量在增强，对堕胎、同性婚姻、毒品的容忍度比欧洲低。美国的离婚率从1980年的7.9%下降到2000年的6.2%、2008年的5.2%^②。而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却在回归传统道德上跟不上美国的步伐，生育率也难以回升。根据密歇根大学1997年的一份调查，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6%、14%和13%。美国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有43%，加拿大只有20%；美国只有8%的人从来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加拿大却有38%^③。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④。

① Will Marshall and Isabel Sawhill, “Progressive Famil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presented at the Maxwell Conference on “Public Policy and the Family,” Syracuse University, October 24–25, 2002, pp. 2, 6, http://web.lemoyne.edu/~ridzifm/fmridzi_files/maxwell_school/Soc%20281%20files/Policy%20Conference/marshall-sawhill.pdf.

② U.S. Census Bureau, “Marriage and divorce rates by country: 1980 to 200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2,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2012/tables/12s1337.pdf>.

③ “How many North Americans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and how many lie about going)?”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rel_rate.htm.

④ Spengler, “Faith, fertility and American dominance”, Asia Times, Sep 8,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I08Aa01.html. Spengler, “Power and the evangelical womb”, Asia Times, Nov 9,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K09Aa02.html.

美国男女分工比较合理。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1》^①，美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为0.299，不但高于新加坡（0.086）、韩国（0.111）、日本（0.123）等东亚国家，也高于瑞典（0.049）、丹麦（0.060）、德国（0.085）、法国（0.106）、加拿大（0.140）、英国（0.209）等欧美国国家，甚至高于中国（0.209）、阿联酋（0.234）、马来西亚（0.286）等发展中国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性别不平等指数”不是越低越好，美国保持合理的男女分工和较高的生育率，可以让美国妇女老有所养。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除了恢复传统的生育文化外，美国还建立起让主流家庭生得起、养得起三个孩子的福利和分配制度。

美国的儿童福利项目几乎涵盖了儿童需求的每一个方面（如收入保障、食品与营养、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福利的开支占GDP的比例由1960年的0.6%增加到1980年的1.4%、2000年的1.6%、2010年的2.6%。2010年，联邦支出总额为3.5万亿美元，其中11%（3740亿美元）用于儿童福利。联邦经费只占用于儿童的总开支中联邦的1/3，还有2/3来自州政府（占GDP的3.9%，主要用于教育）和地方政府。2008年，各级政府给每个儿童的投资共为11323美元^②。绝大多数地方都是13年免费义务教育，部分地区是14年免费义务教育（4岁开始进学前班，学前班2年）。民间组织也有种类繁多的儿童福利计划。

美国很多经济政策有利于降低家庭的养育负担，比如，医疗保险是以家庭为单位，已婚家庭缴纳比单身稍高一点的保险费，全家（无论是只有夫妻两人，还是有五六个孩子）都享受医疗保险。一些公园、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的门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大学学费可以贷款。美国这些“添丁不加银”政策的原理和效果都类似于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

美国住房等民生压力比欧洲、日本和中国要小。美国的人均住房面积远远比欧洲和日本要多，但房价更低。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美国60平方米（1950年也只有26平方米，2010年超过70平方米了），英国38平方米，德国38平方米，法国37平方米，日本31平方米^③。美国2007年中位房价229100美元，只是人均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39-142, http://www.gm.undp.org/HDR_2011_EN_Complete.pdf.

^② Julia Isaacs, Heather Hahn, Stephanie Rennane, C. Eugene Steuerle, Tracy Vericker, “kids’ share 2011- Report on Feder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Through 2010”, Urban Institute, <http://www.urban.org/UploadedPDF/412367-Kids-Share-2011.pdf>.

^③ 《我国与发达国家住房差距有多大？》，人民网，2001年9月17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enghuo/81/99/20010917/562142.html>。

GDP45800美元的5倍。美国德州的生育率全美最高，其房价低（是人均GDP的3倍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人民币35199元，其中北京为人民币80394元、上海为人民币82560元^①；如果依照美国的标准，那么2011年全国、北京、上海的中位房价只应为18万、40万、41万元人民币。中国目前之所以能够忍受天价房价，是因为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美国生育率在1976年之后止跌回升，1989年达到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但是2010年、2011年分别降到了1.93、1.89。能否遏制生育率下降的势头，将决定美国今后几十年的国运。

欧美鼓励生育的困局

日本、美国、法国在1980年的时候生育率相差不大。此后同样是鼓励生育率，但是2006年日本生育率跌到1.32，美国、法国则上升到2.1、2.0。中国台湾、韩国生育率快速下降，而欧洲国家生育率下降却相对平缓。这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表9.1 各国历年非婚生孩子比^②和生育率^③

国家	非婚生孩子比(%)					1980年生育率		2006年生育率	
	1980	1990	2000	2006	2008	总和	婚内	总和	婚内
意大利	4.3	6.5	9.7	16.2	NA	1.64	1.57	1.35	1.13
西班牙	3.9	9.6	17.7	28.4	31.7	2.22	2.13	1.38	0.99
德国	NA	15.1	23.4	30	32.1	1.44	NA	1.33	0.93
英国	11.5	27.9	39.5	43.7	NA	1.89	1.67	1.84	1.04
爱尔兰	5.9	14.6	31.5	32.7	NA	3.23	3.04	1.93	1.30
荷兰	4.1	11.4	24.9	37.1	41.2	1.60	1.54	1.72	1.08
法国	11.4	30.1	43.6	50.5	52.6	1.85	1.64	2.00	0.99
丹麦	33.2	46.4	44.6	46.4	46.2	1.55	1.03	1.85	0.99
瑞典	39.7	47	55.3	55.5	54.7	1.68	1.01	1.85	0.82
加拿大	12.8	24.4	28.3	27.1	NA	1.74	1.52	1.59	1.16

① 张少雷：《2011年各省市人均GDP数据出炉 25省份超4000美元》，新华网，2012年2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2/07/c_122667889.htm。

② U.S. Census Bureau, "Births to unmarried women by country: 1980 to 200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2011/tables//11s1335.pdf>。

③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 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续表

国家	非婚生孩子比 (%)					1980年生育率		2006年生育率	
	1980	1990	2000	2006	2008	总和	婚内	总和	婚内
美国	18.4	28.4	33.2	38.5	40.6	1.84	1.50	2.10	1.29
日本	0.8	1.1	1.6	2.1	NA	1.75	1.74	1.32	1.29

欧美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使得单身母亲可以单独抚养孩子，非婚妇女生的孩子的比例不断攀升。

根据法国统计局的资料^①，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非婚生孩子只占孩子总数的6%，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非婚生孩子比例快速上升，从1975年的8.4%上升到1990年的30.1%。2008年更是提高到的52.6%，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是婚外生的。瑞典、丹麦等北欧福利国家在1980年的时候非婚生孩子比例就已经超过30%，瑞典在2000年之后更是达到55%（2006年瑞典生育率为1.85，但婚内生育率只有0.82）。

法国非婚生孩子比例从1980年的11.4%上升到2008年的52.6%，生育率从1980年的1.85上升到2006年的2.0（但婚内生育率却从1980年的1.64下降到2006年的0.99）。爱尔兰在1995年前是禁止离婚的，因此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婚外孩子比例也很低；但1995年离婚合法化（仍然设置了非常严格的离婚条件）之后，婚内生育率快速下降，非婚孩子比例快速攀升。

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非婚生孩子比例相对较低，生育率也较低，目前只有1.3左右，长期的低生育率使得西班牙、意大利首先出现经济危机。德国由于产业结构较好，在高端制造业上占有优势，经济暂时还不错，但人口结构决定了德国今后日子并不好过。

其实，单身母亲的日子很不容易。夫妻共同抚养孩子，妻子还能腾出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而单身母亲的选择余地小多了。

美国1980年以来在鼓励生育的时候，尽量往家庭上倾斜（美国税负水平远远低于法国和北欧，单亲母亲的日子没有法国和北欧好过），努力抑制婚外孩子比例，但婚外孩子比例仍然从1980年的18.4%上升到2008年的40.6%。虽然美国生育率从1980年的1.84上升到2006年的2.1，但婚内生育率却从1.50下降到1.29。

美国2008年非婚妇女生的孩子比例全国为40.6%，黑人中为72.3%，拉美裔中为52.6%，白人中为28.7%，亚裔和太平洋岛民中只有16.9%（其中华裔、日裔、韩裔比

^①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ACCORDING TO THE MARITAL STAT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 France, http://www.insee.fr/en/ppp/bases-de-donnees/irweb/sd2005/dd/excel/sd2005_t5_11.xls, 2011/9/10.

例更低，估计比日本国内高不了多少)^①。

日本非婚生孩子比例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1980年为0.8%、2006年也只有2.1%），除了社会福利的配置不同外，更主要是由于文化传统不同。

中华文化很难认同未婚母亲，孟子认为“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东亚文化只有一个“父亲”（血亲）；而西方传统有多个“父亲”，以前有两个（血亲和上帝），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社会福利制度）。

日本、韩国的婚内生育率其实与美国差不多、高于法国和瑞典，即便完全复制美国的鼓励生育的经济制度（由于严重的老年化，日、韩将没有财力这么做），由于婚外生育率不可能如美国那么高，总和生育率还是难以提升（能够提升到美国的日裔、韩裔的生育率水平就不错了）。因此，东亚地区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就不能跟着欧美亦步亦趋，而需要别出心裁。

欧美现在那种靠非婚生孩子来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并且是不可持续的。相当部分男人被剥夺了孩子的“产权”，没有物质产权的社会是危险的，没有孩子“产权”的社会同样危险。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福利国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对单亲家庭进行补助的方案，实际上是把养家的责任从缺失的父亲那里不公平地转移给纳税者，这种方案实行的后果是使国家充当了“父亲”的角色^②。其结果是使整个社会产生更多的单亲家庭。

“子不教，父之过”，未婚母亲的孩子在家“无父”（最易发展成问题少年），在外“无君（政府）”。2011年英国伦敦骚乱的参与者很多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知母不知父”（类似于文明之前的原始社会），母亲很难管住那些十来岁、人高马大的儿子们（很多还有情感缺陷）。近年来在法国，社会骚乱和“青年恐慌”几乎年年发生，而单亲孩子比例小的邻居德国情况要好得多。

短时看，美国、法国、北欧的鼓励生育政策暂时是有效果的，但这种福利制度是建立在低抚养比的基础上的；而发达国家总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攀升，今后将陷入“儿童福利”和“老年福利”的冲突之中。由于古代寿命短，“养老”的物质成本并不算高（低于“养幼”的成本），更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尊老”；而现在寿命延长，“养老”的成本增加，成了社会问题。

虽然1960年以来美国的儿童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在增加，但是其占国内支出总

^① “Births: Preliminary Data for 2009”，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9, no. 3 (December 21, 2010), PP.7.

^②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额（domestic expenditures，不含军费和国际事务的开支）的比例却从1960年的20%下降到2010年的16%；而同期用于非儿童方面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占国内支出总额的比例却从22%上升到47%（随着老年化的加剧，今后将更高）^①。

以目前表现最好的福利国家瑞典为例，几十年来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目前经济发展不错，总和生育率已经回升到2010年的1.98（但婚内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但是由于老年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28%增加到2020年的34%、2040年的42%，总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53%增加到2020年的63%、2040年的69%。由于人口结构老化、创新力降低等原因，瑞典的制药、电信、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正在走下坡路（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1989年的29.5%下降到2009年的20.1%），1990年全球500强企业中瑞典占17家，但2010年只占3家了。瑞典总税收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965年的33.3%增加到2010年的45.8%了（美国只占24.8%）^②，税负很难再增加了。那么今后“在世的”老年福利必将压制“未出生的”的儿童福利，降低单身母亲养孩子的能力，生育率将会下降。

其实，“老年福利压制儿童福利”在日本已经开始显露。日本老年化严重，老人参政意愿比年轻人还高，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有利于老人。导致年轻人在福利、工作、晋升上都处于相对劣势，既降低了他们的养育能力，也降低了他们的创新活力。日本的税负水平与美国相当，但是在儿童福利的投入却远远比美国少。

养幼是生物学本能，儿童福利应该优先于老年福利才有利于社会持续发展和今后的老人福利。有人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青年的战场，老年人的地狱”，此话并不准确（美国由于人口结构年轻，老人的“夕阳”仍然比日本要红）。但也说明美国目前儿童福利优于老人福利的政策是符合生物学原则的，而日本却不是。

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

依照哈耶克的逻辑标准，传统的婚姻制度应该算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将珍贵的“生物学”钻石（人性）装在精美的“社会学”盒子里（婚姻和家庭）。父母“各子其子”，孩子长大后“各亲其亲”，因此能够做到“货、力为己”。这种符合生物学“本能”的制度是可持续的。

^① Julia Isaacs, Heather Hahn, Stephanie Rennane, C. Eugene Steuerle, Tracy Vericker, “kids’ share 2011- Report on Feder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Through 2010”, Urban Institute, <http://www.urban.org/UploadedPDF/412367-Kids-Share-2011.pdf>.

^② Tax revenues as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ECD Tax Database. <http://www.oecd.org/tax/taxpolicyanalysis/oecdtaxdatabase.htm>.

而现在高离婚率、高重组家庭（“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比例，其实远离了自然选择，脱离了最初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那种一夫一妻制^①。重组家庭是相互养育别人的子女，继父、继母对小孩的爱就不是“本能”，而只是一种文化约束；孩子赡养继父母也不是“各亲其亲”，赡养成本大为提高。因此子女不愿父母离婚、再婚，其实是一种本能反应。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赖特说：“毕竟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赖特严厉批判了这种“变相的”一夫一妻制：“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大量浪费，即爱的浪费。无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彼此功过如何，在某种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多种形式的一夫一妻制，即变相的一夫一妻制，是所有形式中最差的一种。”^②而单亲家庭的情况更糟。现在“社会学”的盒子里已经做得越来越漂亮，但是里面的“生物学”钻石却越来越少。

西方福利制度是纳税人承担“公共父亲”的义务养育孩子，又承担“公共儿女”的义务扶养老人，是“不亲其亲”、“不子其子”，这种不符合生物学“本能”的养幼和养老的大锅饭既养不好幼，今后也养不好老。

今后应该是家庭养老（幼）为主，社会养老（幼）为辅，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既让养老收益与养幼投入适当挂钩，又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既符合生物学原则，又符合文明准则。

目前的学制和经济制度更符合男性生理学，不符合妇女生理学，在这种框架之内去追求女权，可能会适得其反。需要对整个体系进行反思，从更宏观上的高度看待男女平等。

2011年6月28日，美国专栏作家莫纳·查伦（Mona Charen，曾是里根总统夫人南希的演讲撰稿人）写了一篇《全方位看待婚姻》^③，介绍了米奇·佩尔斯坦（Mitch Pearlstein）的新书《从家庭的崩溃到美国的退化》。该书描述了家庭解体与经济衰退的关系。单亲母亲（偶尔也有单亲父亲）无力养育孩子，转向政府要求援助，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拖累美国经济。在传统家庭里，进入中年后如果有慢性病或者残疾，往往能得到配偶的照顾，但是高离婚率和低结婚率使得这一切变得不可能。缺乏管教的单亲家庭孩子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的工作，最后走向他们父母的老路，继

① 郑也夫：《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②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道德的动物》，上海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③ Mona Charen, "See marriage from all angles", The Spokesman-Review, June 28, 2011. <http://www.spokesman.com/stories/2011/jun/28/mona-charen-see-marriage-from-all-angles>.

续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去生非婚生孩子，继而把孩子送入贫困中。书中的结论是：美国的经济复兴有赖于向传统家庭观的回归。

莫纳批评美国民众漠视传统婚姻而过度关注同性恋婚姻。她认为同性恋比例本身不高，想结婚的人更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比利时、荷兰也只有2%~6%的同性恋真正想结婚），花费很大的精力炒作同性恋实在没有必要，对传统异性恋婚姻的关注更为紧迫。如果把关注同性恋婚姻1/20的精力转到关注异性恋婚姻上来的话，那么美国会更为强大。她认为：“同性婚姻是一种干扰，而国家依靠的是传统婚姻。”

数百万年的集体智慧所“自然”形成的传统家庭模式和道德伦理体系有其合理性。先贤们将这种文化秩序层层地封在礼教的经典和宗教的教义中。每一个封条如果用现代“学术手术刀”理性地解析，是很容易解开的（就像铁锹可以轻易击碎精美的古代陶瓷文物一样），但是释放的将是恶魔，几十年的“学术”可能毁灭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封建落后”的保守力量却起到文明的捍卫者的作用。欧美也正是宗教力量捍卫“自然法则”，防止了剖腹产、人工喂养比例的攀升；而中国由于缺乏“封建落后”力量的制约，一半的孩子是剖腹产，70%以上的孩子没有获得足够的母乳喂养，降低了整个国民素质。

中西方文明有很多共同的普世价值，比如都规范男女分工、强调人口的生生不息、反对淫乱和自杀。中国《孟子》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西方《圣经》强调“生养众多”。中国的《孝经》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西方的《神曲》将自杀者的灵魂置于地狱。中国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西方有“对死的虔信的焦虑”。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古代的一些文化和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部分地区确实存在歧视妇女现象）。重新审视传统的生育文化，并不表示全盘回归到古代的文化、制度（由于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很多是回不去的），只是为了从中淘到一些真正的“钻石”，洗去泥土，装进“社会学”的盒子里。

落实政府责任，保障生育权利

发展人口是政府的首要职责

有人说，计划生育是不应该的，鼓励生育也是不应该的，应该自主生育。其实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发展人口，有了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文明才延

续下来。

《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等古文献，“帝”和“天”是通用的，皇帝自称天子。在甲骨文里，“帝”字象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为帝。可见古代最高领导（帝）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励生育，通过鼓励生育才算得上是天子，人丁兴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保证人口能够世代延续下去，才能让国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西方的《圣经》也认为上帝是造物主，呼吁“生养众多”。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鼓励生育的；只有最近几十年部分国家是反生育的，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开始显性化。

计划生育是政府的手伸进了老百姓的裤裆里，但是仅将手抽出来是不够的。计划生育30多年，拆了引擎，卸下了车轮，毁坏了道路，车还能上路吗？因此，计划生育不能一停了之，政府还必须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保持国家繁荣。其实在人口快速增长后，经济也会随之而增长，这已经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那么对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发展人口更重要？从某种角度看，现在各国政治家热衷于发展经济却忽略人口（任凭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其实有点不务正业。

有人担心，中国今后会出台强制性的鼓励生育政策。其实这是杞人忧天。强制性限制生育，现任政府是有利可图的（可以获取罚款，并且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降低总抚养比），主要的后遗症（如光棍危机、老年化）却是在几十年后了。而强制性鼓励生育，需要现任政府投资，但人口的主要收益却要等20年之后（其实暂时也会因为“婴童经济”而有一些收益）；而后遗症马上就要显现出来，比如面临孩子的抚养问题（“非情愿”生孩子、贫困的家长可能将养育的责任推给政府，需要政府增加儿童福利）。只有有高度责任感的政府才愿意进行人口投资；但是即便在需要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古代，也没有出现过强制性鼓励生育，而只是引导，唐太宗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就是一篇柔性引导的范文。因此，需要担心的，不是政府强制鼓励生育，而是政府以“自主生育”为由逃避发展人口的责任。

人口政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任其自然”。就像种菜一样，需要松土、除草、除虫、施肥，这样才能有好的收成。要是“任其自然”，杂草丛生，不可能有好收成的。中国台湾、韩国目前的人口政策基本是“任其自然”，政府享受着人口的收益，却不承担发展人口的责任。老百姓名义上有生育权，但这种权利却得不到保障（个人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都出现了很多棘手问题，何况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

权)。民不聊“生”，生育率持续低迷，政府是失职的。如果中国大陆政府今后也如中国台湾、韩国现在这样无所作为，那么生育率也将继续下降，这种“自主生育”可能正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所期待的（根本无须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就足以让生育率降低到超低水平，只需要提防中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就是）。即便中国今后鼓励生育的手段和措施远远比美国的还要柔性，也可能将招致一些人指责中国“强制鼓励生育”。

保护婚姻

远古时代“未有夫妇妃匹之合”，两性关系混乱，人口无法增加，无从产生文明，这是因为“昔太古尝无君矣”。可见，政府（君）的重要职责就是规范婚姻秩序。

高离婚率是一种社会病，这已经在国际上取得共识，在世界各国政治家正在为高离婚率而伤透脑筋、并且正想尽办法降低离婚率（比如英国延长离婚案的处理时间，避免情绪性离婚）的时候，但中国一些所谓的“学者”偏偏认为离婚率增高反映社会进步。美国总统在努力降低离婚率，法律在保护婚姻，离婚率在不断下降，而中国的法律却在“制造”离婚。

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中国离婚对数从1980年的34.1万对增加到1990年的80万对、2000年的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2010年为196.1万对、2011年的过211万对^①。有下面几个原因：①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孩子少了，维系家庭稳定的纽带也少了。② 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③ 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修改，使得离婚变的更加容易。④ 独生子女一代进入结婚年龄，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双方性格难以磨合），双方父母过度关注、干预子女家庭。东北地区离婚率高，也可能是东北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现在生育率已经很低了，离婚率却又很高，人们到老的时候得不到配偶的照顾，增加儿女的赡养成本。很多原本在家庭内部就可以解决的矛盾，将释放入社会，威胁国家安全。

中国急需制定新的《婚姻法》以保护婚姻（保护了婚姻，也就保卫了国家），降低离婚率，既尊重妇女在生儿育女方面的贡献，也尊重男人的生育权利。万一要离婚，既要考虑妇女生孩子造成的工作机会、技能上的损失，也必须尊重男女双方对孩子的共同“产权”和抚养的义务。这需要法学界和其他各科学家共同探讨，也让全民

^① 楚齐：《中国离婚率为何攀升》，《今日中国》中文版，2011年第60卷第11期，第50～51页，http://www.chinatoday.com.cn/ctchinese/second/2011-11/03/content_402921.htm。王南：《北京登记离婚数增幅创7年新低》，新华网（来源：《法制晚报》），2012年2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2/02/c_122648419.htm。

参与讨论。

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男22岁，女20岁）比其他国家要晚，一方面降低了人口素质，一方面增加了不孕率的发病率。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修改婚姻法，降低结婚年龄^①，笔者认为该建议非常不错。

落实政府责任

东西方文明在强调生育的私权（孩子是父母生的）的同时，也都强调政府的职责。比如中华文明认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圣经》认为：“儿女是耶和華所賜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孩子不但为家庭做贡献，也为国家做贡献。因此，家庭和国家都需要承担养育的责任。

古代政府主要是维护婚姻秩序、家族制度、生育伦理，严惩不孝（让生育私权获得稳定的回报）和弃幼，设置结婚上限年龄（防止晚婚）等。总体来说，政府是在很宏观的高度促进人口发展，不干涉生育私权，在“无为而治”中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古代根本就没有人口政策）。古代的族田的收益部分用于扶贫、助学，也有助于人口发展。中国的生育模式是在西周就已经完善了（儒家是继承了西周的生育文化）。此后，即便在改朝换代、外族入侵的动乱年代，生育私权也基本能够得到保障。因此人口能够延续下来。可以说，是西周的人口政策奠定了中国三千年的辉煌文明。现在面临历史转折点，如果不能建立起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的人口政策，我们的文明将走向衰落。

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生育模式所依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目前，各国普遍存在生育权力归属不清晰的问题，总体来说是公权侵犯了生育私权，导致生育率过快下降。中国是公权直接侵犯生育私权。发达国家是公权间接侵犯生育私权，比如，养儿的投入主要在家庭，但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而如果将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不但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而且还能获得丰厚的养老金；甚至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也被过分地限制（适当地限制是有必要的，可以防止家庭暴力；但过分限制，将降低家长的管教能力）。古代的经济政策是刺激生育，现在的经济政策是抑制生育。

政府的生育责任和老百姓的生育私权怎么划分，以什么原则划分？如何地让生育得到合理的回报？需要多学科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和详细量化。

^① 林霞虹、陈翔：《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周岁》，新华网（来源：《广州日报》），2012年3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2-03/03/c_122784634.htm。

让经济政策由目前对生育的负反馈变成正反馈，相当于给生育行为装上物质引擎。

此外，还必须重建生育文化，给生育行为装上精神引擎。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传统的生育文化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自然形成”的，但是却不适应已经发生巨变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生育文化的重建，需要既要“托古”（对自然形成的秩序进行修补，不偏离“自然法则”），又要“改制”（使之适应现代的社会、经济结构）。

“物质引擎”和“精神引擎”完善后，与“婚姻引擎”、原始的“本能引擎”一起，划给生育私权领域。这样，生育私权就有了四缸引擎。

政府除了在外围对引擎进行必要的维护外，主要职责是“修路”：调整经济制度，合理规划城市，降低民生成本（包括住房、教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

目前，法国、北欧的人口政策是“推车”，依赖政府福利，靠提高单身母亲比例来提升生育率，成本高，效率低。这种“推车”政策，在下坡路是有很有效的，在平地也还可行；但是随着老年化进程，今后将是上坡路，政府的“推力”将不足，生育率可能会下降。

美国的人口政策是一方面努力修复“精神引擎”（回归传统的生育文化），一方面加大“修路”的力度（美国家庭的相对养育成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提出多项新政策，其中就包括抑制学费上涨）。但是由于美国的生育引擎的马力还是不足，目前生育率能够稳定在更替水平，很大程度还是靠“推车”。美国的人口政策的一些做法，值得中国深入研究。

越是最基本的权利，就越是需要公平地得到保障。比如在空气和阳光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源，无论贫富基本是平等共享的。生育是最原始的本能，生育权是仅次于生存权的基本人权。一夫一妻制的建立（平均主义），就是为了保障性和生育这两大基本权利在制度上平等。无论贫富，基本的生育权都需要得到保障。合理的制度是既能让高学历、高收入者“愿意生”孩子，也让低收入者“养得起”孩子。

目前，城市人、高学历者（尤其是女性）生育率很低，表面看，是“自愿”不想生孩子，其实是生育权没有得到保障，主流家庭根本生不起三个孩子，他们的人生是禁不住“生命核算”的。这说明现代城市规划、教育制度、住房政策、就业模式出了问题。

当然，正常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有人多生，有人少生、不生、单身。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

是不生、单身者由于没有在人口再生产上尽义务，需要缴纳较高的税。中外古代政府就长期实行这种税赋政策；现在欧美国家也都实行这种政策；韩国政府也向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提供补贴，并向不生育的夫妇和婚龄内的单身男女征税。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现在中国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规划都是依照独生子女家庭模式设计的，城市容积率比日本、韩国还要高。如果以这种模式完成城市化，今后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比现在的日本、韩国还要低。中国未富先老，在鼓励生育上将无力如现在欧美那样靠“推车”，必须在“生育引擎”上多花工夫。中国要让主流家庭愿意生、也养得起三个孩子，让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任重而道远！

现在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制度还远没有稳定下来，互联网和3D打印技术等将进一步改变产业结构、就业模式、城市布局。如果不能在动态中成功建立起适应新的经济模式的生育模式（包括生育、生命伦理体系，经济支撑体系，男女分工模式，经济和文化激励体系等），即便是像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民族，也会很快衰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着眼现实，解决人口危机

以前，将一切问题都往“人口太多”上推而不主动找出路；今后，要防止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有些问题在过去的发展模式是难以解决的，但是人类社会毕竟是有弹性的，因为人是一种生物，而适应环境、改变环境是生物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今后将有4亿老人、4000万光棍、数百万失独家庭，这是客观事实。必须正视现实，适应这种人口结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年老体衰虽然是很多疾病的原因，但是如果预防的当，还是可以降低很多疾病的发病率、降低护理成本、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的，今后老年医学在养老中将起重要作用。同样，老年化虽然是经济衰退和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调整发展模式，在新的人口结构下，还是可以做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的。

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沙漠化”，靠传统的粗放式“灌溉”（家庭养老和财政补贴）的方式，显然是种不出“庄稼”来的。但人类社会毕竟是有适应能力的，还是会探索出一些“滴灌”术的。比如2002年美国兴起的“家庭互助养老”就值得借鉴。志愿服务是社区养老机构运营的基础，绝大多数是社区周边的居民，很多还是社区的老

人。这些老人既给别人提供服务，也是被服务对象。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满足老年人“就地养老”的愿望，并且费用很低。

改善养老模式固然重要，但如果“面粉”（劳动力）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区养老还是难以为继的。比如日本比中国早30年进入了老年社会，已经建立起多样化的养老模式，但是由于老年抚养比在持续增加，老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因此，中国应该双管齐下：既提高“制面包技术”（探索养老模式），也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提高“面粉”的供应能力。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会过于强调社会的适应性，并乐此不疲。但是必须牢记一点：人是生物，生物体最基本的特征是新陈代谢，这是与非生物最本质的区别。只有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生物体才能进行生长、发育、应激、适应、遗传和变异等各项生命活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就是因为中华生育文化符合“生物学”原则，强调新陈代谢（“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而现在美国的生育文化尚处于“物理学”的水平（推车），还没有上升到“生物学”的高度。没有人口的新陈代谢，人类文明将如同温水煮青蛙，在适应中灭亡！

BIG COUNTRY WITH AN EMPTY NEST

后记

这些年我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鼓励和支持。王小强老师在内刊《香港传真》上发表我多篇文章，并支持我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2004年至今，8年来茅于軾老师给予我道义上持续的支持。梁中堂老师是1979年就参与人口政策的“老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2006年开始与我坚定地站在一起，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杨支柱兄在2006年以来与我有许多深入的讨论，达成很多共识，这些年他一直笔耕于网络和报刊。孔庆东兄在2005年之后利用多种机会帮助传播我的观点，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马德先生主持的《光明观察》和仲大军老师的网站则帮助了我早期观点的传播。潘维老师也提供了传播平台（包括内刊和讲坛）。叶廷芳老师在2007年联名29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废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他说“好几次我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在情感上与我有强烈的共鸣。戴国庆老师近年除了帮忙传播我的理论外，还与杨支柱兄一起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一些建议。黄文政兄在2003年就开始支持我的观点，在我邮寄资料遇到困难时，与我的族兄易武等慷慨解囊。

余永定、袁绪程、姜明安、袁刚、董克用、何亚福、王鑫海、王勋、金观源、程亚文、旷新年、李红刚、陈友华、陈子明、刘钟毅、苏剑、李建新、穆光宗、梁建章、居雄伟、郑也夫、孙笑侠、童大煊、涂肇庆、王广州、丁金宏、游允中、赵虹、黄细花、杨莹、薛涌、文学、王建军、李茂生、王飞跃、廖进忠、陈潭、黄元河、丁力、曹思源、余晖、秋风、魏城、韩德强、滕彪、张宏良、袁伟时、李伟东、陈绍华、孙大午、于风政、周天勇、牧沐、梅新育、管清友、刘军宁、袁颺、顾海兵、毛寿龙、伊力哈木·土赫提、展江、贾葭、郑克强、旺秀才丹、左春和、郭洪钧、顾昕、曹顺庆、刘仁文、管益忻、马进、鄢烈山、汪海林、张耀杰、徐昕、郭松民、杨子云、蔡守秋、徐骏、孙晋、徐建民、邵晟东、郭琼虎、薛云、吴述纲、赵磊、薛蛮子、黎明、长平、盛洪、魏甫华、摩罗、许志永、阎桂丽、王建勋、冯兴元、肖雪慧、

马勇、丁东、李子暘、陈玉宇、陈浩武、夏骏、彭中天、陈云、李蒙、鲁晟、万庆涛、洪秀平、范瑞平、刘汉清、蔡铮、杨明佳、彭晓辉、梅志罡、高卫星、王孝俊、周家群、马武华、樊明、蒋晓蕙、马建、向继东、张英洪、常伟、崔春婷、许凯、和阳、肖郎平、金微、梁杰华、吴祚来、陈焕仁、宋鸿兵、张祥龙、夏业良、焦国标、罗志渊、罗竖一、吴洪森、朱毛斋、罗天昊、赵勃楠、李铁、吴钩、李寒秋、郑旭光、金满楼、傅蔚冈、尹建新、赵克罗、胡冰川、欧阳桃花、李春涛、仲富兰、黎来芳、何光伟、陈新欣、侯宁、黎光寿、老可、徐挺、张禹东、侯虹斌、刘佑平、李方平、张后奇、刘卫国、周明华、王以超、叶竹盛、张梦云、朱又可、尹名兴、杨桐、杨政文、高明勇、刘海波、张凯、刘帅、王攸欣、陈智富、陈林清、许西安、葛洪义、汪云志、李俊、杨团、张连起等数百位老师、朋友、贤达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供过帮助或者在我发起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留言”活动中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同事，欢迎更多人继续“三言五语评计生”。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徐胜、黄华斌、黄海清、赵伟、刘先平、丁昕、崔胜、孙聚民、何龙飞、大汉樊吟、心软、自自强、轩辕东、杨汝辉、吴德宣、宋剑雄、Mike Wu、李友林、李敏辉、连连风雨、月影风声、杜杨、花衣笛手、Henanyanling、舟木、人口如棋、阿蚌、伊文、祭轩辕、喧寂斋、小米的步枪、灌水拍砖、国年、默默祝福、天为人纲、来往变常、很寄生、华云龙、任星辉、黄凯平、应剑群、吴主任、夏小芽等，由于人数众多，暂时难以一一列举，今后会专门整理一份名单）的大力支持。有些贡献于幕后（收集、邮寄资料），有些奋战于前线；有些在网络“各领风骚一两月”，有些从2003年、2004年就一直坚持“日顶一帖，日行一善，日拱一卒”；有些还设法“生产自救”、“言传身教”。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座座壁垒被攻破，终于形成了从网络草民到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的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体呼吁。我两次回国，都有一些网友从数百里、数千里之外赶来相见。

最后，要感谢媒体界朋友的鼎力支持。凯迪、光明观察、天涯、网易等众多网站为这股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平台。这些年，我先后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系、南方报系、经济观察报、凤凰传媒、第一财经传媒、香港文汇报、南华早报等数十家国内媒体以及美国之音、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新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十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或约稿。

易富贤

2013年1月15日

易富贤出版《大国空巢》有重大意义。在我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著作中，这本书资料最详尽，观点最客观，论据最扎实，而且通俗易懂。想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情况，这是一本必读书。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观点不只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其尖锐并富有逻辑的阐述令人振聋发聩。《大国空巢》这本书讨论了中华民族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一个大问题，它将引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从而开启一个新时代。

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条分缕析人口数据，用历史眼光、国际视野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让人通幽洞微、耳目一新。此书值得国人一读，更值得人口资源部门在做相关决策时参考。

易富贤先生怀着对民族前途的负责精神，花大量精力，以翔实的资料和新锐的观点写出了《大国空巢》，振聋发聩，有助于中国的决策者和部分受影响的公众走出人口思维的误区，走上科学决策的轨道。

大国如泡影，神州已空巢。借问肉食者，何日弃屠刀？ | **孔庆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人口政策是国策，既然是国策，就需要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和探讨。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就是一份很有份量的探索，他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他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易富贤十年磨一剑，成就这本书。他指向的是中国的一个元问题，不改变国策，由这元问题产生的一系列弊病都无从医治。

《大国空巢》从国际视野来研究中国人口与生育问题，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历史、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反思，揭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潜在危机，其观点值得国人关注，更值得政府决策部门关注。

作为门外汉，对易富贤先生的学术观点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则深感钦佩。可以不夸张地说，围绕中国人口政策的大辩论有着比任何时髦经济问题都重要得多的意义。

易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一书以翔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我国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危局，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反思。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细述了一个我国当代社会政治史的重要教训，值得以后永久记取。生育自由是政府不能剥夺的人类基本权利。

易富贤看到了中国人口结构的严峻现实和可怕前景，并发出第一声呐喊。我斗胆认为，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大书。读了这本书，就知道中国法学界以国情特殊为由拒绝关注计划生育问题的借口是不能成立的。

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学教师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
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梁中堂

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专家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姜明安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原全国政协委员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笑侠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学部委员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

潘维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今阅·图书

看好书，找今阅！ 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cheerfulreading>

上架建议 畅销书/人口

ISBN 978-7-80234-856-1



9 787802 348561 >

定价：55.00元